A hand is shown holding a white rectangular tag with a hole at the top, which is suspended by a thin metal wire. The tag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frame.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blue-toned globe of the Earth, showing continents and latitude/longitude lines. The overall lighting is dim, with a slight glow around the globe and the tag.

国际政治论坛

伊斯兰
与

冷战后的世界

东方晓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际政治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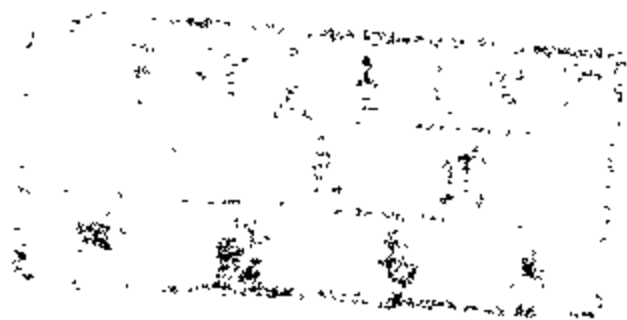
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

东方晓 主编

东方晓 陈德成 著
曲洪 王凤



20102310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东方晓主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6

(国际政治论坛)

ISBN 7-80149-145-9

I. 伊… II. 东… III. 伊斯兰国家-政治-研究
IV. D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9156 号

·国际政治论坛·

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



主 编: 东方晓
著 者: 东方晓 陈德成 曲 洪 王 凤
责任编辑: 金宜久 屠敏珠
责任校对: 张 江 同 文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0.125

字 数: 254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ISBN 7-80149-145-9/D·012

定价: 20.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际政治论坛》出版者的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两极对峙格局下形成的冷战思维和国际政治基础,终于经不起经济全球化强劲潮流的冲击,节节败下阵来,被多极化的现实所取代。今天,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要求。但世界仍然并不太平。国际政治形势呈现出对抗与对话、冲突与合作、动乱与稳定、争霸与反霸、复活冷战思维与彻底摒弃冷战思维,维护旧秩序和创建新秩序的不同势力和观念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以及经济与安全的双重动荡。迈向新世纪的国际形势的这种两重性:一方面同当前国际关系的“非零和性”和转折时期的过渡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是由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深层矛盾所决定的。首先,是大国争夺主导权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全球层面上表现为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在地区层面上则表现为若干地区性强国谋求对地区事务垄断和支配权的野心与多数国家维护地区力量平衡与稳定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冷战旧秩序瓦解后激活的民族和宗教矛盾。这种矛盾作为殖民主义遗留的严重后果。表现为国际性的泛民族主义和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两种倾向。再次,是围绕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所产生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经济全球化扩散到全世界,将其内在矛盾变成为全球性的发展矛盾,从而加剧了南北冲突;另一方面,世界市场的有限性与各国谋求自身强大发展的矛盾,引发和加深了各国之间围绕经济利益的竞争和冲突。国际政治的这种两重性及其所含的矛盾将延伸至下一个世纪。

在今天这个地球村里,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和影响愈益直接地关系到每个村民,人们对国际政局的变化及其信息和获取也表现出空前的热切关注。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兄弟系列,《国际政治论坛》将就人们关心的前沿或热点问题,或是回顾历史,揭示现代国际政治发展的规律,或是分析现实,探讨当前的格局和势态,或是展望未来,预测演变的趋势和前景,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兼收并蓄,精选国内外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优秀学术论著奉献给广大读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前 言

冷战结束是以东欧民主化、海湾战争爆发和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为主要标志的。东西方全面对抗的结束，使笼罩全球 40 余年的战争阴云逐渐散去，各国越来越把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竞争放到了头等重要的位置。为了加快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为了迅速提高生活的水平和质量，有的国家开始了全面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的自由化，有的国家则在一些国际组织或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即使是一些长期处于权威主义统治之下的国家，也实施了某种谨小慎微的经济与政治变革。看来，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西方政要和媒体以及学术界所竞相鼓吹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新时代。

然而，在穆斯林世界，特别是在中东地区，这种变化的前景远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在失去外部力量支持和依托的情况下，一些矛盾和冲突趋于缓解，然而，另一些矛盾却因为各种抑制因素的消失或失衡而变得更加难以控制，甚至一些沉寂多年的冲突也死灰复燃，成为影响地区或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有限政治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也激活了许多政治力量和社会意识，他们纷纷被动员起来，以各种方式干预、甚至试图进入政治进程，从而对穆斯林世界各国的现行政治结构形成挑战。

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干预和影响以及它对国际关系的冲击并不

始自冷战的终结，但东西方对抗的缓解和消失至少使与伊斯兰教或穆期林相关的问题变得引人注目起来。首先，沿着原东方阵营的边缘，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民族冲突与政治运动普遍高涨：在巴尔干半岛有波黑内战；在外高加索有纳—卡冲突；在中亚则是伊斯兰复兴党势力的扩散；俄罗斯内部爆发了车臣危机；在阿富汗，塔利班民兵组织迅速崛起并控制了包括首都喀布尔在内的广大地区。第二，在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界地区，各种伊斯兰组织与政府的冲突和政治斗争不断升级：激进的伊斯兰组织为了打击现政权固然是无所不用其极，越来越多的伊斯兰组织则调整自己的结构与斗争策略，把合法进入政治过程并最终攫取政权作为现实的选择。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它们长久以来就面对着仇视西方的穆斯林大众，如今，它们可能不得不面对更多的憎恨西方的穆斯林政府。第三，在穆斯林世界，不少国家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而在西方国家的眼中，这些国家不仅是地区稳定的害群之马，而且因为涉嫌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直接支持和参与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它们已经成为全球安全的主要威胁。第四，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和穆斯林移民的涌入，伊斯兰已深入西方的机体内部。这不仅对西方国家的内部整合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诱发了西方社会早已存在的毒瘤——极右势力和种族主义。更为重要的是，穆斯林移民还把其政治歧见和宗教纷争带到了西方，在西方社会内部展开了一场不宣面战的战争。同时，大量移民社团的存在还为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直接打击西方提供了方便，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发生使整个西方社会不寒而栗，所有的人都明白，打着伊斯兰旗帜的恐怖主义分子已经来到他们身边。

于是，“伊斯兰威胁论”迅速在西方国家流行起来。一些人把伊斯兰等同于恐怖主义，一些人则认定伊斯兰已取代共产主义成为冷战后世界的主要威胁，而在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眼

中，伊斯兰与儒教正结成同盟，一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已经来临。看来，如何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评价当代的伊斯兰运动，如何判断它的发展前景，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已成为事关各国政府决策和行为、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重大现实问题。

这就是我和我的同事产生写作本书想法的主要原因。

由于伊斯兰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我们能力的有限性，我不敢肯定本书在多大程度上回答了我们所设定的问题，也不敢断言本书能够为读者提供多少关于当代伊斯兰的新见解，特别是由于我们缺乏对当代伊斯兰运动的直接考察和亲身体验，因此，“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如果我们所提出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关注，我们所进行的分析能够对伊斯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裨益，那完全是课题组全体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至于本书可能存在的疏漏和问题，其责任则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因为，作为本课题的主持人，我不仅负责课题的整体设计、主要观点的产生以及大部分章节的撰写，而且对全书进行了修改和审定。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1995 年立项的重点项目，因此，我应该感谢院科研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的领导同志，没有他们的支持，本课题的立项和出版都是不可能的。我还要对西亚非洲研究所图资室和办公室的同志表示敬意，他们在资料以及课题管理等方面提供的支持是本课题顺利完成的基本保证。同时，我也对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表示感谢，他们严谨、高效、合作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向我尊敬的刘竞先生、赵国忠先生、金宜久先生、吴云贵先生和陈嘉厚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他们是中东和伊斯兰研究领域的前辈，有的年事已高仍承担繁重的科研任务，有

的因担任所领导公务缠身，但他们都在百忙之中极为认真地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极具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刘竞先生，他不仅是我进入中东研究领域的启蒙导师，十多年来还一直对我的生活和研究工作关怀备至，因此，我想把这本小书作为他 78 岁的生日礼物奉献给他，祝他健康、长寿。

东方晓

1998 年 11 月于北京

各章节撰稿人

东方晓：前言、第一章、第六、七、八、九章

陈德成：第二、三章

曲 洪：第四章

王 凤：第五章

目 录

第一章 当代伊斯兰运动概论	1
第一节 当代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历程.....	1
第二节 当代伊斯兰运动的基本类型	13
第三节 当代伊斯兰运动——研究视角	33
第二章 伊斯兰——历史的透视	43
第一节 伊斯兰教及其主要特征	43
第二节 伊斯兰教的生命力	57
第三节 伊斯兰教的复古传统	68
第三章 伊斯兰社会——来自外部的压力	83
第一节 外部压力的来源	83
第二节 外部压力的表现	90
第三节 外部压力的特点和影响.....	104
第四章 伊斯兰社会——来自内部的危机	111
第一节 近代以来传统伊斯兰社会的解体.....	111
第二节 二战后伊斯兰社会的困惑与挑战.....	132
第五章 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伊斯兰运动	156
第一节 国际格局的变动及其影响.....	156

第二节	伊斯兰与国际关系·····	169
第六章	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变革·····	189
第一节	冷战的终结与穆斯林世界·····	189
第二节	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变革·····	202
第七章	政治变革进程中的伊斯兰组织·····	227
第一节	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	227
第二节	埃及:排斥伊斯兰的政治·····	243
第三节	突尼斯:从复兴到革命的纳赫达运动·····	255
第八章	伊斯兰政治的发展前景·····	262
第一节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治发展·····	262
第二节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发展·····	281
第九章	结束语——伊斯兰:威胁还是挑战?·····	298

第一章 当代伊斯兰运动概论

第一节 当代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历程

一、当代伊斯兰运动的发生

到本世纪 20~40 年代，产生于公元 7 世纪初的伊斯兰教在经历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盛衰荣辱之后似乎已走到了尽头：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和凯末尔革命的胜利摧毁了穆斯林心中的圣殿，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则使大部分领土已沦为西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穆斯林世界陷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对于穆斯林世界来说，它所面临的危机是多重的和深刻的。帝国主义各国不仅把穆斯林国家纳入殖民主义的世界体系，肆意掠夺和剥削穆斯林国家的财富，而且人为地改变穆斯林世界的边界和政府乃至种族构成，不断在穆斯林世界制造新的矛盾与冲突，更有甚者，帝国主义各国程度不同地对殖民地进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于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普遍两元化成了穆斯林各国的共同现象。

如果说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对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的威胁是外在的，那么穆斯林社会日益流行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则是更为致命的内部威胁。应该说，穆斯林社会的世俗化和西方化进程是一个强迫与半强迫、自觉与半自觉的混合物，殖民主义的扩张和穆斯林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富国强兵，或希望借助来自

于西方的意识形态（例如民族主义）争得民族的独立，这两个方面都促成了穆斯林社会世俗化和西方化倾向的加强。尤其是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胜利以及随之进行的政治社会改革更对伊斯兰教和传统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形成巨大的震撼。

20世纪20~40年代，穆斯林世界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是，各种自上而下改革的纷纷失败、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思想归于孤寂，而民族主义逐渐成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改革已没有可能，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也毫无意义，只有民族解放才是挽救国家与民族的有效武器，在这方面，土耳其民族主义革命的胜利无疑为殖民地人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说各种伊斯兰思想归于孤寂并不是说伊斯兰已消声匿迹，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各国的伊斯兰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民族解放运动，以瓦哈比教义为旗帜的沙特家族更完成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我们想强调的是，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曾经影响深远的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改革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伊斯兰思想已势衰式微，整个穆斯林世界正在酝酿和等待一种新的伊斯兰思想和伊斯兰运动的出现。

由此看来，在这一时期哈桑·班纳（1906~1949）和毛拉那·阿布·阿拉·毛杜迪（1903~1979）分别在埃及和印度次大陆建立穆斯林兄弟会（1928）和伊斯兰促进会（1941）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了。班纳和毛杜迪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他们的经历相似，面临的社会背景相似，因此，他们的思想与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就不足为怪了。根据美国著名伊斯兰事务专家约翰·埃斯波希托的研究，班纳与毛杜迪的宗教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以下7个方面，第一，伊斯兰教为个人和团体、国家和社会提供了全方位的意识形态；第二，《古兰经》作为神的启示和《圣训》（逊奈，Sunnah）是穆斯林社会的基础；第三，以《古兰经》及先知的模

范行动为基础的伊斯兰教法（Sharia，通向真主之路）是穆斯林生活的神圣蓝本；第四，贯彻神的法律，重建真主的权威是每个穆斯林必须忠实履行的使命，如此，将给“乌玛”带来成功、权力和财富；第五，穆斯林社会的虚弱与从属地位应归咎于穆斯林的不忠，他们偏离神启的道路而追随来自西方或东方——资本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世俗的、物质至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第六，要恢复穆斯林的荣誉、权力和统治（伊斯兰帝国和文明昔日的光荣）就必须回归伊斯兰，重新贯彻真主的法则，并给国家与社会提供指导；第七，科学与技术的应用须以伊斯兰为指导，这样才能避免穆斯林社会的西方化和世俗化。^①

班纳和毛杜迪是当代伊斯兰运动的奠基者。他们的思想都超出了所在国家的边界，在穆斯林世界广泛流传，他们所建立的伊斯兰组织也被其他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所学习和模仿，从穆斯林世界的西方到东方，几乎所有的伊斯兰运动都或多或少受到他们的影响。

二、处于政治边缘的伊斯兰运动

50~60年代，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政治局势的演变主要受到两种力量和发展趋势的影响。第一，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的争夺全面展开，由于西亚、北非、南亚和东南亚等穆斯林地区或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或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美苏在这些地区的争夺表现得尤为激烈。所有的穆斯林国家或是投靠西方、或是依附东方、或是游离于两者之间待价而沽，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或者置身事外。第二，随着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衰落以及广大殖民地人民民族

^① John L.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Myth or Reality?* Oxford University, New York, 1992. PP. 122~123.

意识的觉醒，穆斯林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部分穆斯林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由于受这两种历史发展趋势的影响和制约，各穆斯林国家的基本政治现实是，在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同时，纷纷采用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各种世俗的意识形态，进行政治与社会变革，即使是在带有浓厚传统主义色彩的王权国家，诸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国，也开始了以现代化或西方化为朝向的社会、经济变革。然而，各穆斯林国家的政治与政策选择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对外政策领域，他们或多或少都必须接受冷战格局和美苏争夺的影响和制约，即便是他们的国内政策也经常处于超级大国的干预和遥控之下。

对于伊斯兰主义者和当代伊斯兰运动来说，50~60年代是一个充满挫折和痛苦的时期，无论从那个层面来说，伊斯兰教和伊斯兰运动都处于政治与社会的边缘。

首先，我们从穆斯林各国的国内层面来看。在50~60年代，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发展基本上沿循三个方向，其一是20年代获得独立的土耳其，虽然国内的政治争论时有发生，但土耳其基本上没有偏离凯末尔所确立的世俗发展道路。其二是王权国家，如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虽然各王权国家有许多的不同，但基本说来他们对外都与西方国家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王室与部族、封建贵族以及宗教上层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相互依赖关系。其三是处于民族主义革命当中和民族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在土耳其，情况比较明确，不管民间的伊斯兰宗教情绪如何变化，它都很难在政治领域发挥影响。对于那些王权国家来说，情况就稍微复杂一些，由于统治当局与传统势力之间的密切联系，伊斯兰教总能通过某种方式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宗教反对派的产生和发展。然而，由王室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已日益削弱传统宗教势力的社会和政治

地位。同时，迅速的、有时甚至是盲目的现代化也在催化着民众的伊斯兰情绪，这又为伊斯兰反对派的产生奠定了某种基础。众所周知，霍梅尼正是在这一时期不断受到伊朗国王的政治迫害，他在伊朗民众之中的影响和声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在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远比前两类国家更为复杂。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各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组织都不同程度地成为民族主义的同路人，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加强阿拉伯团结、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国家与民族寻找新的发展道路等等，这许多的共同目标把伊斯兰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联在一起。然而，当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之后，由于在建立政治制度、确定国家的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伊斯兰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伊斯兰主义者不仅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而且经常不断地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在埃及，仅1954年夏天因密谋暗杀纳赛尔被逮捕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就有400人之多。

对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运动来说，真正的危险可能还不是政府的压制，而是各国推行的以世俗化为朝向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在50~60年代，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家先后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在政治领域，确立“一党制”，严厉取缔政治反对派和伊斯兰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确保宗教上层对政府的忠诚。在经济上，各国都程度不同地实行了土地改革和经济国有化。尤其是土地的再分配，严重削弱了封建地主和宗教势力的社会地位。在司法领域，源于西方的现代刑法和民法体系逐步取代了伊斯兰教法，即使在伊斯兰教法依然起作用的领域（如个人身份）也必须接受国家的司法监督。同时政府还将教育和清真寺置于国家的管理和控制之下。为了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有的国家甚至走得更远，例如，1960年，突尼

斯当局公开指责斋月的禁食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①显然，伊斯兰教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的同时，它的社会地位也受到严重削弱。

在地区事务中，伊斯兰同样处于全面防守的地位。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胜利以后，纳赛尔主义成了风靡阿拉伯世界乃至穆斯林世界的意识形态。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广泛影响，为纳赛尔主义赢得了世界性的威望。正是在纳赛尔主义的深刻影响下，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地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王权国家土崩瓦解，另一些王权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也深切感到纳赛尔主义所带来的威胁，实际上，纳赛尔主义及其支持者曾数次作出推翻阿拉伯世界的王权统治和保守政府的努力。到1962年，随着也门发生革命，埃及更直接卷入也门内战，与沙特阿拉伯进行了一场间接^②的军事对抗。面对埃及、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革命政权的包围，以及纳赛尔主义的广泛影响，沙特国王费萨尔在穆斯林世界掀起了新一轮泛伊斯兰主义浪潮。1962年，在沙特的支持下，伊斯兰世界联盟宣告成立，其主要的目标就是应付民族主义的挑战。1965年10月至1966年9月，费萨尔国王走访了亚洲和非洲的9个保守的穆斯林国家，强调必须用伊斯兰来回击激进的意识形态的挑战。^③沙特国王费萨尔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呼吁虽然得到不少国家的响应，然而，在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纳赛尔所代表的激进的民族主义。

① Ira M.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8, P. 702.

② Willard A. Beling, *King Faisal and the Modernisation of Saudi Arabia*, Croom Helm Ltd. the United Kingdom, 1980, P. 185.

③ Willard A. Beling, P. 1988.

三、当代伊斯兰运动的高涨

70~80年代,是伊斯兰运动从低谷走向高潮的时期,从利比亚卡扎菲“绿皮书”的发表,到埃及的萨达特以“信教的总统”自居,从苏丹的伊斯兰化浪潮到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运动,从经常发生的一般恐怖活动到麦加大清真寺事件,从各国伊斯兰组织频繁的活动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在穆斯林世界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背后,差不多都可以找到伊斯兰的影子。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伊斯兰教这股蕴藏在穆斯林世界的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才引起了世人的广泛注意,以致在国内外的学术界,许多人都把这一时期看作当代伊斯兰运动发生并走向高涨的时期。概括起来,伊斯兰运动的高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政治的伊斯兰化。所谓国家政治的伊斯兰化是指统治者自上而下推动的伊斯兰化,由于穆斯林世界各国政治体制、政治意识形态不同,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也有很大区别,因此,各国政治伊斯兰化的动机和程度存在相当的差异。然而,总体看来,其目的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利用伊斯兰教来构建政治合法性和政策合理性的基础,消除统治当局面临的困境,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①于是,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一种十分奇特的政治风景便出现了。对于那些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来说,一方面重新确立伊斯兰教在国家立法和司法领域的重要地位,强调国家、社会和民族的伊斯兰特性,另一方面还努力调和世俗的意识形态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和差异,寻找世俗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渊源。对于那些保守的王权国家来说,通常的做法是,强调统治者家族与先知和伊斯兰传统的历史联系,利用与宗教上层的联盟为

^① 参见东方晓:《当代伊斯兰运动与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西亚非洲》,1994年第4期。

王权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为所有的政策编织伊斯兰的神圣外衣。

第二，伊斯兰教的政治化。对于传统的伊斯兰来说，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社会是合而为一的事情，因此，从本质上看，伊斯兰教就是政治。我们所讨论的伊斯兰教政治化首先是相对于50~60年代伊斯兰运动的边缘化而言的。从70年代开始，伊斯兰组织成了许多国家政治中最有威胁的反对派，他们深入农村和城市的贫民区，通过开办学校、诊所、银行和其他社会救助和福利机构，不仅有效地削弱和取代了政府一些职能，还广泛获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与好感。他们还乘各国政治伊斯兰化之机，利用各种会议和出版物以及清真寺，进行反政府的宗教宣传，煽动普通穆斯林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同时，他们还有计划地向军队、警察、政府部门和大学进行组织渗透，广泛地寻找同情者和同路人。对政府更直接的挑战来自于极少数伊斯兰极端组织，经常不断的恐怖主义活动使各国统治当局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黎巴嫩南部，伊斯兰组织代表了伊斯兰政治化的另外一种趋势。这类组织成为反抗外族占领的主要力量。就总的情形看，各种伊斯兰组织无不把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穆斯林社会遭受的屈辱归咎于腐败的政府当局，无不把推翻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重建伊斯兰正义作为自己神圣的义务与责任。

第三，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由于穆斯林国家政治的伊斯兰化和伊斯兰教的政治化的双重作用，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就成了某种必然的趋势。从穆斯林个人来说，人们更经常地到清真寺体验正规的宗教生活，更忠实地完成宗教功课，更愿意自觉地接受宗教信条与教律的约束；从穆斯林国家来说，除了增加各级学校的宗教课程，经常不断地在新闻媒介和公共场所渲染宗教气氛之外，还程度不同地恢复了伊斯兰教法在社会中的作用。此外，伊斯兰组织的广泛存在和积极活动，尤其是一些激进伊斯兰组织的

强制性行动都有力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伊斯兰化。换言之，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是在发自穆斯林内心的“自律”和来自外部环境的“他律”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的。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清真寺数目的增多、人们更频繁地出入清真寺、阿拉伯大袍和面纱的再度流行等等只是一种表象。其中所暗递的信息是，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漫无边际的和无序的世俗化和现代化之后，人们渴望对伊斯兰和传统的回归，期盼找回本民族早已失落的那份真实和认同。

第四，伊斯兰对王权国家的双重压力。经过千余年的积淀，伊斯兰教对于穆斯林国家来说已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一种信仰体系，它已成为穆斯林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和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除伊朗巴列维王朝外穆斯林世界的国王们或多或少都与伊斯兰有所关联^①。有的强调与先知家族的血缘关系，有的与宗教上层结成政治上的同盟，更多的则是把伊斯兰教及其经典当作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立法的主要渊源。总之，伊斯兰教构成了王国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然而，正是由于王朝统治的这一特征，使得国王们在70~80年代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伊斯兰挑战，一方面，他们面临来自宗教上层人物的压力——随着70年代石油美元的滚滚而来，各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一大批拥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社会精英纷纷涌入政府与社会的重要部门，宗教阶层的影响与势力不仅在政府决策机构受到抑制，即使在传统上由宗教界控制的教育和司法领域也遭到排斥。于是，宗教当局要求重新确认伊斯兰教与政治的联盟，重新确认国家的伊斯兰特性；另一方面，国王们还必须迎击来自民众伊斯兰运动的挑战——严重的政治腐败、贫富两极分化、传

^① 只有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是个例外，它更强调与波斯帝国的历史联系。——作者

统价值的沦丧、对西方的依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刺激所激发的普通民众对伊斯兰理想的向往。伊斯兰在两个方向对国王们形成的挑战以及各国自上而下进行的不同程度的伊斯兰回归构成了这一时期伊斯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伊朗的伊斯兰革命。1979年，一场以伊斯兰势力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了统治伊朗50余年的巴列维王朝，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不仅导致伊朗的全面伊斯兰化，而且对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产生了强大的冲击。首先，伊朗革命是现代史上利用宗教进行革命取得胜利的惟一范例，它激发了穆斯林世界压抑已久的伊斯兰宗教情绪，它使广大的穆斯林把对现代社会的所有不满变成了更加强大、更加激进的伊斯兰复兴的呐喊，80年代初穆斯林世界伊斯兰运动的高涨以及与政府的激烈对抗显然与霍梅尼在伊朗的成功有直接的联系。第二，在对外政策领域，伊朗积极致力于对伊斯兰革命的输出，虽然霍梅尼强调他只想输出那种“主导伊朗的精神”，^①但实际上，伊朗在政治、军事和宗教等方面深深卷入了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事务之中，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都把伊斯兰的伊朗视为严重的威胁。第三，巴列维伊朗的垮台使美国失去一个重要的战略盟友，而霍梅尼的伊朗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的毫不妥协的对抗更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受到不断的威胁和挑战。于是，在全球范围内，伊朗和伊斯兰势力都成了美国重点遏制和打击的主要对象。

四、伊斯兰运动的新起点——合法融入政治进程

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当代伊斯兰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激进的伊斯兰运动依然广泛存在，并

^① Shireem T. Hunter, *Iran and the World—Continuity in a Revolutionary Decade*, Indiana University, USA, 1990, P.41.

时常制造像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爆炸那样的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事件，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伊斯兰组织调整策略，改变做法，逐步放弃与政府当局对抗、不合作、不参与的态度，积极参加地方和全国选举，以合法的方式融入政治进程。1989年4月，突尼斯举行全国选举，尽管政府对选举过程严加控制，并阻止伊斯兰倾向运动或复兴党以政党形式参加选举，然而，该组织的成员仍然赢得了18%的选票，在一些城镇地区，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0%。^①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先是在1990年的市政选举中拔得头筹，继而又在1991年的议会第一期选举中遥遥领先，如果不是军方干预，取消第二阶段选举，阿尔及利亚肯定会出现第一个民选的伊斯兰政府。1992年，真主党在黎巴嫩的议会选举中取得极大的成功；同年10月，科威特议会的50个选举席位中，伊斯兰主义者轻取三分之二。^②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以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已不是某几个伊斯兰组织的政治选择，埃及和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青年运动和伊斯兰党等等，凡是允许参加选举的国家，伊斯兰组织和政党几乎毫无例外地以合法的途径融入政治进程。^③

当代伊斯兰运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它是冷战结束、国际局势变更以及伊斯兰运动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国际范围来说，冷战结束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东欧解体、苏联瓦解以及西方国家的鼓动所掀起的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经历了最初的欣喜与狂热之后，已经意识到在穆斯林世界、特别是在中东地区鼓吹民主化的极大风险，政治变革的浪潮还是对穆斯林世界传统的政治结构形

① John L.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 — Myth or Reality?* P.152.

② *Middle East Journal*, Volume 47, Number 2, Spring 1993, P.208.

③ John L.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 — Myth or Reality?* P.187.

成了巨大压力。从地区层面来说，当东西方对峙这个外在的压力消失之后，所有以这种压力为借口、为依托而存在的矛盾、力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都失去了重心。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力量重组、矛盾转换、寻求新的平衡成了地区形势发展的主要特点。海湾战争的爆发、中东和平的推进、一些地区民族矛盾的激化或沉寂、某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变革等等，都属于这种变化进程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种压力的相互作用之下，在广大的穆斯林世界，一些国家放弃了持续数十年的一党统治（如阿尔及利亚和也门）、一些国家扩大了选举范围（如埃及）、一些国家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如土耳其、突尼斯等）、一些国家扩大了政治参与程度（如海湾诸国）。从伊斯兰运动本身来说，也到了适时调整方向和行动纲领的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所掀起的浪潮已进入低谷，即使伊朗自己也早在调整其内外政策。同时，与政府当局的激烈对抗和战争不仅未能推动伊斯兰理想的实现，还招致了政府的严厉镇压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更为严重的是，广大的穆斯林民众已厌倦了社会与政治的动荡不安。正是在这种极为复杂的背景下，一些伊斯兰组织调整了功能与结构，尝试用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进程。虽然穆斯林各国情况不同，政治与社会的开放程度各异，伊斯兰组织的存在方式也千差万别，然而，当代伊斯兰运动确实已经进入一个功能转换、结构调整的新时期。

怎样评价冷战终结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还有待未来的发展能给我们提供多少启迪，然而，对于当代的伊斯兰运动来说，90年代确实给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要么信守固有的传统原则，坚持在现有的法律和政治进程之外同政府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要么实现自身的变革，以理性的政治参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然而，不管采取哪种方式，伊斯兰的思想家们必须首先为伊斯兰运动设计出可行的方案，为伊斯兰社会绘制出现实的蓝图。

第二节 当代伊斯兰运动的基本类型

一、自上而下的伊斯兰运动

当代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民族国家是在本世纪中叶以前建立起来的，虽然各国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到经济体制、社会政策都存在很大的差别，然而，就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来说，基本上可以分为3类，即世俗国家、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国家。

所谓世俗国家是指那些在建国原则中明确规定实行政教分离、在社会生活中广泛推行世俗化的国家。这一类型的国家最典型的就是土耳其。在凯末尔的带领下，从20~30年代土耳其进行了广泛的世俗化和西方化改革。1923年，土耳其废除苏丹制；1924年又废除了哈里发制，同时将宗教基金和乌勒玛置于政府部门的控制之下；1925年，解散苏菲教团；1926年，根据瑞士民法典制定的新的家庭法取代了伊斯兰教法；1928年进行了文字改革，消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对土耳其语的影响，另外，在服饰、社会风俗等方面也进行了西方化的改革。^①凯末尔的改革以及他确立的基本发展方向使土耳其成为穆斯林世界世俗化和西方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所谓伊斯兰国家是指那些伊斯兰教与政治结成了某种同盟、宗教为政治提供统治的合法性的国家。在伊斯兰国家中，伊斯兰教及其经典构成了立法的主要源泉和政治统治的根本基础，伊斯兰教的上层人物积极参加或干预政府的决策，并在教育、司法等领域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沙特阿拉伯自称为伊斯兰国家。它的历史与18世纪兴起的瓦哈比宗教改革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在

^① Ira M.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y*, pp. 608~610.

当代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生活中，《古兰经》是王国的宪法和政治统治的基础，伊斯兰教法是规范和约束社会的法律，乌勒玛作为王室与政府的顾问、作为王国法统的监护人、作为司法和教育等机构的官员享有崇高的荣誉与地位。伊斯兰教不仅为沙特王室的统治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为王国的各项内、外政策构建合理性的基础。

所谓穆斯林国家是指那些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构成其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主体的国家。应该说，穆斯林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属此类。在穆斯林国家中，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复杂。一般说来，国家的统治者都把一些源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策选择、法律规范和管理模式使用于穆斯林社会，也不刻意用伊斯兰教来构筑政治合法性和政策合理性的基础。然而，他们都试图将伊斯兰教和宗教阶层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寻求宗教界的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伊斯兰教对现代社会的作用和意义。比如，在宪法中承认伊斯兰教是立法的主要源泉，承认伊斯兰教法在某些领域的特殊作用，要求国家元首必须是穆斯林等等。

虽然穆斯林世界各国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大不相同，但是从70年代开始，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恢复和强调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广泛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回归伊斯兰的现象。

1. 利比亚：卡扎菲的第三条道路

1969年9月，以卡扎菲为首的一批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统治利比亚的伊德里斯王朝，虽然卡扎菲的革命从根本上讲可以被看作是纳赛尔在中东地区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然而，从一开始，这场革命就有着强烈的伊斯兰特性。1969年10月，也就是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接管利比亚政权的第二个月，卡扎菲就委托埃及法理学家阿里·阿里·曼苏尔研究伊斯兰教法以及如何用伊斯兰教法取代利比亚的成文法，其目的

就是以伊斯兰教法为指导，逐项审核在利比亚施行已久的欧洲法，排除那些与伊斯兰教法相违背的现行法律条款。于是，在革命后的利比亚，饮酒、赌博和夜总会被严厉禁止，伊斯兰教法的某些律令得以恢复，比如偷窃者断手，私通者用石头砸死，在商业交易中禁止支付和收取利息等等。1978年10月28日的一项政府命令中则规定，在新的法律和立法颁行以前，必须首先考虑它们是否与伊斯兰教法的根本原则相符合。^①应该强调的是，以曼苏尔为首的审查成文法的高级委员会和负责审查个人身份法、商法和刑事法典的三个专业委员会是比较务实的，在审查现行法律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局限于在利比亚占主导地位的马立克教法学派的传统，而是灵活地引入和使用其他三大逊尼派教法学派、甚至十叶派教法学派的方法和原则，最大可能地保存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现行法律。同时，曼苏尔还强调利比亚法律与埃及法律的联系，毕竟埃及的法律已经过艾资哈尔乌勒玛的论证，其有效性和与伊斯兰教法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70年代中期开始，卡扎菲陆续发表了《民主问题的解决办法》、《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社会主义》、《世界第三理论的社会基础》等三篇著作，并最后汇编成《绿皮书》出版发行。虽然《绿皮书》试图构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第三条发展道路，卡扎菲也以此为蓝本在利比亚建立了十分奇特的政治、经济制度，然而，一般的评价是，它不过是泛阿拉伯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在利比亚的混合物，它所讨论的问题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当代伊斯兰思想有许多的共同之处，比如，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西方的依赖导致的软弱和认同感的沦丧、以剥削和腐败为特征的社会不公、只有伊斯兰的回归才能恢复阿拉伯和穆

^① Marius K. Deeb & Mary Jane Deeb, *Libya: Since the Revolution*, Praeger, USA, 1982, P. 99.

斯林往日的力量和荣耀。^①

虽然伊斯兰教在革命后的利比亚有着广泛的影响，世界第三理论也与伊斯兰教存在天然的联系，然而，卡扎菲的“伊斯兰革命”却在穆斯林世界引起巨大的争议，即使在利比亚国内，宗教界和虔诚的穆斯林对之也持拒绝和否定的态度。首先，卡扎菲强调与真主的直接对话，反对和否定教法学家和乌勒玛在真主与人之间的中间作用。他在1978年2月19日的一个演讲中谈到，“《古兰经》使用的是阿拉伯语，因此，用不着伊玛目解释，我们自己就能理解。”^②第二，卡扎菲坚持《古兰经》是立法的直接源泉，否定伊斯兰其它经典的作用。他认为，由于《古兰经》以外的经典不是神启的，是人的智力活动的结果，因此他们不仅曲解了《古兰经》的本意，而且更可能带有教法学家本人的经历印记和感情色彩。由此他得出结论，当今穆斯林的信仰和习惯并不完全与伊斯兰的根本原则相吻合。第三，卡扎菲在降低逊奈（Sunna）和哈底斯（Hadith）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伊智提哈德（ijtihād）的大门并没有关闭，从而为他自己随意解释伊斯兰提供了方便：他不仅敢改变伊斯兰教历的日期排列，还大胆地宣布到麦加朝觐并不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③

纵观革命后的利比亚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第一，伊斯兰教为“9·1革命”和革命的政策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它是穆斯林世界70年代开始的自上而下伊斯兰回归浪潮的一部分。第二，伊斯兰思想是形成世界第三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卡扎菲在70年代末一再坚持两者毫无关联只是表明，他力图使世界第三理论有更大的适应性。第三，卡扎菲是

① John L.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Myth or Reality*, P.81.

② Marius-K. Deeb & Maty Jane Deeb, *Libya: Since the Revolution*, P.103.

③ John L.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Myth or Reality*, P.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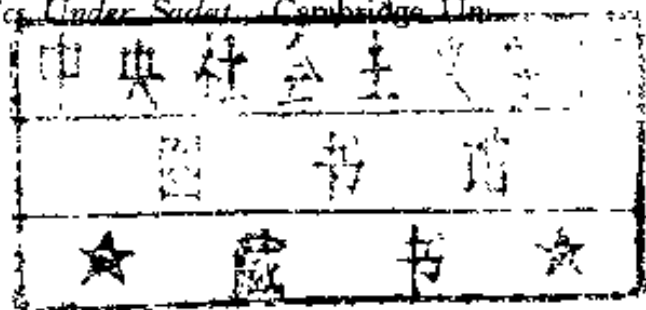
一个有着强烈个人意志的领袖，他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不允许宗教人士在清真寺中对政府指手划脚，他要在真主和伊斯兰教面前掌握主动权，保持与真主和《古兰经》的直接联系。第四，卡扎菲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伊斯兰教是他推行内外政策的利器，他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2. 埃及：萨达特——信士的总统

1970年9月28日，埃及一代伟人纳赛尔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对于新任总统萨达特来说，他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是多方面的。作为纳赛尔去世时的副总统，萨达特继任总统顺理成章，并且，在10月15日的公民投票中，他赢得了90.04%的选票，然而，在当时的埃及，所有这些都不足以确保总统权力的安然无恙。事实上，萨达特之所以被政治权力的核心人物接受，很大程度是因为大部分人“认为他是一个可由他们支配的弱者”。^①因此，新任总统萨达特遇到的首要危机，就是如何消除以副总统阿里·萨布里为首的左翼自由军官和他们的文职官僚同盟对总统地位所形成的巨大挑战，并逐步建立稳固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萨达特还必须面对更为深层的社会危机。纳赛尔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虽然把埃及建立在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更为平等的基础之上，然而，埃及的经济并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在纳赛尔统治时期，埃及的年经济增长率大约是4%，这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由于人口增长迅速，人均收入的年增长还不到2%，远不能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同时，长期与以色列的对垒、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技术官僚的高工资耗尽了埃及的有限资源，使得储蓄与

① 穆罕默德·海卡尔著，发恩、黎启译：《萨达特遇刺记》，第44页，新华出版社，1987。

② Raymond A. Hinnebusch Jr, *Egyptian Politics Under Sadat*,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5, P.27.



投资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更加重了埃及的财政危机。1967年战争的失败对于埃及来说是灾难性的。一方面，埃及失去了来自苏伊士运河、西奈油田和旅游部门的巨大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为恢复大伤元气的军队和重建被毁坏的运河沿岸地区又必须维持庞大的政府开支。更为严峻的是，人们开始怀疑纳赛尔主义及其内外政策，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社会政治力量围绕纳赛尔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如果说纳赛尔还能够用其强大的个人魅力和杰出的政治才能控制各种力量的消长和保持埃及的稳定，那么萨达特无论如何是难以做到的。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萨达特采取的有效战略之一就是“分面治之”^①——在各种不同势力的争论和对峙中，保持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埃及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回归，正是这一复杂背景下的产物——萨达特试图用伊斯兰化解纳赛尔主义和左派对他形成的巨大压力，用伊斯兰构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首先，萨达特刻意强调传统的社会结构和道德价值对埃及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宗法式的家庭和村社是埃及的理想模式，整个埃及就是一个这样的大家庭和大村社，在这样的大家庭和大村社中，富人与穷人和睦相处，人们摆脱阶级之间的忌妒、仇恨和极端情绪，尊重长者的权威，“传统的埃及美德”，诸如忍耐、决心、宽容和团结得到发扬。与此同时，伊斯兰教法被确定为立法的基本源泉，信仰是埃及的力量之本。^②萨达特还有效地利用乌勒玛与政府的合作，为其内外政策提供合理的依据：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艾资哈尔的乌勒玛不仅帮助政府有效地平息了关于开放政策的争论，还刻意把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和与以色列的《戴维营协议》说成

① Raymond A. Hinnebush Jr, *Egyptian Politics Under Sadat*, PP.87~88.

② Raymond A. Hinnebush Jr, *Egyptian Politics Under Sadat*, P.113.

是符合真主意志的和平行动。萨达特本人也从不掩饰自己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他把 1973 年 10 月的战争形容成对以色列的“圣战”，把战争的胜利归结为士兵们的宗教热情；每个星期五他都前往清真寺，并让新闻媒介大肆渲染，他宣称，他是“信士的总统”。萨达特最为大胆的举动莫过于他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与怂恿。他释放了大批被长期关押的兄弟会成员，允许流亡国外的兄弟会领导人返回埃及，宗教杂志《呼声》重新出版。更为重要的是，他鼓励伊斯兰组织在大学里积极活动，以抑制纳赛尔分子和左派分子在校园的影响。

利用伊斯兰教的力量，萨达特成功地反击了政治反对派的挑战，然而，他的开放政策及其负面效应、亲美政策与以色列的媾和很快成为伊斯兰组织的反对目标，一场失去控制的自上面下的伊斯兰浪潮，最终把萨达特淹没了。

3. 沙特阿拉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寻找未来

现代沙特阿拉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中期发生在阿拉伯半岛的一场宗教—政治运动：1744 年，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发起的纯洁伊斯兰教和确认对真主的信仰的宗教改革与穆罕默德·本·沙特推动的统一阿拉伯半岛的政治运动实现了历史的结合，瓦哈卜为推动半岛统一的政治行动提供精神支柱，沙特则为实现对伊斯兰基本原则的回归构建物质基础。正是沙特家族与瓦哈比主义的历史联系构成了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最为深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一方面，沙特王室保证乌勒玛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保证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的广泛影响，另一方面，乌勒玛则为王国的世袭统治、为王室推动的各种政策提供宗教的合理性和与伊斯兰传统的一致性。

应该说，王室与宗教界的联盟是沙特阿拉伯长期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王室与乌勒玛、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并不总是能保持平衡，实际上从一开始，宗教

就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宗教界虽然控制着众多的委员会和社会机构，并通过这些机构对政治和社会进行监督，有的乌勒玛甚至直接参与政府工作，就某项政策提供咨询意见，然而，从总体看，宗教的作用是边缘性的，乌勒玛的意见也没有很强的约束性，他们更多地只是对政府的行为和早已形成的决策进行论证，提供合法性。^①

从60年代开始，来自不同方面的力量对沙特阿拉伯的传统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形成巨大冲击。第一，民族主义的全面胜利，以及埃及、伊拉克和也门等国家王权的相继覆灭使沙特阿拉伯王室感到深切的威胁，王国内部，甚至王室内部都出现了政治反对派。第二，为了与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抗，沙特在祭起泛伊斯兰主义大旗的同时，还成了各种保守势力以及伊斯兰流亡分子的避难所，这些流亡的伊斯兰分子一方面与费萨尔合作对抗民族主义，但另一方面也培育了沙特内部的伊斯兰反对派。第三，从60年代开始，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尤其是70年代石油美元的滚滚而来为沙特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现代教育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大量外籍劳工的进入、西方思想的侵袭、迅猛的城市化对沙特的传统价值和政治结构形成极大的冲击。

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在两个层次上促成了伊斯兰情绪的高涨。第一个层次是乌勒玛与王室的矛盾有所加深，他们不仅对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深感忧虑，更对政治特权的逐渐丧失强烈不满，他们甚至容忍和鼓励新伊赫万对政府进行激烈的批评。第二个层次是民众中出现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新伊赫万不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沙特王室，还把矛头直接指向与政治

^① 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Croom Helm Ltd, Great Britain, 1988, P.20.

结成同盟的乌勒玛阶层。1979 年底一伙激进的伊斯兰分子武力占领麦加大清真寺，表明民众的伊斯兰运动已成为沙特社会中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对民众伊斯兰运动的挑战，沙特王室别无选择，它与伊斯兰的天然联系、乌勒玛在粉碎麦加叛乱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都决定沙特王室只能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求新的平衡，重新确认和巩固与乌勒玛的宗教—政治同盟。因此，80 年代初，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进程放慢了，伊斯兰教法也在社会中得到更严格的执行，尤其是法赫德国王继位以后，宗教与政治的同盟进一步加强。法赫德国王每周都与宗教人士会面，并就各种事务向乌勒玛咨询。他还鼓励乌勒玛努力保护王国的瓦哈比特性和沙特的生活方式。同时，学校的宗教课程增加了，男女隔离制度得到更严格的执行，社会提供给妇女的就业机会也大大减少。^① 总之，在整个 80 年代，宗教与政治的联盟进一步巩固，乌勒玛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得到强化，沙特社会似乎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

二、自下而上的伊斯兰浪潮

从 1928 年哈桑·班纳在埃及的伊斯梅利亚建立穆斯林兄弟会开始，自下而上的民众伊斯兰运动就逐渐构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的主体。与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不同，它不是政治当局与宗教上层相互结合和相互利用的产物，也不是对民众伊斯兰情绪普遍高涨的被动反应。这种由普通的非宗教人士和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宗教复兴运动，以政府和宗教当局为对立面而活动。它是对穆斯林社会政治、经济的衰弱、传统道德和民族认同感沦丧的特殊的反应。当代民众的伊斯兰复兴的呐喊遍

^① Merdechai Abir, P.192.

布穆斯林世界，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同时由于所在国家或地区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他们的不同点显而易见。然而，穆斯林国家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相似的发展历程又使民众伊斯兰复兴显示出许多共同的特征。

第一，与现存统治当局，包括宗教当局的强烈对立。一般说来，自下而上的民众伊斯兰运动是作为现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异己力量存在的，不管统治当局与伊斯兰有着怎样的联系，也不管统治当局怎样强调伊斯兰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作用，民众伊斯兰运动都对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尽管民众的伊斯兰组织有的态度比较温和，有的以合法的形式参与政治进程，然而，他们的最终目标依然是建立伊斯兰的统治，用宗教基本原则、用宗教法律建立符合伊斯兰正义的理想社会。在他们的眼中，现代社会已完全背离先知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启示的真主之路，现代社会的统治者是背教者，是伪信者，而宗教当局则已堕落为统治当局的帮凶。

第二，强烈的反西方倾向。从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一直被视为穆斯林社会的最大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的穆斯林国家虽逐渐获得政治独立，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然而，由于美苏的对峙和以色列犹太国家的建立，伊斯兰遭受屈辱的历史并没有结束。相反，由于穆斯林国家不同程度地接受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不同程度地依赖外部势力，穆斯林社会的各种危机甚至有逐渐加深的趋势，因此，民众的伊斯兰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反对西方统治、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传统。

第三，强烈的反世俗化、反西方化倾向。当代的穆斯林国家虽然建立了不同的政治制度，采用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大部分的国家都把推动社会的现代化作为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当代的现代化理论是以西方社会的发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此，世俗化——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排除宗教

的影响就成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先决条件，而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又被理解为西方化。在传统的伊斯兰看来，伊斯兰与政治、伊斯兰与社会、伊斯兰与生活的一切方面根本就是不可分的，伊斯兰就是一切，所以，现代化理论与伊斯兰教、现代化与传统的伊斯兰社会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由于各国对现代化认识上的偏差，由于现代化进程的盲目性，伊斯兰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激化了。

第四，强调伊斯兰对现代社会的重要作用。当代民众伊斯兰运动无不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持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态度。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过度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人们的精神需求，共产主义则否定神的存在，坚信唯物主义。与此相反，伊斯兰提供了一种完美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克服了现代社会的一切弊端。在这里，我们看到，民众的伊斯兰并不是简单地召唤向传统的回归，而是力图把伊斯兰当做现代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第三种选择。

当代民众伊斯兰运动对现代社会的排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与现行社会制度进行全面的战争。实际的情形是，当代民众伊斯兰运动十分复杂，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组织内部，伊斯兰与社会的关系，伊斯兰与政治的关系经常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便于对问题的讨论和理解，我们把民众伊斯兰运动的存在形式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激进的伊斯兰运动。激进的伊斯兰运动往往使用暗杀、爆炸、绑架人质，甚至袭击平民百姓和民用目标等激烈的武力方式同政府当局进行对抗。在他们的眼中，现实社会已经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伊斯兰，一个是非伊斯兰，两者已没有调和的余地，对非伊斯兰的阵营进行“圣战”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它们可以是一个组织，如1981年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圣战组织”；它们也可以是某一合法伊斯兰组织的执行特殊使命的秘密机构，

如早期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都有自己的军事组织；它也可以是伊斯兰运动某一发展时期的主要形态，如伊朗革命以后在穆斯林世界引发的激进伊斯兰浪潮。应该说，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及其人数并不是很多，也不是民众伊斯兰运动的主流。然而，它的破坏性和影响力却是巨大的，也许，正是暗杀政治领袖、袭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这样一些震撼人心的恐怖主义活动才使人们认为伊斯兰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第二类是社会的伊斯兰运动。社会的伊斯兰代表了当代伊斯兰运动中的非政治的趋势。它的成员对政治当局鼓吹的意识形态、选择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不感兴趣，也无意通过某种方式去获得权力。他们深入落后的乡村和城市中的贫民区，深入社会的最低层，利用清真寺和各种家庭及社区的聚会，宣传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和传统精神，强化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和对真主的崇拜；同时，利用大量宗教捐赠积累起来的雄厚财力，开办银行、企业、学校、医院、诊所，向穆斯林提供各种周到的服务；另外，他们还建立社会救助、职业培训和其他福利性机构，向贫困的穆斯林提供直接的帮助。社会的伊斯兰不介入政治，对政府已失去信心，它的成员所建立的种种社会机构虽然是对政府职能的某种补充，但同时也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有效削弱。他们并没有对政治当局进行直接的打击，然而，他们对伊斯兰信仰的广泛宣传，在普通穆斯林中的强大影响，却是穆斯林国家统治当局面临的致命威胁。据报道，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着埃及 22 个最大专业协会，拥有几十个诊所、医院和学校，除了拒绝使用武力以外，其目标与其他地下组织的目标是一致的。^①

第三类是政治的伊斯兰运动。政治的伊斯兰运动是指在现行体制内进行合法政治斗争的伊斯兰政党和组织。虽然这些伊斯兰

^① *New York Times*, June 12, 1994.

政党和组织在其党纲或行动纲领中仍然坚持伊斯兰教及其经典和伊斯兰教法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仍然把建立伊斯兰国家作为最终的目标，然而，由于他们以合法的方式进入政治进程，不使用或者放弃了激进的斗争手段，因此，他们实际上已认可了现代政治的运行方式，诸如选举、议会、民主等。尤其是从 90 年代开始，不少伊斯兰政党在市政和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有的甚至直接入主政府。越来越多的伊斯兰组织政党化、合法化也许预示着今后伊斯兰运动发展的新趋势。

三、新泛伊斯兰主义

新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当代伊斯兰复兴的第三种表现形式。

泛伊斯兰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步伐的加快，穆斯林世界生存危机的加深，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穆斯林思想家就奔走于阿富汗、埃及、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力图把穆斯林世界统一在一个以哈里发为首政府之下，根据伊斯兰的基本原则，调和宗教与科学、宗教和理性之间的矛盾，通过穆斯林社会内部的改革和汲取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最终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伊斯兰国家。因此，近代的泛伊斯兰主义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穆斯林世界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直接反映，它在穆斯林世界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改革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伊斯兰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帝国——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凯末尔革命胜利以后更废除了哈里发制度，至此，旧式的泛伊斯兰主义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虽然从 20 年代到 60 年代，在一些国家和宗教机构的鼓动之下，先后数次召开伊斯兰大会，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实现穆斯林世界的联合

与团结，然而，由于各国矛盾重重，更由于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强大，将穆斯林各国联合在伊斯兰的大旗之下，强调伊斯兰的基本原则和伊斯兰教法对现代穆斯林社会的核心作用，不仅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而且更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运动。为了有助于问题的理解，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新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历程。从2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是新、旧泛伊斯兰主义的转换时期。一方面，旧式的泛伊斯兰主义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穆斯林世界共同的精神领袖哈里发已不复存在，穆斯林各国或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托管地，或已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情况下，鼓吹建立以伊斯兰基本原则和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已没有任何可能。实际上，旧式的泛伊斯兰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梦想，在穆斯林世界，家族的、种族的、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早就超越了宗教的利益，更不用说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下，任何改革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另一方面，旧式的泛伊斯兰主义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泛伊斯兰主义还没有寻找到合适的历史基点和发展机遇。从20年代到60年代，所有泛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活动都说明了这一点。1926年，开罗伊斯兰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寻找一位哈里发；1927年埃及成立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其核心纲领是恢复哈里发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不再关心哈里发的命运，但仍然醉心于建立“伊斯兰斯坦”、“穆斯林联合国”，实现伊斯兰统一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泛伊斯兰主义也开始追求一些新的比较现实的目标，比如，推动穆斯林各国在科学、文化领域的交流，强调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等。但不幸的是，与泛伊斯兰主义比起来，民族主义在地区和国际事务有着更大的感召力。

1967年的中东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它为新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壮大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首先，1967年战争的失败使以纳赛尔主义为主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遭受重大的

挫折。军事上的失败使人们开始怀疑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一切方面：它的国有化政策和土地改革没能有效地推动经济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平等，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它也没能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减少对苏联的依赖。其次，战争中阿拉伯国家不仅丧失了像戈兰高地这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而且作为伊斯兰第三圣地的耶路撒冷也完全陷入以色列之手。1969年，阿克萨大清真寺被毁，所有这些事情极大地刺激了各国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对于穆斯林来说，阿以冲突已不再是阿以双方的事情，从以色列控制之下解放耶路撒冷是每一个穆斯林的神圣义务。第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在中东战争中受挫，大大缓解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保守的中东王权国家所受到的压力，同时，日益增长的石油美元收入也为沙特等保守的王权国家推动泛伊斯兰主义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1967年的战争和沙特阿拉伯的强力推动，新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是不可能的。

早在20年代，沙特阿拉伯就有心充当泛伊斯兰主义的中心，当时的沙特国王伊本·沙特于1926年发起召开世界伊斯兰教大会，试图利用沙特独特的宗教地位确立对伊斯兰事务的领导权。50年代~60年代，沙特更成为中东地区保守王权国家的领导核心，在费萨尔的主导下，泛伊斯兰主义成了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对抗的有效武器，1962年，在麦加建立“伊斯兰世界联盟”。然而，沙特对泛伊斯兰主义的真正有效的推动和领导是在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1969年，利用阿克萨清真寺被毁在穆斯林世界引起的震撼，费萨尔国王不仅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对以色列进行圣战，而且呼吁召开穆斯林国家首脑会议商讨对策。在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鼓动下，第一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于1969年9月在拉巴特举行，第二年，沙特又发起并组织第一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正是由于沙特阿拉伯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世界穆斯林大

会、伊斯兰世界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才成为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三个泛伊斯兰主义组织。

沙特阿拉伯推动的新泛伊斯兰主义有以下几个不同的方面。第一，它是激进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在1967年战争以前，它处于完全的防守地位，此后，它逐渐在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的事务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最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也被逐步融入泛伊斯兰主义的组织之中。第二，泛伊斯兰主义把反对以色列，尤其是把解放耶路撒冷作为自己的重要旗帜，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泛伊斯兰组织是反对以色列的最为广泛的国家联盟。第三，与旧式的泛伊斯兰主义不同，它逐步放弃了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或世界穆斯林共同体的不切实际的主张，追求在伊斯兰的旗帜下加强穆斯林国家的了解与团结，推动穆斯林国家间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第四，在一些穆斯林国家政府和伊斯兰组织的推动下，北美、欧洲和非洲等地都建立了不少伊斯兰教的宣教和研究机构，加强对伊斯兰的研究、扩张伊斯兰的影响、促进不同文化和宗教间的理解成了这些机构的重要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十多年来，伊斯兰国际组织已不再局限于关注与伊斯兰和穆斯林国家有关的事务，它们试图在更广阔的国际领域发挥影响，种种迹象表明，泛伊斯兰组织和穆斯林国家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四、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以宗教为旗帜取得革命胜利的范例，它对国际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的衰落，美国逐步成为中东和海湾地区的主导力量。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中，巴列维的伊朗是美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遏制苏联、打击激进的民族主义国家、维

护海湾通道安全的重要支柱。因此，美国一方面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巴列维王朝的独裁统治进行全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乐观地注视着伊朗所进行的以西方化为导向的现代化改革，在西方的眼中，巴列维的伊朗是强大的和稳定的。因此，当貌似强大的、亲西方的、世俗的伊朗在一夜之间垮台，被一个激进的、反西方的、伊斯兰的伊朗取而代之的时候，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震惊和不知所措是可想而知的。霍梅尼领导下的伊朗对东方、对西方都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伊朗没有倒向东方（苏联）固然值得欣慰，然而，伊朗激烈的反西方、反美国的态度却使西方在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利益和政策受到经常的挑战。

伊朗伊斯兰革命还对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形成强大的冲击。传统上，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和宗教上的歧见、在民族和领土方面的矛盾就使双方的冲突存在某种必然的趋势。然而，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首先感到的并不是这些传统的矛盾所形成的压力，而是霍梅尼极具扩散性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威胁。首先，霍梅尼对东西方都采取完全拒绝的态度，即所谓的“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世界的两个“大撒旦”。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由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全面投靠和依赖超级大国，听任超级大国控制和掠夺那些由真主赐予的资源，因此他们是海湾地区的“小撒旦”。其次，根据霍梅尼两分法的意识形态，现实社会被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阵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那些“小撒旦”都属于压迫者阵营，而伊朗则领导着被压迫阵营。霍梅尼认为，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不可避免，被压迫者最终必将战胜压迫者。第三，霍梅尼对王权统治深恶痛绝，主张建立伊斯兰政府，在霍梅尼看来，王权统治是与伊斯兰的基本原则根本相背的。他强调，任何对先知建立伊斯兰政府的行为稍有研究的人都会意识到，伊斯兰生来就是为了砸碎专制者的宫殿，下

权统治是政治生活中最为可耻的反动现象之一。^① 伊拉克首先发动两伊战争、海湾六国建立“海湾合作委员会”以图联合自保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深深感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所形成的巨大威胁。

伊朗革命对国际社会所形成的最大冲击当数它对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强劲的影响力。一种影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伊斯兰革命的自然扩散力——伊朗用不着输出革命，霍梅尼也用不着作进一步的宣传和煽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模式足以诱发普通穆斯林民众的激情和想象力，使他们起而效尤。首先面对伊朗革命冲击的是有着大量什叶派居民的海湾诸国，据统计，什叶派穆斯林在海湾各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巴林 70%，科威特 30%，阿曼 6.95%，卡塔尔 80.32%，沙特 5%，阿联酋为 41.39%，伊拉克 55%。^② 一般说来，在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什叶派穆斯林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受到压制、排斥和歧视的阶层，即使是在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他们也长期处于被统治的无权地位。因此，海湾各国的什叶派穆斯林对伊朗革命迅速做出主动的反应是毫不奇怪的。1979 年沙特盛产石油的东方省的什叶派骚乱，80 年代初科威特多次发生的爆炸事件，1980 年巴林发生的大规模什叶派示威和次年 12 月的未遂军事政变等等，都反映了伊朗革命在海湾地区的深刻影响。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还对整个中东地区，乃至穆斯林世界的民众伊斯兰运动的普遍高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穆斯林各国的伊斯兰运动多属于逊尼派，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传统和政治目标，但

① Rouhllah K. Ramazani, *Revolutionary Iran—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the Middle Eas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SA, 1986, PP.28~29.

② Edited by Ephraim Kam, *the Middle East Military Balance 1994~1995*, 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edies, Tel Aviv University, Israel, 1986.P.225、266、305、327、333、375. Ramazani, *Revolutionary Iran*, P.259.

这并不妨碍他们从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中得到启示，也不妨碍他们从什叶派的成功中汲取经验。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就要求在埃及建立“像伊朗阿亚图拉·霍梅尼政府那样的由宗教人士领导的伊斯兰共和国。”^①伊朗伊斯兰革命对当代伊斯兰运动的更强大影响还来自伊朗的主动出击——输出伊斯兰革命。革命后的伊朗不仅利用各种媒介宣传伊斯兰革命的主张，鼓动各国的民众推翻现政权，而且直接卷入了一些国家的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反对派的活动。

在整个 80 年代，关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国际社会最熟悉不过的是这样一句口号：“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有伊斯兰”。由于伊朗革命与 20 世纪时代潮流的格格不入（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由于伊朗革命对中东现行政治秩序的严重挑战，由于霍梅尼积极鼓动输出伊斯兰革命，由于伊朗在一些国际事务中的激进行动，再加上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和新闻媒介的刻意渲染，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对伊朗革命和伊斯兰充满恐惧。在人们的印象中，伊朗是国际上各种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大本营，伊斯兰意味着爆炸、劫机、绑架人质和失去理性的宗教狂热。时至今日，伊朗革命已过去了近 20 年，也许，我们应该能够比较理性地分析“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有伊斯兰”的真实含义。纵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实践，揭去霍梅尼宗教革命的神秘面纱，“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有伊斯兰”的政治宣言实际上存在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确认伊朗的发展道路。众所周知，巴列维的伊朗在坚持专制统治的同时，把推动以西方化为归宿的现代化改革作为伊朗社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巴列维伊朗还刻意强调它与古代波斯帝国的历史渊源，削弱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影响，淡化伊斯兰教对伊朗历史和文化

^① *Washington Post*, June 15, 1985.

传统的重要意义^①。这种割断历史、超越现实的社会变革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失败的危机。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社会改革的反动，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对整个穆斯林世界和第三世界所进行的各种变革（东方的或西方的，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反动，其核心意义在于，东方的和西方的发展模式都不能有效解决伊朗和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伊斯兰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第二个层次是确立伊朗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冷战的格局下，世界各国基本上被分割成两个阵营，虽然在国际事务中存在“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这样一些不愿意介入东西方之争的独立势力，但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却很难摆脱冷战的阴影。伊朗作为美国在海湾和中东的战略支柱更是深深地陷入了东西方的激烈争夺之中。如果我们揭开“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有伊斯兰”的宗教面纱，如果我们抛开任何先人为主的价值判断，我们看到的将是“既反对苏联的霸权，也反对美国的霸权，坚持独立自主”，这无疑是冷战时期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最强烈的要求。由此，我们也就易于理解为什么霍梅尼强烈地批评美国和苏联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国家，强烈地反对伊拉克和海湾诸王国。第三个层次是通过强调伊斯兰的重要意义，确立伊朗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穆斯林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在霍梅尼的思想中，世界总是被分成两个部分，以实力来区分，一方是压迫者、剥削者，另一方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以意识形态来区分，一方是追随美国的资本主义阵营——西方阵营，另一方是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东方阵营；以道德或宗教来区分，一方皈依真主之路，一方堕入撒旦之路。^② 在这个

① Edited by Peter J. Chelkowski and Robert J. Pranter,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Duke University, USA, 1988, P.45.

② Shireen T. Hunter, *Iran and the World*, P.37.

两分的世界中，伊斯兰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消除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与剥削，只有伊斯兰教才能确保一个国家政治独立和民族认同，只有伊斯兰才是通向真主之路的惟一大门。由此，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就有了非同小可意义，作为惟一的根据伊斯兰的基本原则建立的政府和惟一努力追求真主之路的国家，伊朗就成了人类硕果仅存的希望。于是，输出伊斯兰革命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仅是当代伊斯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当代伊斯兰运动中重要的表现形态之一。

第三节 当代伊斯兰运动——研究视角

对当代伊斯兰运动和以伊斯兰教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思潮的讨论已成为当前中东问题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观察角度的差异，各国的伊斯兰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对于当代伊斯兰运动的性质、发展趋势、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等问题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看法，问题的探讨与争论已超出了学术领域，对伊斯兰运动的判断、寻求应对之策实际上成了各国外交政策中的重大课题。我们在此斗胆讨论研究伊斯兰的视角和方法问题，并不是要为伊斯兰的研究提供一种不容争辩的模式，消除学术界的争鸣，只是有感于国外一些学者由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文化偏见等因素面进行的研究和讨论不仅在学术界流传其广，而且对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也有不小的影响。换言之，对当代伊斯兰运动的研究与判断已成了事关国际关系演变的重大理论问题。显然，寻找比较客观的研究伊斯兰的方法与视角已是刻不容缓。

一、伊斯兰的内在活力

当代伊斯兰研究中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从70年代开始在穆斯林世界发生了一场经久不衰的所谓伊斯兰复兴运动？从国内外已经发表和出版的大量著述来看，应该说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较为圆满的答案，归纳起来可分为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伊斯兰社会内部经济和社会的落后、政治的腐败和道德的沦落使恢复伊斯兰正义与社会公正、用严格的伊斯兰教法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重新确认对真主的信仰这样的召唤有着广泛的社会与群众基础和历史的合理性。第二，在冷战的格局下，东西方阵营对穆斯林国家在政治上压制和经济上的盘剥严重阻碍了穆斯林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阿以冲突也不断使伊斯兰和穆斯林遭受失败和被欺骗的屈辱，西方文化和各种世俗意识形态的广泛流行和泛滥更使穆斯林深切感到伊斯兰教和传统文化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然而，随着对伊斯兰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疑问浮现出来，千余年来穆斯林社会已经历几番兴衰、数度荣辱，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环境不断变迁，为什么伊斯兰总是以几乎不变的诉求来呼唤宗教的复兴、社会的公正？为什么伊斯兰有如此沛然的生命力用宗教的理想来干预、影响，甚至改造穆斯林社会和国家政治？当然不少学者已注意到这些问题，并且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比如，有人引用恩格斯的分析与断言来说明伊斯兰运动每隔大约100年就发生一次的周期性，还有的学者深入研究了伊斯兰教强烈的复古传统与伊斯兰复兴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些研究都有助于加深对当代伊斯兰的理解。然而，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只能解释某一次伊斯兰运动发生于此时而没有发生在彼时，用伊斯兰百年一次的呼唤来解释重复出现的宗教—政治运动有某种宿命论的嫌疑，要知道，当今世界的发展是恩格斯生活的那个年代根本无法想象和预

知的。对伊斯兰复古传统的研究与分析朝客观地理解伊斯兰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迈出正确的一步，伊斯兰的长久生命力、它在历史上不断发出宗教与政治召唤，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伊斯兰内部，来自伊斯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具的特征，来自伊斯兰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功能。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与历史和文化的有机结合，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对穆斯林道德、行为与认同的规范与影响，作为一种宗教和社会理想对穆斯林生活的激励与诱导，作为一种法律体系对社会行为的约束，所有这些都为每一次伊斯兰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作好了最充分思想和组织准备，只要有适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只要外部的压力与内部的危机已威胁到伊斯兰教的生存，一场伊斯兰运动就会来临，虽然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尤其是社会和政治诉求存在极大的差异，然而，其外在形式却总会带有某种伊斯兰特征。

二、伊斯兰的复兴动力

到目前为止，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有效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因此把伊斯兰放入动态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的伊斯兰运动、把握伊斯兰的未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伊斯兰教的发生与发展来看，它就与其他宗教有着显著的不同。虽然在一开始它也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宗教，与当时的统治者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产生激烈的冲突，但冲突的结果是伊斯兰教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而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也成了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里，宗教与政治实现了最直接和最完美的统一。这与基督教或佛教所取得的统治地位有本质的不同，这不仅是因为基督教和佛教的创始者最终也没能进入统治者序列，甚至为信仰而舍去了性命或今世生活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宗教对于统治集团来说基本上是一种工具，当宗教的圣光不再有

用，当宗教已经束手束脚、危及统治者生存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换一种宗教和信仰，或者干脆抛开宗教，实行政教分离。而在伊斯兰社会，统治者的政治地位、政治合法性与伊斯兰教紧密相连，历代统治者不要说实行政教分离，即使是在伊斯兰的大旗下推动某种变革也完全有可能被视为异端而招致灭顶之灾。因此，除非伊斯兰的历史发展突然中断，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指望穆斯林社会发生类似中世纪末期欧洲那样的启蒙运动和宗教革命实在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事情。另外，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传播也与其它宗教有着显著的不同。一般说来，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是与阿拉伯帝国的军事征服紧密相连的，这并不是说众多的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完全是对军事压力的屈服，我们只是想强调，在军事征服推动之下，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以一种更有力、更有效的方式迅速完成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一方面由于统治集团对伊斯兰宗教信仰的不断强化、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对被征服者施以高压，伊斯兰教逐渐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帝国的广袤领地上，一些异质文明在保留了不多自身特性的情况下实现了伊斯兰化，更多的异质文明则融汇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海洋之中。另一方面，伊斯兰在以前所未有的胸怀吸收和拥抱其他的文明之后，它也进入了一个自我审视、自我清算的阶段，即用《古兰经》来审查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确立《古兰经》和“圣训”的不能争论、不能怀疑的神圣地位，这一过程的完成一方面牢固地确立了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伊斯兰创造能力的衰竭，从此，穆斯林社会的任何变革与发展都得在宗教的教条和先知留下的惯例中寻找动力和依据。

纵观伊斯兰的政治发展史，有两种历史现象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一方面，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解决现实中经常遇到的新问题，他们总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断地进行一些变革和创新；另一方面，在伊斯兰的政治理论

中，人们又以伊斯兰的基本原则和最初的社会、政治实践作为进行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评价现实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努力使偏离伊斯兰理想的现实重新返回理想状态。也许，正是穆斯林社会内部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无可避免且不断扩大的强烈反差构成了伊斯兰运动重复出现的最深层的原因之一。换言之，只要伊斯兰仍然是构成穆斯林国家政治传统、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以伊斯兰为旗帜的宗教—政治运动的经常发生就有着某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和性质。

三、回应危机和挑战

如果说穆斯林社会宗教—政治运动的动力首先来自于伊斯兰本身所具有的复兴机制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各种伊斯兰运动则更多地是为了回应西方的挑战。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对于伊斯兰社会的冲击与威胁是致命的：欧洲列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进攻使伊斯兰社会陷入彻底解体和崩溃的境地，军事上失败和领土的被瓜分固然刻骨铭心，然而，经济上遭受盘剥以及宗教与文化的日趋衰微更使穆斯林社会感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和认同危机。

考察从近代开始的穆斯林社会对西方挑战的回应，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第一，回应挑战的方式变化；第二，诉求方向的转换。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对于理解当代的伊斯兰运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约翰·埃斯波希托的著作中，伊斯兰社会回应西方的挑战方式被划分为4类：拒绝、退隐、世俗化和西化、伊斯兰现代主义。对于大部分穆斯林来说，学习和模仿先知的传统也许是最好的回应方式：当麦加人不能容忍伊斯兰的时候，先知迁往麦地那，然后积聚力量，再对异教徒发动圣战。然而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最初的反抗很快遭到失败，因此，拒绝与殖民当局的合

作，自觉回避西方学校教育和其他机构的诱惑就成了许多宗教领袖积极鼓吹的回应之道。世俗化和西方化的目的在于通过学习和模仿西方，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反映到统治阶层，则表现为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应该强调的是，此类改革有极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是为了回应西方殖民扩张对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地位所构成的威胁，而不是为了缓解长期的封建专制所积蓄的社会压力。换句话说，改革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因此，改革失败或者半途而废就有着不可避免的特性。伊斯兰现代主义在伊斯兰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力图调和宗教与理性、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弥合伊斯兰传统主义者和改革者之间的分歧，通过有选择地吸取西方的科学思想，激发伊斯兰文化和传统的活力，回应西方的挑战。

纵观伊斯兰对西方挑战的回应其基本的诉求方向是内省式的。从本质上看，穆斯林对自身的宗教、文化、价值和历史仍充满自信，穆斯林社会经济的衰弱、道德的沦丧、军事上失败以及政治的分裂首要的原因在于对伊斯兰背离，只有返回真正的伊斯兰、重新确认对真主的信仰才是消除穆斯林社会衰败的惟一良方。从18世纪到19世纪，受这一思想激励的伊斯兰宗教—政治运动遍及整个穆斯林世界。例如，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运动、尼日利亚的富拉尼（Fulani）运动、孟加拉的法赖迪亚（Faraidiyyah）运动、哈迈德·巴雷莱维在印度发动的圣战者运动、利比亚的赛努西运动以及苏丹的马赫迪运动等。与此同时，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和宗教、政治领域的开明人士从另一个角度对伊斯兰进行了反思，他们试图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技术、科学和思想，甚至政治制度，观照伊斯兰的传统和文化，通过改革，使伊斯兰社会获得新生。这种历史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反映了穆斯林社会对自己传统与文化的崇拜与信心，对伊斯兰社会与政治理想的向往，另一方面，殖民主义的扩张还没有

使穆斯林真正感到亡教和亡族的威胁。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完成，随着帝国主义各国更加强化对殖民地的控制和镇压，穆斯林国家失去了任何通过自身的改革求得发展的可能，对于广大的穆斯林来说，在各种改革尝试纷纷失败、民族危机日趋加重的情况下，首要的问题已不是反省自身的文化与价值体系、寻找伊斯兰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契合点，而是救亡图存，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于是，民族主义逐渐代替改革主义，成为穆斯林社会政治运动的主流。而各种伊斯兰思潮和政治运动也由此获得了改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特征。

四、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实践

两次世界大战对于广大的穆斯林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除了极个别的地区外，大部分的国家完全沦为帝国主义各国的殖民地，与殖民地化进程同步而来的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民族主义运动成了穆斯林国家政治运动的主流。虽然伊斯兰教对于民族意识、尤其是阿拉伯民族意识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虽然在民族解放的进程中各种伊斯兰组织也不同程度地积极参与，然而，伊斯兰并没有对民族解放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独立后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伊斯兰也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伊斯兰为什么没能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大多追随世俗的、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有待我们重新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以为对这一历史现象认识的深入非常有助于理解当代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和政治前景。

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各种起源于西方的世俗的意识形态在各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大部分的国家也强调伊斯兰在立法和约束、规范穆斯林生活中的作用，然而，在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中，伊斯兰已经降至非常次要的地位，

甚至传统上由宗教界控制的教育、宗教等领域也受到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即使在家族和部族势力强大、宗教势力盘根错节的王权国家，由于近几十年来对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以及对西方各国的依赖，伊斯兰的传统和宗教界的影响也受到强烈的抑制和排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期，伊斯兰势力的相对衰弱是不可避免的。民族主义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使民族主义的领袖获得极高的声望，在广大穆斯林看来，像纳赛尔这样一些英雄人物，不仅从殖民者手中争得了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他们还捍卫了伊斯兰的尊严，而西方殖民统治的被铲除则为伊斯兰社会与宗教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来自两方面的原因刺激了伊斯兰运动的复兴与发展。第一，来自伊斯兰社会内部的原因。从总体上看，各种形态的穆斯林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进展十分迟缓，这不仅是因为贫穷与落后仍普遍存在，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使社会危机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盲目的社会改革、贫富的两极分化、西方思想的泛滥、社会道德的沦丧使人们感到，伊斯兰社会面临从内部彻底解体的巨大威胁。第二，来自外部的压力。在冷战的格局下，东西方的激烈对抗对穆斯林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或者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不得不依附于某一方，并在一定程度上出卖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利益，另一方面，当地区内发生冲突、国与国之间出现争端时，他们又经常受到超级大国的压制和欺骗。在普通穆斯林的眼中，国家的统治者实际上成了东西方冲突的马前卒，超级大国利益的代言人，伊斯兰理想的叛逆者。

正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各种意识形态在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实践、东西方冷战、40余年的阿以冲突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后，一些伊斯兰思想家开始了新一次对伊斯兰教与国家的发展前途、人类的最终命运、发展道路

的选择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之所以说它是新一次，是因为比起近代的伊斯兰思想来说更加深刻、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首先，它认为西方文明所赖以建立和存在的基本原则已经遭到失败，自由与民主的原则并没有为社会奠定良好的秩序，相反，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人类被两次卷入世界大战的浩劫和前所未有的经济萧条之中，刚刚消除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世界又陷入了冷战的旋涡。第二，东西方的发展模式都没有为人类指出美好的发展前景，西方的工业文明固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它并没有为人类精神的解脱与灵魂的超越带来一丝的灵感，相反，对物欲的狂热追求与满足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精神生活的极度贫乏。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曾经为人类的未来带来一线希望，但是，它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极端无能和无神论的信仰同伊斯兰形成了根本的对立。第三，各种世俗意识形态在穆斯林国家的流行和不同发展模式的政治实践正在给伊斯兰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他们对穆斯林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所构成的威胁是根本性的。各国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无能与腐败，在外交上对超级大国的依赖与服从，在与以色列军事对抗上的软弱与背叛，无一不使伊斯兰的生存面临极大的威胁。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认识，伊斯兰的思想家不仅重提伊斯兰对穆斯林社会的重要作用，而且进一步强调伊斯兰对整个未来所肩负的神圣使命。在这里，伊斯兰已超越穆斯林世界，成为整个人类摆脱困境、走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五、冷战的终结和伊斯兰运动

理解当代伊斯兰运动的第五个视角应该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及其趋势。首先，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影响进一步上升，尤其是海湾战争以后美国更成了国际社会主导一切的惟一超级大国，这一方面使伊斯兰与美国和西方的

对抗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另一方面，在失去了前苏联对美国的牵制与平衡的情况下，伊斯兰激进势力又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时，美欧各国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实践上也在不断调整对伊斯兰和伊斯兰国家的政策，寻求比较实用的与伊斯兰打交道的方式。第二，世界范围内的和解正使激进的伊斯兰运动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潮流，尤其是阿以之间从对抗走向和平，解除了伊斯兰组织最具号召力、最具煽动性的宣传工具。第三，经济发展日益成为各国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激进的政治鼓动和暴烈的政治斗争对于广大的穆斯林来说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生活质量更加诱人。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即使是一些最激进的伊斯兰国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而西方各国也有意通过经济合作促进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发展，以消除伊斯兰激进运动产生的温床。第四，冷战结束以后，政治民主化之风一度席卷全球，许多穆斯林国家对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不少的调整与改革，甚至海湾地区实行家族统治的王权国家也许诺扩大政治参与，这些措施多少缓解了穆斯林国家紧张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抑制了伊斯兰浪潮的进一步发展。

这些变化能否持续下去，对于穆斯林社会和伊斯兰的最终影响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致妄下断言，然而从目前来看，它至少促成了部分伊斯兰组织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转化，它们逐渐放弃了激烈的行动手段，进入政治进程，试图在现行体制内，用合法的政治手段取得国家政权。

第二章 伊斯兰——历史的透视

第一节 伊斯兰教及其主要特征

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中国旧称大食法、大食教度、天方教、清真教、回回教、回教等。伊斯兰系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宇宙唯一的最高主宰安拉^①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约公元610年，由阿拉伯先知^②穆罕默德所创传。主要传播于西亚、北非、中亚、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欧、北美、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流传和发展。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初止，约有10亿多信徒。

伊斯兰教实际上是一种信仰安拉唯一的社会体系。它的构成包括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内在因素）和伊斯兰教社会实体（外在因素）两大部分。前者是无形的，属于伊斯兰教的“软件”部

① 安拉，阿拉伯文 Allah 的音译，一译“阿拉”。伊斯兰教信奉的惟一神的名称。通用波斯语的穆斯林多称安拉为“胡达”。中国穆斯林也有称安拉为胡达的，但通用汉语的穆斯林多称安拉为“真主”。

② 先知，阿拉伯文 Nabi 的意译，音译“纳比”、“乃宾衣”。伊斯兰教对直接得到或通过天使、幻梦等得到安拉“启示”的人的称谓。穆罕默德自称为最后一位先知，即“封印的先知。”

分，后者是有形的，是其“硬件”部分。这两大部分是有机的统一体，缺一不可，但“内在因素”居于核心地位，规定其性质、特征、演变及发展方向，而“外在因素”则是其实现的形态和存在的方式。

居于伊斯兰教最核心、最内层的是其通常所说的“伊玛尼”。“伊玛尼”(Imān“伊曼”)，意为“信仰”，指对安拉赐予穆罕默德的“启示”及其基本信条的确信和承认。伊斯兰教对于“伊玛尼”是有严格规定的，它由三部分组成：信仰的内悟、信仰的表白、善行。尽管伊斯兰教信仰的内容很广泛，并且涉及到人们的行为，但其基本信仰在《古兰经》中曾多次提到：“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①和使者^②，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神、经典、使者、末日，谁确已深入迷误了。”^③“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正义。正义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神，信天经，信先知，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孤儿、贫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履行约言，忍受穷困、患难和战争”。^④从《古兰经》的经文中可知，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是五条，即五大信仰。

①信仰安拉。伊斯兰教认为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宇宙万物由他所派生，具有独一无二性。“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⑤

① 真主，中国通用汉语的穆斯林对安拉的称谓。

② 使者，阿拉伯文 Rasūl 的意译，音译“来苏里”。泛指受神的启示负有宗教使命的人。伊斯兰教特指受安拉之命，向世人传播一神教义的人。在一些场合亦专指穆罕默德。

③ 《古兰经》(五、4:136)。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括号内第一位数字代表卷，第二位数字代表章，第三位数字及其后的数字代表节。下同。

④ 《古兰经》(二、2:177)。

⑤ 《古兰经》(三〇、112:1~4)。

②信仰天使。天使又译作“天仙”、“天神”。它们是安拉在创造人类之前用“光”创造的妙体。它们圣洁无邪、神通广大。无性别之分,无老幼之别。不食、不欲、不睡、无生死。其数目繁多,其职司各异,有的管理天堂,有的主持火狱,有的负责传达安拉的启示,有的专门监督和记录世人的善恶。《古兰经》中说:“每个人的前面和后面,都有许多接踵而来的天神,他们奉真主的命令来监护他。”^①“他每说一句话,他面前都有天神当场监察。”^②

③信仰经典。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信仰安拉降给使者们的一切天经。据说,有104部之多,其中包括降给穆萨的1部《讨拉特》(指《摩西律法》),降给尔撒的1部《引支勒》(指《福音书》)、降给达伍德的1部《则逋尔》(指《圣经·诗篇》)、降给穆罕默德的1部《古兰经》等。以前安拉颁降的一切经典由于受到人们的删改和修订,因而是过时的,惟有《古兰经》最为尊贵,它是安拉的语言,其原型“记录在一块受保护的天牌上”。^③

④信仰使者。伊斯兰教认为,安拉曾先后向世人派遣过315名使者,其中最著名的有“六大使者”:阿丹、努海、易卜拉欣、穆萨、尔撒、穆罕默德。尽管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相信安拉在不同历史时期曾派遣使者到不同民族中传布安拉命令,但却认为,穆罕默德是安拉派遣的最后一位使者,是最伟大的使者,要求人们绝对地信仰他。

⑤信仰后世。伊斯兰教相信世界的一切终将有一天全部毁灭,那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那时,安拉将使一切在今世生活过的人复活,并接受安拉的总清算。行善者进天堂,作恶者下地狱,任何人都不能躲避开这“末日审判”。尽管伊斯兰教要人

① 《古兰经》(一三、13;11)。

② 《古兰经》(二六、50;18)。

③ 《古兰经》(三〇、85;22)。

们毫不怀疑地信仰后世，但同时也要求穆斯林“两世兼顾”，不要放弃对今世幸福的追求。

此外，一些伊斯兰教乌勒玛根据《古兰经》提到的前定问题，也把它列为一大信仰，与上述五个信仰合在一起，称为“六大信仰”。所谓信仰前定，即指万事万物皆由安拉“前定”。《古兰经》中说：“他预定万物，而加以引导。”^①“真主确已使万物各有定数。”^②有些伊斯兰学者在阐述伊斯兰教前定论时指出，前定论并不否认人类有意志自由。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指出：“成立善恶乃前定，作用善恶乃自由。若无前定，亦无自由。非自由不显前定，然自由不碍前定，前定亦不碍自由，似并立而非并立也。”^③

在伊斯兰意识形态中，伊斯兰教宗教理论占据重要地位。它涉及的内容相当宽泛，主要包括“安拉的独一性”，“安拉的统一性”、“安拉与宇宙”、“安拉与人”、“信仰和行为”、“信仰《古兰经》”、“前定”、“圣战”、“哈里发与伊玛目”、“教法”、“天堂和地狱”、“善行”等问题。伊斯兰教宗教理论主要体现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在伊斯兰教历史的进程中，相继问世的“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等，对上述问题也作了阐述和说明。

① 《古兰经》。《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kurān 或 Quran）意为“诵读”，共有五十五种名称，其中以“读本”、“光”、“真理”、“智慧”、“训诫”、“启示”等为穆斯林所常用。伊斯兰教认为，《古兰经》是安拉通过天使哲布勒伊来降给先知穆罕默德的。全经共 30 卷，114 章，6200 余节；分

① 《古兰经》（三〇、87:3）。

② 《古兰经》（二八、65:3）。

③ 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第 29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麦加章”（约占全经的三分之二）和“麦地那章”（约占全经的三分之一）。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期，以古来氏方言为标准，以哈福赛保存的经本为依据，重新整理和统一出《古兰经》的定本，至今在世界通行的《古兰经》，就是当年奥斯曼“定本”的复制本。

② “圣训”。“圣训”，(Hadith, “传闻”或“传述”)是穆罕默德在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除安拉“启示”（由后人汇编为《古兰经》）外，还口述过一些非“启示”性言论，连同他的称为“逊奈”（或圣行）的举止和活动，由其弟子加以传述，构成了“圣训”的基本内容。在伊斯兰教逊尼派中，承认其权威仅次于《古兰经》，并作为立法根据之一的，有布哈里、穆斯林、提尔米基、阿布·达伍德、奈萨仪和伊本马哲等人汇编的“圣训集”，通称“六大圣训集”。什叶派则推崇该派乌勒玛所编纂的“圣训集”（即“四圣书”，一说“五圣书”）。^①

除《古兰经》、“圣训”外，“经注学”和“圣训学”在发展伊斯兰教宗教理论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经注学”是伊斯兰教关于《古兰经》及其注释的学科，主要研究《古兰经》经文“下降”的时代背景及原因，经文的词意、内容，以及经文注释的原则和条件等，在伊斯兰发展史上曾出现一批著名的经注学家和大量的经注学著作。“圣训学”是探究穆罕默德言行的传述世系，以判定其传述内容真伪的一门学科。经过分析、归纳而区分出不同类型的圣训，如“正确的”、“好的”、“不可靠的”等，它既是伊斯兰教宗教理论的宝库，也确保了伊斯兰教不偏离其初始

^① 四圣书，伊斯兰教什叶派圣训学家汇集的四本著名的穆罕默德言行录的总称，即《卡菲》、《曼·拉·亚赫杜鲁胡·法基》、《塔赫吉布·阿赫凯姆》和《伊斯提布赛》等。五圣书，除四圣书外，还承认“第五本圣书”。一说阿比·本·塔希尔·沙里夫；穆尔太德汇录的《雄辩之路》为“第五本圣书”；一说是伊本·巴布亚汇录的《麦地那特·伊勒姆》。

方向。

“法学”和“教义学”与伊斯兰教宗教理论关系十分密切。法学是研究伊斯兰教教法的立法原理，创制原理以及解释教规、律例和诉讼程序的学科。在逊尼派中由于对教法的认识程度和解释方法不同而产生了四大法学派：哈乃斐派、罕百里派、马立克派和沙斐仪派。由于伊斯兰教法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基础，因此它又是教义的主要体现。“教义学”以安拉与人类的关系为基本框架，思考、讨论与内心信仰相关的问题，并从理论上予以解答。它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基础学科，是“最尊贵的学问”。在伊斯兰教义学发展史上起到里程碑作用的一是艾什尔里学派，一是以经院教义学集大成者安萨里为代表的宗教思想体系。

伊斯兰教宗教感情是构成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第三个要素。它是穆斯林对独一无二和万能的安拉的诸种感情的综合体，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它是在伊斯兰教的氛围中熏陶出来的，由伊斯兰教宗教理论和礼仪培植而成。伊斯兰教宗教感情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但它却深藏在穆斯林心中。伊斯兰教宗教感情大体上包括下述内容。

①敬畏感。对于穆斯林来说，安拉是绝对真实存在的。《古兰经》中说：“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除他所启示的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他的知觉，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① 穆斯林认为，安拉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自然界和人类都是他的力量的呈现与恩赐

^① 《古兰经》（三、2:255）。

的结果。因此，心中充满了对安拉的敬畏。“你们应当归依真主，应当敬畏他，……”。^①

②顺从感。众所周知，“伊斯兰”的原义是“顺从”与“和平”，意即顺从安拉，而顺从安拉则必定也要顺从他的使者。尽管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和耶稣不同，他既不是神子，也不是神，《古兰经》中称穆罕默德“只是一个凡人”，^②“只是一个使者”，^③但却是使者的最后一名，肩负传达启示、指引正道的使命。要服从使者，正如《古兰经》中说：“如果你们喜爱真主，就当顺从我；（你们顺从我），真主就喜爱你们，就赦宥你们的罪过。”^④“你们当服从真主和使者。”^⑤

③神圣感。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的心中具有十分崇高的神圣性。不仅“安拉”、《古兰经》被认为是神圣的，几乎一切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东西无不罩上神圣的光环，如清真寺、麻扎等。伊斯兰教的“五功”，在一些穆斯林看来，也是一种神圣的功修。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怀有的神圣感情，是普遍的、潜在的，根深蒂固的。

④依赖感。指的是穆斯林对安拉的依赖感情。它有几种表现：一是自己存在必须依赖安拉存在的感觉或意识，这在伊斯兰教的“真主独一观”和“前定论”中反映得非常明显；二是有限感，穆斯林感到自己是有限的存在物，总有一天会死亡，从而产生了对超越生死的、无限的安拉的向往和企盼。三是人生坎坷，苦难重重，尽管原因多种多样，但穆斯林并不甘愿受苦受难，要和苦难抗争，又痛感自己力量有限，希望从安拉那里获得安全、

① 《古兰经》（二一、30:31）。

② 《古兰经》（二四、41:6）。

③ 《古兰经》（四、3:144）。

④ 《古兰经》（三、3:31）。

⑤ 《古兰经》（三、3:32）。

帮助。

⑤罪恶感。尽管伊斯兰教没有“原罪”说，但它也有“罪”的概念，即指一切违背主命、圣谕、教法的言行。罪分“大罪”和“小罪”。最大的“罪”莫过于不信安拉和以物配主。除最大罪外，只要及时改正，向安拉作忏悔，乞求安拉的饶恕和宽宥，都会得以免除。

⑥神秘感。穆斯林的复杂宗教感情之一就是神秘感。它有两种。一种是一部分穆斯林，特别是苏菲派教徒所经历的对安拉的某种内心感受和精神体验，有的甚至达到与安拉合一的境地，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心理状态。另一种是一般穆斯林普遍具有的对伊斯兰教的神秘感情，如穆罕默德的夜游与登霄，安拉是“光”和“灯”，人复归安拉、“复活日”的严肃氛围等等。总之，穆斯林的心灵深处对伊斯兰教程度不同地怀有神秘的感情和心理状态。

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第四个要素是伊斯兰文化。所谓伊斯兰文化，指的是以独一的安拉为信仰基础的一种文化类型。特别在中世纪，它无疑是伊斯兰世界的主体文化。近代以来，其影响力有所减弱，但在社会、文化生活各个领域仍然具有广泛影响。伊斯兰文化大致分为三部分：

①器物文化。伊斯兰教器物文化包括清真寺、教坊、礼拜场所、经文学校、圣书、圣地以及其他一切进行宗教活动所需的用物、工具和场所。这些宗教器物是伊斯兰教信仰、教义和感情的物化现象，是伊斯兰教得以确立的物质基础。在伊斯兰教的诸种器物中，无不弥漫着伊斯兰文化的因子。

②制度文化。伊斯兰教制度文化指的是伊斯兰教的组织结构、宗教礼仪、宗教习俗、修持方式、宗教庆典等构建伊斯兰教宗教活动的一切形式和方法。它是伊斯兰教信仰、教义和感情的结构性表现，是伊斯兰教存在发展的组织力量。毫无疑问，它凝

聚着穆斯林在社会活动中的无穷的创造力。

③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伊斯兰教文化的核心。它包括宗教信仰、宗教教义、宗教神学、宗教艺术、宗教文学、宗教音乐、宗教伦理等一切精神性的产品。对伊斯兰教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它起着导向作用。

从上述的探讨可知，伊斯兰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由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理论、伊斯兰教感情、伊斯兰教文化等构成。仅仅对伊斯兰教作如此观是不够的，还应看到，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实体。所谓社会实体，指的是由人群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的，并在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出现的组织。作为社会实体的伊斯兰教的组成要素如下：

①穆斯林。数以亿计的穆斯林是伊斯兰教社会实体的首要的和最活跃的要素。它既包括普通的穆斯林，也包括各种各级教职人员。广大的穆斯林是伊斯兰教的基础，而教职人员以及有教衔的人员则是伊斯兰教的中坚力量。伊斯兰教的教职和教衔主要有大毛拉（毛拉维）、伊玛目（掌教）、卡迪·库达特（总教法官）、卡迪、穆夫提、总穆夫提、哈菲兹·古兰、毛拉、阿訇、穆智泰希德、谢赫、伊禅、占土布、吾里、辟尔、穆尔希德、德尔维什、鲁哈姆、瓦伊兹、玛克塔布、穆泰瓦利、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侯哲—伊斯兰等。

②宗教行为。伊斯兰教的宗教行为具有高度程式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等“五功”上。念功是信仰的确认，为“五功”中的首功，指念诵“作证词”及一切赞颂安拉的经文，伊斯兰教的作证词是“我作证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独一无二，亦无同等；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主奴仆，是主使者。”礼功，是信仰的支柱，即礼拜。礼拜有一定的时间并有仪式规定。每日礼拜的方向被规定为麦加的克尔白天房。斋功即斋戒，在伊斯兰教历九月举行，时间为一个月。课功指天

课，课以洁物，按不同课率，每年一次完纳。朝为朝觐，有条件的穆斯林一生至少须赴麦加朝觐一次。除五功外，还有种种日常行为规范、宗教禁戒等。

③宗教组织。所谓宗教组织，指的是伊斯兰教进行宗教活动等的“社会群体”的组织形式，主要有清真寺组织、卡迪组织、宗教教育组织等。此外，还有各种协会、团体。为了有效地组织穆斯林的宗教活动，还相应地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

④宗教设施。为满足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需要，伊斯兰教设置种类繁多的宗教设施，主要有：清真寺（圣寺，主麻清真寺、加米清真寺、麻扎寺、一般清真寺）、教坊、麦德莱赛、札维叶、拉比塔、道堂、麻扎和其他宗教活动场所。

⑤宗教事业。伊斯兰教兴办多种多样的经济事业、文化事业、慈善事业等，以之增加宗教活动经费，发展宗教经济，繁荣宗教文化，扩大对外交流，赈济贫穷，广做善事。

根据以上对伊斯兰教的分析可知，伊斯兰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由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内在因素）和伊斯兰教社会实体（外在因素）组成。虽然这两部分各自具有质的规定性，但彼此之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相互作用的，并且各自按自身的规律不断发展变化。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的宗教必然要与社会发生一定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往往要横亘许多中间环节，并呈时而紧密、时而疏离的特征。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部分，是社会形态之一种，必然要对社会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等发生作用；而伊斯兰教的实体部分，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联系。因此，仅仅从宏观上把握伊斯兰教还不够，还需深入地探讨其主要特征。而且这些特征不仅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表现得异常明显，而且在当代伊斯兰运动中也有十分突出的反映。伊斯兰教的主要特征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①认主独一。伊斯兰教和佛教、基督教不同，它是比较彻底的一神教，关于安拉独一性的观念十分肯定、清楚和明确。《古兰经》中说：“你们所当崇拜的，是惟一的主宰；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至仁的，是至慈的。”^①“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②“他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今世后世的赞颂全归他，判决只由他作出”。^③“真主说：‘你们不要崇拜两个主宰，应受崇拜的，只是一个主宰。’”^④伊斯兰教还认为，安拉没有妻子儿女，并一再声明，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是和我们一样的一个人，是接受天启的人，不是永生者。^⑤佛教则不然，它不仅尊释迦牟尼为佛，而且其门人弟子也被提升到佛的地位。虽然基督教也是一神信仰，但它承认圣子，圣灵，并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因此，佛教和基督教都有人神混淆的问题。认主独一说在精神领域和政治领域确立了安拉对宗教、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的主宰地位，并在信仰和行为两方面不断强化认主、从主、归主的宗教政治观念，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伊斯兰文化的内核，穆斯林特有的思维定势以及伊斯兰社会的特殊宗教价值取向的基础，其影响十分深远。

②两世并重。就世界三大宗教而言，一般说来，佛教和基督教都求后世而弃今生，但对于伊斯兰教说来，在通常的情况下，确是既修来世又重现世，诚如中国穆斯林所深信的，伊斯兰教是求得两世的吉庆。伊斯兰教两世并重说有丰富的内涵，主要是：第一，人的生活分两大部分，一为今世，一为来世。所谓来世，即后世、人死后再复生的世界。第二，两世互为因果。今世的所

① 《古兰经》（二、2：163）。

② 《古兰经》（二〇、112：1）。

③ 《古兰经》（二〇、28：70）。

④ 《古兰经》（一四、16：51）。

⑤ 参见《古兰经》（二二、33：40；二四、41：6；十九、26：193；一七、21：8）。

作所为，都要在“末日审判”时得到相应的报赏和惩处。第三，允许今世适度和有条件的享受。“谁想获得今世的报酬，我给谁今世的报酬；谁想获得后世的报酬，我给谁后世的报酬。”^① 今世生活的享受，诚如《古兰经》中所说的，是令人爱好的事物，如妻子、儿女、金银、宝藏、骏马、牲畜、禾稼等。^② 第四，它不提倡出家。《古兰经》中说：“我未曾以出家为他们的定制”。^③ 第五，后世是永恒和完满的。伊斯兰教认为，穆斯林获得的现世利益和享受必须以信仰为前提。“今世的生活，只是一种享受，后世才是安宅。”^④ 第六，末日的审判是必然的。“我只凭真理创造天地万物，复活时是必定来临的。”^⑤

③政治性。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古兰经》对此作了明白无误的说明，“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誓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⑥ 当穆罕默德于622年从麦加迁到麦地那后，立即建立了伊斯兰教公社“乌玛”。“乌玛”既是宗教组织，又是政治机构。穆罕默德除了担任宗教领袖外，还是麦地那社会政治事务的主要仲裁人，也是军事首领。在“乌玛”中，“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人，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真主及其使者”。^⑦ 诚如托马斯·李普曼说：“创始人就确定了在他们的时代和地方说来具有革命意义但为麦加所拒绝的两条原则：一是伊斯兰教不仅是宗教权威而且是世俗权威的源泉；二是管理人们事

① 《古兰经》（四、3:145）。

② 参见《古兰经》（三、3:14）。

③ 《古兰经》（二七、57:27）。

④ 《古兰经》（二四、40:39）。

⑤ 《古兰经》（一四、15:85）。

⑥ 《古兰经》（十四、16:97）。

⑦ 《古兰经》（一〇、9:71）。

务的统一力量应是信仰而不是部落。”^①“乌玛”后来成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的“原型”。在正统哈里发时期（632～661），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等四位哈里发均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政权的领袖。艾布·伯克尔以伊斯兰教的名义，采取军事行动对付各部落的“里达”（叛乱）活动，先后平息了泰伊部落、艾赛德部落、盖特方部落、哈尼法部落、台米姆部落等的武装叛乱和“伪先知”图莱哈、穆赛里姆、赛查哈等的叛教活动。欧麦尔哈里发以“圣战”为旗帜，在短短的时间内，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波斯相继落入穆斯林政权手中。欧麦尔还有“立法的栋梁”的美称，他任命伊斯兰法学家到大马上革、约旦和埃及担任卡迪（教法官），开穆斯林设立法官职位的先河。《古兰经》的奥斯曼定本是在奥斯曼时期完成的。继正统哈里发时期之后，是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伊斯兰教都是国家权力和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奥斯曼帝国、沙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等三大帝国，均把伊斯兰教视为政权的精神支柱，而伊斯兰教支持国家政权，为其合法性作出说明。到了近代，伊斯兰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和中世纪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影响，仍不可低估。此外，伊斯兰教派、学派、教义、教法等的形成和发展，都与政治密不可分。有些人称伊斯兰教为“政治伊斯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无道理的。

④教法至上。在世界三大宗教中，教法获得实质性发展并对社会产生持久和重大影响的，首推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教法具有神圣性、包容性和实用性的特点。伊斯兰教法，阿拉伯语称作“沙里亚”（shariah），原意为“通向水源地之路”，泛指“行为”、“道路”；进入法律成文期后，又称“沙里亚法典”，意为安拉降示的神圣的诫命大全或总和，因其被视为安拉意志的体现，所以

^① 托马斯·李普曼：《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第59页，新华出版社，1985。

又称天启律法、安拉之法度等，因此，具有神圣性。伊斯兰教法不仅仅是宗教教义、宗教道德的体现，而且还延伸到世俗道德、世俗法律领域，呈现极大的包容性，它集宗教教义、道德规范、法律制度于一体。历史上阿拔斯王朝（750~1258）和奥斯曼帝国（约1290~1922）都曾以伊斯兰教法为国家基本大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历史上伊斯兰教法在各伊斯兰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人们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尺，凡是合乎伊斯兰教法的，则是合法政权，否则为“非法政权”。不管是历史上的复古思潮和运动，还是今天的伊斯兰主义运动，都主张全面恢复伊斯兰教法。

⑤注重实际。尽管伊斯兰教充满了对天国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它却十分讲究实际，对现世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它的教义简单明了，朴实无华，与现实联系密切，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拨动其心弦并有一定的吸引力。加入伊斯兰教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仪式，只需诵念清真言，有两个人作证就足够了。由于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前往清真寺礼拜的穆斯林，按先后次序在带领祈祷的伊玛目后边排成一行行队伍，他们不分权位高低、财产多寡，也没有专为尊贵者留出位置，正因如此，许多穆斯林感到一定程度的安慰和心理满足。早期伊斯兰教的传播，虽然说是与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和政治扩张同时开始的，武力也确实起过重要作用，但军事征服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统治，即使政治统治，也往往保留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和行政制度，尽可能不触动当地的行政统治集团，并吸收和利用他们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对被征服地区的异教徒主要强调其在政治上接受统治，允许按自己意愿信仰原宗教，在皈依伊斯兰教方面是相对地较为宽容的。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被征服地区的文化和宗教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伊斯兰教只要信仰核心完整无损，却还容许增添地方色彩。伊斯兰教非常现实，关注实际生活，同它的信徒的生活

关系密切，颇能适应其日常生活。它没有过分许愿，也没有过分要求，常情常理贯穿其始终。虽不乏宗教理想的说教，但也处处表现出重实际的精神。

第二节 伊斯兰教的生命力

在现今世界三大宗教中，发展势头强劲的当数伊斯兰教。为什么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伊斯兰教不仅未失去生存的活力，反而又向世人显示出一定的生命力，除了现实的诸种原因外，人们反思伊斯兰教历史，也许有助于此问题的解答。诚然，穆斯林社会的近代开始于18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通常被穆斯林认为是伊斯兰教历史的“黑暗时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丧失了生存的活力，而是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不断地反思自己，寻求应变的最佳方式，偶而也显露峥嵘。尤应指出，近代以前，特别是伊斯兰教出现的最初几个世纪，伊斯兰教曾长期保持顽强的生命力。深入研究伊斯兰教蕴含的经久不衰和衰而复兴的生命力，对于研究当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 从民族宗教到世界宗教

伊斯兰教由阿拉伯民族宗教发展为世界宗教，这是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集中表现，这个过程大约历时200余年，到阿拔斯王朝（750~1258）前半期基本完成。其主要标志是：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教义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等各种族、各民族的大多数人民所认同；伊斯兰教的“五功”和风俗礼制等在伊斯兰帝国的范围内得到严格遵守，不仅表现在服装衣帽、言语经文、饮食生活和行为举止上，而且表现在信仰的基本功课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伊斯兰教已在世界广大地区传播，主要以西亚北非为中心，并辐射到世界的其他一些地

区，从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伊斯兰教成为幅员广阔的伊斯兰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主体文化，指导着国家政治生活，统摄着社会舆论，协调、维系着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人际关系。伊斯兰教发展为世界宗教有多种原因，首先，伊斯兰教自身具有普世性特征，其所信奉的安拉是“全世界的主”，^①即不是部落的，也不是某一民族的；伊斯兰教坚信，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皆是安拉的“造物”，并将最终回归安拉。其次，伊斯兰教，特别是早期伊斯兰教，不仅生机勃勃，而且具有开放性，它吸纳了许多外来的异质文化的成分，当然其中不乏进步因素，但仍能保持自身的本质属性。第三，它得益于阿拉伯帝国的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支持。诚然，不能认为伊斯兰教全凭武力传教，但战争对早期伊斯兰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尤应指出，阿拉伯帝国制订并执行了比较合乎实际的宗教政策，贯彻了《古兰经》倡导的“对于宗教，绝无强迫”^②的原则。第四，波斯萨珊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衰落，为伊斯兰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极大地有利于伊斯兰教在世界的传播。

2. 伊斯兰教自身的发展

今天人们所见所闻的伊斯兰教，与穆罕默德时期的伊斯兰教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毫无疑问，这也是其活力的重要表现。被奉为伊斯兰教根本经典的《古兰经》，在穆罕默德在世时，经文被记录在兽皮、石板、椰枣叶上，并未汇编成册。后经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命令而整理、保存，到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再次订正，编成“奥斯曼定本”。《古兰经》定本的出现，推动了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等宗教学科的发展。穆罕默德时期，“圣训”一直是口头传述，以后依然沿袭此种方式，

^① 《古兰经》（一、1:2）。

^② 《古兰经》（三、2:256）。

未做整理和汇集。由于诸种原因，伪造圣训现象日甚一日，加之发展和完善伊斯兰教法的需要，从8世纪开始，对“圣训”的考证、辨伪、编辑等研究工作，不断出现高潮，到9世纪后半叶，“六大圣训集”先后编辑成功。什叶派圣训学家汇集的“四圣书”也于10世纪下半叶完成。伊斯兰教法是在古代阿拉伯部落习惯和伍麦叶王朝时期流行的民俗习尚、行政惯例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逐步发展而成的，经历了从公元7世纪至10世纪300年时间，最终形成哈乃斐学派、马立克学派、沙斐仪学派、罕百里学派等四大教法学派，对伊斯兰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教义学产生于8世纪初，以穆尔太齐赖学派为代表的思辨教义学的形成为标志。正统的伊斯兰教义学是在批判穆尔太齐赖学派的斗争中形成的，罕百里学派是其早期代表。由于罕百里学派否定人的理性和外来文化，终被以希腊辩证法论证正统信仰为主要特征的艾什尔里学派所取代。“伊斯兰教权威”安萨里在艾什尔里学派遇到自然哲学、圣训派和苏非神秘主义严重挑战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重建”正统教义学体系，改造艾什里尔学派，扬弃苏非主义，通过融合苏菲主义来恢复正统信仰的活力。经过艾什尔里、安萨里等权威大师的不懈努力，正统伊斯兰教义学到11世纪终于取得统治地位，对伊斯兰教的统一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伊斯兰教教育体制不断发展，日趋完善；宗教管理日趋制度化；宗教组织不断发展和壮大；宗教活动日益严格和经常化。总之，伊斯兰教自身在不断发展变化。

3. 在困境中求生存

在历史上，伊斯兰教曾遇到无数的艰难险阻，但伊斯兰教总能够摆脱困境、绝处逢生，例如，619年，穆罕默德的妻子赫蒂彻、叔父阿布·塔里布先后逝世，传教工作由于失去保护而陷入严重困境，穆罕默德被迫从麦加到达塔伊夫。在塔伊夫，穆罕默德的传教努力一再受挫，人们不仅嘲笑他，还掷石头驱逐他。穆

罕默德只得又回到麦加，但等待他的是更大的困难，因此，他敦促所有的穆斯林迁居麦地那，而他和阿布·伯克尔、阿里等人却留守到最后。在得知古来氏人决定集体刺杀他的信息后，阿里冒着生命危险躺在他的床上，他才得以脱身，于622年9月24日到达麦地那。从此，伊斯兰教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又如，在十字军东侵的过程中，面对血雨腥风，伊斯兰教再次向世人展现了它的极强的应变能力。十字军东侵是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以维护基督教、解救耶路撒冷的圣陵为名，对地中海东部地区发动的侵略战争，其主要攻击目标是那里的伊斯兰国家。前后共8次，历时近200年（1096~1291），尤以前四次东侵气焰最为嚣张。十字军先后占领了北自叙利亚、南至亚喀巴、东抵约旦河的大片土地，并建立了几个拉丁小国，如耶路撒冷王国、安条克王国、的黎波里伯国、埃德萨伯国等。1291年，十字军侵占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克城被穆斯林收复，十字军东侵以失败告终。十字军东侵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伊斯兰教的凝聚力、号召力无疑是促使其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著名的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阿拉伯抗击“十字军东侵”的民族英雄萨拉丁·阿尤比（1138~1193）就充分注意发掘了伊斯兰教的潜力。1187年，为抗击十字军，萨拉丁组成60000人的阿拉伯联军，并发出“真主至大，把法兰克人赶出耶路撒冷，收复失地”的号召，同年6月底，萨拉丁率军在巴勒斯坦太巴列湖附近的赫汀（哈丁）发动对十字军进攻，一举歼灭十字军主力20000人，10月攻占耶路撒冷，旋又收复许多失地。在抗击十字军东侵中，萨拉丁责成伊斯兰教乌勒玛撰写宣传“圣战”的文章，号召穆斯林“抓住真主的绳索”，紧密团结，抵御外敌。

4. 西部蒙古汗国的伊斯兰化

从1219年成吉思汗亲自率军西征开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多次用兵中亚、波斯及索翰罗斯地区，一度建立了地域辽阔的大

蒙古兀鲁思。但这个大帝国没多久就四分五裂。在中亚、波斯以及欧洲部分地区，形成了察合台、伊利、钦察三大汗国。蒙古军的西征对伊斯兰教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城，杀哈里发穆斯塔辛，灭阿拔斯朝。蒙古军在巴格达城内劫掠七日，居民被屠杀约数万人，伊斯兰教似乎面临灭顶之灾。但到13世纪末，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257年术赤第三子别儿哥（1257~1266年在位）继承察汗国汗位，并引导众多的上层蒙古贵族皈依伊斯兰教。在伊利汗国，1282年旭烈兀次子帖古迭儿继位，并改信伊斯兰教，1284年8月10日被政变推翻。1295年11月阿鲁浑子合赞继承汗位，宣布改奉伊斯兰教，改名穆罕默德，称素丹。随即下令宫廷大臣、贵族、军队和汗国境内的蒙古人一律改信伊斯兰教。据史载，约有15万帐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察合台汗国是在秃黑鲁帖木儿汗时期改信伊斯兰教的。1354年，秃里鲁帖木儿汗宣布信仰伊斯兰教，后说服王公、大臣归信伊斯兰教，并下令其臣民改宗，史载约16万帐蒙古人集体宣誓归信伊斯兰教。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曾重创伊斯兰教，但在不到200年时间，钦察、伊利、察合台三大汗国的后裔均成为虔诚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在丧失政权保护下，不但渡过了危机，反而有了更大的发展，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诸多原因，比如，蒙古人在文化上相对地后进，蒙古帝国内部四分五裂等，但不能不考虑伊斯兰教是适合蒙古统治者政治需要的，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西部蒙古汗国的伊斯兰化，是伊斯兰教具有某种活力的一个突出事例。当然被伊斯兰化的不止是钦察、伊利、察合台三大汗国的蒙古族，人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柏柏尔人、突厥人等。

5. 非官方体制的伊斯兰教的深入发展

在伊斯兰世界，既有官方的宗教体制，又有非官方的宗教体制。所谓非官方的宗教体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非官方的宗

教机构和组织，二是民众伊斯兰教。前者以非官方的乌勒玛为领导，后者以苏菲导师占据主导地位。在伊斯兰世界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两者均有长足发展，并对伊斯兰教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非官方的宗教机构和组织遍布于伊斯兰世界的城市和乡村，与政权既有联系，又有相对较大的独立性。非官方的乌勒玛，或担任一些重要的地方教职，或在各种不同的宗教学校里讲授传统的宗教学科，他们往往得到宗教基金或宗教捐赠，依靠自己的宗教知识、虔诚信仰和生活方式而赢得社会的尊敬和信任，他们还被穆斯林视为正统教义和教法的监护人。民众的伊斯兰教，主要是苏菲教团，在18世纪前，遍布伊斯兰世界各个角落，实际上有五六个世纪居统治地位。它既影响了正统或官方的伊斯兰教，促使安萨里将其神秘主义引入正统教义，使正统派增加生气，并为自身发展创造了机遇；又把神秘主义及其运动引向深入。尽管苏菲教团有遵法派与非遵法派之分，两者主要不同是在对待伊斯兰教法和履行基本宗教功课的态度上，但不管那一派对伊斯兰教的发展都功不可没。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苏菲，特别是专事功修的苏菲，云游四方，布道说教，甚至进入新的活动地域，创建道堂，自立分支教团，与社会各阶层发生广泛联系。加之，他们往往对不同宗教倾向和不同地域的社会条件表现得十分宽容和变通灵活，以至于使得伊斯兰教伴随他们的足迹深入民间和边缘地区，引导成千上万的民众加入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非官方体制比较完善，比较发展，尤其是非官方体制与官方体制之间在一般情况下相处得比较和谐，甚至互相补充，当然也不排除两者的分歧、矛盾，甚至是斗争，这种社会现象在佛教和基督教中并不多见。

6. 近代的复兴和改革

伊斯兰教在近代尽管被人们普遍认为处于“黑暗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已经穷途末路，无数事实不断向世人昭示，

伊斯兰教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耗尽，反而被再次激发，这主要体现在复兴和改革上。伊斯兰教在近代先后兴起两股潮流：复兴主义和现代主义。它们有时候甚至同时出现，也有的时候交替发生，在多数场合下，既互相影响，又彼此争胜。它们在目标上不乏一致之处，即都主张复兴和改革伊斯兰教，以适应时代潮流，但也无庸讳言，它们也有明显的差异。近代复兴主义是一种回应的潮流，其出现的时间比现代主义要早一些，而且对民众的影响比现代主义要更广泛和更深刻。针对伊斯兰社会内部的衰落和道德沦丧，复兴主义主张恢复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始教义和本来精神，坚持个人重新解释传统的权利，反对中世纪盲目服从权威的要求，试图重建社会道德，重新改造现实社会。18世纪中叶兴起的瓦哈比运动，是这种复兴主义的一次重大成功。在南亚，复兴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里的瓦利乌拉。在非洲，各地的复兴运动由新苏菲教团领导。19世纪初，东南亚兴起净化宗教的巴德利运动。在中亚，纳合西班牙迪教团是该地复兴运动的中坚。近代的伊斯兰复兴主义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直接先驱。在复兴主义持续高涨的同时，现代主义的浪潮也一浪高过一浪。伊斯兰现代主义是一种以适应为主的潮流，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其主要主张是试图依据理性、伦理和民族基础重建伊斯兰教，试图解决伊斯兰教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问題，并力图通过伊斯兰教改革来达到民族复兴。伊斯兰现代主义一个重要特点是鼓动向西方学习，既学习军事技术，也学习经济制度，对西方教育也颇感兴趣。在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大潮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代表人物，诸如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等。总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复兴和改革，是伊斯兰教近代史的主旋律。

对历史上伊斯兰教生命力的诸种重要表现进行研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伊斯兰教生命力在历史上不

断焕发的原因所在，因为，只要这些原因仍然存在，伊斯兰教的生命力不但不会丧失，反而会持续地在世界政治大舞台上反复不断地展现。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研究伊斯兰教的前天、昨天，是为了更卓有成效地把握伊斯兰教的今天。今天不是孤立的，它是前天的延伸，昨天的继续。

1. 伊斯兰教的适应性

勿庸讳言，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发挥的社会作用也相当复杂，也有僵硬的一面。但当人们探讨其生命力产生的原因时，不能不高度重视其适应时代发展的一面，这是其能存续一千多年的重要原因。伴随着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不断转化，伊斯兰教也随之相应地变换着自己的社会角色。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至少起了六面旗帜作用，这是其拥有所谓永恒魅力的实质所在。当阿拉伯半岛处于从部落向民族和国家发展的转折时期，它是一面革命的旗帜；当统治阶级内部改革派与顽固派斗争的时刻，它是改革派手中的一面进步旗帜；当劳动人民奋起反抗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时候，它是劳动人民的一面斗争的旗帜；当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遭遇民族压迫的时候，它是一面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的旗帜；当殖民主义者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殖民统治和文化侵略的关头，它是一面反对殖民主义的神圣的旗帜；当世界上多种文化激烈碰撞的时候，它是一面保持别具特色的伊斯兰文化的旗帜。正是由于伊斯兰教具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相协调的性质，它受到了无数的进步人士和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民众的拥护，并从那里汲取了取之不绝、用之不尽的活力。

2. 伊斯兰教具有浓厚的文化属性

伊斯兰教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它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种源远流长、千姿百态的主体文化密不可分的。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既相异又相容，宗教文化渗透到人类文

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伊斯兰教作为宗教文化之一，也不例外。但是，在漫长的中世纪，由于伊斯兰教一直高居于政治意识形态之首，因此作为宗教文化的伊斯兰教，在伊斯兰世界的文化领域里，总的说来，起着主导作用。可以说，伊斯兰教文化淹没了处境艰难的世俗文化，极而言之，伊斯兰教成了文化的同义语。这种现象，对于佛教、基督教来说，宗教文化对世俗文化的统帅地位，无论在时间的跨度方面，还是在深度、广度方面，都无法相比。伊斯兰教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包涵着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在这三者之间，精神文化是其内核，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则是其外壳，内核与外壳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促进着伊斯兰教文化的发展。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伊斯兰教文化的三大组成要素，均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与佛教、基督教相比，显得相对完善和成熟。鉴于上述情况，伊斯兰教文化对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影响，对广大穆斯林生活的渗透，均相对地广大、深刻和持久。在伊斯兰世界，人一出生就会受其熏陶和影响，民族和国家被包围在浓浓的伊斯兰教氛围中。伊斯兰教文化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其中包括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习俗。它还深深地制约着信奉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发展和前进方向，并为民族的文化烙上了深刻的伊斯兰属性。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在精神文化方面具有多方位的文化功能：关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的解释功能；在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中的特殊的交流功能；通过一定制度，以不同层次、不同方式对穆斯林进行系统的宗教教育功能；关于语言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艺术、建筑艺术等的艺术功能；把宗教生活和日常的生活习俗融合在一起的宗教生活习俗功能。^① 以上伊斯兰教文化的诸种功能的发挥，对伊斯兰教的不

^① 参见陈麟书：《宗教学基本理论》，第106～11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断发展以及在困境中维持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伊斯兰教的浓厚文化属性是伊斯兰教生命力的主要源泉之一。

3. 《古兰经》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伊斯兰教在历史上不断地表现出令人震惊的生命力，是得益于它拥有一部《古兰经》。《古兰经》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与阿拉伯民族人觉醒并焕发出空前旺盛创造力相伴随的。《古兰经》被认为具有神圣性，是安拉的语言，其原型存于高高的上苍。《古兰经》首次比较深刻地、辩证地表达出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以典籍形式将阿拉伯民族的“元精神”加以定型。《古兰经》包容一切：天国与现世、今生与后世，昨天与今天，政治与经济、科学与幻化，其中闪烁着一些理性的光辉。《古兰经》凝续着阿拉伯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和文化心态，以典籍形式使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文化类型得以固定。《古兰经》在表述形式方面质朴无华，简单明了，饱含着盎然生机，既适合于刚从部落跨进国家的阿拉伯民族，又为后来者进行新的解释留有广阔的余地。《古兰经》保存了大量社会史、思想史、宗教史的原始材料，蕴含丰富；珍藏着阿拉伯民族跨入文明门槛前后所积淀的精神财富，其间既保存原始氏族制时代原始民主及原始思维的遗风，又记载着阿拉伯民族刚跨入文明门槛的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社会风俗与观念形态。《古兰经》既有“穆合凯姆”，（Muhkam，原意为“明确的”或“清楚的”），又有“穆太沙比哈”（Mutashabih，原意为“含糊的”或“不明的”），前者被认为是“明显的经文”，后者为“隐讳的经文”。由于后者具有神秘性、不确切性和模糊性等特征，极易于后来者对其作出新的解释。即使有些“明显的经文”，也可以从“明意”、“隐意”两方面进行注释，从而丰富《古兰经》的内容，洞察其新意、深意。《古兰经》在阿拉伯民族以及其他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的历史生活中占有崇高

的地位，不仅由《古兰经》的“本义”丰富性所导致，也由《古兰经》不断被人们发现其“引申义”所强化。历代经注家不断地从多角度对《古兰经》进行注释，其意义被发掘，被阐扬，随着时代的步伐，某一个侧面或被突出，或赋予新意，以至对穆斯林的影响不断加深，对社会的作用不断扩大。《古兰经》规定着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制约着这些民族的未来走向，并成为它们的垂范久远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4. 伊斯兰教的双轨制宗教体制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伊斯兰教宗教体制是双轨制，即由官方体制和非官方体制组成。所谓官方体制，是以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为主要体现的，因其以宗教典籍为保证，也被称为制度化伊斯兰教。非官方体制前文已经提及。这两种体制并存于伊斯兰世界中，其地位不是半斤八两，而是有主有副，官方体制为主，非官方体制为副，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有时候也存在以非官方体制为主的现象。总之，两种体制是有机的整体，向人们呈现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格局。伊斯兰教的这种双轨制，对伊斯兰教能够保持长久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官方体制正常运作的时候，伊斯兰教的诸种社会功能，诸如社会整合功能、信仰认同功能、社会参与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等，均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伊斯兰教也就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由于官方体制与“官方”一体，因此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而且其宗教思想易于僵化、保守和教条，以至于削弱了与下层民众的联系，特别是当权力更迭之际，由于失去强有力的政权庇护，往往一蹶不振，极大地损害了伊斯兰教的生命力。非官方体制，在一般的情况下和官方体制和谐相处，配合官方体制对社会发挥着重大影响。但是，每当官方体制受挫之际，非官方体制往往取而代之，成为民众信仰的主要形式，这是因为非官方体制可以较自主地活

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虽与官方有联系，偶而甚至彼此关系密切，但并不依赖于官方，因此，和官方体制相比，权力更迭对其影响要小得多。加之，非官方体制与民众联系密切，宗教思想的表达所受限制相对地少一些，而且还具有灵活变通的特点，并自成体系，所以在官方体制受到严重冲击的关头，它仍能坚定广大穆斯林信仰，组织他们参加宗教活动，坚持伊斯兰教的基本主张，甚至在困境中发展伊斯兰教。总之，伊斯兰教自成特色的双轨制宗教体制，是伊斯兰教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源泉，正是这个双轨制，使伊斯兰教易于适应变化的环境，特别是险恶的环境，易于强化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影响，易于不断改变伊斯兰教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尤其当官方体制由于诸种原因而处于穷途末路之际。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经验对现实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研究伊斯兰教的生命力，是为了更全面地、更深刻地把握当代伊斯兰运动。历史和现实是有联系的，如不认真研究历史，就很难对现实作出科学的、理论的说明。

第三节 伊斯兰教的复古传统

透视整个伊斯兰教历史，给人们留下的一个较为鲜明的印象是，伊斯兰教是一个具有复古传统的宗教。这种复古现象不仅频繁出现，而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伊斯兰教的复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弄清楚伊斯兰教的复古传统，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其认识。

“古”本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与“今”对比而言的。但“古”也有较为确定的内涵，各大文明圈的“古”均有自己的、相对固定的内容，伊斯兰教之“古”也不例外。伊斯兰教出现以

前的一个多世纪（5世纪末至7世纪初），阿拉伯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连绵不绝的部落战争，这一时期发生在部落之间的血族仇杀，据学者统计，大大小小约有1700多次。穆斯林史家称之为“蒙昧时期”，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所必经的野蛮时期。^① 显而易见，伊斯兰教的复古绝对不是要回到“蒙昧时期”去。以伊斯兰教出现为标志，阿拉伯半岛的社会才步入民族形成、国家出现的阶段。伊斯兰教的早期，即穆罕默德时期和正统哈里发时期，是麦地那政权向世界帝国过渡的时期。穆罕默德建立的麦地那政权，是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后建立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四大哈里发遵照穆罕默德遗训继续治理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的早期状况，被穆斯林视为一种理想。恢复到伊斯兰教早期状况，这是伊斯兰教的复古传统的出发点，它包括忠实遵循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认真履行伊斯兰教规定的功课，严格按照穆罕默德的教导生活，坚决执行伊斯兰教教法，重大国事由民众协商，哈里发必须选举产生等等。

尽管历史上伊斯兰教复古的内容有一致之处，但因具体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特点有别，文化背景各有特色，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相异，所以，复古的侧重点有明显差别，并均有新增添的内容，从而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的特征。

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复古和伊斯兰教出现几乎是同步的，穆罕默德曾宣称自己是恢复古代易卜拉欣正教，正如M.库克所指出的，对于伊斯兰教来说，“‘亚伯拉罕的宗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② M.库克说的亚伯拉罕就是伊斯兰教和《古兰经》中所多次提到的易卜拉欣。易卜拉欣是穆斯林信奉的先知之一，在

^① 参见M.库克：《穆罕默德》，第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② M.库克：《穆罕默德》，第119页。

伊斯兰教中享有安拉的“至交”^①和“众人的师表”^②的崇高地位。《古兰经》第十四章是以易卜拉欣为章名的，据此也可看出易卜拉欣对伊斯兰教重大影响之一斑。当时穆罕默德的神圣使命是确立一神安拉信仰、实现半岛统一，而其复古的重点是反复强调易卜拉欣是一个坚定的、忠诚的一神安拉信仰者，为此曾和其父阿扎尔及其族人的偶像崇拜作无情斗争，甚至接受安拉“启示”以其子伊斯玛仪（又译以实玛利）作燔祭。此外，还突出了易卜拉欣及其子伊斯玛仪是麦加古神庙（即克尔白）的奠基者，这座古神庙作为崇拜一神安拉的神址，在伊斯兰教的朝觐以及宰牲节（古尔邦节）中保存“亚伯拉罕的宗教”色彩最为浓厚。^③当然，穆罕默德的复古和其后来者的复古在内容上是不同的，因为伊斯兰教的复古滥觞于此，也就不能不在此首先提及。

伊斯兰教出现不到半个世纪，其内部就涌动出以宗教——政治派别的形式进行复古活动的一股强大的潮流，它以哈瓦利吉派为代表。“哈瓦利吉”，意为“出走者”。哈瓦利吉派，即由不满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接受穆阿维叶提出的“依经裁判”的妥协态度而分裂出走者组成。该派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史上第一个复古派，其原因是它的政治主张和教义思想具有鲜明的回归早期的伊斯兰教传统的倾向。哈瓦利吉派十分眷恋伊斯兰教早期一度存在的政治上的民主和平等，因此主张民主推选哈里发，每一个虔诚、正义的信士，不论其是否出身于古来氏家族，皆可担任哈里发。在重信仰与重行为的关系问题上，它更加重视身体力行，并强调身心洁净。该派的信徒表现极端虔诚，他们虔诚地叩头，直到额头

① 《古兰经》（五、4:125）。

② 《古兰经》（一、2:124）。

③ 参见《古兰经》（一、2:125~127；四、3:96~97；七、6:74~81；一六、19:42~48；一七、21:51~69；一九、26:70~87；二〇、29:17~24；二三、37:85~98；二三、37:102~106；十七、22:26~29；）。

磨出胼胝，还主动延长礼拜时间。该派严格遵守教规，严厉禁止音乐、舞蹈、赌博和饮酒等。正如希提所说：“严格的哈列哲派（即哈瓦利吉派——作者注），努力保持伊斯兰教朴素的和民主的原则，在伊斯兰教历头3个世纪中，他们为实现这个愿望，而流血成河。积年累月，他们禁止崇拜圣徒，禁止朝拜他们的陵墓，禁止苏菲派的集会。”^①

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苏菲派，特别是早期苏菲派，也曾一度卷入伊斯兰教的复古大潮，换句话说，伊斯兰教的复古传统也曾以神秘主义形式出现。苏菲派于7世纪末8世纪初产生于伍麦叶王朝统治时期的库法和巴士拉等地。早期苏菲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效法先知穆罕默德及门生弟子早年的虔诚和简朴生活，他们对穆罕默德的隐居潜修、沉思默想、直觉体验，以及登霄面见安拉等倍感兴趣，对伊斯兰教早期的社会状况无比赞赏，而对伍麦叶王朝宫廷的奢侈腐化和统治者之间的争权夺利无比痛恨。在苏菲派的影响下，当时社会上确实出现了一股企图恢复伊斯兰教早期社会状况的浪潮，刮起了一股复古的旋风。苏菲派复古的重点是净化社会，纯洁道德，其方式则满足于穆斯林个人的宗教功修。苏菲主义经历曲折发展，在近代演变为新苏菲主义，一度成为伊斯兰教近代复古传统的主要代表。

伊斯兰教复古传统更多和影响更为广泛深远的是以教法学、教义学的形态出现，其实质性的发展尤与罕百里教法学派、新罕百里主义密不可分。罕百里教法学派的创始人是伊本·罕百勒（780~855）。他是9世纪圣训派首领、著名的教法学家和教义学家。伊本·罕百勒及其教法学派主张：严格遵循《古兰经》的表义；广泛引用“圣训”，尤其尊重圣门弟子、再传弟子的判例，认为它们胜过“类比”法，较少使用公议；哈里发人选的产生应

^① 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286页，商务印书馆，1979。

根据《古兰经》的精神协商选举，哈里发须由古来氏人充任。此外，伊本·罕百里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813~833在位）的信仰考查和甄别时期，拒不屈服，于严刑拷打后被监禁于牢狱。马蒙的继位者穆尔台绥姆（833~842年在位）哈里发曾亲自审问他，双方辩论达3天之久，仍无结果；哈里发下令施以鞭刑后，将他关押两年零四个月之久，致使他终身病残。伊本·罕百里及其学派强调的尊经崇训的基本主张，倡导的正本清源、净化信仰、遵循正道、回归传统的原教旨思想，以及他本人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对于强化伊斯兰教复古传统，扩大复古影响，都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而罕百里教法学派有时也被人称为“原教旨主义派”。

新罕百里主义，亦称为新罕百里学派，系指从伊本·泰米叶（1263~1328）直到阿卜杜勒·瓦哈卜（1703~1792）所体现的复古主义思想。尽管新罕百里主义与罕百里学派思想相比，有许多发展，但在思想渊源上后者与前者是一脉相承的。伊本·泰米叶以为，伊斯兰教从中世纪以来，由于受外来影响，背离了“安拉的正道”，出现了多神崇拜和异端思想，因此应纯洁信仰，恢复早期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主张除经、训外，不迷信任何权威；承认四大哈里发的正统性，并声称哈里发只有经过民主选举，才符合伊斯兰教的平等原则；必须实行伊斯兰教法；服从执行伊斯兰教法的政府和反对背离伊斯兰教法的政府同样是穆斯林的神圣义务；穆斯林没有必要服从腐败的统治者。伊本·泰米叶被穆斯林称为“罕百里教法学派的权威”、“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先驱”。他的思想从理论上极大地发展和完善了伊斯兰教的复古传统，并为18世纪阿拉伯半岛兴起的瓦哈比运动提供了依据。阿卜杜勒·瓦哈卜是伊本·泰米叶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的基本思想是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净化信仰、改造社会。他的主要贡献是：主张根据《古兰经》的本义独立地解释《古兰经》，不盲目遵循

以往经注学家们的注释；强调以“圣战”来实践主命，认为这是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义务。阿卜杜勒·瓦哈卜的思想为瓦哈比运动的成功和沙特阿拉伯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总之，新罕百里主义是伊斯兰复古传统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影响十分深远。

在近代，伊斯兰教的复古传统主要是通过复兴运动的形式向世人展示的。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新苏菲主义运动在18世纪一度成为复兴运动的主导潮流。新苏菲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苏菲派内部兴起的新苏菲教团所提倡的理论和主张。其特点是，强调遵循伊斯兰教法，并以《古兰经》、“圣训”作为布道的根本依据；提倡以现实主义态度面向社会，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它的思想渊源可回溯至罕百里学派，更与新罕百里主义一脉相承，呈现出鲜明的原教旨主义倾向。新苏菲主义是新苏菲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而新苏菲主义运动则是新苏菲主义的载体。近代伊斯兰教复古传统已不像以前那样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或依附于教派、学派上，而是立足于行动，有一段时间呈烈火燎原之势。赛努西运动是18世纪新苏菲主义的产物，它得名于运动的领导者、赛努西苏菲教团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阿里·赛努西（1787~1859）。1838年，赛努西在麦加近郊建立“札维亚”教团组织，开始布道、收徒，因受奥斯曼帝国歧视，于1840年离开麦加，迁往利比亚，后于1843年在今利比亚东部边缘地区的昔兰尼加建立了非洲第一个“札维亚”。为远离奥斯曼帝国势力，又将传教中心迁至贾加布卜绿洲，北非各地穆斯林纷纷归信，发展很快。到1859年赛努西去世时，“札维亚”已达100多个，信徒多达300万人，遍布北非各地。赛努西教团主张恢复早年伊斯兰教的朴素信仰，并深信伊斯兰教复兴时代即将到来，虽不提倡武力传教，但认为一旦遭到外敌攻击，必须以“圣战”自卫。赛努西之子穆罕默德·马赫迪继承父业，除在北非致力于伊斯兰教改革与复兴外，还向西非、中非、西亚、南亚等地派遣布道团，

发展组织。1911年，赛努西教团领导了抵抗意大利殖民统治的斗争。在赛努西运动的浪潮中建立的伊德里斯王朝延续到1969年。除赛努西运动外，在西非的尼日利亚，卡迪尔教团成为复兴伊斯兰教的领导力量。19世纪初，奥斯曼·丹·福迪奥（1754～1817）发动富拉尼人进行圣战，征服许多小王国，建立了以尼日利亚北部索科托为中心的富拉尼帝国。在苏丹，萨曼尼教团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1848～1885）自称为马赫迪，主张以积极的态度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关心政治和社会变革，并以“圣战”来反对外国统治者，在马赫迪1885年6月去世前，苏丹已联合为统一的独立国家。马赫迪的儿子阿卜杜勒继承父业后，改称哈里发，马赫迪国家成为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1898年被英埃联军推翻。在印度尼西亚，于1803年发生为复兴伊斯兰教而进行的“巴德利”运动，从净化信仰开始，曾提出“纯洁伊斯兰教”的口号，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早期的原旨教义，后组建军队，开展激烈持久的反旧教派的宗教战争。1821年4月，发动抗荷起义，对荷兰侵略军开展“圣战”，直到1837年被荷兰殖民者镇压。在中亚，纳合西班迪教团成为复兴运动的领导者，并在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组织反抗沙皇俄国的“圣战”。在南亚，瓦利乌拉的儿子阿卜杜·阿齐兹（1746～1824）、艾哈迈德·巴雷莱维（1786～1831）发动“圣战者运动”，强调一神教义，严厉谴责多神崇拜，开展“圣战”，企图建立以社会正义和平等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

尽管伊斯兰教现代主义和伊斯兰教复兴主义是两股价值取向大不相同的潮流，但伊斯兰教复古传统在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如埃及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就力主复兴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朴素信仰，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后人常以“莎拉菲叶”（意为先祖）来称呼他们领导的现代主义运动。

总之，认定伊斯兰教具有复古传统是以充分的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它以多种形式自伊斯兰教出现之后就不断显现，也是不证自明的。可以说，当代兴起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就是这种复古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

世界三大宗教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复古”现象，但其各有特点。就伊斯兰教复古传统来说，其主要特征如下：

①周期性。所谓周期性，指的每隔一段时间，伊斯兰教就会出现各具特色的复古思潮或形式多样的复古运动。尽管复古的原因多种多样，波及的范围有大有小，复古的程度或深或浅，但在漫长的伊斯兰教历史上，这种复古现象周期性呈现，未曾间断过。当然，一个周期与另一个周期之间的距离是不均等的，有的短一些，有的则长一些，具有不平衡特点。但也不是无规律可循，复古的高潮期，往往出现在或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或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刻、或是社会转型关头。在上述时期，伊斯兰教总要表现自己，显示其力量，并寻找其与社会的最佳结合点。

②多元性。从历时性角度看，伊斯兰教的复古呈周期性特点，但从共时性角度看，则又是多元的。

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复古思潮和运动，呈多元特点，并不是统一的。复古不仅没有统一领导，而是多头并列，互不隶属，甚至其载体相互严重对立。从时间看，如果划分为大阶段，可视为同一时期，但仔细分析，也是有前、有后、有长、有短、极不一致。某一个时期在伊斯兰世界出现的复古运动，并没有统一的纲领，他们各行其是，五花八门。总之，它是多元的，不是划一的。

③政治性。一般说来，伊斯兰教的复古现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历史上发生的复古运动或出现的复古思潮，尽管具体内容大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即往往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并试图解决一些当时尖锐突出的社会问题，即使早期的苏菲

主义，虽然罩上浓厚的消极色彩，但它也是对当时社会盛行的腐败之风的一种抗议。特别是在近代，伊斯兰复古运动往往采用“圣战”形式，其政治性更强。虽然复古的口号是返朴归真，是到伊斯兰教早期的武库里寻找武器，但由于政治需要不同，因此所选取的武器也有很大区别，有的对民主选举哈里发抱好感，有的对乌玛感兴趣，有的对教法非常欣赏，有的强调对教律的严格遵循。

④战斗性。尽管历史上伊斯兰教复古运动在战斗性方面是很不一致的，早期苏菲派就缺乏战斗性，但一般说来，它是具有较强战斗性的。例如，哈瓦利吉派不仅与阿里派兵戎相见，而且对伍麦叶王朝来说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再如，瓦哈比运动，历经挫折、失败，但始终不屈不挠和顽强战斗，令世人刮目相看。还有那些数以千计的大小圣战者运动，更令对手胆战心惊，刀光剑影，血溅沙场，几乎是平常之事。

⑤复杂性。伊斯兰教的复古现象的复杂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就复古形式而言，有极端的，也有温和的，甚至还有十分消极的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卷进复古大潮的人也十分复杂，有统治者，有下层劳动人民，还有乌勒玛宗教人士，到了近代，还有中产阶级。尽管复古内容有一些基本共同之处，但由于诸种原因，还有诸多不同之点，对此不可简单化。

⑥群众性。伊斯兰教的复古现象较少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对实践层面予以特别关注。它既不是少数理论家的专利，也不是上层统治者的特权，而往往与广大穆斯林相联系。每一次大的复古运动一般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参加，因此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执行罕百里教法的人在穆斯林总人数中占有相当比例；信仰新罕百里学说的人数以万计；苏菲派的信徒遍布伊斯兰世界；参加近代穆斯林复兴运动的人难以计数。总之，历史上伊斯兰教的复古运动确实把相当多的穆斯林发动起来了，群众性是

其鲜明的特征之一。

既然伊斯兰教是具有明显复古传统的宗教，那么人们自然会关注其产生的原因，一般说来，伊斯兰教的复古传统是伊斯兰社会的产物，也和伊斯兰教自身状况密切相关。

①社会压迫。在伊斯兰历史上，伊斯兰教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社会上普遍存在贫困和种种弊端。伊斯兰教宗教上层和封建主关系密切，有时，他们本人就是封建主。由于封建主和宗教上层对广大穆斯林的剥削和压迫，到处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不合理景象。统治者骄奢淫逸，劳动者食不果腹，贫富尖锐对立的现象普遍存在。社会矛盾往往处于激化状态，它既有阶级矛盾，也有民族矛盾。伴随着社会上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风气日趋变坏，道德堕落普遍，宗教意识淡漠，不遵循教法禁戒，忘却日常功修，违背经训事例层出不穷。此外，外来思想和文化，包括近代的西方思想和文化，不断地向伊斯兰教渗透，侵蚀着穆斯林的心灵。正是社会压迫造成许多社会弊端需要纠正，但又无法彻底纠正；社会风气需要改善，但也无力彻底净化；封建制度虽然自身可以作局部调整，但又不能彻底解决。这一切，就使得伊斯兰复古召唤反复出现有了客观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只要剥削制度持续存在，复古就会反复出现。

②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穆罕默德时期，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穆罕默德亲手缔造的“乌玛”，被后人视为美好公正的社会；“乌玛”的各个方面，都以安拉的启示为指导，并遵照穆罕默德的教诲，“乌玛”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统哈里发时期，经过平叛，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扎了根，并开始迅速向半岛以外传播。伊斯兰教的旗帜，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高高飘扬在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波斯的上空。《古兰经》定本也完成在这一时期，“圣训”传述的收集工作很有成绩，许多重大的伊

伊斯兰政策被制订。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穆斯林视为圣门弟子遵照《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遗训治理穆斯林社会的完美的典型。尽管后人往往过于美化伊斯兰教这一时期，但也不能不看到，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确实成就巨大，因而，为后来的复古运动提供了依据，并具有极大吸引力。

③穆罕默德的榜样力量。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初，穆罕默德确曾进行一些复古活动，这种情况被复古者认为是体现安拉意志、为穆斯林指引正道的典范。穆罕默德根据阿拉伯民族的古老宗教传说，认定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恢复“易卜拉欣的宗教”。穆罕默德还高度重视阿拉伯民族的古老传统，诸如氏族成员间平等民主协商的传统、互助互济的传统等。他还对贝都因人惯用暴力手段进行袭击和抢劫的传统予以改造，以便为其传播伊斯兰教和开疆拓土服务。在伊斯兰教礼仪中也大量保留了旧礼仪传统，如朝觐时关于受戒、穿戒衣、奔跑、绕行、投石、探泉、宰牲、吻黑石等。当然，穆罕默德的种种复古活动，是为了传播伊斯兰教，扩大信仰队伍，进行伊斯兰教革命，它不但不能说明穆罕默德是一个守旧派而恰恰证明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④《古兰经》、“圣训”的元典作用。《古兰经》、“圣训”出现在阿拉伯社会重大转折时期，是阿拉伯民族的元典，其蕴含的精神具有永久的魅力。在广大穆斯林看来，《古兰经》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宗教经典，《古兰经》是安拉的语言，源自“天经原本”。《古兰经》起着“详解万事，向导信士”的作用，在穆斯林的心目中，享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圣训”的内容是有关穆罕默德传教过程中除传述《古兰经》之外的一切非“启示”性言论，以及他的举止、活动和他在场时未加禁止而默认的行为等。“圣训”的地位，在伊斯兰教中仅次于《古兰经》。鉴于保持《古兰经》与“圣训”的原初面貌和正确无误，对保护伊斯兰教的统一以及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至关重要，加之《古

兰经》、“圣训”对广大穆斯林有巨大影响，因此，复古者对《古兰经》、“圣训”倍感兴趣是十分自然的，几乎所有的复古者都不遗余力地去利用《古兰经》和“圣训”，以达到“托古改制”的现实目标。

⑤历史周期循环论思想的影响。“圣训”说：“在每个世纪之初，真主将给这个社团（乌玛）派遣一些人来，以复兴其信仰。”说到底，“圣训”所宣传的正是历史周期循环论，即每过一个世纪，就会兴起一次大规模复兴伊斯兰教的浪潮。诚然，历史循环论是一种唯心主义，而复兴虽具有周期性循环特征，但也不绝对是一个世纪一个周期。但是，由于“圣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典籍，加之伊斯兰教所长期依存的封建社会往往也呈现乱与治之间的某种循环，因此，“圣训”宣传的历史周期循环论在伊斯兰世界非常流行。这种思想理论，常常鼓动少数精英，为达到某种目的，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关头挺身而出，大搞复古活动；深受历史周期循环论潜移默化影响的普通民众则群起追随、深深卷入复古的浪潮。

⑥马赫迪思想的广泛传播。尽管马赫迪思想未被穆斯林作为统一教义予以信奉，但伊斯兰教各个教派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其影响，特别是在什叶派的伊玛目派那里，马赫迪思想更成为伊玛目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赫迪，（Mahdi意为“被引上正道的人”、“被指导的”、“获得指引的”）引伸为伊斯兰教所期待的“救世主”。什叶派的复临说就是马赫迪思想的具体化。所谓复临说，是指伊玛目有时可“隐遁”，被安拉藏在一个秘密的、人所未及的地方，他并没有死，不时被人看见，与某些人经常发生联系，并掌握着人类的命运，在世界末日审判前会复临人间。什叶派复临说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复临的人选只能是伊玛目；第二，伊玛目没有死，只是隐遁；第三，“隐遁的伊玛目”就是马赫迪“救世主”；第四，在伊玛目“隐遁期间”，有代理人。对逊

尼派来说，也流行着当人世间充满不幸和灾难的时候，马赫迪就会复临人间，以建立平等和正义的制度，因此，逊尼派中也时常出现一些自封为马赫迪的精英人物，不断发动大大小小的马赫迪运动，掀起阵阵复古浪潮。

伊斯兰教的周期性复古现象，除了纯洁信仰、强化认同等显而易见的宗教作用外，还对穆斯林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就其正功能来说，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①推动伊斯兰社会发展。伊斯兰教复古现象，在许多情况下，具有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性质。在中世纪，一些复古活动往往具有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内涵；有些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守旧派的斗争，但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还有一些，是反对民族压迫的，具有不可否认的正义性。在近代，绝大多数复古活动具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生存的性质，而这些大大小小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则是伊斯兰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

②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伊斯兰教历史上的许多复古活动，都打上了鲜明的改革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烙印。或者说，形式是复古的，内容则是现实的。穆罕默德之所以举起恢复“易卜拉欣正教”的旗帜，是为了证明伊斯兰教早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以便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哈瓦利吉派也是在复古的外衣下表达了下层人民对平等的渴望和追求；苏菲主义是对当时奢侈时尚和残酷派别斗争的消极抗议和心灵渴望自由的呐喊；瓦哈比派具有重新统一阿拉伯半岛和反对奥斯曼土耳其民族压迫的革命内容；至于近代发生的其他复古运动，或为了纯洁社会，或为了振兴民族。总之，应当注意复古背后的现实内涵。

③对保存传统文化功不可没。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的主体文化。在几乎所有的

伊斯兰教复古活动中，都蕴含着尊重和保存自己民族文化的內容，反映出维护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特别在近代，这个作用日益明显和突出，并受到人们高度重视。抛弃传统，完全西方化，肯定没有出路。当然，否定西方化，并不意味着对西方先进的东西可以不去学习。伊斯兰教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复古活动，对保护伊斯兰文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④宗教改革的一种尝试。一般说来，每一次复古活动，都多少带有宗教改革的痕迹。当然，中世纪的复古活动，往往是修修补补，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伊斯兰教内部存在的某些问题。到了近代，随着社会转变，伊斯兰教通过复古形式进行的改革活动，或者说伊斯兰复兴，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伊斯兰教的周期性复古活动，也是宗教内部的一种改革尝试。

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复古现象还有副功能的一面，同样不能被人们忽略或一笔抹煞。

首先，它具有比较保守的一面。其表现在诸多层面，特别是其思维定势具有绝对化的倾向。对早期伊斯兰教过于美化，看不到当时存在的问题，而对外来文化，包括近代的西方文化，则不能批判地吸收。对伊斯兰教法，也是无比青睐，看不到其不足的方面，其实，伊斯兰教法有待改进之处很多，特别是，它有必要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增强其适应性。此外，复古运动对伊斯兰教的某些已过时的东西，也不能大胆地进行改革。总之，它缺乏的是一个开放的心怀，一种向前看的远大目光。

其次，它有时成为落后势力的工具。由于伊斯兰教复古活动具有消极的一面，特别是其具有保守性，因此，无论在中世纪，还是在近代，常常被伊斯兰教中的某些落后势力所利用，他们打着“纯洁”、“改革”的旗帜，妄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强化宗教信仰的同时，极残酷地对待异己分子，极力维护旧秩序，更

有甚者，有的以复古为名，公然与外国入侵者勾结。

总之，对历史上伊斯兰教的复古现象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该肯定的必须充分肯定，该否定的应该坚决否定。今天，时代不同了，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复古活动虽然在保卫伊斯兰文化传统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但对自己的传统理应批判地继承，对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也应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这样，伊斯兰教才能赶上历史的潮流，跟上时代的步伐，广大的穆斯林与其他文化圈的人民，才能携起手来，共创美好的未来。

第三章 伊斯兰社会——来自外部的压力

第一节 外部压力的来源

一、英、法的殖民扩张

随着资本主义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穆斯林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步步地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各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一系列条约，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作为老牌的殖民大国，英国和法国在穆斯林世界占据主导地位。英国控制了从波斯、海湾沿岸各国，直到阿拉伯半岛的广阔地区，还于1922年7月24日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委任统治，于1922年8月在伊拉克建立了“用糖衣裹着的委任统治”；^① 外约旦虽于1923年宣布独立，但英国仍控制预算、财政、军队、经济发展和外交事务；早在1914年12月18日，英国就片面宣布其对埃及行使保护国权力，后于1922年2月28日，又把埃及提升到独立自主国的地位，但由于英国军队和许多英国顾问驻在埃及，而且有一个英国人来作埃及军队的西尔达尔

^① 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下册，第537页，商务印书馆。

(总司令), 因此, 埃及事实上并未获得真正的独立。^① 苏丹名义上由英埃共管, 实际上是英国的殖民地。除英国外, 法国根据协约国“圣雷莫协定”, 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了委任统治地; 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 摩洛哥大部分地区被法国控制; 突尼斯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 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势力范围; 意大利控制利比亚; 摩洛哥的部分地区被西班牙控制等。美国则得到了开采巴林群岛、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石油的租让权。

二、美国和苏联取代英国和法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英国和法国的势力日趋衰落。1946年法国和英国军队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走, 1947年英国大部分驻军撤出伊拉克, 1956年英军全部撤出埃及。在巴勒斯坦, 英国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由于其无力继续维持对巴勒斯坦的控制, 被迫于1947年2月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1948年5月14日, 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 5月15日撤走英国军队。此外, 英国由于财政困难, 无力继续承担对土耳其的军援和经援, 因此, 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于1947年2月21日向美国国务院递交照会, 提出让美国承担此项任务。

与英国、法国在中东地区屡屡受挫相反, 美国和苏联的势力进入中东地区并节节胜利。二战后的美国, 已是世界头号强国, 到1945年, 它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 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一, 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军事上, 武装部队总数达1200余万人, 国防预算超过800亿美元, 它的海军和空军是世界上最庞大的, 在5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484个军事基地, 并垄断着原子弹。1947年7月, 美国同土耳其签订军事协定; 1948年土耳其成为“马歇尔计划”援助国, 并得到2亿美元援

^① 参见《中东史》, 下册, 第580页。

助；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7年和1950年，美国同伊朗签订两项军事协定，伊朗允许美国使用伊朗机场、港口、基地和其他军事设施；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了颠覆不听美国指挥的摩萨台政府的政变。1951年，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缔结《共同防御援助协定》、《达兰机场（租借权）协定》和《第四点计划总协定》，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势力。与此同时，美国在北非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1948年美国同法国签订协定，美国在摩洛哥11个地区建立军事基地；1954年，美国在利比亚建立惠勒斯空军基地。总之，美国成功地取代了英国、法国在中东的地位。当时，惟一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国家是苏联，苏联拥有世界无双的强大装甲部队，并于1949年原子弹试验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考虑到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利益和为了打破美国的遏制战略，苏联先后同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对亲美的土耳其和伊朗施加压力。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末，苏联在积极支持中东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进步力量的同时，不断增强其在中东的势力，其中最突出的是增加了军事上的渗透，使苏联的军事力量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进入中东，以至于在军事力量方面基本上达到与西方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苏联开始公开参与中东的事务，几乎每一起重大的中东事件，均与其有关。

三、美国谋求中东霸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无数事实告诉人们，有力量在中东争夺霸权的只有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美国争夺中东霸权是基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①稳定地获得石油，②遏制和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③控制战略通道；④维护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⑤维持与亲美的阿拉伯国家的盟友关系。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

的战略目标就是巩固其在中东的势力范围，排斥、遏制苏联对中东的渗透。而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就是偏袒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分而治之。美国在中东奉行亲以色列政策，是伊斯兰主义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美国为什么偏袒以色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国内的原因，二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作用。在美国，犹太人有600多万，犹太人资本垄断了钢铁业（25%）、皮毛工业（90%）、粮食加工（60%）、电影企业（40%），在新闻、宣传机构有巨大影响。强大的犹太院外集团，影响着美国历届总统选举，任何一位美国在任总统都受犹太势力的巨大牵制。与此同时，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可靠的盟友，美国依靠以色列，既可以压制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又可以遏制苏联；同时又可以使成为美国向中东扩张的据点。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援助下，土地不过1.5万平方公里（不包括1948年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近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不过500万的以色列国经历四次中东战争不但未被消灭，反而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强国。尤应指出的是在历时6天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1967年6月5~10日），埃及、叙利亚、约旦遭到惨重失败，三国死亡4300人，伤9100人，被俘和失踪7500人，损失飞机408架，坦克965辆。此外，还丢失了大片阿拉伯土地：整个西奈半岛（6万平方公里）、全部约旦河西岸（5200平方公里）和戈兰高地（1150平方公里）以及耶路撒冷旧城（两年以后，即1969年8月，阿克萨清真寺被暴徒纵火烧毁）。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迫使一部分阿拉伯穆斯林反思战争失败的原因，把它归咎于当时在中东占统治地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尤其是纳赛尔主义，认为纳赛尔主义“脱离伊斯兰教原则”导致战争失败。由此可见，伊斯兰运动崛起于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之后绝非偶然，与美国谋求中东霸权有密切关系，因为它一贯支持以色列，使以纳赛尔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丧失权威，并导致阿拉伯国家大片河山

沦陷，百万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园。

四、苏联与美国争霸

冷战时期，世界上堪与美国匹敌的惟有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苏联的军事工业发展异常迅猛。1947年苏联工业已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至1950年工业产量与战前相比增加了73%。众所周知，中东是美国全球战略中遏制苏联的前哨阵地，而反遏制、并进而控制中东也是苏联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可概括为4点：①控制中东石油资源；②占领东西方交通要道；③打破美国对苏联的包围战略；④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苏联与美国逐鹿中东是相当紧张、激烈和残酷的，甚至多次达到军事上几乎迎头相撞的程度。中东地区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能看到苏联和美国的影子。尤应指出的是，苏联于1979年12月24日悍然入侵阿富汗，这是它第一次对一个第三世界主权国家的武力入侵。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为了支持和保护1978年4月27日由左翼的人民民主党通过政变建立的亲苏政权，当然也是其妄图称雄中东进而称霸世界的南下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给伊斯兰运动向前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早在70年代初，阿富汗就出现了反对查希尔国王的世俗化和西方化路线的伊斯兰反政府组织。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斯兰反对派反政府的斗争发展为阿富汗穆斯林反对苏联侵略的战争，在阿富汗的伊斯兰运动中，烙上了深深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烙印，从而使伊斯兰运动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到80年代初，阿富汗的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形成了“七党联盟”和“八党联盟”两大集团，前者指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由7个党派组成，后者是指总部设在伊朗境内的由8个什叶派穆斯林组织联合组成的“伊斯兰革命联盟”。在“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的7个党派中，伊

伊斯兰党（希克马蒂亚尔领导）、伊斯兰协会（拉巴尼领导）、伊斯兰党哈利斯派（哈利斯领导）等3个力量最强的组织，都属于伊斯兰主义派别。而“伊斯兰革命联盟”深受伊朗革命影响，并受到伊朗政府支持。此外，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运动，不断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以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等众多国家的支持，并获得了大量的物资、财政和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援助，甚至有些穆斯林国家变相地派出所谓志愿人员前往阿富汗参战。这一切都说明，苏联与美国争霸中东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当代伊斯兰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五、建立一极世界

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使美国在中东处于前所未有的有利地位，美国在中东第一次没有了强大的对手。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仍然是美国的“关键利益”所在，在美国的“参与和扩展”的新的安全战略中，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确保海湾地区石油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和国际市场、保障中东地区的海空战略航道畅通无阻和进一步扩大与控制具有重大潜力的中东市场，对于维护美国得来不易的世界霸权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为此，美国在中东地区频繁活动。首先，扩大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它以种种借口，通过多种形式，已与10国达成了可以派驻军队的协议，美国目前在海湾及附近水域有20艘军舰，数十个空军中队，2万余名官兵。其次，美国联合西方盟国，借联合国之手，继续保持和加强对中东反美地区大国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等国的制裁。第三，按照美国的意图控制中东军备竞赛，确立美国对中东武器销售的主导地位，并在此前提下实施军控。第四，美国第一次取得了在阿以冲突双方居间调停的地位，促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和平。这些均向人们昭示，美国在中东地区业已处于主导地位，中东地区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美国。但是，由于美国在中

东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对一些中东地区主权国家的粗暴干涉、继续偏袒以色列以及在军控、人权等方面的双重标准等，势必引起中东地区各国人民的极大不满，这也就为伊斯兰运动持续发展提供了温床和土壤。

虽然冷战时期伊斯兰社会的外部压力主要是美国和苏联，而冷战结束后则为美国，但是，从总体上说，伊斯兰社会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当代伊斯兰运动具有强烈的反西方倾向，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既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从历史上看，主要是由于西方列强使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相继沦为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在广大穆斯林心中埋下了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仇恨的种子。早在1502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著名的航海家达·伽马袭击并俘虏了载有200~400名赴麦加朝圣者的阿拉伯船只，除50名妇女和小孩受了洗礼，一人逃走和一个领航员外，其余的人全部被杀害，从而揭开了西方殖民者侵略穆斯林世界血淋淋的一页。1798年5月10日，法国拿破仑率领战舰350艘，军队3.5万人侵略埃及，7月24日法军进入开罗，标志着穆斯林世界全面衰落的开始。后来，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瓜分了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领地；英国和俄国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阿富汗沦为英国的附庸；英国还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周围的几个小酋长国；1853年俄土战争以后，奥斯曼土耳其沦为半殖民地。随着殖民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穆斯林世界四分五裂，伊斯兰教也岌岌可危，因此，穆斯林史学家们称这段历史时期为伊斯兰教的“黑暗时期”。从现实来看，冷战时期，虽然美国和苏联基本上是由于有起有伏、攻守交错的相持局面，但在冷战时期后期，在美苏竞争中，苏联处于劣势，这是由于苏联当时经济停滞、国力衰退造成的。1984年，苏联在非洲之角的主要盟国埃塞俄比亚由于灾荒有700万人濒于饥饿时，苏联仅支援一万吨大米，这不仅受到西方的嘲笑，也引起埃塞俄比亚国内的不

满。苏联的总体实力不如西方，除提供军火外，在经济建设领域很难同西方竞争。就是军火，还有许多不如西方之处。比如，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中，叙利亚使用的苏制武器远不如美制武器精良，从而使叙利亚在战场上吃亏不少。一些西方分析家在评论苏联侵略阿富汗时说，伊斯兰运动在其他地方主要表现为反对西方，反对资本主义，而在阿富汗则表现为“伊斯兰与共产主义的斗争”。

第二节 外部压力的表现

认真梳理和探讨伊斯兰社会在本世纪所承受的日益沉重的外部压力的诸种表现，对于深入研究伊斯兰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不仅和伊斯兰运动的兴起、发展密切相关，而且对其纲领、口号、斗争目标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本世纪伊斯兰社会所遭受的外部压力主要有三种，即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每一种压力均有多种表现形式，令人眼花缭乱。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伊斯兰运动的出现和殖民主义密不可分，伊斯兰运动的发展与新殖民主义关系密切，伊斯兰运动的持续高潮与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紧紧相随。

一、殖民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统治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欧洲列强实现了对中东地区的彻底瓜分。

①“委任统治”制度。“委任统治”制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殖民列强瓜分殖民地的一种新形式。所谓委任统治，即以国际联盟(1920年1月成立)的名义管理德国的殖民地和从土耳其分割出的一些属地，而土耳其属地均属于穆斯林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殖民列强行使国际联盟“授予”的“委任统治权”。这种新办

法使英、法等国在重新瓜分殖民地当中获得了最多的权益，特别是这两个国家通过圣雷莫条约取得对中东的委任统治权，而国际联盟不过是履行手续的工具。因此，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于1920年6月说：“如果以为按照国联的盟约或其他文件，拥有授予委任统治地之权的是国联，那是十分错误的。拥有这种权力的是已经征服了那些地方的大国——因而这些地方要由它们来进行分配。”^①在委任统治地，英、法等国通过派驻“高级专员”、“民政专员”、“总参谋长”等，实施直接统治，委任统治地实际上就是殖民地。

②“间接”统治体制。当“委任统治”在实践中屡屡受挫时，英、法等殖民国家又转换手法实施“间接”统治体制，即通过扶植代理人和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及表面上准予独立的办法，达到继续控制穆斯林世界的目的。英、法与所扶植的代理人所签订的条约主要有：1919年英国—伊朗条约、1922年英国—伊拉克同盟条约、1928年英国—约旦条约、1930年英国—伊拉克条约、1936年英国—埃及同盟条约、1936年法兰西—黎巴嫩同盟条约等。上述这些条约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即英、法殖民列强实际上仍控制着签约国，它们的殖民利益并未受到实质上的伤害。

③资本输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输出在许多殖民剥削形式中成为主要形式。它主要包括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前者指公债、贷款等，后者指投资开办各种企业（多为非直接生产领域）。早在1914年，英、法、美、德四国在东方（包括伊斯兰世界）的投资已达154亿美元。^②在叙利亚，多达10亿法郎的法国垄断资本，控制着叙利亚的铁路、港口、电力、自来水等企业，以法资为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银行垄断了叙利亚的货

① 乔治·E·柯克：《中东简史》上册，第23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75。

② 参见郑家馨、何芳川：《世界历史》，第31～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币发行权。^① 在黎巴嫩，铁路、公用事业和银行大体上由法国的投资人拥有并经营。^② 此外，英、法等殖民强国继续把穆斯林世界作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例如，为满足英国纺织工业的需要，埃及被规定“只能生产棉花”。^③ 此外，穆斯林世界的石油也被源源不断地、廉价地输往殖民国家。殖民列强疯狂地掠夺穆斯林世界的石油资源，攫取了惊人的利润。例如，“英伊公司在 1913~1950 年间就夺取了 4 亿英镑的利润，它原以 420 万镑起家”。^④

④军事镇压。殖民列强从未忘记以暴力镇压人民的反抗，因此，它们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例如，法军血腥镇压 1925~1927 年叙利亚起义、英军镇压 1920 年伊拉克起义和 1919~1922 年埃及人民起义等，都是殖民列强依靠暴力的有力的证明。殖民列强十分重视在穆斯林世界驻扎军队，建立军事基地等，从而对穆斯林世界构成严重威胁。

此外，殖民列强的驻军费用对人民来说是一项十分沉重的负担，例如，在伊拉克 1919~1920 年的财政年度中，“总支出的 16% 用于占领军总部和行政支出，这比以前的许多年算是降低了”^⑤；而在叙利亚，1919~1923 年法军驻叙费用达 24.4 亿法郎。

⑤西方文化输出。由于英、法等列强的政府和企业直接推动和资助西方文化、教育、制度、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穆斯林世界的植人活动，以至于基督教堂、教会学校、医院、出版机构、慈善

① 参见郭应德：《阿拉伯史纲》，第 50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② 参见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下册，第 527 页。

③ 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 156 页，商务印书馆，1980。

④ 费舍尔：《中东》，第 16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⑤ 乔治·E·柯克：《中东简史》上册，第 257 页。

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也随之侵入，资本主义精神文化传播日趋广泛、影响日益深入。由于西方文化输出带有强制性，并包藏着从精神上征服和控制穆斯林世界的祸心，加之西方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共存，以及精神文化与器物文化同在，因此它对伊斯兰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复杂的。尤应指出的，在西方文化大规模冲击和影响下，伊斯兰社会内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世俗民族主义的兴起从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的宗教与文化形成冲击。

二、新殖民主义

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新殖民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当他看到老殖民主义那一套已经难以维持，他不得不花样翻新。罗斯福的主张是：①二战后实行领土托管制度；②废除贸易特惠制，实行自由贸易；③开发落后国家。罗斯福新殖民主义的显著特点是用经济扩张代替赤裸裸的领土扩张。^①在罗斯福之后，新殖民主义不断发展和完善。总的说来，新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在二战后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也称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一种新的剥削和掠夺方式。其显著特点有二：①承认原殖民地、附属国独立的权利，特别是承认它们享有独立的国家主权；②坚持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奉行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为主的方针，但不放弃军事干涉和武装侵略。新殖民主义虽然突出了一个“新”字，但与老殖民主义相比来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新殖民主义不过是老殖民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种。

新殖民主义一度在穆斯林世界非常盛行：

①“经援”和“军援”。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推行新

^① 参见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编：《世界现代史论文集》，第127～12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殖民主义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经援”和“军援”。“经援”和“军援”的理论基础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7年3月12日抛出的“杜鲁门主义”和1949年1月20日出台的美国外交“四点主要行动原则”。前者首次把遏制苏联、称霸世界、援助“世界各地自由民族”和防止共产主义的渗入作为基本国策公诸于世，并向国会要求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以协助两国复兴”，阻止它们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四点主要行动原则”的第四点，明白无误地规定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投资。1947年7月12日，美国和土耳其政府正式签订了《关于协助土耳其的协定》，协定规定：美国援助土耳其1亿美元，其中8000万美元用于土耳其军队的现代化，另外2000万美元用于修建公路、港口、机场等军事设施。1949年，美国又向土耳其提供7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向土耳其提供“军援”的主要战略目的是把土耳其变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反对苏联的桥头堡。此外，美国于1951~1954年间曾向约旦提供2525万美元的援助，进一步控制了约旦。再者，1951年，美国政府根据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与沙特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和技术协定，从而扩大了在沙特的影响。还有，美国与伊拉克于1954年4月21日秘密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决定在3年内向伊拉克提供1亿美元的军援，伊拉克后来成为中东军事联盟——巴格达条约组织的轴心。必须指出，美国等国的“经援”、“军援”，多数是要还本付息的，即使有一部分是“赠与”，也往往要求受援国以特殊的“优惠”供应某种资源为条件。总之，美国等国正是以“经援”、“军援”为名，行控制和掠夺之实。

②签订军事条约和组建军事集团。签订军事条约、组建军事集团也是新殖民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美国等国正是以此对签约国、参加国从军事上加强控制，以保护和扩大它们在中东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早在1950年11月10日，美、英、法、土四

国发表成立中东司令部宣言，并邀请有关国家参加，但响应者只有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加之叙、伊两国后来均发生人民反对参加中东司令部的斗争和示威，使美、英等国策划军事集团计划夭折。1953年1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被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为国务卿，上台不久，就炮制出关于建立中东军事集团的计划，即“杜勒斯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首先由中东东北部诸国组成小型的军事集团“北层防御集团”，然后西方国家和“北层”诸国分别订立军事援助协定，继之“北层”诸国再与中东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军事协定，逐步地形成中东军事集团。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国务院开始执行“杜勒斯计划”。1954年2月19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准备签订一项军事合作协定。一星期后，美国发表声明赞同土、巴两国结盟，并许诺扩大对两国的军援。4月2日，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缔结了《促进共同合作条约》，有效期为5年。1955年1月，在美、英大使的幕后唆使下，土耳其和伊拉克政府决定缔结军事条约，2月24日在巴格达正式签署了《互助合作公约》（又称《巴格达条约》），从而为建立一个中东军事联盟铺平了道路。1955年4月4日，英国与伊拉克签订了一项《特别协定》，参加了《巴格达条约》。9月23日、11月3日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宣布正式参加《巴格达条约》。1955年11月21~22日，《巴格达条约》签约国在巴格达举行首届理事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英等国通过它们操纵的巴格达条约组织，紧紧地把条约参加国控制在自己的手掌中。^①

③策动政变和军事干涉。策动政变和军事干涉在新殖民主义的政策中仍占有一定的位置。美、英等国对于那些为了维护民族

^① 参见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第164~1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利益而疏远它们的国家，有时利用其国内亲西方势力发动政变，颠覆原来的政府，建立惟命是从的亲西方政府；有时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涉，妄图达到控制的目的。例如，1953年8月19日，伊朗的萨希迪将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领导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的摩萨台的民族主义政权。9月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给予伊朗4500万美元的紧急赠款。其后，在短短一年内，美国政府又向伊朗提供了5笔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共计7900万美元。又如，1958年7月15日，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执行“兰色球棒”行动计划，在第六舰队的70艘军舰和420架飞机掩护下，9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黎巴嫩贝鲁特附近的哈尔迪湾登陆，以声援摇摇欲坠的亲美的黎巴嫩夏蒙政府。尽管这次对黎巴嫩的军事干涉以美国失败告终，夏蒙被迫辞职，美军于10月25日全部撤离黎巴嫩，但这是美国在中东第一次以自己的军事力量直接干涉中东国家的内政，从而使穆斯林世界各国人民认清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①

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是伊斯兰主义运动持续发展的重要的外部因素，反强权政治、反霸权主义是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最响亮的口号和经久不衰的内容。所谓强权政治，一般是指大国或强国倚仗实力，对弱国或小国强行干涉或控制，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压贫，并最终确立它们的垄断和控制地位。强权政治作为一种对外政策原则，自资本主义形成后就已经确立，但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之后，特别在近半个世纪，已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此外，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是一对孪生姐妹，大国强国推行强权政治的同时往往或奉行全球性的霸权主义，或奉行地

^① 参见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第200～206页。

区性的霸权主义。美国一贯奉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昭然若揭，而苏联也紧步美国后尘。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其大国主义已恶性膨胀，并开始向不发达国家（包括穆斯林世界）扩张势力；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逐步地、不可逆转地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穆斯林世界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有如下突出的表现。

①维护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所谓国际政治旧秩序，乃是少数大国、强国、富国（主要是美国和苏联）控制、掠夺其他小国、弱国、穷国，违背民主、平等、公正原则的国际秩序；所谓国际经济旧秩序，“集中表现为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不合理分工，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不等价交换，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国际垄断资本占有支配地位，国际经济和货币组织受少数发达国家控制。”^①由此可见，不管是国际政治旧秩序，还是国际经济旧秩序，都对发达国家有利，而对发展中国家（包括穆斯林世界）不利，因为旧国际秩序是帝国主义殖民时代的产物，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结果。正因如此，发达国家极力维护旧的国际秩序就毫不奇怪了，它们正是利用了这种旧的国际秩序，在政治上控制、干涉，在经济上剥削、掠夺其他国家。旧的国际秩序的存在，不仅使穆斯林世界各国的政治独立受到威胁，而且也严重地阻碍着它们的民族国家的振兴，以至于在政治上不同程度地依附大国；农业发展缓慢，甚至于有些国家粮食不能自给；贸易条件继续恶化，畸形经济结构变化甚微，农矿业初级产品仍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债务负担沉重。根据1994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字，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叙利亚、苏丹、伊朗、突尼斯、约旦等12国，1992年的外债总额为

^① 李琛：《第三世界论》，第40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2305.18 亿美元，为 1980 年 798.65 亿美元 2.9 倍。^① 海湾战争前，1988 年阿拉伯国家的外债总额已经达到 1400 亿美元。1990 年初更上升到 2600 亿美元，其中伊拉克、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苏丹五国的债务总额占阿拉伯国家债务总额的 3/4。目前，阿拉伯国家的债务额已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为当年商品和劳务出口收入的一倍半。每年仅支付利息就占阿拉伯国家出口收入的 20% 以上。^②

② 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的产物，兴起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才有了飞速的发展。按其资本所属国度的社会制度性质，跨国公司可分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社会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跨国公司，而第一类的跨国公司居压倒优势。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穆斯林世界的发展中也有可以利用的一面，但是，无庸讳言，它也具有大国、强国、富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工具的一面。第一，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着穆斯林世界国家的许多经济部门，使这些国家或在资金方面、或在技术方面、或在工业制成品方面、或在消费方面，程度不同地依靠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例如，以“七姊妹”的别号闻名于世的 7 家跨国石油垄断公司建立了庞大的国际石油工业，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们操纵国际石油市场，控制石油输出国的国计民生。它们的经理人员从匹兹堡飞到科威特，从旧金山飞到沙特阿拉伯，就像在它们所主宰的国土上旅行。它们的收入超过了它们在那里采油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收入，它们的油船队的总吨

① 参见安和芬、陈德照、朱婉娟、马秀卿：《海湾战争后的中东经济与政治》，第 216 页，中国物价出版社，1995。

② 参见林青：《国际石油风云》，第 4~5 页，香港朝阳出版社，1977。

位，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国的海军舰队，它们在沙漠中拥有和主管整座城市。它们有全套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体系，完全用不着假手别人。^① 70年代，不少石油输出国家实现了石油开采国有化，并夺回了价格决定权。在股权减少的情况下，石油跨国公司的利润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大大增加了。主要是由于它们控制了石油成品的销售价格。第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剪刀差，进行不平等交换，使穆斯林世界各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并蒙受巨大损失。众所周知，穆斯林世界大体上可以分为以输出石油为主的国家和以输出农矿初级产品为主的国家。前者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阿曼、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10个国家；后者有阿富汗、埃及、黎巴嫩、也门、约旦、叙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此外，也有少数在出口商品中制成品占的比重较大的国家，如土耳其等。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垄断低价进口农矿初级产品，并以垄断高价出口工业制成品，使穆斯林世界各国，特别是以农矿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和地区，惨遭剥削。“据关贸总协定资料统计，初级产品价格（不包括石油）和工业制成品的交换比价，如以1980年为100，1985年降为85.1，1988年再降为76。”^② “1980~1989年间，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非石油商品，平均价格下降33%，许多产品价格下跌到半个世纪以来最低水平。”^③ 工业制成品不仅价格上扬，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也明显增加，已从1980年的57.2%增至1987年的70%，其中，高技术产品的增长大为迅速。”^④ 第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常常干涉所在国的内政。它们

① 参见林青：《国际石油风云》，第4~5页，香港朝阳出版社，1977。

② 蔡拓等：《当代全球问题》，第8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③ 同注②。

④ 同注②。

往往以投资建厂、提供贷款和技术为条件提出种种需求，践踏东道国的主权。为了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保护所谓的投资利益和特殊权益，总是力图影响东道国的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千方百计地让这些国家追随它们的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更有甚者，它们通过各种手段，包括贿赂和收买东道国政府要员，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大搞政治颠覆和军事政变。第四，依仗垄断现代科学技术，达到控制和掠夺的目的。二战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而垄断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往往掌握着科学技术的垄断权。在一般情况下，它们不轻易转让先进技术，只把那些已经开始扩散，甚至过时的技术才投放到技术贸易市场，并收取高昂的专利使用费，同时规定种种不合理条件，以便进行进一步控制、剥削和掠夺。

③军火倾销与武装干涉。大量向穆斯林世界进行军火倾销、努力维持和扩大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苏联在穆斯林世界的军事存在，间或对穆斯林世界进行直接干涉或武装入侵，至今仍然是大国奉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重要表现。

向穆斯林世界进行军火倾销，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现象和涉及领域十分广泛的热点问题，它既属于军事领域的活动，又是具有特殊经济、政治、外交和战略内涵的行为。根据统计资料，1987~1991年世界武器出口国排在第一位的是前苏联（613亿美元），第二位的是美国（600亿美元）；而在进口国中，沙特阿拉伯名列第二，为106亿美元，次于印度（176亿美元），伊拉克为第三，103亿美元，阿富汗和土耳其分别列为第五和第六，前者为84亿美元，后者为64亿美元，次于位居第四的日本（98亿美元）。^①海湾战争后，穆斯林世界核心部分的中东地区的军

① 参见王帆、吴华、孟琪、李征：《国际军火交易》，第7~8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费开支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8%；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以色列、土耳其是该地区的五大军火进口国；1990~1992 年，中东地区国家购买武器额已达最高记录，且突破年购买额 1000 亿美元的大关，并以进口高、精、尖武器为主。^① 在武器出口国中，冷战结束前，美国和苏联一直是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继续充当军火销售大国。在军火交易中，特别在美国、苏联的军火交易中，除了明显的经济利益追求外，美国和苏联历来将其作为扩大政治影响和军事影响的重要工具。把它们的政治、军事利益置于重要地位，往往附带种种政治条件，以便对武器进口国保持长期控制，为它们称霸世界的总的战略目标服务。冷战结束后，美国向穆斯林世界的武器倾销，同样也是其建立所谓的以美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工具，美国通过军火交易，可以获得在武器接受国使用军事基地、空中飞越以及获得战略资源等权利，并进一步增加了这些武器进口国对美国的依赖性，从而也必然造成对这些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的严重威胁。此外，日益膨胀的军火贸易，也给区域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巨额的军费开支严重影响了武器进口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除借倾销军火进一步控制穆斯林世界外，美国和苏联都曾努力扩大自己的军事存在。早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前，苏联曾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派出数千名军事顾问，并取得了伊拉克的乌姆盖斯尔港，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和塔尔图斯港的使用权。美国也不甘示弱，以土耳其为例，美国同土耳其多次签署军事协定，可以利用土耳其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加强其在土耳其军事存在。1991 年海湾战争以来，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和设施被美国用来打击和监视伊拉克。另外，美国于 1983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

^① 参见《海湾战争后的中东经济与政治》，第 63~69 页。

了“中央司令部”，主管中东地区 19 个国家和红海、波斯湾两个战略海域，所辖兵力约为 30 万。^① 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主要是和盟国举办联合军事演习，在紧急时刻使用盟国基地，组建以美国为首的区域军事联盟，并和科威特等国签订联合防御条约。据统计，1994 年初，美国驻扎在海湾地区陆、海、空军总兵力达 2.5 万人，军舰 20 余艘，其中包括航空母舰 2 艘，战斗机 200 架。少数大国的军事存在，无疑对伊斯兰世界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更有甚者，它们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干涉和武装入侵。例如，苏联为了打开南下印度洋的通道，于 1979 年 12 月武装入侵阿富汗，直到 1989 年 2 月 15 日最终撤出，占领阿富汗前后达 9 年多时间；又如，美国以反对利比亚支持恐怖活动为名，分别于 1986 年 3 月 24 日和 4 月 14 日晚实施“草原烈火”计划和“黄金峡谷”作战方案，对利比亚进行空中打击。

④ 强制推行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观。早在二战前夕，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就说过，美国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促进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国际生活环境，但必须按照美国式的习惯和要求，必须能够使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方式普遍各方”。^② 杜鲁门总统也曾狂妄地宣称：“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③ 他的国务卿贝尔纳斯还说：“我们将赢得全世界都皈依我们的信仰”。^④ 美国统治集团的这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例如，里根总统说：“我们谋求保护和推动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事业。”苏联解体以后，少数大国，特别是美国大力宣扬和鼓吹西方（美国）的发展模式具有世界意义和普遍意义，西方（美国）的价值观——所谓民

① 参见王京烈编：《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第 37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② 参见梁守德主编：《国际政治论集》，第 185 页，北京出版社，1992。

③ 同注②。

④ 同注②。

主、自由、人权、议会选举、市场经济，多党制等是“人类共同的准则”，因此，应该在全世界予以推广。为达到在全世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把是否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观作为它们提供对外援助、贷款的先决条件。美国布什总统曾提出用五种办法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它们是：经济制裁、军事打击、能源控制、技术垄断、思想渗透。此外，还把“经济改革”作为穆斯林国家接受援助或免减外债的重要条件，例如：1991年，西方国家向埃及提出，如果埃及能够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埃及经济改革计划，它们将分三个阶段免除埃及的50%债务。至1993年7月，埃及当局宣称，埃及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改革计划，因而被免除30亿美元的西方外债。此外，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对伊斯兰社会也有很大的冲击，诸如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吸毒、性解放（甚至卖淫）、贩毒、凶杀等，都随着少数发达国家强制推行西方价值观而涌进伊斯兰世界，不断冲击着伊斯兰传统文化和道德，既造成了伊斯兰社会的持续动荡混乱，也使数以万计的人迷失方向，普遍感到精神上失落，就如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尤应指出，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的“一个目标、三个支柱”的对外战略总方针，既是其霸权主义野心的大暴露，也是导致伊斯兰主义运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所谓“一个目标”就是要在全世界建立和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三个支柱”是指经济安全、军事实力和促进民主。为了建立和巩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势必干预地区冲突，争取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解决热点冲突，同时要竭力保持美国对穆斯林世界的军事优势。美国为了在国际上全力保障美国经济利益的安全，加强美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将“公平贸易”作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市场具有开放性，增加美国商品进人

的机会，如果他国不按公平原则行事，美国政府将采取强硬行动，迫使其开放市场。美国坚持维持世界上惟一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就“必须保持强大的防务力量以对付新的挑战”，因此确定了“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军事战略指导方针，在适当减少海外驻军的同时，保持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并加强美军对重要战略地区发生的危机和冲突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美国将保持“世界上最大军事力量”和世界上惟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作为其防务政策的核心目标，对世界和平和穆斯林世界的安全构成严重挑战。美国还运用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等手段，在穆斯林世界“促进民主和人权”，并有选择地动用美军参与人道主义救援及其它与促进人权和民主有关的行动。美国片面解释人权，把美国模式强加于人；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对人权实行双重或多重标准。美国还迷恋于用经济制裁作为惩罚其他国家的办法，到处挥舞经济制裁的大棒。鉴于美国是冷战结束后剩下的惟一超级大国，因此，美国的所作所为对世界形势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美国的霸权主义，遭到许多穆斯林国家的抵制和反对，同样地也刺激了伊斯兰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并为伊斯兰主义运动提倡反西方威胁和反西方化提供了证据。

第三节 外部压力的特点和影响

本世纪穆斯林社会遭受的外部压力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伊斯兰运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并蕴含在它的口号、纲领乃至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中，甚至规定着它的涨落起伏。因此，认真探讨外部施加于伊斯兰社会压力的特点和影响，对研究伊斯兰运动大有裨益。

伊斯兰社会所遭受的外部压力有哪些特点呢？可以概括如下。

①动态性。所谓动态性，指的是外部压力经常处在不断的变化中，在压力源方面，先是老殖民国家英、法等，继而是美国 and 苏联，当今主要是美国。就压力的诸种表现来说，开始是殖民主义，继而是新殖民主义，后来又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至于压力的内容，包含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每个时期都有其侧重点；外部压力的地域范围也是逐渐扩大，最后遍及整个穆斯林世界。

②深刻性。伊斯兰社会遭受的外部压力还具有深刻性的特点，主要是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筑在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达的商品经济比穆斯林世界的自然经济要先进得多，而前者对后者起一种分解和瓦解作用。此外，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它可以不触动穆斯林世界的现有的经济结构，满足于表层的掠夺，随着其发展到大工业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必然要把后者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体系，使之进入商品经济范围，以更好地实现对穆斯林世界的财富掠夺。与此同时，它要用资本主义手段进行剥削，还必须推广西方教育，培养新型知识分子。总之，外部压力客观上对伊斯兰社会起了改造作用。

③长期性。从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始，西方就对伊斯兰社会形成了全方位的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穆斯林世界各国逐渐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并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复兴。然而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努力之后，穆斯林各国依然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压力。由于穆斯林社会经济与技术的落后仍将持续下去，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它肯定会继续感到西方的压力。

④沉淀性。外部压力由于持续时间长，加之压力大，种类繁多，而且步步深入，结果它就沉淀到更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和宗教心理中去了，成为潜意识的民族隔阂，累积起来，为以后总爆发

做了准备。本世纪伊斯兰运动出现，也就是外部压力沉淀性的突发表现。穆斯林世界中人民大众的心灵深处，都蕴积着反抗外部压力的潜意识，这是不断累积的结果，这种意识由弱到强，由小到大，是伊斯兰运动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伊斯兰运动既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也反对东方无神论，均与外部压力的沉淀性密切相关。

外部压力给穆斯林世界带来一些重大的影响，也给伊斯兰主义运动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

①造成穆斯林世界动荡不宁。由于外部压力，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使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区持续紧张动荡，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连绵不断，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穆斯林世界就是一块战火连绵之地，到处皆是殖民主义的血雨腥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阿以之间就进行过四次大规模战争。进入80年代，中东又爆发了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以色列人侵黎巴嫩的战争和伊拉克同伊朗的战争，同时，小规模武装冲突、恐怖活动、教派流血冲突更是目不暇接，不可胜数。外部势力的干涉一直是穆斯林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大国的争夺，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争夺是穆斯林世界战火不息的制造者。出于自卫的需要，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国家不得不求助于某一大国的支持，花费巨额资金购买大量军火，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独立受到威胁，经济上也背上了沉重负担，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无法改善。尤应指出，从60年代起发生的第三次（1967）中东战争，第四次（1973）中东战争和1982年黎巴嫩战争，背后都有美国的支持和纵容，战争给不少阿拉伯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丢失大片土地，数以万计的穆斯林倒在血泊之中，并严重伤害了广大穆斯林的民族尊严和宗教感情。

②影响对发展道路的选择。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国家长期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它们无权选择自己的经济发

展方向和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穆斯林世界各国相继独立，其中大多数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抛开国内原因不谈，外部压力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首先，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已经看到旧殖民主义那一套不灵了，因此换了个面孔，支持各国政治独立，并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积极为此呼吁；其次，表示愿意通过提供经济援助，与它们合作，发展经济，克服不发达状态；第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行者，它们不仅开风气之先，而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生产力，在经济、科学、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确实起了示范作用。但是，人们也不能不看到，帝国主义促使穆斯林世界诸国转向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控制和剥削它们，使它们仍然作为其原料供应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尽管穆斯林世界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进步性，但也无法避免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比如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不能彻底反封建以及国民经济中的官僚垄断等，都严重地阻碍穆斯林世界各国的发展和进步。

③穆斯林世界经济发展步履艰难。穆斯林世界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世界市场一直是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垄断着国际贸易、金融诸领域，这样，穆斯林世界各国往往要受它们的控制、摆布和剥削。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变本加厉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致穆斯林世界各国的制成品出口不断受到歧视和限制。据不完全统计，它们制订了1000多项非关税壁垒措施，不仅涉及钢铁、纺织、鞋类、农产品等传统部门，而且已扩展到电子产品等新兴部门。还有，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滞胀”时，它们往往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穆斯林世界各国也无法逃脱这股祸水。另外，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还强迫穆斯林世界各国按照它们的利益和愿望调整经济政策，并且在穆斯林国家中挑拨离间，威胁利诱，手段十分卑劣。例如，1986年初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动油价战，但由于英、美的破坏，最后，油价战以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亚马尼被解职而结束。总之，穆斯林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上虽有进步，但创业维艰，发展一波三折，面临着许多困难。多数国家经济仍然比较落后，还处于贫穷状态。它们过去的单一经济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资金进一步短缺，债务负担沉重。

④政治上的依附性不断加深。穆斯林世界各国在未获得独立以前，在政治上丧失全部或部分的主权；独立后，又逐渐成为美苏两个大国争夺的“中间地带”。美苏千方百计地使这些国家依附它们，或施加政治影响，或不断插手地区争端，或对这些国家横加干涉。总之，这些国家多受制于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总战略，并成为美苏争斗角逐的牺牲品。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穆斯林世界明显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倾斜，美国也企图在冷战后把它们纳入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新秩序”，不断地利用“人权”和支持“民主化”向穆斯林世界各国施压，同时联合西方盟国和利用联合国干预穆斯林世界各国内政，侵犯它们的主权。曾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穆罕默德·贝贾维说：“目前非殖民化处于襁褓时期，假独立盛行，新兴国家的主权往往以幻象出现。1945年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有关国家主权的传统概念有着明显的不足之处，这一点已越来越清楚了。根据政治因素制定的这一概念并未考虑到经济因素，它可以使新兴国家获得一些外部可见的主权——一面国旗，一首国歌，联合国席位等等，而真正的权力则在他处。”^①他还说：“假政治独立和真正的经济依附是

① 穆罕默德·贝贾维：《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第68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2。

不发达状态的典型特征，而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则力图在这种不发达状态下保持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①

⑤加快了西方化和世俗化的进程。本世纪穆斯林世界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民族主义成为最富有魅力的政治思潮，并在此种意识形态指引下，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民族独立国家，而这些国家往往奉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方针和实施现代化改革战略（主要以西方为楷模）。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在欧洲，它是资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基本原则，在它传入穆斯林世界后，逐渐成为穆斯林世界各国反帝反殖的一面旗帜。政教分离原则也来自西方，尽管《圣经》中记载过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②但只有当新兴资产阶级赋予它新的含意后，它才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原则。民族主义主张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构成民族的要素是共同历史、文化、语言和血缘、地域联系，这就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伊斯兰教在民族国家中的地位。在实践中，许多国家采取了限制或禁止伊斯兰教参与政治，如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停止实行伊斯兰教法；埃及在1952年革命后颁布法律规定，宗教组织不得参与政治活动；阿拉伯也门在1962年推翻王室以后取消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叙利亚1973年宪法取消了有关国教的条款；伊朗巴列维国王主张王权至上，教权服从王权等。此外，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不是大胆吸收和善于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先进生产力和优秀的文化成果，而是照抄照搬，邯郸学步，以至于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和颓废没落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在穆斯林世界泛滥成灾，并与传统伊斯兰文化发生猛烈碰撞。

① 穆罕默德·贝贾维：《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第68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2。

② 《圣经·马太福音》，（22：21）。

伊斯兰社会在沉重的外部压力下于 18 世纪步入近代社会。从那时起，政治上经历了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痛苦历程；经济上的发展异常缓慢，即使有些经济部门注入了资本主义因素，其发展也是畸形的；伊斯兰文化不断受到冲击，也发生了扭曲；伊斯兰教也陷入悲惨境地，通常认为，这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总之，伊斯兰社会处于普遍的衰败之中。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相对抑制了穆斯林社会的衰败，然而各国又不得不忍受现代化所引发的磨难，依附性困扰着经济的发展，伊斯兰文化不断受到冲击，伊斯兰教也日益受到世俗化的打击，一句话，外部压力对伊斯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考察、研究穆斯林世界的种种政治现象，对外部压力给予严重关注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章 伊斯兰社会——来自内部的危机

第一节 近代以来传统伊斯兰社会的解体

一、中世纪伊斯兰社会的结构

自7世纪初以来，伊斯兰教经历创教、对外扩张与征服，至9世纪已完成封建化过程，与封建生产方式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整合协调功能的政治文化，统摄着社会舆论，指导着国家政治生活，维系着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人际关系，成为法律、秩序、社会良心的象征，价值取向的内在源泉”。^①

阿拔斯王朝是伊斯兰教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继《古兰经》被汇集之后，圣训学兴盛，6大圣训实录相继问世。同时，教法体系也进一步系统化和规范化，教法理论趋于完善，并最终形成了以逊尼派权威学者及其学说为基础的四大教法学派。应该强调的是，圣训学的兴盛、教法学派的形成是以对此前的伊斯兰宗教、社会和政治实践进行清算为前提的，因此，当这一过程完成的时候，整个社会特别是社会的结构与人们生活方式连同宗教本身一起格式化了。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伊斯兰社会虽历经王朝更迭、政治变迁，但始终呈现出超稳定状态，直到18世纪，

^① 吴云贵：《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4期。

这一社会结构依然是几乎原封不动地维持和延续着。这无疑同其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文化方式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1. 伊斯兰教与政治制度

伊斯兰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思想体系，宗教教义同时也是政治学说。传统伊斯兰教政治思想所体现的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伊斯兰教之创立与统一阿拉伯国家建立的进程是同步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先知穆罕默德以真主的名义陆续降示的启示，不仅成为创教立国之本，而且还是一种神圣的政治学说，据此形成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被称为“真主之法度”，不能更改。四大哈里发时期实施政教合一制度，伍麦叶王朝一度出现过某种程度的世俗化倾向，重王权而轻教权，但阿拔斯王朝确立了正统宗教思想的地位。伊斯兰教的政治制度分别由逊尼派的哈里发学说和什叶派的伊玛目学说及其相应的设施、主体等所体现。

哈里发学说是由阿拔斯王朝时期的逊尼派教法学家阐述的。其内容包括：①哈里发制度的必要性。认为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是伊斯兰教所确认的惟一合法的政治制度，其宗旨是由哈里发来继承或代行先知的职能，管理国务、教务，捍卫伊斯兰信仰和保障穆斯林大众的生存以及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种以君主与臣民的契约为基础的义务性制度。②哈里发的资格。哈里发必须是古来氏族男性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虔诚、公正、勇敢等优秀品质，精通法律，拥有治国才能，为公从所拥戴。③哈里发产生的方式。可以通过普选制、有限选举制或以暴力革命推翻不义暴君的方式。④哈里发的特权。聚礼日讲道时被提及名字，货币上铸名，在国家重大典礼上可穿先知遗下的斗篷，监守先知的其他遗物。⑤哈里发的职责。维护伊斯兰教信仰，保家卫国、征收赋税、维护治安、任免官吏、赈济贫民、讨伐叛逆等。⑥哈里发的废黜。意在君主专制予以必要的限制，认为穆斯林民众有权废黜不义哈里发，但没有明确方式，故这项政治原则只是教

权对王权在理论和道义上的一种限制，并非政治机制。^①

什叶派有自成体系的伊玛目学说。主张只有伊玛目才是神权的真正体现，并且只有第四代哈里发阿里的后裔才有资格出任伊玛目一职，否认艾卜·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前三代哈里发职务的合法性。“伊玛目”一词后来常被看成是哈里发的同义语，二者可以互用。从王权与教权的关系上看，先知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王权与教权是合二为一的；伍麦叶和阿拔斯王朝时期，理论上王权服从教权，实践上则是教权服从王权，哈里发只要在名义上承认伊斯兰教法的权威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②

哈里发学说作为正统宗教思想和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奥斯曼帝国，它以伊斯兰教正统信仰的名义和真主的权威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君权神授”使封建制度披上了“合法性”的神圣外衣，臣民在天上忠于真主，在地上忠于哈里发。忠于哈里发即忠于真主，而反叛哈里发也即背叛真主，成为不可更易的宗教政治信条。

2. 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社会

传统上伊斯兰教法规范着穆斯林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教法又称“沙里亚法典”，被视为“安拉对于人类生活的全部诫命”。它规范信仰者与“安拉”之间的理想关系、信仰者之间的关系、信仰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穆斯林提供了可遵循的一整套持身律己、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历代统治者皆以经训、教法的有关内容为法律根据治理国家、整顿社会。至阿拔斯王朝，教法发展为完善的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① 参见吴云贵：《伊斯兰教法概略》，第196～1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② 参见赛义德·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第3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教法的内容大致可分三大类：即宗教礼仪制度、社会生活准则、法律关系规定。具体内容包括宗教礼仪、契约、遗产、婚姻、家庭、刑法、圣战、宰杀、作证、释奴、法律程序等各种条款。教法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对于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予以具体、明确的指导和约束，在社会整合上起着重大作用。例如，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伊斯兰教法承认的以血缘和婚姻为基础的惟一社会单位。婚姻家庭关系是穆斯林社会中最常见的关系之一，其有关规定构成教法的核心领域，即“穆斯林家庭法”。凡属家庭婚姻之事皆受此法约束，从而维护了小自家庭大至整个社会的稳定。财产分配关系虽是经济事务，但它也是最重要社会关系之一，对此教法通过继承法，以宗教制度和伦理规范予以制约和协调，至近代一直产生着十分明显的效力。对于治理整顿社会，惩处坏人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古兰经》为基础的伊斯兰刑法拥有一套繁杂的制度。它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宗旨还是以宗教道德为尺度“劝善戒恶”，因而刑罚也只是为此宗旨服务的辅助手段。阿拉伯商业发达，在商贸活动中总需要遵循一定的道德和原则，伊斯兰商法即为人们的经济交往和商业活动提供了一系列行为规范，以保证其顺利进行。

总之，教法以宽泛的内涵和外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出发，在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调整中产生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促使穆斯林社会正常有序的运作。当然，除了教法外，王权和行政法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3. 伊斯兰文化与穆斯林社会

伊斯兰文化是在吸纳被征服地区古老文明和东西方学术文化及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由伊斯兰社会中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鉴于穆斯林有其独特的伊斯兰生活方式，社会生活中无处不有伊斯兰教的深深烙印，所以伊斯兰文化也毫无疑问地要受到伊斯兰宗教思想和宗教制度的影响。伊斯兰文化包含制度文化、精神文

化和器物文化三大层面，它们都与穆斯林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密切相联，其中以器物文化对穆斯林大众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具体。

清真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每天接纳许多穆斯林举行拜礼，成为完成宗教功课最重要的场所；作为学习场所，在清真寺学校中，每天有学童们去接受教育，背诵《古兰经》，学习经训、教法知识；作为社会生活场所，它又是人们聚会、相互交流思想之地。伊斯兰教知识阶层乌勒玛——伊斯兰文化忠实的捍卫者和监护人，通过聚礼讲经和授课，把伊斯兰教所提倡的一套伦理道德规范，诸如善恶有报、为人公正宽恕、虔诚坚忍、行善、施舍、济贫、亲爱友邻等灌输给广大穆斯林，潜移默化地陶冶穆斯林的思想情操，使其在不自觉中接受这一套道德规范，奉为行为准则。例如，伊斯兰教肯定社会上有贫富差别，但主张通过富者对贫者的施舍来缩小双方间的差距，《古兰经》中关于“各人只得享受自己的劳绩”的规定（53：39），约束教徒不得有非份之想。这些既强化了宗教信仰，又起到了调节社会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避免了社会动荡，稳定了社会正常生活秩序。

从理论思考的角度看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和有序，其原因有三：①伊斯兰教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二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性。②伊斯兰教法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其神圣性和包容性确立了一套广为穆斯林民众所尊奉的行为规范，对社会一体化影响深远。③由于王权和教权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离，所以，只要统治者不去触动穆斯林的宗教情感和生活方式，就不至于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10世纪以后随着“创制之门”关闭，伊斯兰教法在日趋内向封闭的同时，道义权威却与日俱增，并且在政治变幻的风云中，保证着伊斯兰社会在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一致，维持着伊斯兰社会结构的稳定。

二、伊斯兰政治制度的衰亡

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早已四分五裂，统一的阿拉伯哈里发大帝国不复存在。16世纪时，一度出现奥斯曼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和波斯沙法维王朝三足鼎立之势。18世纪，沙法维王朝为卡加王朝取代，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内部矛盾日益深重，逐步走向衰落的深渊。

奥斯曼帝国是当时伊斯兰世界的统治中心，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处于欧亚水陆交通枢纽线上。它从国家体制上说是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帝国统治民族是突厥人，封建主组成统治阶级，素丹是国家首脑，拥有军政大权。自16世纪起素丹兼任哈里发，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陷入全面危机：经济困顿、国家机关腐败、地方割据势力失控、军队丧失战斗力等，这些都从政权层面上标志着伊斯兰政治制度的衰落。

1. 传统伊斯兰政治学说和制度的衰落

兴起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学说是一种政治理想主义，对哈里发的品行能力要求很高。到奥斯曼帝国时期，这一宗教政治学说已经历若干次异变，面对明显世俗化、专制化的哈里发制度，逊尼派宗教学家对其政治学说进行了修补和充实，使其适应封建社会的需要。奥斯曼帝国建立后，为使这一靠武力扩张形成的军事政权合法化，素丹巴亚吉德一世曾向埃及马木鲁克王朝控制下的“影子哈里发”讨过封，素丹塞里姆一世甚至将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劫持到君士坦丁堡，以示其正统地位。早年的素丹们都很热衷君权神授理论，渴望成为“虔诚的”统治者。尽管如此，他们却从不使用“哈里发”这一称谓，而自称“素丹”或“伊斯兰的巴迪沙”。

突厥人在其全盛时期，曾对伊斯兰政治制度有过重大建树，

素丹塞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和苏来曼一世（1520～1560年在位）都很重视国家体制的伊斯兰化，并以行政手段开展立法活动。首先尊奉哈乃斐教派为官方教法学派，其次以宗教法庭为基础，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司法机构和行政制度。奥斯曼素丹对伊斯兰政治体制的贡献表现在国家行政法律，即卡农法的发展上。卡农法及其汇编，一部分内容是整理和重申既有的律令，作为对教法的强调，另一部分是行政法规，还以习惯法和惯例形式，保留一些早期确立的制度，如少年募征制、军事采邑制等。帝国时代，卡农法实质上是教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手段。奥斯曼素丹首次真正使教法成为国家有效法律，并授予卡迪及其法庭以官方地位和充分权力，来保证教法在整个帝国内的实施。伊斯兰教法所享有的实际效力是任何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的穆斯林社会都未曾达到过的。^① 奥斯曼素丹以教法为治国之本，完善了伊斯兰政治体制，经历了最初的辉煌后，伊斯兰政治体制渐渐趋于松弛。到了帝国末期，素丹十分专制暴虐，昏庸无道，生活糜烂，穷奢极欲，严重脱离人民，其哈里发称号已变得徒有虚名。因此传统的政治思想不再具有从前的号召力。当19世纪后半叶素丹重申哈里发制度、企图借助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泛伊斯兰宗教情感来显示自身地位以增强帝国的内聚力并对抗西方列强时，早已松散的这一伊斯兰政治制度和古代哈里发的幽灵便不能起多大作用了。

土耳其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新政权进一步做出决定，废除没落腐朽的哈里发制度。1925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文件指出，“哈里发制度并无经典依据，真主从未诫命建立这类国家制度，而纯粹是教法学家们为了统治穆斯林大众而人为创建的一种功利主义的行政制度；历史上真正的哈里发制度只在先知去世后持续

^① 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第135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了30年(632~661),其后的哈里发制度徒具虚名,完全是靠强权和暴力来维持的,既然哈里发制度背离了初衷,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最适宜的国家政府形式。”^①上述关于哈里发制度的基本观点,后来成为修订正统逊尼派伊斯兰政治理论的重要依据,受到各国宗教改革派思想家们的赞赏。但哈里发一素丹制的废除,导致传统伊斯兰政治思想、政治体制的危机,引起全世界穆斯林的关注。传统政治制度衰落的另一导因和表现是:帝国后期,素丹按照西方政治制度对伊斯兰国家体制进行了某些改革。例如,建立了以文官为省长的行政机构,成立了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等政府机构,设立了大臣会议、军事会议和最高法制会议,并规定将政府机构的办公室布置成欧洲式样,政府工作人员上班时须统一着装。^②这些新机构的出现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它标志着旧体制已经崩溃,将被新的政治体制取代。

2. 统治阶级的暴政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奥斯曼帝国实施封建专制统治。尤其是素丹阿卜杜拉·哈密德二世统治时期(1876~1909年在位),是土耳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史称“祖吕姆”(暴政)时期,持续30年之久。祖吕姆时期奥斯曼帝国内部三大封建因素,即以素丹和哈里发相结合的君权神授专制制度、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对非土耳其民族的压迫制度都被强化了。这个时期实际上是素丹王室代行政府职能在管理国家,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其基础,大封建主是哈密德二世的主要支柱,他们占据了政府中所有要职。库尔德人组成的“哈密德骑兵”是素丹的私人卫队,对帝国基督教居民起威慑作

^① 哈密德·埃纳耶特:《现代伊斯兰政治思想》,第56页,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2。

^② 参见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5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用，各地封建主的亲兵也是“血腥素丹”的忠实工具。

祖吕姆时期，素丹对内实施专制恐怖政策。派出专人严格检查全国的新闻出版物，禁止有关议会、宪法的论述。还设立遍及全国的谍报网，监视军政官员和老百姓的言行，整个社会生活都处于警察和密探的监督之下。“任何一个具有改进政府工作思想的土耳其人都很可能被发现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中一个沉重的麻袋里。”^①

这一时期还推行极端民族压迫制度。帝国境内民族众多，既有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德鲁兹人，又有斯拉夫人、马其顿人、克里特人等。帝国将臣民分为四等，土耳其族是统治民族，为第一等公民，而其他民族都是下等人和被奴役对象。素丹实施民族歧视压迫政策，残酷屠杀境内少数民族以及反抗暴政的起义和运动。1894~1896年东安纳托里亚亚美尼亚人的民族解放斗争被镇压，10万亚美尼亚人失去了生命。1896年克里特岛希腊人起义失败，马其顿基督徒争取解放的愿望也被扼杀。素丹的暴政在阿拉伯地区也激起了人民的愤怒，阿拉伯民族独立思想初露端倪，出现了一些反祖吕姆暴政的秘密结社，整个阿拉伯世界处于一种骚动不安状态，正如威廉·雅尔在《近东现代史》中写道：“我所到之处都看到了这种同样持久和普遍的情绪：对土耳其人的仇视……一个新兴的阿拉伯运动正在远方隐隐呈现。一个迄今一直被蹂躏的民族现在将要求在伊斯兰的命运中占有适当地位。”^②但素丹政府对于任何民族独立的倾向都不予放过。残酷的军警镇压和暗探跟踪，使阿拉伯民族反素丹活动的一些中坚人物被迫逃往异国他乡。

帝国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封建生

^① 费舍尔：《中东史》，第424页，商务印书馆，1980。

^② 威廉·雅尔：《近代中东史》，第196页。

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两者之间的不相适应对现有生产力造成很大破坏。土耳其及其属地都是农业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一部分产品用于简单再生产，一部分作为剩余产品被封建主剥削占有。由于封建主对农民的掠夺十分残酷，农村中出现了十年九荒的现象，农民生活异常困苦。帝国各地的土地都高度集中在封建主的手里。据统计，1913年1%的地主占有39%的可耕地，而87%的农民只占30%的可耕地。^①同时，封建领主还以赞助公益宗教事业为名，霸占土地，聚敛财富，使寺院财产无限制膨胀，至近代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土耳其政府1925年一项官方调查表明：清真寺占有的土地—公益瓦克夫，占土耳其本土全部耕地的3/4，在阿尔及利亚占1/2，在突尼斯占1/3，在埃及占1/8。寺院土地实际上成为封建主和宗教上层剥削贫苦农民的一种手段。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计艰难，使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加之王室贵族穷奢极欲，为满足荒淫无耻的生活，大举外债，提高税收，加重对人民的盘剥，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慨，阶级矛盾尖锐化，遂爆发多次农民起义。1886年德鲁兹山区农民起义，领导者为出身显贵的舍布里·阿特拉什。土耳其当局妥协，委任阿特拉什为德鲁兹人的埃米尔，起义即以胜利告终。1896年该地区人民因不愿服土耳其兵役，再次举行起义。1899和1906年又两次暴动，均被镇压。1895年阿勒颇、1903年贝鲁特都爆发过群众性骚乱，属自发性局部风潮，很快被镇压。帝国境内出现的这些起义和暴动具有双重性质。首先反映了帝国内部的基本矛盾，即封建社会两大阶级—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同时，由于帝国封建压迫常常表现为民族压迫，因此起义又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是被压迫民族反对奴役的运动。二者相结合，构成帝国内部两大阶级对抗的特点。

1. 参见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第4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随着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奥斯曼帝国毫无例外地成为西方列强掠夺和奴役的对象。1881年，法国强占突尼斯，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为了对外战争，素丹向外借债，到1877年公债数额达到91亿镑，帝国经济陷于崩溃。1881年哈密德二世被迫同意由英、法、德、意、奥等国组成“奥斯曼国债管理处”，法、英遂变成素丹政府最大的债主，通过铁路租让权、海关、对外贸易、工业和外国银行控制手段，逐步把土耳其变成了半殖民地，土耳其的经济命运也从此操在外国人手里。国力衰微的奥斯曼帝国进一步走向衰落。

奥斯曼帝国是以武力扩张建国，境内管辖着众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民族，且各属地之间、属地与中央政权之间都没有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这种以军事力量为依托建立起来的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混合体，一开始就具有离心倾向。只是早年素丹们十分在意国家的伊斯兰化，深知伊斯兰教是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伊斯兰教法有强大的社会整合作用，才一度维持帝国的强盛局面。时至近代，已历时600年的奥斯曼帝国，在那种惟一可以把境内民众维系在一起的传统伊斯兰政治制度——哈里发制度松弛后，在传统伊斯兰政治学说没落后，再也无法有效地控制这个庞大的国家，内部由来已久的种种危机处于某种一触即发的状态。列强的人侵只是外因，而伊斯兰教的衰落和实质上地方分权与名义上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才是导致帝国衰落的两大内因。

三、伊斯兰教法的衰落

在人们的观念中，伊斯兰国家属于神权政体，真主是国家主权的真正执掌者，真主的启示——《古兰经》是惟一至上的合法的法律渊源，哈里发或素丹是其在人间的“代治者”，是实施“沙里亚法”的政治保证，教法通过哈里发制而生效，两者互为依存。权威的教法学家拥有释法大权，是教法的合法监护人。伊

伊斯兰教法成型于公元 10 世纪，它以中世纪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思想体系为基础，由逊尼派教法学家对已流行的司法惯例和阿拉伯部落习惯作出规定而形成一整套宗教道德准则，与封建社会的体系结构基本上相适应。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教法以两种方式适应变化着的社会，调整法律关系。①习惯调整。即对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而又与某一教法规定有相悖之处的行为举止，由教法解释官穆夫提发布一项“法特瓦”（正式法律见解）予以肯定。②行政命令。由掌权的哈里发或素丹颁布政令，以行政法的方式为教法增添新的活力。鉴于封建社会整体上发展缓慢，社会生活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教法与社会才有如此长久的适应期。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在伊斯兰社会萌芽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开始松动变化，教法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便越来越大，以往的两种调整方式也显得乏力无奈，整个伊斯兰教法趋于衰落。

1. 伊斯兰教法衰落的原因

教法衰落有内外两大原因。内部原因当然是与教法体系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局限性分不开的。教法称神圣法或天启法，它有四大法源：即《古兰经》、“圣训”、类比和公议。《古兰经》为立法之首要依据，但并非全部经文皆为法源，只有那些表现为“判列”形式，具有法律内含的经训原文，经过后世教法学家诠释、引申、扩展之后才构成教法实体。其次是“圣训”律例。“圣训”立法约始自 8 世纪下半叶，当时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涌现出许多新问题，由于《古兰经》律例内容有限，亟需新的法源来满足社会立法需求。“圣训”乃先知生前言行录，具有权威性，遂成立法之第二大源泉。再次是类比（“格亚斯”），指以经训律例为依据进行公正、合理、有效推导得出结论。类比有推测性和可变性，只有精通经、训知识的教法学家方可用之，且类比结论须经公议核准才具有法律效力。类比得出的结论称“类比律例”，

在可信度上低于直接源于经训的律例。最后是公议。（“伊制马尔”），系指穆斯林教法权威就某一具体教法问题形成的一致见解。公议具有不谬性。它是四大法源中最重要者，教法学家正是运用公议创制了伊斯兰教法的实体和理论体系。它重道德感化而轻司法实践，形成之初便有脱离实际和非理性的一面。四大教法学派形成后肯定了经训为基本法源，类比和公议不得有悖于经训原意，使理性的地位江河日下，只能在神启认可范围内发挥次要作用。^①而后又出现了“创制之门关闭说”和“仿效原则”（塔格里德），认为自四大教法学派形成之后，伊斯兰教立法的任务已告完成，教法成为一个完整自足的体系，可以适应一切社会生活。后世教法学家无需再“创制”，只需“仿效”前人学说。“创制”（“伊智提哈德”），是指逻辑思维与理性判断的过程。早期教法学家普遍采用这一方法，为教法注入新内容。“创制之门”关闭后，从理论上排除了人为立法和修订已有法律的可能。伊斯兰教法进一步丧失了理性思辨与逻辑论证的成份，慢慢失去活力，成为一个内向封闭的体系，日益陷入呆滞、僵化的状态，严重束缚自身的发展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教法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外部环境变迁所引起的。教法否认任何世俗立法，但其自身又有很大缺陷，需要增补与扩充。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使教法无法避免世俗立法的影响，并在对抗中削弱自身的价值。

19世纪初广大伊斯兰地区如西亚、北非、南亚等地开始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殖民化过程使这些地区封建的伊斯兰国家在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他们作为一支新兴的

^① 参见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第232页，东方出版社，1995。

政治力量，关心自身的利益，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强调个人价值的西方文化传统渗入后，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伊斯兰社会传统结构下的各类社会关系。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有所改变，个体对权利、利益的要求明显加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在新的价值取向下的关系非同以往。而建立在社会习惯基础上的传统法律制度无力适应这些变化着的社会需要，衰落之势无法挽回。

2. 伊斯兰教法改革

教法本是传统伊斯兰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之一。欲在新的环境下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现存政治体制，并使教法恢复活力，改革是必由之路。

教法改革以西方法律制度为楷模，分为公法和私法两个领域。由于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完全是异质的，照搬到伊斯兰社会行不通，因此改革采取缓和渐进的方式，通过在教法中占支配地位的“仿效”原则“托古改制”，逐步变革与时代进步不相协调的内容，使伊斯兰教法现代化。^①

奥斯曼帝国率先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改革。1839~1876年素丹麦吉德及革新派领导了自上而下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改革，史称“坦志麦特”（改组）。在法制改革中以公法（宪法、刑法、民法和商法）为突破口，相继引进几部欧洲法律，1850年颁布《商法典》，直接搬用《法国商法典》的部分内容，第一次以法律条文的方式确认了商业利息的合法性，取消伊斯兰教禁止放债取利的规定。1858年颁布《刑法典》废除对叛教者处以死刑之外的全部固定刑罚。^② 1861年和1863年又连续颁布《商业诉讼法》

① 关于教法改革详见吴云贵：《伊斯兰教法概略》；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有关章节。

② 伊斯兰教固定刑罚，即“胡杜德”，共有6种：指对偷窃、私通、诬陷私通、酗酒、抢劫、叛教的刑罚。

和《海商法》，都是法国法典的翻版。为实施这些法典还建立了称为“尼扎米亚”的世俗法庭，以处理除穆斯林属人法之外的全部民事纠纷。为给民事裁判提供一个可资依据的文本，1869至1876年在综合哈乃斐学派不同意见的基础上，以现代法律条文形式编制了一部民事审判基本法，即著名的《奥斯曼民法典》。其适用于当时奥斯曼帝国本土及所有领地，如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巴勒斯坦等地。

奥斯曼法制改革在本地区引起巨大反响，中东地区各国相继步其后尘。埃及名义上作为其属地，实际上于1874年取得司法独立。它在法制改革上步子走得更快更远。自1875年起，除直接搬用法国刑法、商法、海商法之外，还建立了世俗法庭，并制定了《埃及民法典》，只保留了少量教法规定，分别适用于混合法院和埃及国民法院。

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其法制改革与英国殖民当局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1782年殖民当局规定在原有宗教法庭无法可依情况下，应当根据“公正、平等、良心”的西方法律原则判决。这是英国法律首次渗入伊斯兰教法。1790年殖民当局对伊斯兰教司法制度彻底革新，大量英国普通法内容充入其中，形成了盎格鲁—印度穆斯林法。1860年殖民当局颁布了《印度刑法典》、《刑事诉讼程序法》、《契约法》、《穆斯林离婚条例》等现代立法，从而使印度法制改革更加深入。

伊斯兰教法在私法领域（婚姻、继承、宗教基金等）的改革最早始于本世纪初。穆斯林婚姻家庭法是其核心，改革的阻力很大。奥斯曼帝国于1917年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就传统婚姻制度的两大缺陷童婚和妻方无权离婚作了局部修改，颁布了《奥斯曼家庭权利法》。此乃伊斯兰国家历史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涉及穆斯林婚姻家庭问题的完整法规。但私法领域实质性的改革还在二战之后，这里不再赘述。

改革使伊斯兰教法渐渐恢复了一些活力，同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方面有所减少，其直接后果是商法、刑法和民法脱离了伊斯兰教法，被西方资产阶级世俗法律所取代，传统伊斯兰教法的统治地位大大削弱，其作用也今非昔比。近代法制改革还为二战后各国进一步实现法制现代化和世俗化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四、伊斯兰文化的困惑

近代西方列强以炮舰打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及其属地的大门后，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思想随之传入，对其社会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不仅促使帝国各地实现教法改革，兴办新式教育，建立世俗学校，而且导致伊斯兰传统宗教文化教育江河日下，伊斯兰知识分子乌勒玛阶层地位下落，作用骤降。

1. 传统宗教教育的衰落和现代世俗教育的兴起

如果将伊斯兰教视为单纯的信仰知识，那么它是由启示知识（《古兰经》）、传述知识（“圣训”、史地知识）和教法知识（宗教学）三部分组成。经训知识为主要的基础知识，并不绝对排斥科学和理性，其中“圣训”知识内容繁杂陈旧，缺乏时代精神，教法知识虽含有某些逻辑推论和理性思辨的内容，但只是辅助知识。传统教育以经堂教育为主，主要由乌勒玛阶层传授，因此他们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地位，普遍受到信任和尊重。他们的生活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寺院、经学院校，而是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主持或监督穆斯林的宗教和日常生活，大至节日礼仪、小至红白喜事，都与其有关。他们还根据伊斯兰教的精神、教法和历史，向教民灌输宗教意识，传播宗教知识，讲解经训教法，宣传政府通谕法令，并对教民中的是非纠纷予以评判调解、劝善止恶。宗教知识阶层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民众意见的代言人，并在重大政治事件中起着组织宣传作用。由于他们与民众宗教生活和

社会生活十分贴近，他们的态度、言谈可左右或支配教徒的思想与行为。

乌勒玛阶层掌握着传统伊斯兰社会的教育大权，在传统宗教教育方面发挥很大作用。例如埃及 18 世纪的教育分为二级。高等院校如艾资哈尔大学教授伊斯兰教义学、教法学和哲学；初等教育背诵《古兰经》，那时遍及上、下埃及的小学多达几千所，学生们每天上课就是背诵经文，反复记忆。所有这一切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知识学问一直是乌勒玛阶层的世袭领地。坦率地说，经堂教育不是以开发学人智力，扩大学生知识面为主旨，而是以充塞记忆为主，很难谈得上人才之培养。

伴随奥斯曼帝国门户洞开，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随之传入，冲击了传统经堂教育，引起伊斯兰教育制度内部的革新。首先，打破伊斯兰教治学上只求记忆，不求理解的弊端，要求学面时思之，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第二，扩充教学内容，增设数学、物理、医学、化学、文学、工程技术、音乐、美术等非宗教现代科目，改变以往只教授伊斯兰教知识的常规，开阔知识面。第三，设立体育课，作为对学生进行品行修养教育的辅助课程。

西方人在奥斯曼帝国内兴办现代世俗教育，创立西式学校，培养新型人才，成绩斐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1820 年始建第一批由美国人开办的学校，到 1860 年已达 30 多所，1866 年开办叙利亚基督教新教徒中专学校，后改为美国大学。^① 埃及欧式学校开办数十年后，充分显示其优越性，入学的人数不断增加，1875 年欧式学校中学生共 8961 人，其中埃及人约有 2000 名，到 1887 年学生总数增至 22769 人，其中埃及人增加到 15132 人。到 1892 年，埃及境内共有外国学校 42 所，分三个等级，依次为

^① 参见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简史》，第 261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初等启蒙学校 6 所，初等学校 34 所和中等学校 2 所。^① 勿庸讳言，大部分西式学校都是由教会开办的，当然有传播基督教教义，扩大西方影响的一面，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启迪穆斯林思想，促进社会变革的作用。

帝国官方统治者因看到了东西方在力量上的强烈比差，深感要维护封建统治，富国强兵，就必须大办教育，遂兴建大批西式学校。土耳其先创办了医学院、农学院、海军学院、行政管理学院和兽医学院，并于 1846 年将其中部分院校合并为伊斯坦布尔大学。在兴办现代高等院校和中等专科院校的同时，还试图普及义务教育，1851 年已设立 6 所此类学校，后因经费少而放缓速度。^② 埃及在 1836 年已有各类专科学校 23 所，小学 50 所，学生 5500 人，中学 2 所，有学生 2000 人，^③ 伊斯梅尔时代学校数目由 1862 年的 185 所增加到 1879 年的 4817 所，共增加 1632 所。这些学校大部分实行免费教育，国家承担的经费由每年 6000 镑上升到 75000 镑。^④

由于世俗教育的发展，作为历史上国民教育主体的宗教教育被弃之不管，渐渐处于组织松散，被忽视和冷落的境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废除传统教育，停办旧王朝沿袭下来的宗教院校，公私立学校一律禁止宗教课程，取消伊斯坦布尔大学神学系，按西方模式改造原有学校，全部由教育部统管。普通教育不再掌握在乌勒玛手中，即便是宗教教育也由政府接管，教育部设立新型宗教教学中心，为国家培养伊玛目和讲道员。古老的艾资

① 参见米尔纳：《埃及政变史略》中译本，第 17-23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

② 前引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简史》，第 259 页。

③ 参见约翰·里奇曼：《1898-1952 年的埃及：向着现代性前进》，第 64 页，纽约，1977。

④ 参见杨灏城：《埃及近代史》，第 14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哈尔大学也把现代科学列入教学内容，开设数学、物理、文学、艺术等各学科，变为既培养宗教学者、又培养世俗人才的新型宗教大学。传统宗教教育的衰落，使以宗教传统和封建秩序坚定捍卫者自居的、思想上因循守旧的乌勒玛阶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2. 伊斯兰主体文化地位的下降和西方思想影响的上升

近代以前，伊斯兰社会犹如铁板一块，宗教文化是其主体文化，地位非常牢固。近代以降，西方入侵，这一“铁板”被击得千疮百孔，宗教主体文化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无力保住自己的地位，日渐衰微。这自然与其内部结构有着内在的关系，也与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影响分不开。

伊斯兰文化由于强烈地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以经训教法知识为主导，逐渐成为一个内在封闭的系统，它虽不绝对排斥科学和理性，但从本质上讲却缺乏理性思考与逻辑思辨。它于中世纪定型后，就逐渐变得缺乏活力，对其他文化吸纳和融合的能力几乎丧失殆尽，因此到了近代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攻击下就显得无力还击。

西方思想在伊斯兰世界的传播有几个途径。除了西式教育的创办，还有翻译运动的兴起，印刷厂和图书馆的设立等，但其中尤以派遣留学生最为重要。当时帝国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挽救封建制度的危亡，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行政管理人員和懂技术的军官、技师来领导政府、指挥军队和建设工厂。于是政府在达官贵族子弟中择其优者，送往西方各国学习军事和科技。以埃及为例，1813~1847年共派319人，分9批到意、法、英等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1883~1919年又输送289人赴欧留学。这些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回国后在政府各个部门任职，并把穆斯林民众前所未闻的民主的、科学的、世俗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潮流带入传统的伊斯兰社会，传播给下一

代，使“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代议制政体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思想不断深入到穆斯林的头脑中。”^①并使穆斯林认识到“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都应履行自己的义务，良好的社会应具有法制和正义。”^②

创办现代世俗学校，特别是欧式高等教育和留学生的派遣，培养了一批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上层人物，东西方两种教育制度的碰撞，导致伊斯兰社会出现严重的精神分裂，人们在世界观、价值观和真理观上的认同不再局限于伊斯兰文化，而呈现多元化选择。知识精英阶层分裂为两大派。一是现代派，他们崇拜西方文化，价值取向上向西方文化和生活靠拢。例如，印度的赛义德·阿赫默德汗青年时代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效劳，曾在许多城镇里担任英国法庭的书记员。1857年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中，因营救英国侨民有功被封为爵士。他受资产阶级文化决定论的影响，认为发展教育是宗教复兴的前提和手段，为在印度建立一所穆斯林大学，曾专程赴英考察，并以剑桥大学为模式兴建阿利迦大学，培养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充实社会各部门。再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杜承认西方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支持西方文明特有的文化科学知识在伊斯兰世界传播，并力图缩短伊斯兰教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距离，促使二者相协调。二是传统派，他们固守传统文化，以不变应万变，主张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净化信仰，消除腐败，严守一神教义和先知遗训，按伊斯兰教法行事，尊重和保持伊斯兰教传统的道德规范，用伊斯兰价值标准来指导社会生活，抵制一切外来不良影响，反对西方文明。自此，在伊斯兰世界，现代派和传统派在文化上的论争便此消彼长，前者推崇科学理性和物质文化，后者重视人文精神和传统价值。作为穆

① 前引哈密德·埃纳耶特：《现代伊斯兰政治思想》，第125页。

② 阿尔伯特·胡拉尼：《自由时代的阿拉伯思想》，第70页，纽约，1983。

斯林社会主体文化方式的伊斯兰文化受到重创后出现困惑，陷入危机。

3. 土耳其革命的再冲击

本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已是内忧外患，处于被列强肢解的境地。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素丹，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土耳其建国后在社会、文化上进行了改革，旨在使土耳其摆脱伊斯兰教封建神权对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束缚，把人们的思想从传统伊斯兰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伊斯兰教之影响最顽固地表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上，为此进行了“帽子革命”，不允许国民戴象征穆斯林身份的红色费兹帽；规定国家公务员必须戴西式礼帽，在办公室里应脱帽并像欧洲人那样相互打招呼。凡是没有正式宗教职务的人一律不准穿用宗教袍服或佩戴宗教徽记。改革文字，以拉丁字母替代阿拉伯字母，清除土耳其语汇中的阿拉伯词汇和波斯语词汇，吸收部分英语、法语词汇。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世俗教育，将学校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向受教育者提供非宗教的现代教育，传授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思维方式。^①此外，还在历法、地名、习俗等方面以新代旧，以此来推动社会向现代文明前进。通过除旧布新，土耳其渐渐成为一个世俗性西化国家，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日趋衰微，从而完成了文化方式上的转型。

一个前伊斯兰世界的统治中心，几乎彻底抛弃了原有的宗教文化传统，代之以异质的西方文明，这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本已衰落困惑的伊斯兰文化遭受了一次新的打击。

^① 参见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第99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第二节 二战后伊斯兰社会的困惑与挑战

一、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认同的困惑

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浪潮的猛烈冲击下，已然支离破碎的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保护地，这段屈辱的历史遭遇，被穆斯林史学家们称之为伊斯兰教的“黑暗时期”。在许多穆斯林看来，外强的入侵、统治和奴役，从根本上说是对他们所珍视的伊斯兰教信仰及其所体现的伊斯兰生活方式的严重威胁，因此“伊斯兰教处于危险中”是当时伊斯兰世界最流行的口号。为了救亡图存，伊斯兰世界在一些穆斯林政治精英的鼓动、组织领导下，兴起了一系列的宗教社会思潮和运动。其中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领导的泛伊斯兰运动，穆罕默德·阿布杜和赛义德·阿赫默德汗领导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最为重要。^①其共同主张是“宗教兴则民族兴”，企图以开发伊斯兰教的文化资源、唤醒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意识、民族意识来回应愈益深重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信仰认同危机。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思潮和运动尽管都包含有复兴与改革伊斯兰教以重振其雄威和荣耀的内容，从总体上看，却都没有取得成功。如果说这些思潮和运动主要是从伊斯兰教“内部”来回应社会危机，那么此后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解放运动则可以看作主要是从伊斯兰教“外部”来回应社会危机。由于立足点、价值趋向、社会发展观和斗争策略不同，二者所导致的结果也明显不同。民族主义力量所获取的成功中很可能包含着对传统伊斯兰社会理想的断然拒绝和否定，并在其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成为新

^① 详见吴云贵：《近代伊斯兰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的社会危机的根源。

19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在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兴起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三种形态：即土耳其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巴基斯坦穆斯林民族主义。^①它们在继近代伊斯兰教复兴改革思潮和运动之后，成为世界各地伊斯兰社会发展进程的主导力量。它们在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探寻通向现代化之路的艰难曲折的进程中，既有某些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沉痛的失败教训，其中的负面影响又成为二战后伊斯兰社会动荡不安的导因。

①世俗土耳其民族主义。1924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成为本世纪伊斯兰世界最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土耳其本土。革命胜利后，称之为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成为新国家的政治指导思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37年凯末尔主义以6大原则被载入国家宪法，6大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其中以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更为重要，引起的争论也更多。土耳其革命前的奥斯曼帝国是个多民族的封建帝国，以伊斯兰教和泛伊斯兰主义为国家统治思想，企图借助上下一体的宗教信仰、宗教情感来维护幅员广阔的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因而，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认同是一种超国家、超民族的泛伊斯兰认同。土耳其革命过程中，凯末尔通过各种措施初步实现了政治认同的转化，从广为流行的泛伊斯兰主义、泛奥斯曼主义转向土耳其民族主义，作为民族认同、个人身份认同的新的基础。

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作为现代土耳其政治认同的基础，其功利主义目的性十分明确。前者旨在确立以民族国家而非过去那种

① 参见吴云贵：《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4期。

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为基础的政治认同：“土耳其是为土耳其人的，土耳其人为了土耳其。”^① 后者强调政教分离的政治原则，即宗教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无涉，宗教文化与社会发展无涉，宗教组织不得干预国家政治建设，宗教信仰应当完全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土耳其政治认同的转变实质上也是国家与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转折，现代土耳其已成为一个西化和世俗化的国家，因而土耳其社会已不再是中世纪那种名副其实的伊斯兰社会。这种转变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对于这种急剧的革命性转变全体土耳其人未必都能欣然接受和适应。长期以来，土耳其社会上一部分因循守旧的人群一直对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持保留和反对态度，一有机会就鼓吹传统的宗教认同。这种民族认同和个人身份认同上的矛盾心态时常演变成为社会认同危机。例如，40~50年代，在提加尼教团的煽动下，一大批墨守伊斯兰教传统的群众在土耳其国民议会大厦前举行游行示威，用阿拉伯语呼拜，要求恢复传统习俗，复兴宗教信仰，并且以反对偶像崇拜为名，捣毁凯末尔雕像。60~70年代，宗教政党兴起且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以合法方式向政府施压，反对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其中以救国党为重要，它鼓吹“重振宗教道德”，主张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法制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强调以宗教作为社会和个人身份认同的基础。直至80、90年代，这股力量更加强大，1996年6月以埃尔巴坎为首的宗教政党繁荣党上台执政，欲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实现更充分的伊斯兰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繁荣党奉行土耳其伊斯兰民族主义，强调伊斯兰文化的认同作用和伊斯兰历史的纽带作用。其政策大大地助长了国内传统宗教势力，使国内骚乱和认同危机再起，1997年2月在安卡拉的辛詹镇繁荣党市长组织了“耶路撒冷之夜”集会，再次提出要在

^① 费舍尔：《中东史》，第430页，纽约，1979。

土耳其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口号。这些都表明用革命手段去摧毁早已根植于土耳其民族共性和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仍然具有广泛基础的宗教信仰、宗教文化认同是十分艰难的。因此，它与政府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政治、社会认同原则永远难以调和，认同危机也将无法避免。

②阿拉伯民族主义。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模式未能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共鸣，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大多转向了合成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其典型体现是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民族主义。这里仅就纳赛尔主义展开讨论。

所谓合成型民族主义是相对于世俗民族主义而言的，它对于宗教和宗教文化传统不是采取绝然排斥的态度，而是将其作为民族主义的一部分，积极地予以融合和利用。纳赛尔主义又称阿拉伯主义，它包括阿拉伯、非洲和伊斯兰世界三个层次，称为“三个圈子”，其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或阿拉伯统一是其核心。纳赛尔认为历史上阿拉伯地区曾是一个有着共同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的统一的社会实体，目前的分裂状态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人为造成的，阿拉伯世界应当走向统一。纳赛尔主义在实践过程中又分为三个层次和阶段，即埃及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纳赛尔主义只是在对外政策上，特别是在争取实现阿拉伯统一过程中较多地利用伊斯兰教，而在国内政策上则越来越明显地采取某种事实上的政教分离政策。它要求埃及官方宗教组织“爱国守法”，拥护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并为政府的各项社会改革政策进行论证，提供某种政治合法性的依据。

纳赛尔执政时期，在民族和个人身份认同上采取某种模糊的态度和做法。由于纳赛尔在推翻旧政权，建立共和国以及后来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中的杰出表现，他不仅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

民族英雄，而且也被成千上万的埃及穆斯林视为伊斯兰教的一代骄子。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阿拉伯、伊斯兰、穆斯林、民族主义者等称谓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可是后来随着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随着土地改革、企业国有化等经济政策的逐步实施，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纲领与伊斯兰教教义的矛盾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显然，左翼纳赛尔主义者与右翼穆斯林兄弟会在社会价值观和个人身份认同上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后来由于阿拉伯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特别是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惨败，失地、丧权、辱国，埃及社会中开始出现怀疑、攻击、反对纳赛尔主义的思潮，将其斥之为不合国情、民情、教情的“舶来品”。70年代以后，埃及在政治认同和个人身份认同上出现了两大相互对立的派别：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这标志着合成民族主义走向破产，并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

③穆斯林民族主义。特殊历史环境使印巴次大陆的一部分穆斯林走上了分离式的民族主义的道路。16~19世纪中叶印度处在伊斯兰教的莫卧尔王朝统治下，形成了穆斯林少数统治印度教徒多数的政治格局，民族矛盾由来已久，后由于英国殖民者的挑拨离间，占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徒与占人口少数的穆斯林终因积怨深厚和利益冲突而走向民族分离道路。印度穆斯林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全印穆斯林联盟，并致力于实现印度穆斯林聚居区的自治和建立分离的穆斯林国家。“两个民族”理论始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由赛义德·阿赫默德汗、伊克巴尔、阿里·真纳等人阐述。认为印度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众和信奉印度教的民众构成了印度两大民族，他们在语言文字、文化传承、生活方式、民俗习尚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别，无法共同生活，应各自为政，建立不同的政治实体。伊克巴尔指出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理想的伦理准则，而且也是一种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它的宗教秩序

同它所创造的社会秩序浑然一体。^① 由此他进一步阐述“两个民族”理论，提出印巴分治主张，深化穆斯林分离主义，为巴基斯坦建国规划蓝图。1940年“穆盟”主席阿里·真纳在英国报刊《时与潮》上发表专文，阐释“两个民族”理论，要求英殖民当局以法律形式确认印度有两大民族，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同年3月在拉合尔会议上正式通过“两个民族”理论为“穆盟”指导原则，以及关于建立巴基斯坦国的决议，从此走上彻底的民族分离道路。1947年6月英国公布“蒙巴顿方案”，巴基斯坦从此建国。以“两个民族”理论为基础的穆斯林民族主义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印度永久性地分裂为两个国家。

“两个民族”理论的内在矛盾是，它既在法理和道义上确认新生的巴基斯坦属于伊斯兰国家，应当以伊斯兰教为政治认同和个人身份认同的基础，又不准备把这一理论思想付诸实施，国家实际上是以世俗性的现代民族国家为发展方向的。建国以后，以执政党穆斯林联盟为一方和以伊斯兰教促进会为另一方，双方围绕着国体、政体以及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等问题不断争论。这一争论不仅影响到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组合和分裂。长期以来，在巴基斯坦一直存在着两大不同的派别：以现代化、世俗化为发展方向的非宗教的政治、知识精英集团和以传统宗教文化为价值认同的伊斯兰教政党及组织，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社会动荡的重大因素之一。

二、不同政治道路的选择

二战以后，民族主义在亚非地区形成强势，伊斯兰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民族国家相继获得独立。40年代独立的有

^① 阿齐兹·阿赫默德：《印巴伊斯兰现代主义》，第160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

印度尼西亚、外约旦、巴基斯坦；50年代有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马来西亚、几内亚等；60年代有科威特、阿曼、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马尔代夫等；70年代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卡塔尔、孟加拉国等；80年代有文莱，巴勒斯坦也于1988年11月宣布建国。这是战后世界政治发展史上辉煌的一章。在这一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一些国家的宗教阶层仍依附于殖民当局，在民众中失去威信而无力承担使命。民族主义者以大无畏的气魄肩负领导革命的重任，并在独立后维护国家利益、发展民族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成绩斐然。一批杰出的领袖人物如纳赛尔、苏加诺、布迈丁、布尔吉巴等也脱颖而出，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民族英雄，活跃于各国政治舞台上。各民族国家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经济发展状况，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思想指导下进行国家政权的建设，其政治体制已与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思想相去甚远。

1. 政治体制与政权建设

当今穆斯林国家按其政治制度不同可划分为三类：

①共和制国家。包括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黎巴嫩等国。政治上以欧洲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为指导原则，建立新型国家政权，实行总统制和议会民主制；法制上废除伊斯兰法庭，代之以统一的国民法院制度；教育上推行世俗教育，通过自上而下的调整和改革，使国家沿着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前进。

土耳其是穆斯林世界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建国之后以凯末尔主义为政治指导思想，在国家政权建设上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旨在实现政教分离，使宗教退出公共生活。为此，政府于1922年宣布废除伊斯兰教法官和教长制度，撤消宗教法院和国家宗教事务与宗教基金管理部门。1924年宣布废除哈里发，取

消哈里发—素丹制，并将奥斯曼王室全部驱逐出境。继而通过新宪法，授予各独立法院代行国家司法职能的权力。成立两大部门主管宗教事务：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受政府直接领导，负责清真寺管理、伊玛目和讲经师任免等教务，并监督穆夫提工作。宗教基金管理总局负责宗教基金的征集和使用、宗教建筑和宗教文物的保护等工作。并且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政教分离原则，有关法律规定：禁止滥用宗教、宗教情绪或宗教圣物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禁止组建政治性宗教团体。1928年从宪法中删除“伊斯兰教是土耳其国教”一语，最终从法律上完成政教分离工作。

埃及1952年革命胜利后，以纳赛尔主义为国家政治指导思想。在政权建设上提出6项革命原则，即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对国家的控制，建设强大的军队，实现社会公正和适当的民主制度。1961年根据6项原则颁布一系列法令，实行大型企业国有化。1962年又将6项原则载入埃及“国民宪章”，成为实现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在宗教政策上，也制定出法规条令，对宗教组织和活动予以限制和利用。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埃及国教，教法为国家立法的渊源之一，国家保障全体公民信仰自由和履行所有宗教义务的自由，但禁止宗教干预政治。宗教事务由宗教基金与艾资哈尔事务部主管，伊斯兰最高理事会为全国最高宗教机构，通过各地分会组织协调宗教活动。

②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摩洛哥、文莱和马来西亚等国。这些国家中宗教与封建王权紧密结合，宗教政治化成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政治宗教化使政体呈现一些教权色彩。国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最高宗教权威，伊斯兰教是王权合法性、神圣性的象征，其内外政策受宗教意识形态、宗教传统影响较深，宗教上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地位。法制上仍以伊斯兰教法为主，保留伊斯兰法庭（卡迪法庭），教育上重视传统

宗教教育。7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海湾地区石油的开发，引起一些国家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上述国家在新的条件下重视政权建设，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对各项制度进行局部调整与改革。政治上将诸如“议会”、“总理”、“内阁”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术语和机构引入封建王国，法制上出现伊斯兰教法与世俗法规并行局面。教育上提倡以世俗性为主的现代教育。

③教权制或准神教制国家。主要指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阿富汗1992年也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似有教权体制色彩，但迄今内战未停，尚不可定论。苏丹与伊朗相似之处甚多。这类国家给予伊斯兰教以至高无上的国教地位，宗教意识形态对国家内外政策有显著影响，教职人员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以伊斯兰教法为国家大法，实现国家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

以伊朗为例。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的思想成为国家的指导原则，原教旨主义从政治反对派的主张转变为国家行为。新政权仍在名义上实行“三权分立”原则，但国家政府实为“伊斯兰政府”，也即教法学家主政的政府。霍梅尼去世后，内外政策略有调整，但基本情况未变。新政权采取以下措施巩固建设其神权政体。①宗教领袖对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绝对指导作用，毛拉控制议会，废除世俗性民法、刑法、商法，以伊斯兰教法来全面治理国家。②组建“伊斯兰革命卫队”，强化伊斯兰政权。卫队由来自社会下层，笃信真主，效忠宗教领袖的年轻人组成，对内捍卫伊斯兰革命胜利成果，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对外派出武装力量“输出革命”。③重建传统伊斯兰道德规范，提倡遵经守法，恪守“五功”。广修清真寺，1978年共有1.5万所，1981年就达2.2万所，3年里净增加7000所，^①以之为辅

^① 参见肖宪：《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第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助伊斯兰政权的基层组织，控制人们日常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为纯洁伊斯兰社会，消除西方文化影响，严厉取缔一切娱乐设施，封闭妓院、舞厅、酒吧，禁止播放西方电影。严令禁酒，违者严惩不怠，屡犯者有可能被处死。妇女不得裸露肌肤毛发，必须黑袍加身、掩盖头发，违者处以鞭刑或拘禁。^①打击知识分子。伊斯兰政权认为伊朗知识分子受西方影响较深，世俗思想浓厚，是现政权的异己力量。因此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将其逮捕、判刑、枪决，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与此同时停办世俗教育，高等院校也不再招生。德黑兰大学原有2000名教职人员，经清洗、调离或出逃后，到1982年底只剩下400人了，流亡国外200多万伊朗人中，知识分子占相当一部分，流亡医生就有2万人。伊斯兰共和国还通过镇压反对派，打击军队中亲巴列维国王的势力，排挤民族主义者等作法，终于使伊斯兰政权在1982年稳固下来。

2. 穆斯林国家的军事政变

军事政变是二战以后建立的穆斯林国家常见的现象。据统计1945~1985年中东有9个国家的军队共发动28次成功的军事政变；^①叙利亚自1958~1970年的22年间，共发生22次政变，其中11次成功；苏丹1958~1989年共发生4次政变，均获成功；土耳其1960~1980年发生5次政变，其中3次成功；印尼、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也都发生过一次或多次军事政变。据不完全统计，伊斯兰会议组织50多个成员国中，有26个国家发生过军事政变，政变尤集中于50、60年代。^②军事政变频繁发生是与穆斯林国家的处境、内外政策

^① 参见刘竞主编：《中东手册》，第37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② 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与当代政治》，第8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有很大干系的。尤其是 50 年代、60 年代各民族国家刚刚独立不久，处于内忧外患交加的境地，一些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一些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但从总体上看，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各项政策都是以非宗教教义为出发点的，而且有许多作法如企业国有化、土地改革等甚至是传统伊斯兰教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的，加之有些国家在政策制定上左右摇摆，莫衷一是，由此引起国家政治、社会和政教关系不稳定，政局出现动荡便无可避免。

军队是穆斯林国家保卫政权、维系安全的重要工具，在国家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当国家政治发展出现危机，军队便会出面加以干涉，以军事政变的方式解决危机。穆斯林国家的军事政变尽管频繁得惊人，但其性质只有两类：一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促进政体向民主化演变的军事政变。例如，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革命，推翻腐朽的法鲁克王朝，建立埃及共和国；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革命，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利比亚共和国；达乌德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查希尔王朝，建立阿富汗共和国等。二是为己私利，推翻前任，攫取政权者发动的军事政变。穆斯林国家中大部分政变都属于这一性质，不一一赘述。军事政变成功后，军人上台执政，一段时间后，即还政于民，通过选举成为国家领导人。军人政权的性质属于非教权的、世俗主义的，它坚持政教分离政策，是民族主义在军界的反映。例如，土耳其二战以后宗教政策放宽，导致宗教势力上升，宗教活动泛滥，几次威胁到世俗政权的存亡，在这些关键时刻，都是土耳其军方挺身而出，匡正时弊，安定社会，捍卫政教分离的基本国策。但也有军人当政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需要借助教界势力，而向教界做出较大让步的情形。例如，齐亚·哈克军政权的“伊斯兰化”政策；苏丹尼迈里时期教权主义倾向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与迷失

现代化建设通常应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治现代化。前文述及二战以后穆斯林国家普遍以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为国家指导思想，政治现代化步伐较快，新的政治体制完全是异质的，并非脱胎于这些国家原有的传统伊斯兰政治思想。几十年来的发展表明，新政权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作为不大。例如，中东阿拉伯国家在阿以冲突中未能有效御敌，丧权失地，使民众对新政权及其指导思想失去信心，出现“信仰危机”，人们不得不再度回归到固有的宗教信仰体系上去寻求出路。二是经济现代化。二战以后大多数穆斯林国家都十分重视经济现代化建设，一些国家实行了计划经济；一些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提出了种种国家现代化的纲领，如白色革命、阿拉伯社会主义经济纲领等。不能否认它们在经济建设上有一定成绩，但伴随这一进程，各国普遍出现官僚阶层腐败、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贫富相差悬殊等问题，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诱因。三是社会文化现代化。穆斯林各国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轨问题，使自19世纪以来社会上就出现的文化分裂的状况日益加剧，一方面接受西方教育的政治、知识精英推行世俗文化，另一方面接受宗教教育的知识分子要求回归伊斯兰文化，两派的争斗、对立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造成民众在文化认同上的混乱。

1. 经济现代化的失误

二战前穆斯林国家大都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境况，经济上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是其原料、能源供应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只有一些手工作坊和小手工业；农业畸形发展，长期以来只为宗主国种植某种单一经济作物，二战以后，各国政治上虽然获得独立，但经济上仍难以摆脱西方列强、特别是前宗主国的制约和影响，实际上并未完全

独立。为了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都经历了两件大事，以解决所有制问题。①大型企业国有化运动。将以前由殖民者掌握的大型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银行金融业等收归国有，以谋求经济独立和民族经济发展。例如，伊朗、伊拉克、巴林、埃及等国于 50 年代初开始收回石油工业权益，埃及 1956 年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接管英法在埃资产。经过这一过程，民族国家基本上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大银行等生产、金融、外贸部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由此形成国家垄断的新型经济体制。②土地改革运动。土改以前各国普遍存在着土地高度集中问题，例如，中东地区占农村总人口 5~7% 的大地主占有 50~80% 的土地，而广大农民却无地少地，被迫以租耕他人土地或作季节雇工方式勉强维持生计，并且需把收成的 50~80% 交给地主。^① 这种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关系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为此，各民族国家相继展开土改运动，以求尽快变革旧有生产关系，促进农业快步前进。例如，伊拉克土改后土地关系得到调整，农业发展速度明显增快，达到年平均 5~6% 以上，农民生活相对改善。^② 在讨论现代化进程的失误时，对于民族国家变革所有制关系，维护国家独立的这些做法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穆斯林国家主要有两种选择：一是仿效前苏联模式，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者，以推行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主，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阿尔及利亚、南也门等。二是受西方影响，走盲目西化道路或类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如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当然，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并非

① 前引刘竟主编：《中东手册》，第 592 页。

② 参见安维华等主编：《海湾寻踪》，第 107 页，时事出版社，1997。

改善国家经济面临的困难局面。

埃及是这类国家的典型代表，它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先后经历两个不同时期。纳赛尔时代奉行以农业土地改革、外国和民族资本企业国有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1953~1970年间先后颁布三次土改法令，但土改后农村土地分配不公的问题依然存在，1965年5.5%的地主和富农仍占有全国耕地的42.9%，而89%的贫农和5.5%的中农仅占有全国耕地的57.1%。^①农民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中的阶级矛盾依然尖锐。在国有化方面政府操之过急，涉面过宽，把一些已埃及化了的侨民的企业收归国有，并对允许保留的私人企业限制过多，束缚甚紧，这些作法都挫伤了一大批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上，纳赛尔不顾国力，力求速成，投资过大，由此造成赤字累累，不得已靠举借外债来填补，至1971年底共欠债务30亿美元。在纳赛尔政府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缺乏活力，内部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之风盛行，生产效益低下，产品价格与成本倒挂，弊端严重，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苦。萨达特于70年代初继任总统后，面临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严峻挑战，为克服经济困难，他对前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予以全面调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经济“开放政策”。鼓励私营经济，大力引进外资，放宽外汇管制，导致进口、投资、消费大幅度增长，经济复苏回升，1974~1981年经济增长速度达8%以上。1981年萨达特遇刺身亡，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在经济上仍然坚持“开放政策”，继续吸引外资，扩大生产性开放，削减进口，增加就业，在加强国营经济的同时发挥私营和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②

^① 参见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第147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② 新华社1982年11月16日开罗电。

萨达特以来埃及执行经济“开放政策”确实效果不错，但这一政策也引发着诸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发展缓慢、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增高等若干问题，并且由于某些政策偏差或配套措施跟不上，给一些人提供了投机倒把、走私漏税、黑市买卖、假公济私、牟取暴利的可乘之机，他们一夜暴富，成为社会上一小撮“肥猫”，形成新的特权阶层或集团。自纳赛尔以来埃及社会中出现和存在的各种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扩大和强化了，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据统计 1974 年埃及只有百万富翁 187 人，到 1981 年就达 17000 人，在短暂的 7 年中百万富翁的人数增加了 90 倍。5% 的最上层人群占有国民收入的 21% 以上，而 20% 的最低层仅占国民收入的 5%。^① 富人居住豪华，往往拥有几处或几十处别墅和住所，萨达特的弟弟就有住房 31 套、别墅 6 处。^② 而埃及穷人则生活艰辛，入不敷出，农村中 44% 的人和城市中 33%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人住在破烂的帐篷里或棚户区内。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时，月薪才 80 英镑，还有一些毕业生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无着落。这些都成为引发社会不满的潜在因素。从 1974 年起埃及通货膨胀率一直高达 25~30%，人民生活日益困难，动荡迭起，时而罢工罢课、时而游行示威，时而大规模骚乱，整个社会处在一片混乱之中。

第二类：实行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模式的国家。这类国家包括巴列维时代的伊朗、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它们都有国营企业，由于历史上各国都开展过石油国有化运动，将石油资源主权和外国控制的石油工业企业收归国有，从而形成国营企业的主干部分。另一方面，还有一些重型骨干企业，或由于耗资巨

① 参见穆罕默德·海卡尔：《愤怒的秋天》，第 185、211 页，伦敦，1983。

② 《埃及新闻报》，1982 年 10 月 24 日。

大，资本收益期较长，或由于私人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兴办，只能由国家出资经营，从而形成国营企业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些国家对外国或本国私人资本一般不实行国有化政策，反而通过低息贷款、优惠价格、豁免税收以及提供廉价土地、水、电等措施扶持和鼓励私营企业发展，还以发放股票方式将一些国营企业渐渐私有化，合资企业和三资企业发展势头较好。这类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是：①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同时发展，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②以轻工业、中小工业为主，发展速度上保持稳定。③工业农业并重并举。④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积极接受外国贷款。

巴列维时代的伊朗经济发展上先后实施了2个七年计划(1949~1962)和3个五年计划(1962~1978)，以1963年“白色革命”为界，以前是发展速度缓慢阶段，以后是迅速或极度迅速发展阶段。政府力图使伊朗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工业化强国，因此在石油美元的支持下，把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很大，以极快的步伐实行工业化，大大缩短了从轻工业发展到重工业所需的时间间隔。的确，伊朗工业大有发展，至1978年共有钢铁、机床、炼铝等较大企业6000家，合资企业200多家，工人总数由130多万增至350多万。^①1968~1978年其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6~1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60年的19美元增加到1977年的1930美元。但是，经济快速发展也带来许多严重问题，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1976~1978年更达到100~200%。由于社会分配不公，物质财富剧增只养肥了少数富人，而广大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众多工人住贫民窟，工资微薄，难以养家糊口，迅速工业化导致城市人口高速增长，大批破产农民流入城市，使失业率居高不下。与此同时，社会财富被聚敛到一小部

^① 参见张俊彦主编：《中东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第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分人手中，在伊朗形成了以国王为首的，包括王室成员、高级官吏、大资本家、大地主在内的豪门巨富阶层，他们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生活，使贫富之间的悬殊更显突出。经济政策的失误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引发了伊朗 70 年代末剧烈的社会危机与动荡，罢工、罢课、罢市和游行示威此起彼伏，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毫无疑问，穆斯林国家政府主观上都力图发展本国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但由于经验不足，无论是选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西方自由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如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两级分化、贫富悬殊等社会经济问题，由此产生一系列危机，迫使人们从他们所熟悉的伊斯兰的角度去思考摆脱困境的出路。这种“投石问路”，以 70 年代以来人们广泛谈论的伊斯兰发展道路问题最为引人注目，其被视为第三条道路。

2. 回归传统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尝试

一种经济思想总是特定的生产方式的产物，同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相适应。传统的伊斯兰经济思想流行于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同当时封建的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相适应。近代以来，伴随着封建制度在伊斯兰世界的解体，传统伊斯兰经济思想、经济制度急剧衰落，只存在于虔诚的宗教家的记忆之中。然而，由于传统伊斯兰经济思想与伊斯兰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而宗教信仰具有恒久性和价值超越性，因而当穆斯林社会出现内部危机时，传统伊斯兰经济思想便随着伊斯兰教复兴改革思潮的泛起而出现某种程度的复兴，得到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的认同和支持，它的兴起反映了当今穆斯林社会危机的加深和为走出困境而采取的一种回应。

本世纪 70 年代以后，由于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遭到失败和挫折，社会上出现了复兴和回归传统伊斯兰经济

理论和实践的呼声，其中以海湾国家最为突出。这一回归传统的思想倾向主要表现在：一是许多伊斯兰经济学家和教法学家通过自己的著述批判东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经济制度、发展模式的偏失，鼓吹走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伊斯兰发展道路；一是在沙特阿拉伯的提议、组织和领导下，通过伊斯兰世界联盟等泛伊斯兰国际组织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广泛的磋商和讨论，以扩大影响。回归传统伊斯兰经济思想和经济实践的倾向，既是当今穆斯林社会内部危机的突出表现，又是对这一困惑和危机所作的一种回应。

所谓传统伊斯兰经济理论和实践主要包括 3 个来源：①《古兰经》和“圣训”中有关社会经济问题的启示和论述；②教法著作中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则、规定和论述；③当代伊斯兰学者和经济学家结合实际对传统伊斯兰教经济理论、经济制度所作的新解释和补充。其显著特色是强调宗教信仰、宗教道德对现代经济行为的全面指导作用，强调具有相似历史文化的穆斯林国家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伊斯兰发展道路，不应盲目照搬东西方的发展模式。目前许多问题仍在探讨之中，未有定论。其理论和实践在四方面更引人注目。

首先是关于发展道路问题。伊斯兰学者认为伊斯兰经济理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间，可以统称为“伊斯兰经济学”、“伊斯兰教发展道路”、或“第三条道路”。它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们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危机的总根源，而穆斯林国家只有选择符合国情、教情、民情的伊斯兰发展道路才能摆脱当前所面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时代的挑战。

其次是关于宏观经济理论问题。伊斯兰学者认为，伊斯兰世界急待建立和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伊斯兰经济学，以指导各国的经济建设。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

经济学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其宗旨是制定名副其实的伊斯兰社会生活法则。鉴于目前世界上尚未建立起这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因此只宜作一些调研工作。第二种观点认为，伊斯兰经济学属于实践科学，它要求世界各族穆斯林以宗教道德来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避免偏离“正道”。目前应当着手“架桥”工作，即深入研究和比较世界现行经济体制与伊斯兰经济制度之间的差异，找到替代办法，逐步实现过渡。第三种观点认为，伊斯兰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其宗旨是在尊重伊斯兰价值观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穆斯林社会的经济问题。当前急待创建一门指导性的“超经济学”，以伊斯兰道德准则为判断依据决定人们的经济行为是否正确合法。

再次是关于创建和发展伊斯兰金融理论问题。其要点包括：①重新解释《古兰经》“利息禁令”的含义，认为经中所言的禁吃“重利”（2：275）是指“净利息”，而不适用于国家为控制通货膨胀而规定的浮动利率；②提倡借贷双方共担风险、共分利润。认为目前流行于西方的借贷关系极不合理，它有利于贷方而不利于借方，最公平的原则应当是银行与客户之间结成伙伴关系，双方共担投资风险，按合同共分投资利润。③反对视利息为货币价格。认为惟有通过劳动生产的有形产品才有使用价值、商品价值和市场价格，而货币资本并非商品，当然也就谈不上价值和价格。④建议以投资利润代替利息。这是为绕过利息禁令而提出的变通办法。由于在正常的情况下，银行投资利润远远高于利息，因而以投资所获利润来代替利息既不违反“利息禁令”，又有利可图。

第四是修订和补充伊斯兰税收制度。针对目前穆斯林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富差别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状况，伊斯兰学者提出应当大力提倡历史上广泛流行于穆斯林社会的天课制度。为此，他们提出了四项措施。一是扩大天课的适用范围，传统上未涉及

的税项，诸如股票、保险金、保险储蓄、有价证券、备用资金以及租赁建筑物、租赁交通工具、机械设备和其他资本货物都必须依法纳税。二是以浮动税率代替固定税率。对新征收的天课税项，应采取浮动税率，由国家规定。三是由国家负责天课收入的分配，坚持一切经费开支都必须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天课收入的分配亦无例外。四是修改某些传统的税制。例如，历史上广泛流行的什一税（欧苏尔）是按农产品的毛值估算，出入很大，应改为按农产品的净值征税。^①

3. 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断裂

当代穆斯林社会内部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传统与现代精神之间的脱节和断裂。二战以后，穆斯林国家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之后即步入现代化进程。一般认为，现代是传统的继续和发展，现代化所要求的现代性或现代精神不能简单地由外部植入，还必须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经验证明，这样的现代化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才能在转型过程中获得平衡、有序的发展。可是就大多数穆斯林国家而论，其现代化进程大多是未经过充分的思想准备而突然启动的。近代历史上，由于大部分穆斯林国家都曾经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现代主义思想传统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扬弃，就因为殖民统治秩序的建立而被迫中止了。战后取得政治独立以后，这些国家在经济体制、文化教育乃至政治制度上仍深受西方国家的影响，缺乏创造性和独立自主性。因而，其现代化进程往往因为主客观条件不够成熟和缺乏经验而陷入迷失和困惑，这在实行激进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或盲目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的穆斯林国家尤为突出。其社会层面、价值观层面上的表现则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及

^① 参阅吴云贵：《战后伊斯兰经济理论和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7期。

其与之相联系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兴起。70年代以来上述现象的出现，也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危机加深的典型体现。这一危机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层面更为显著，而各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对现代化、世俗化、西方化的拒绝和否定，正是因为传统与现代精神断裂所引起。关于这一情况，一位研究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家曾作过四方面的描述和论证。^①

首先是世俗化。由于现代化经常被人们等同于世俗化和西方化，因而在当今的许多穆斯林国家都出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世俗化和某种程度的西化倾向。世俗主义把源自西方的新的社会伦理从外部强加于传统的穆斯林社会，导致《古兰经》和圣训的神圣指导地位被否定，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被架空，社会发展出现了某种非道德化的趋向。现代化所带来的人们有陌生之感的外来文化和外来生活方式，使社会上墨守传统的一部分人群感到自己被异化了，所以谴责这些舶来品为“贾希利叶”（蒙昧）。由此引起了回归传统的狂潮，而回归传统又使现代派颇感不满。

其次是对西方的依附。二战以后，赢得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对西方国家仍处于某种依附地位，其中以在经济上的依附尤为显著。西方不仅通过经济联系对穆斯林国家继续施加影响，而且通过政治体制调整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许多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军队都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其政治精英中有不少亲西方的人士。这种依附地位使得许多穆斯林国家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活动空间越来越小，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人们回忆起昔日伊斯兰大帝国的荣耀、伊斯兰文化的光彩，就会产生今不如昔之感，从而也就越发要求改变现实的困境。

^① 参见约翰·埃斯波西托：《复兴伊斯兰之呐喊》，第218～219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

第三是教育制度的分裂。现代化进程促进了现代世俗教育的发展，导致传统宗教教育的衰落，引起教育指导思想的混乱。在大部分穆斯林国家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教育机构，由于培养目标不同，社会上出现了两个互相对立的团体和人群：现代世俗政治、知识精英和传统宗教领导阶层。前者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把持了国家各级政府的权力，同时又被广大下层民众视为西方的代理人，他们大多受过现代西方教育，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世俗化和西化的积极倡导者、推行者。后者以宗教领袖、宗教知识精英为核心，他们仍留恋传统的宗教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反对世俗化和西化的鼓吹者和领导者。二者的分裂和对峙，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成为当今穆斯林社会相当普遍的现象。

第四是政治合法性危机。二战后随着政权的更迭，以外来统治思想为基础的新的领导体制和领导阶层成为多数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中心。但新的政治精英由于政治腐败、行政乏力、脱离民众，逐渐丧失了威信和民众支持，致使一些穆斯林国家出现了政治合法性危机。广大下层民众从对现实生活状况的不满发展到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怀疑和否定，认为一切不按真主意志办事的国家政权皆为非法政权，必须予以推翻。政治合法性危机后来在部分国家为伊斯兰政治反对派所利用，成为他们鼓吹伊斯兰革命或实行国家体制伊斯兰化的旗帜和口号。例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曾在大选中提出“不要宪法，不要法律，《古兰经》就是一切”的竞选口号，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则以“《古兰经》是解决办法”为竞选口号。这些口号的潜在含义都包含着对本国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拒绝和否定。

此外，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断裂还表现在个人的价值认同和生活方式问题上。这一点前已述及，这里略作补充。传统的穆斯林

社会高度重视以经、训、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生活方式，并通过宗教教义和礼仪制度把人际关系转化为个体对真主的关系，据以指导穆斯林个体的日常生活方式。但是由于社会世俗化、西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在社会改革进程中被大刀阔斧地修改，其地位和影响江河日下，精通教法知识的乌勒玛阶层在许多国家中逐渐处于社会边缘化的不利地位，而新的世俗性法制又不够健全，因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司法混乱的现象。对世俗化潮流不满的一部分社会力量，在宗教领袖、宗教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下，在许多国家发起法制伊斯兰化运动，成为伊斯兰政治反对派动员民众的一条方便的渠道。由于世俗化只得到少数城市民众和亲西方的政治、知识精英的赞同和支持，而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大多数民众仍沿袭传统生活方式，因而个人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仍离不开宗教，仍属于传统的认同。人们在价值观和个人身份认同上的巨大差异，在不少穆斯林国家中已成为社会危机、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

第五章 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 伊斯兰运动

第一节 国际格局的变动及其影响

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

1.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不复存在，这是国际政治领域内一次重大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两极格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构筑的雅尔塔体系为基础，以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紧张对峙、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零和争夺为特征，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在此条件下，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政治运动几乎无不打上冷战烙印、受制于两大集团的对抗。两极格局的瓦解，使得过去敌友分明、清晰易辨的国际格局顿时变得复杂起来，同时，原来受两极格局抑制的各种矛盾与政治势力，例如民族、教派、种族矛盾，以及民族主义、宗教政治力量等，纷纷凸现，力争在新旧格局交替时期施展政治影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特别是原苏东地区及其控制区域，由于苏联这个权力制衡中心的消退而大多陷入失衡无序状态。在这些地区，不仅存在内部势力积极动员组织群众向政治领域拓展的情形，许多外部力量为谋取一己之私也加紧渗透，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动荡一度成为这些地区的主要社会特征。

苏联解体还导致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谷。苏东国家纷纷抛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仅使苏东国家,而且使原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或奉行社会主义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出现混乱和真空,从而为其他各种思潮和社会模式的登台亮相提供了条件。在社会主义严重受挫的情形下,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急剧下降。意识形态不再是决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其地位和作用并未完全丧失,在某些地区仍可能发挥一定作用。与此同时,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地位和作用相对上升。不仅“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能否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同时以经济和科技为主导的国际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力量多元化也成为推动国际政治格局转化的深刻动力。^①此外,文化及民族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日渐上升。异质文化的矛盾与分歧可能诱发并加深国际冲突,同源文化的认同与亲和则成为构筑国际联盟的因素。^②民族主义浪潮,不仅改变着世界政治地图,而且导致许多国家政局动荡,成为诱发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③

再者,苏东解体还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在两极格局下,世界经济基本上分为两大平行对峙的经济体系,即苏东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两大经济体系相互封闭,交流较少。苏东解体,则导致这两个“敌对阵营和平行市场”的消失,从而为“发展国际经济关系和实现经济国际化扫除了一大障碍”。^④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因此

① 参见刘中民:《冷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特点》,《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5期。

② 同注①。

③ 同注①。

④ 参见张兴武:《冷战后欧亚关系发展——机遇和挑战》,《欧洲》,1996年第1期。

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象征，具有全球意义。自然，西方国家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原苏东国家以及地域广阔的发展中国家或处于次要地位，或不得不调整经济战略向这个世界经济体系靠拢。

2. 国际格局总体上处于过渡状态，但目前渐呈“一超多强”的多级化发展趋势

其一，“一超”指美国。苏东瓦解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作用显著上升。美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属世界一流，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与之匹敌。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常规和核力量，能够保持一种同时介入两场大规模地区冲突的力量。^①它是惟一一个在全球拥有海外军事基地的国家。它的海外基地不仅分布于欧洲、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而且遍及中东和东南亚、以及加勒比和拉丁美洲，这些海外基地是美国能够有效维护其全球战略利益的重要保证。当今世界，军事实力仍不失为保障国家利益的最后有效手段。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也因此膨胀，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关注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所说：“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从未像今天这么重要，它可以使美国更加安全、更加繁荣。……如果美国决定冷战后不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世界就会变得不那么安全。”^②此外，美国已着手摸索、制订相应的战略，以图巩固和维持美国的霸权。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就认为，应当把外交手段和军事力量相结合，以发挥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1996年10月25日他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时阐明了这点思想。他讲道：“在当今世界上，在美国的利益

① 新华社伦敦1996年10月9日英文电，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96～1996年度军事力量对比》报告美国部分。

② 新华社华盛顿1995年3月7日英文电，佩里提交的年度报告第一部分《新时期的新战略》。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属于全球范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安全需要把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用。如果没有可信的威胁或使用武力作后盾，这种外交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最终是危险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用外交增进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肯定会发觉自己将在战场上保卫这些利益。……我们必须将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投入战场并予以经费保证，但是我们还必须开展一流的外交活动并予以经费保证。”^① 一流的国力加上强烈的领导世界的主观意识，导致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显著上升。

其二，“多强”指世界格局呈多极化发展态势。尽管从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上看，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却相对下降。与此同时，欧盟（尤其是统一后的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力量日趋增强，大有与美国分庭抗礼之势。据统计，1991年美国、日本、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56826万亿美元、33561万亿美元和16858万亿美元，但若按人均计算，三者位次分别是：日本27065美元、美国22550美元、德国21475美元。^② 德国和日本正借助经济实力向政治大国迈进。除此之外，俄罗斯继承前苏联衣钵，一旦走出目前困境，其经济潜力和政治实力不容低估。俄罗斯外交政策日趋务实，在许多国际事务中与美国针锋相对，形成一股对美国起牵制作用的政治力量。发展中国家亦在崛起。仅以亚洲为例，除“四小龙”外，中国经济增长率较高，综合国力逐步增强，国际地位相应提高。从国家角度看，德、日、法、俄、中等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重要大国；若从地区角度看，北美、欧盟、东亚堪称全球三大经济中心。不论怎样，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必将带动世界政治力量

^① 美新署华盛顿1996年10月28日英文电。

^② 参见李琮：《第三世界论》，第45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向多中心发展。没有其他大国的配合，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想要主宰世界几乎变得不可能，强大如美国者也不例外。

3. 在世界范围内，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构成一股强大的浪潮，猛烈地冲击着发展中国家

经济自由化来势迅猛，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战略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所谓经济自由化，核心就是实行私有化，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减少国家干预，实行私有化，鼓励私人经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②更多地对外开放，大力吸引外资，强调实行出口替代战略，或综合发展战略；③大力推行产品多样化，促进农业发展；④实行财政紧缩，减少赤字，抑制通货膨胀。^① 这股浪潮可以追溯到 80 年代前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经济滞胀问题，它们依靠这套调整战略，促使自身经济克服危机，并取得较长时期持续增长。这对当时也深陷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无疑一副良药。苏东巨变及其向市场经济转轨，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深受苏东影响的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及其操纵的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沉重、经济出现危机、有求于西方之时，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干预。其手段之一，就是提出治理这些国家经济危机的药方，即实行自由化、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减少国家干预。其理由在于：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的根子在于内部，即其经济自身的薄弱性，而不是外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不平等的国际环境尚未改善的条件下，它们不得不依这些药方行事，以争取西方或国际组织的援助。西方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决策构成了干预。

^① 见前引李琰书，第 293 页。

政治民主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也异常强大。所谓政治民主化，主要指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它包括：开放党禁、民主选举、新闻自由等。在西方国家看来，冷战的胜利是民主制度的胜利，因此，当苏联解体民主化浪潮风行世界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把推动民主化当作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其手段之一，就是借助经济援助提出附加的政治条件。这些政治条件主要包括：尊重人权，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推进民主化进程。如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等，将受援国民主化和尊重人权的程度作为援助多寡的先决条件。此外，西方国家也不排除进行政治和军事干预的可能。这可以从“国际干涉”思想中略窥一斑。所谓“国际干涉”，指由“国家共同体执行的对违反国际法和反对公认国际社会意愿的政府或叛乱行为的限制行为”。^① 国际干涉主体可以是多国集团，也可以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北约）或非政府国际组织（如人权观察组织等）。^② 国际干涉主义者认为：“主权不再抽象地同国家，当然也同自命的军人或文人独裁政权站在一起，而是同该国人民站在一起”。^③ 换句话说，主权不属于政府，而属于人民。只有那些“合法政府”，才能获得行使主权的权力。^④ 政府合法与否在于是否尊重国内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在于是否致力于民主进程。如果一个政府没有遵循上述标准，或者当一国陷入内战而造成悲剧时，可以剥夺这些政府的主权地位。此时，国际社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为保护受迫害的人民和无辜的民众提供一个合法政府而行干涉之责。可见，国际干涉思想的核心在于：将政府合法化与民主化、尊重人

① 苏长和：《论国际干涉》，《欧洲》，1996年第4期。

② 同注①。

③ 同注①。

④ James Mayall, Non-intervention,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67, No.3, 1991, P.427.

权、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挂钩，同时否定传统主权观念，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意愿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规范，实质上这与霸权主义如出一辙。西方的目的很明确，即彻底消除社会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同时把发展中国家完全纳入西方设计的“国际新秩序”，更好地为西方的战略利益服务。

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浪潮波及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并在90年代达到高潮。以拉美为例，该地区的经济私有化进程较早，1981年前后开始实行，1985年后逐步加速，冷战结束前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卷入这个浪潮。^① 非洲的政治民主化则来势迅猛。1989年，非洲51个国家中实行一党制和军人统治的有39个，占国家总数的76%，实行多党制的有12个，占总数的24%；到1994年6月，实行或已宣布准备实行多党制的非洲国家已猛增到47个，约占非洲国家总数（53个）的90%，剩下6国为军人政权或无党制国家。^② 一般来讲，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不平衡性、有限性和脆弱性。不平衡性指发展中国家民主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例如在中东地区，土耳其民主制度创建较早，民主体制较为稳定，军人即便干政，一俟局势稳定，很快还政于民；埃及民主程度稍为逊色，70年代才开始实行民主开放政策；海湾国家民主基础最薄弱，程度最低。有限性和脆弱性指多党制、议会制即便建立，仍不完善，君主或总统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军队干政仍是权力机制运转的重要因素，一些政党包括宗教组织（政党）不被认可享有合法地位和参政权利，^③ 民主大门的开启与关闭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等。

① 见前引李琮书，第297页。

② 参见高晋元：《多党民主制在非洲的发展》，《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

③ 参见杨鲁平：《试析中东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西亚非洲》，1994年第2期。

二、伊斯兰运动新趋势与新特征

1. 覆盖地区扩大，形成多中心、多类型的伊斯兰运动活动带

冷战期间，伊斯兰运动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伊朗、埃及等等中东国家，冷战后伊斯兰运动开始在北非、中亚等更广阔的穆斯林世界蔓延。1989年苏丹军事政变后，以哈桑·图拉比为首的“全国伊斯兰阵线”渗透到苏丹核心部门，在幕后与前台的军政权联手执政，致使苏丹成为继伊朗之后全面（南方三省除外）伊斯兰化的国家。此外，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国的伊斯兰运动也有所突破，尤其是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所造成的“政治地震”，对中东及欧洲均产生很大震动。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伊斯兰势力发展引人注目，除一般群众重新确认伊斯兰信仰、崇尚伊斯兰生活方式外，形式各异的伊斯兰组织也应运而生。其中，伊斯兰复兴党活动频繁，力量发展迅速，其分支机构短时期内即已遍及中亚5国。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曾与民主党联合发动政变，一度夺取政权，失败后的伊斯兰复兴党至今仍在塔吉克斯坦的南部两个州拥有相当实力，成为塔吉克斯坦政府的心头大患。除上述地区外，在巴尔干地区、阿富汗、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以及美洲，伊斯兰运动均有抬头之势。目前已形成一个以中东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伊斯兰弧形活动带，并呈现多中心、多类型、多层面的特征。

2. 民众伊斯兰、尤其是伊斯兰政治反对派势力高涨，反政府、反西方倾向增强

首先，群众性社会伊斯兰深入发展。在中东地区，除一般国家外，埃及、土耳其这类世俗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群众性伊斯兰也异常活跃。例如，埃及的伊斯兰教社会化相当普遍。据报道，埃及昔日“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意识形态，如泛阿拉伯主义、社会主义

和世俗主义,均已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情形是:“祈祷地点增多,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律,妇女的面孔被面纱遮盖得越来越严实,实行电影审查制,利用电视布道……酒吧不卖酒,猪已被赶走……在出租汽车或公共汽车上,用于祈祷的盒式录音带已取代音乐磁带。”^①类似情况在世俗化最彻底、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土耳其也屡见不鲜,据报道,现在土耳其每年新开设 1500 座清真寺,1984 年土耳其只有 54667 座清真寺,而到 1995 年底已增加到 70213 座。在过去 10 年里,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数量翻了一番,平均每年新建 100 座。今天该城市有 3000 座清真寺可供给 1000 万居民使用,平均每 3300 人拥有一座清真寺。^②群众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既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也与伊斯兰组织有关。

其次,伊斯兰温和型政治反对派参政势头虽遭到削弱,但热情不减,在某些国家还有所突破。1992 年,黎巴嫩真主党参加了全国 20 年来第一次议会选举,赢得 8 个席位,从而正式进入黎巴嫩国家政治生活。1989 年 11 月约旦举行众议院选举,穆斯林兄弟会在 80 个席位中赢得 23 席,并有 5 名成员进入内阁任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自 70 年代以来谋求通过合法渠道登上政治舞台,它曾于 1984 年、1987 年两度参加议会选举,成为议会中的主要反对派。1990 年埃及政府修改选举法,限制许多政治反对派参加选举。穆斯林兄弟会不改初衷,转而在地方选举中争取席位。1992 年它与劳工党结盟,在乡村、都市等地方选举中,分别赢得 15% 和 5% 的选票。^③土耳其亲伊斯兰的繁荣党,在 1995 年底举行的全国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于翌年 6

① 新华社巴黎 1996 年 4 月 7 日法文电。

② 德国《世界报》1996 年 7 月 23 日。

③ Sana Abcb-Kotob, *The Accommodationists Speak: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of Egypt*, *Middle East Studies*, Vol.27, No.3, 1995.8, P.328.

月与正确道路党联合组阁，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成立 73 年以来第一个由宗教政党参与的政府，该党主席埃尔巴坎出任政府总理。

冷战后伊斯兰激进组织反政府、反西方暴力活动加剧。自海湾战争中美国及西方盟国军队进驻后，沙特阿拉伯先后发生两起爆炸事件。一起发生在 1995 年 11 月，沙特阿拉伯皇家卫队营地遭到袭击；另一起则发生在宰赫兰美军基地，时间是 1996 年 6 月。据分析，这两起事件与沙特阿拉伯国内穆斯林反西方、反政府思想情绪高涨有关，沙特一位伊斯兰学者认为：“当我们祈祷时，我们祈求安拉的帮助；而当我们陷入困境时，我们却在要求西方给予援助……如果说伊拉克加强了对科威特的控制，西方则将加强对沙特阿拉伯的控制。”^① 一些反对派人士更直言不讳，“让美军异教徒进入沙特阿拉伯的领土，是对圣教的亵渎”。^② 还有人士认为，西方驻军不仅危害沙特阿拉伯主权独立，而且有损伊斯兰文化因素的保持与发扬光大。反对派领袖乌萨尔·伊本拉希以为，王室口头上说实行伊斯兰法律，实际上却听任华盛顿“将整个沙特阿拉伯西方化，并在经济上实行殖民化”。^③ 另有两位学者在《在伊斯兰国家实施沙里亚法》一书中写道，由于本国统治者的允许，西方的渗透致使本国伊斯兰价值日益丧失，一些世俗思想因此出现，譬如，认为伊斯兰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西方民主是一体的。一些原本与伊斯兰精神相抵触的法律却被视为与伊斯兰思想一致的代表。……实施西方法律，将会导致西方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支配穆斯林国家。^④ 除沙特阿拉伯之外，阿尔及利亚自中断民主化进程后，陷入由伊斯兰组织掀起的暴力反

① Khalid Bin Sayeed, *Western Dominance and Political Islam, Challenge and Respons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USA, 1995, P.85~86.

② 法国《快报》周刊，1996 年 7 月 18 日。

③ 见前引 Khalid Bin Sayeed 书，P.86.

④ 见前引法国《快报》周刊，1996 年 7 月 18 日。

抗浪潮之中。伊斯兰拯救阵线及其附属组织，在转入地下武装斗争的同时，并未放弃通过政治渠道与政府和解的努力。但是，激进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则另起炉灶，反对与现政权的“一切对话、一切休战和一切和解”，号召拥护者继续武装斗争，直到推翻现政权为止。此外，这些组织对于支持现政府或与现政府关系密切的外国政府及其公民，特别是对阿尔及利亚有传统影响的法国，予以敌视或对抗。“它们所从事的暴力恐怖活动遍及阿尔及利亚全国，绑架、暗杀了上至国家元首、外国外交官、外国侨民，下至本国无辜人民。据统计，1994年在阿尔及利亚遭暗杀死伤者近9000人，纵火爆炸和破坏事件达2775起”。^①以至于伊斯兰运动在阿尔及利亚和欧洲成为“恐怖主义”的代名词，类似情况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埃及等国也层出不穷。

3. 新的“中产阶级”不断介入，伊斯兰运动的社会基础结构处于变化当中

传统上，构成伊斯兰运动主力军的主要是贫困破产的农牧民、城市贫民、小业主和小商人等，他们一般经济地位低下，文化知识水平浅薄，宗教思想和情感较浓厚。以土耳其为例，1923年建国后，土耳其世俗化、现代化改革取得较大进展，但在土耳其“农村、山区、东部地区”，伊斯兰教根基依然非常牢靠。50~60年代，土耳其政府恢复宗教开放政策后，宗教势力恢复较快，其中“支持宗教复兴最力者是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小业主，即土耳其认为的‘埃斯纳夫’阶层。他们是城市中最富宗教热情的信徒”。^②再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例，在哈桑·班纳领导时期（1928~1949），该组织的主要成员是青年学生、手工业者和中下

① 黄菊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发展和影响》，《学术论文》，1995年第26期。

② 杨兆钧编：《土耳其现代史》，第33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

级国家职员。^① 经过数十年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的“中产阶级”加入这个行列。所谓新“中产阶级”，指的是新一代中小企业主、公司职员，以及从事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其特点是，“或者有生产资料，但不算多；或没有生产资料，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他们受过现代（高等）教育，有中等以上收入，过着中等以上生活”。^② 与伊斯兰运动的传统社会基础相比，这个新阶层无论在知识水平上，还是在经济地位方面，都有显著提高。80年代，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许多领导成员已经成为成功的商人或实业家，他们与国内以及海湾地区的经济界存在密切联系。此外，这些人在国内非政府行业协会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80年代末，他们控制了诸如医师、工程师、药剂师等行业协会；1992年前后，埃及最具影响力的律师协会落入伊斯兰主义者手中；1993年，他们又相继控制了开罗大学等高校教师联合会的领导权。^③ 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感情，与下层穆斯林群众不同，他们在注重穆斯林整体利益的同时，坚持个人自由和选择的权利；他们不回避物质层面的需求，愿意把目光投向现代政治和社会事务，并试图把伊斯兰教与它们结合起来。中产阶级的介入，不仅改变了伊斯兰组织的力量构成，而且日益改变着伊斯兰运动的方向。

4. 随着冷战结束，伊斯兰日益突显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

冷战结束是以海湾战争、苏联解体、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

① Bjørn Olav Utvik, *Filling the Vacant Throne of Nasser: the Economic Discourse of Egypt's Islamist Opposition*.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17, No.4, Fall 1995, P.47.

② 见前引李琮著《第三世界论》，第426页。

③ 参见黄菊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发展和影响》，《学术论文》，1995年第26期。

化这样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交织发生为主要标志的，对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来说，冷战的结束有穆斯林世界地域上扩充（中亚国家独立）和外部压力缓解（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所带来的些许欣喜，但更多的则是挫折、失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海湾战争不仅使重要的穆斯林国家——伊拉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军队更直接进驻海湾国家，并对另一个穆斯林国家——伊朗——进行赤裸裸的军事讹诈与经济制裁；尤为重要的是，获得冷战胜利的西方阵营，越来越把民主化、自由化、西方人权观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迫使相当多数的穆斯林国家走上了政治与经济变革的不归路。经历了近代殖民统治和冷战折磨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在后冷战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如故：伊斯兰教的前途在哪里？穆斯林国家和民族将向何处去？由此看来，伊斯兰浪潮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再度出现高涨就不是偶然的了。首先，被美国和西方国家视为战略盟友的穆斯林国家陷入了伊斯兰势力的两面夹攻。一方面，一些伊斯兰组织（或政党）调整策略，利用政府允许的有限空间，以合法的方式向现行统治结构挑战，另一方面，激进的伊斯兰组织扩大了恐怖活动的范围和目标，试图通过制造社会动乱，彻底击垮当局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政治稳定的信心。第二，被西方国家视为“无赖”的激进的伊斯兰国家，特别是伊朗和苏丹，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卷入了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伊朗试图在中亚发挥更大的影响，而苏丹则试图构建伊斯兰国际联盟。第三，在冷战后的地区动乱中，伊斯兰成为最活跃的因素，巴尔干、中亚、车臣、阿富汗以及非洲地区的政治、民族冲突中，都可以发现伊斯兰的踪影。第四，穆斯林世界的移民大规模进入欧洲和美国，这不仅为西方社会的就业和社会整合带来麻烦，还使激进的恐怖主义活动防不胜防，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事件使美国和西方社会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面对伊斯兰浪潮的又一次高涨，伊斯兰威胁论在西方社会广

为流行，一些西方政要和著名学者甚至断言，伊斯兰已成为继共产主义之后西方所面临的新的威胁。

第二节 伊斯兰与国际关系

一、伊斯兰国家与国际关系

虽然伊朗、苏丹和沙特阿拉伯的政府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但由于这三个国家在经济实力、地理位置、政治传统和与西方关系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他们对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也十分不同。

1. 苏丹及其“阿拉伯—伊斯兰人民大会”

冷战结束后，苏丹筹组的“阿拉伯—伊斯兰人民大会”对国际关系产生较大影响。阿拉伯—伊斯兰人民大会，努力促进非官方的、“民众一级”的伊斯兰主义者和伊斯兰政治派别间的广泛团结，试图与沙特阿拉伯推行的泛伊斯兰运动以及美国抗衡。该大会目前已召开三届，分别在1991年4月、1993年12月和1995年3~4月举行。与会成员，主要是来自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主义者和非官方伊斯兰政治组织的代表。例如，在第二届大会上，成员中既有穆斯林兄弟会世界组织的副领导人穆斯塔法·马赫胡尔、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负责人哈桑·胡尔迪以及巴勒斯坦“哈马斯”的代表，也有来自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伊斯兰派别领袖。此外，巴尔干地区、法国、比利时、西班牙以及美国的一些教职人员也莅临大会。大会的发起者和主持人——苏丹全国伊斯兰阵线领导人哈桑·图拉比，阐明了大会性质。他在第二届大会召开前夕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民众一级，各种派别的穆斯林正在接近。……（我）拟于12月初在喀土穆召开第二届阿拉伯和伊斯兰人

民大会，以这种方式来为这种接近作出贡献。”^① 另外，从三届大会规模以及一些决议上看，图拉比的这种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第一届大会成员来自世界各地 55 个国家，第二届大会会有 50 多个国家、500 名代表，第三届则有 80 多个国家的 500 多名代表参加。第三届大会，不仅通过决议呼吁促进穆斯林内部争端的和解，而且在若干有关穆斯林的国际事务中表明了一致立场。苏丹筹组阿拉伯—伊斯兰大会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冷战后，美国把苏丹视为与伊朗一样的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对其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封锁；沙特阿拉伯则与美国结盟，以保护本国及海湾地区的安全为名，邀请美国军队长期驻扎海湾。因此，图拉比试图通过组织阿拉伯—伊斯兰大会，团结各种民众伊斯兰组织以及反对美国的政府和政治派别，化解美国对苏丹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并同沙特阿拉伯所推动的泛伊斯兰相抗衡。图拉比认为，伊斯兰复兴既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向沙特阿拉伯看齐，而是要把文化的多样性与现代性结合起来。^② 他反对沙特阿拉伯推行的泛伊斯兰主义。他说：“沙特阿拉伯王室成员以保卫麦加为资本，以伊斯兰教国家自居。而沙特阿拉伯人民……明白，王室是反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曾说过应当由信徒来选择他的继承人。沙特阿拉伯人民发现，他们的国家存在利息制度的银行，这是与伊斯兰教决不相容的。他们看到，他们的石油换来的钱流向美国和英国，而根据伊斯兰教，这些财富应当属于人民。”^③ 总之，在图拉比的积极努力下，非官方的伊斯兰政治组织（派别）之间的国际合作机制似已初具形态。然而，对于国力孱弱、内战连绵的苏丹来说，要想把派系复杂、各自为政的

① 法国《星期四事件》周刊，1993年11月25日～12月1日。

② 《参考消息》，1993年5月19日。

③ 同注①。

民众伊斯兰组织联合起来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由于苏丹或多或少卷入了跨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也由于参加阿拉伯—伊斯兰大会的组织和个人并不代表各国伊斯兰运动的主流，有些甚至根本就是恐怖主义者，因此，苏丹的举动更多地是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怀疑。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国际关系

1979年以来，伊朗因其激进的伊斯兰革命和对其他国家伊斯兰革命的煽动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猜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更以伊朗支持国际恐怖活动，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由，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和军事遏制，因此，伊朗在相当程度上被排斥在重要的国际和地区事务之外。然而伊朗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首先，伊朗伊斯兰革命本身及其发展前途就有着广泛的国际效应。当年，伊朗革命曾广泛刺激了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复兴；今天，伊朗政治的发展前景也会对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更不用说伊朗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哈马斯”等伊斯兰组织，实际上深深卷入了一些地区事务。第二，“伊朗因素”还直接影响着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执行一项对伊朗全面遏制的战略，并试图迫使国际社会服从美国的意愿，而俄罗斯、欧盟等出于自身利益，一直执行一种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政策。

冷战结束以来，伊朗的内外政策渐趋务实，伊朗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尤其是伊朗在中亚的活动，更可能引发地缘政治的广泛变动。苏联解体后，中亚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真空，利用历史、宗教、种族和地缘上的优势，伊朗深深卷入了中亚事务。一方面，它通过支持当地的伊斯兰政党，直接影响中亚的政治发展，另一方面，它还通过宗教与文化渗透，鼓动伊斯兰的复兴，伊朗资助中亚穆斯林国家兴建清真寺，赠送《古兰经》，派数百名毛拉宣教；建立卫星系统，使用18种语言向该地区播送伊朗

广播电视节目；^①应邀到这些国家参加当地的文化艺术活动。也许，更能展示伊朗地区雄心的是它在中亚的经济活动，其方式主要是构筑区域经济组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目前主要存在两个区域组织，一是经济合作组织（ECO），二是里海国家集团。其中，经合组织影响较大。该组织原建于1965年，伊朗与土耳其、巴基斯坦为创始成员国。1992年在三方的共同推动下，它恢复活动，并且逐步吸收中亚五国、阿富汗、阿塞拜疆参加，从而扩大成为一个拥有2.5~3亿穆斯林、700万平方公里、10个成员国的中西亚区域经济组织。伊朗特别强调该组织的伊斯兰特性。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在经合组织第一次首脑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合作精神基于我们的宗教和《古兰经》”。伊朗希望该组织发展成为一个西起欧洲边缘、东到南亚次大陆、北及中亚和高加索的伊斯兰共同市场。^②伊朗是经合组织的中坚力量。在经合组织的第三次首脑会议上（1995年3月），伊朗在会议通过的大多数决议上均签了字。这些决议涉及成立经合组织科学发展基金、贸易发展银行、文化交流学院、海运公司、再保险公司、航空公司，以及过境运输、简化成员国商人出入境签证手续等。其中伊朗是贸发银行3个签字国之一，该银行注册资本为10亿美元。在1996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首脑会议上，伊朗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签署关于建设国际铁路的合作备忘录。因此，经合组织在交通、财政等领域为地区经济一体化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伊朗还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以及俄罗斯构筑了里海国家集团，以开发、利用、保护里海资源，拓展与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运输和贸易，并打消哈萨克与土耳其合建石油管

① Hanan Yousif Freij, *State Interests vs. the Umma: Iranian Policy in Central Asia*, *Middle East Journal*, Win. 1996, P. 81.

② 《人民日报》，1992年12月10日，《工商时报》，1992年12月9日。

道的计划。

伊朗筹建地区经济组织的战略意图是明显的：一是摆脱国际孤立地位，二是填补“真空”，与美国支持的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争夺在上述地区的战略影响，施展地区大国的政治作用。长久以来，伊朗就被排除在海湾及阿拉伯地区安全结构之外，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的独立，为伊朗摆脱困境、发挥地区大国作用提供了绝好的活动空间。何况，伊朗也不缺乏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的天然条件。伊朗与阿塞拜疆、阿富汗、土库曼斯坦等国享有共同边界。通过里海，伊朗还分别与阿塞拜疆以及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贯通。伊朗在这些地区也有文化和宗教上的优势，阿塞拜疆大多数人属伊斯兰什叶派，伊朗境内还居住着约1000万阿塞拜疆人。^①另外，塔吉克则与伊朗在文化、宗教、语言和人种等各方面联系密切。这些优势是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所不具备的。当然，与后者相比，伊朗也存在不足，它在财力、宗教条件上不及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在政治模式上不及土耳其那样具有吸引力。伊朗的经济目标是借助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经济联系，拓展伊朗的外部市场，并且对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以及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资源进行控制，以提高自身在该地区石油市场上的垄断能力。伊朗在中亚的活动无疑有助于改善伊朗的经济、政治和安全环境，甚至还远不止此。在当代国际格局中，中亚可说是最后一块资源丰富的飞地，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内的各种国际势力无不把控制或获得中亚的资源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由于伊朗不仅沟通里海和波斯湾、连接中亚与中东，而且事实上成为从陆地进入中亚的最佳通道。伊朗在地缘上的优势已使它炙手可热，不仅欧洲诸国不理睬美国

^① Haran Yousif Freij, *State Interests vs. the Umma: Iranian Policy in Central Asia*, *Middle East Journal*, Win. 1996. P. 72.

的警告，争相加强与伊朗的关系，甚至连美国也表达了改善与伊朗关系的难以克制的愿望。由此看来，伊朗天生就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角色。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伊朗内外政策进一步趋于务实，伊朗必将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3. 沙特阿拉伯与泛伊斯兰运动

沙特阿拉伯及其所支持的泛伊斯兰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尤其在涉及穆斯林的国际事务中，是一支重要的制衡力量。这种制衡作用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第一，在穆斯林与外界的地区冲突中，它积极充任前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代言人，并且给予穆斯林以极大的物质和政治外交支持。冷战结束后，国际上许多热点问题，如波黑内战、纳—卡冲突、车臣危机、克什米尔问题等，冲突的一方均涉及穆斯林。这里面问题复杂，像车臣问题，涉及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关系；克什米尔争端则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领土纷争相关；纳—卡冲突却从民族争执演化为国家间冲突；波黑内战实质上是各方在争夺土地与政治权力。在这些问题面前，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许多穆斯林国家，基本上众口一词，支持穆斯林一方，谴责其对立面，成为各种冲突中穆斯林方面强大的政治后盾。由于这种现象在波黑问题上表现最为突出，这里就以此为例说明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国际组织所起的作用。波黑境内的穆斯林族，原系塞尔维亚人，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改信伊斯兰教，铁托执政时期被单独列作“穆斯林族”。在波黑三大民族中，穆族人数最多，约占总人口的43.7%，而塞族、克族分别占31.4%和17.3%。然而，穆族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及克族和塞族，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穆族在冲突中位居劣势。到波黑内战的第一年年末（1992年底），穆、克、塞族三方所占地盘分别为10%、20%和70%，沙特阿拉伯以及受其影响

的伊斯兰会议组织责无旁贷支持穆族。波黑穆族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多次参加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外长会议和小型首脑会议，借助这个国际讲坛，阐明立场，呼吁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伊斯兰会议组织本身也常常发表声明，谴责塞族对于穆斯林的“侵略行径”，^① 要求维护穆族的“自由、主权和政治独立”。伊斯兰会议组织对于穆斯林的物质支持虽然没有直接材料佐证，但它发表的多项决议，可以间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在内战爆发初期，该组织即要求其下属机构——伊斯兰发展银行向穆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② 该组织第21次外长会议（1993年4月），决定提供9000万美元援助穆族；^③ 第7届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1994年12月），决定“加强联合国驻波黑的伊斯兰军事人员的数目”，并且向穆族提供重武器。^④ 类似的要求向穆族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决议不胜枚举。尽管不能一一兑现，例如联合国反对增加伊斯兰军事人员的数目，以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渗透，但一定的经援和军援还是能够通过各种途径筹集并到达穆族手中。就沙特阿拉伯而言，它所提供的经援有一定的确证。从内战爆发到1993年4月，它向穆族提供的援助达6500万美元；^⑤ 到1996年2月，它所提供的物资总计为6.7万吨。^⑥ 除上述物质援助外，沙特阿拉伯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对于穆族的政治外交支持更不容低估。它们要求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介入波黑冲突，向塞族施加压力，改变塞强穆弱态势。1992年年底，伊斯兰会议组织约40个成员国外交部长聚会吉达，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必要

① 《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9日。

② 新华社伊斯兰布尔1992年6月18日电。

③ 法新社卡拉奇1993年4月29日英文电。

④ 前引《人民日报》。

⑤ 新华社开罗1993年4月12日电。

⑥ 新华社科威特1996年2月4日电。

措施，包括使用武力，以保护穆族免受塞族袭击。^①该组织第21次外长会议（1993年4月）除重申上述立场外，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措施，“包括对塞族使用武力”，“禁止对塞族的所有武器供应”，对援助塞族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实施彻底完全的经济封锁，冻结它们的国外资产”，并认为它们应该“按国际法以破坏波斯尼亚罪受到法律制裁”。^②措辞如此强硬的决议，不仅针对塞族，而且涉及塞族的外援与后盾——塞尔维亚和黑山。为使上述决议产生实效，沙特阿拉伯向西欧和美国施加了政治压力。有材料表明，沙特曾要求美国支持波黑穆斯林的政治独立，以换取沙特在中东和平进程上给予美国的配合。^③如果考虑一下沙特对于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力，以及它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所发挥的“轴心作用”，它向西方所施加的政治外交压力是会产生一定影响的，至少美国不得不认真对待，以平息它在中东事务中所倚重的穆斯林温和力量对于它在波黑和伊拉克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所产生的不满，而这种温和力量，包括沙特在内，是它在安排中东和世界其他热点事务上不可或缺的因素。波黑问题走到目前的和平局面，最终还是依靠西方，尤其是美国得以解决的。这其中，显然有沙特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相当的努力。上述例证说明，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伊斯兰温和力量，凭借自身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够在一定

① 法新社卡拉奇 1993 年 4 月 26 日英文电。

② Francine Friedman, *the Bosnian Muslims: Denial of a Nation*, Westview Press Incorporation, Colorado, 1996, P.217.

另见：黎巴嫩《事件》周刊，1993年2月12日文：《沙特在世界新秩序中的作用》。

③ Francine Friedman, *the Bosnian Muslims: Denial of a Nation*, Westview Press Incorporation, Colorado, 1996, P.217.

另见：黎巴嫩《事件》周刊，1993年2月12日文：《沙特在世界新秩序中的作用》。

程度上影响西方，使一些问题的解决朝有利于穆斯林的方向发展。

第二，在伊斯兰世界中，以沙特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势力是制约伊斯兰激进势力，维护地区和国际秩序稳定和安全、与西方合作的重要力量。沙特阿拉伯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对于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和平进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积极的支持。伊斯兰会议组织对于中东和平的正式立场是：“支持巴解组织为消除以色列占领的影响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家机构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只有通过以色列完全和无条件地撤离自 1967 年以来占领的全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市、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才能在中东地区实现公正和全面的和平”。^① 显而易见，这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沙特与巴解组织的关系也在逐渐修复。1994 年初，沙特国王法赫德会见阿拉法特，并承诺向承建巴勒斯坦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国际基金提供 1 亿美元。沙特还积极向新独立的中亚穆斯林国家渗透，以影响这些国家的未来政治走向，减少激进伊斯兰的影响。它不仅为中亚国家的朝觐者免费提供食宿，而且赠送数百万册《古兰经》，帮助中亚国家兴建大批的经学院和清真寺。沙特财力雄厚，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大量急需的贷款和赠款。据悉，到 1994 年前后，沙特向这个地区的投资达 40 亿美元，贷款约 100 亿美元。沙特还通过开办合资公司的途径向这个地区投入资金，例如建立巴腊克—哈萨克斯坦银行。沙特重大的政治举措，就是向中亚国家敞开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大门，吸收它们为成员国。从 1991～1995 年，陆续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国家有：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由于中亚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成

^① 路透社卡萨布兰卡 1994 年 12 月 15 日英文电。

员国已经从 1991 年的 45 个增加到 1996 年的 53 个。因此，沙特的努力，不仅在民众层面，而且主要在政府层面得到一定的回应，可以说伊斯兰温和势力在中亚地区，尤其是国家层面得到了强化。以沙特为首的伊斯兰温和国家，对于激进势力也展开正面回击。伊斯兰会议组织第七届首脑会议，一致通过《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准则》。阿尔及利亚、埃及、阿曼、突尼斯等国是该决议的主要发起国。埃及的意图就是借助该组织反对伊斯兰激进势力。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说，他希望伊斯兰会议组织找到“加强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办法”，还对穆斯林过激行动给人们造成的“虚假伊斯兰形象”深感遗憾。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此决议的通过表示欢迎，他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步骤。伊斯兰国家终于看清了它们的原教旨主义暴力行动的危险”。^① 该《准则》认为：“任何情况下的恐怖主义都是不正当的”。《准则》要求各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筹划或参与资助、煽动或支持恐怖主义的行动”。《准则》还要求加强成员国在交流有关暴力组织情况方面的合作。^② 伊朗、苏丹也是成员国，对《准则》没有反对。伊斯兰会议组织决议，对于其成员国虽然没有约束性，但是该《准则》至少说明，大多数成员国在反对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立场上是一致的，愿望是共同的，政治意义是明显的。这标志着穆斯林世界反对伊斯兰激进势力联合阵线的初步形成。联合的出发点，是维护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现存秩序及其稳定与安全，是维护大多数成员国政权的稳定和巩固，正如《准则》本身所指出的，必须通过“强化我们宗教的真实形象、揭露恐怖组织的阴谋”，以及“揭露它们对成员国的

① 路透社卡萨布兰卡，1994 年 12 月 13 日英文电。

② 同注①。

稳定和安全的危险性，”同恐怖主义作斗争。^①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后，沙特阿拉伯在维护穆斯林世界团结与合作方面作出较大努力，也取得一定成效。沙特及其所支持的泛伊斯兰国际组织，在穆斯林世界和国际政治中发挥了一定作用。那么，沙特阿拉伯的主要目的何在呢？

第一，宗教因素。伊斯兰教认为，凡穆斯林皆兄弟，穆斯林不分地区、民族、国家同属一个共同体——“乌玛”。这种信念使穆斯林之间有某种亲合力和认同感。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以伊斯兰教两大圣地的“保卫者”自居。这导致它在促进世界穆斯林的合作与团结、维护穆斯林利益方面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雄厚的经济基础为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切实保障。如果沙特阿拉伯不这样做，难保不会受到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指责。事实上一些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的穆斯林国家就认为，沙特阿拉伯在促进兄弟的穆斯林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还做得不够。

其次，维护政权合法性地位的需要。自海湾战争开始，大批西方军队进驻沙特，西方文化对沙特带来了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海湾战争表明沙特依靠自身和海湾的集体安全是难以自保的。这些因素动摇了沙特政权的合法地位，国内外激进势力认为沙特奉行的伊斯兰政策是虚伪的，政权则是腐败的。对沙特政权更重要的挑战来自伊朗、苏丹以及中东地区激进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势力。在此背景下，沙特除与西方合作继续构筑集体安全外，仍需要通过泛伊斯兰主义这面大旗，加强在世界穆斯林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赢得世界穆斯林对于沙特的支持。沙特综合运用伊斯兰与经济这两大优势，日积月累地谋求与穆斯林国家的友谊与信任，最终则是为巩固自身政权而服务。这是沙特以往经验所证实的。例如，海湾战争后，当沙特国王法赫德在回答记者关

^① 路透社卡萨布兰卡，1994年12月13日英文电。

于沙特如何在战争期间动员阿拉伯和伊斯兰力量对抗伊拉克时，国王谈到：“事实上，真是好运气，我国同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有着深厚的友谊”，这样当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我立即呼吁所有兄弟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友好国家帮助我们沙特武装部队履行它捍卫祖国及其一切神圣东西的义务。这些国家令人感激地作出了响应，提供了它们的援助”。^①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沙特在泛伊斯兰主义事业中有所作为时，维护沙特政权就如维护伊斯兰圣地一样，成为许多穆斯林国家和人民的义务与责任。

第三，与地区激进势力展开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沙特阿拉伯所面临的地区激进势力，主要是 50~60 年代的埃及，以及 70 年代末以来的伊朗。沙特阿拉伯之所以高举泛伊斯兰主义大旗，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同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抗衡。在泛阿拉伯主义盛行的 50~60 年代，沙特阿拉伯被指责为“腐败”政权、西方霸权主义的驯服工具，是革命的对象。纳赛尔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沙特阿拉伯被迫应战，当时的国王费萨尔说：“阿拉伯人在世界历史上之所以产生重大作用，是由于他们向世界奉献了伊斯兰信仰及其文化。”^②费萨尔推动建立伊斯兰世界联盟，就是出于这种目的。只是到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由于纳赛尔倡导的泛阿拉伯主义的惨败，才使沙特阿拉伯的泛伊斯兰主义获得发展机会。70~80 年代，沙特面临的激进势力则是伊朗。双方的竞争不仅局限于海湾地区，而且包括中东和其他地区。冷战结束后，中亚穆斯林国家又成为双方施展政治影响的新的角斗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亚地区是中东地区

^① 黎巴嫩《事件》周刊，1991 年 6 月 21 日。

^② Khalid Bin Sayeed, *Western Dominance and Political Islam, Challenge and Response*, N.Y., 1995, P.80.

的自然延伸，沙特阿拉伯力图以温和的伊斯兰模式影响中亚国家的未来政治走向，使之像沙特、埃及一样，成为维护地区现存秩序的政治力量。

二、伊斯兰与地区政治

1. 伊斯兰运动与中东和平进程

激进型伊斯兰运动直接打击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是和平进程向前推进的障碍性因素。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和第 338 号决议是和平进程的思想基础。其核心是：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以色列退出其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黎巴嫩南部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换取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和平。而伊斯兰运动的一般立场则是：阿以冲突是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通过圣战把以色列赶出所有阿拉伯被占领土，恢复耶路撒冷作为伊斯兰教第三圣地的纯洁性；在以色列及被占领土建立伊斯兰国家。拉夫桑贾尼 1994 年 8 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犹太人政府是非法的，“巴勒斯坦人必须返回家园，如果有剩下来的地方，犹太人可以留下来”。^①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要求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立场的根本对立，导致和平进程的每一步，都伴随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挑战与破坏。^②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是打击和平进程的主要力量。两者均属政治军事组织。真主党受伊朗和叙利亚的操纵，目前已发展至近万人，拥有大约 3000~7000 名永久性战士，是黎巴嫩第四大民兵武装，十几年来一直以“圣

^① 前引新华社德黑兰 1994 年 9 月 15 日电。

^② 法新社巴黎 1996 年 3 月 12 日英文电，另见新华社贝鲁特 1996 年 11 月 30 日电。

战”方式反抗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侵占。中东和平进程启动后，双方曾达成暂停袭击平民目标的口头协议。但是只要形势需要，叙利亚或者伊朗就可以利用真主党武装活动作为向以色列或者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真主党对以色列的暴力袭击从未中断过，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相互报复行为成了家常便饭。从1993年8月到1996年3月30日，以军轰炸黎平民区达231次，真主党则10次用“喀秋莎”火箭袭击以色列。1996年4月11日，以借口真主党此前的袭击，对贝鲁特进行14年来的首次空袭，造成200人死、400人伤的惨剧。哈马斯成员约有3万，据估计，其成员及支持者在巴勒斯坦人中约占15~35%。^①自1994年5月加沙—杰里科实施自治以来，以色列境内发生多起汽车炸弹事件。1996年2~3月间以色列曾发生4起此类事件，其中3起系哈马斯所为，致使61人丧生。这些事件加深了以色列国内的不安全感，许多人对于坚持“以土地换和平”的工党政府以及阿拉伯人的不信任感也日趋升温，以色列右翼势力也因此抬头。可以说，这些事件是导致以色列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的一个直接因素。据报道，当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在1996年2月7日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时，他的支持率要高于利库德集团领袖内塔尼亚胡21个百分点。可是，在2月25日哈马斯制造的炸弹事件之后，新的民意测验表明，内塔尼亚胡已经与佩雷斯平起平坐。^②另据报道，在1996年3月3日耶路撒冷爆炸事件之后，以色列右翼极端分子在街头焚烧巴勒斯坦国旗，并高喊反对和平进程的口号。他们威胁要杀死巴勒斯坦人，并要求佩雷斯辞职。^③从总体上看，哈马斯和真主党均被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它们整

① 参见吴毅宏：《哈马斯简介》，《世界知识》，1996年第8期。

② 参见英中：《故会重演》，《天津日报》，1996年3月4日。

③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罗1996年3月4日电。

体实力无法与以色列相比。但是它们长期从事的游击战、消耗战，对以色列的国内安全构成隐患，由此又招致以色列的血腥报复，所有这些行动及其后果，无疑加重了阿拉伯人民与以色列人民之间的心理障碍，中东和平进程举步维艰也就毫不奇怪了。

2. 伊斯兰运动与中东政治格局

伊斯兰运动，尤其是以伊朗为代表的激进势力通过破坏美国“西促和谈”与“东遏两伊”的战略，对由美国“一极控制”的中东政治格局构成挑战。长期以来，伊朗从不隐瞒其对中东和平的敌视，它不仅把以色列视为中东地区的主要敌手，它还通过其所控制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直接影响中东和平进程。另一方面，伊朗利用各种机会，对美国的“遏制”政策予以反击。土耳其是美国的军事盟国，是美国在中东的一根战略支柱。土耳其繁荣党上台后，对美关系出现变数。伊朗抓住时机，利用土耳其总理埃尔巴坎访伊期间（1996年8月10~12日），促使土伊签订3个经济协议，其中包括价值200亿美元、为期23年的天然气协议。这份协议规定，土伊先建造一条长达142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于1999年开始，伊朗每年向上土耳其提供7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到2010年，将每年增加到100亿立方米。该协议于1999年正式生效后，伊朗将获得高达10亿美元的年收入。土伊天然气协定，使美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若根据“达马托法”制裁土耳其则很可能触犯土耳其新政府，若放弃制裁则使达马托法成了一纸空文。伊朗还借发展与西欧国家关系使美国在制裁伊朗问题上再次陷入被动。冷战结束前后，面对美国日益升级的制裁，伊朗有意松动与西欧国家在拉什迪问题上所导致的紧张关系，并且积极发展与西方的经贸合作。目前，欧洲国家所需石油的大约20%源自伊朗和利比亚；^①此外，法国、意大利、德国均在伊朗石油部

^① 法新社巴库1996年8月5日法文电。

门有一定投资。美国“达马托法”出台后，立即遭到欧洲国家的一致反对，它们认为美国“在为世界立法”。欧洲国家反对美国制裁伊朗，建议同伊朗“进行建设性对话”。欧美在上述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是欧洲国家为发展对伊经济关系、维护自身在伊朗的既得利益，与美国发生的冲突。其实，正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才使得欧洲国家大步进入伊朗市场，谋取经济利益。伊朗还重视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增强自身实力。伊朗目前已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据报道，“1994年俄罗斯向伊朗出口武器总值为1.04亿美元，到1995年底，伊朗承诺在两年内购买价值10亿美元的俄罗斯机械和武器”。^①另外，俄罗斯还帮助伊朗修建核电站。1995年双方签署协议，俄罗斯将帮助伊朗建造价值8亿美元的布什尔核电站。核电站的建设，将间接促进伊朗核武器工业的发展，这对伊朗来说，是增强军备的有利时机，是对美国防止其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意图的成功打击。以上事实证明，在伊朗的积极努力下，美国的遏制战略处处碰壁，难以奏效；同时，西方其他国家则借机在伊朗立足、谋取实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与美国争夺中东的势头。

此外，伊斯兰运动的发展，也是造成中东及周边地区长期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它们反西方、反世俗的政治目标，与现存地区秩序是格格不入的。一旦某个派别在某国夺取政权，将会引起周边国家伊斯兰政治组织的连锁反应，同时还会造成本国对外政策倾向的根本变化，进而影响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甚至可能改变整个地区的地缘战略形势。

3. 伊斯兰与地区冲突

冷战的结束，激化了一些沉寂多年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伊斯兰在一些地区冲突中成为重要的因素。例如，车臣问题，涉及信

^① 英国《情报文摘》，1996年12月6日。

奉伊斯兰教的车臣族民族分离主义；纳—卡冲突，也是从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谋求脱离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之问题发展而来的；波黑内战，则源自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与穆斯林族关于波黑未来政治前途的分歧与争执，等等。当然，穆斯林一方在冲突中的地位不尽相同，譬如在印度与巴基斯坦有关克什米尔的冲突中，穆斯林扮演要求民族自决、脱离印度的角色，而在纳—卡冲突中，则成为亚美尼亚人要求摆脱的对象。尽管如此，在多数情况下，穆斯林在实力对比中居于劣势，处于被动局面。那么伊斯兰究竟在诸如此类的冲突中发挥什么作用？有无共同特征呢？这里试图从波黑冲突的个案分析中回答此类问题。首先，伊斯兰教及文化成为穆斯林族政党动员穆族群众、加强政治地位的砝码。穆族，在民族起源上，它与塞族、克族一样同属斯拉夫人，在公元7世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地区越过喀尔巴阡山来到巴尔干南部，^①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皈依伊斯兰教。历史上穆族的民族意识比较淡薄，一些人自视为塞族或克族，大多数人则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近代。^② 穆族作为民族正式得到承认是在铁托执政的南斯拉夫时期，1974年南宪法规定，波黑境内的伊斯兰教徒列为“穆斯林族”。在南斯拉夫解体前夕的政治民主化浪潮中，波黑境内出现以民族为基础的三大政党，即分别代表塞族、克族、穆族的塞尔维亚民主党（SDS）、克罗地亚民主社会党（HDZ）以及穆斯林民主行动党（SDA）。各党都极力拉拢本民族选民以争取议会席位。穆斯林民主行动党也不例外，在1990年的议会选举中，它特别强调该党以及穆斯林选民

① 参见余建华、季惠群：《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与波黑战争刍议》，《欧亚观察》，第215页，1995年第6期。

② Dr. BozoRepe, Bosnia - the First Muslim State in Europe, *Journal of the Pakistan Historical Society*, No.10, 1994, P.404.

的伊斯兰文化色彩。该党自封为“受伊斯兰影响的、拥护中央集权的政党，而且对穆斯林的宗教、政治以及文化权利高度重视”。^① 不仅如此，该党在指导穆斯林回答人口调查问题时，提醒穆族群众：其民族身份是穆斯林，其母语是波斯尼亚语，所信奉宗教为伊斯兰教。^② 该党最后在议会中所得到的席位，与穆族在波黑人口中所占比例基本相称。它在议会 240 个席位中获 86 席，约占 35.8%，位居第一；^③ 而在 1989 年人口统计中，波黑穆族所占比例为 43.7%，也在波黑各族人口中位列榜首。^④ 穆族政党对宗教信仰的强调有助于确立穆族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意识，但也人为地强化了穆族与其他民族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对立。与此同时，克塞两族，尤其是塞族，更在穆族的宗教文化上大作文章，夸大穆族及其在政治问题上的宗教倾向，以加强本民族的团结，并掩饰自身真正的政治目的。塞族的手段之一，就是极力宣传它与穆族的对抗是在保卫欧洲免遭伊斯兰的进攻，就像 17 世纪初抵御奥斯曼突厥人进攻一样。^⑤ 塞族的另一手段，就是指控穆族政治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是“信奉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并要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波黑的政治蓝图。^⑥ 实际情况并非

① Friedman, Francine. *the Bosnian Muslims: Denial of a Nation*, Colorado, 1996, P.212.

② Friedman, Francine. *the Bosnian Muslims: Denial of a Nation*, Colorado, 1996, P.213.

③ Friedman, Francine. *the Bosnian Muslims: Denial of a Nation*, Colorado, 1996, P.225.

④ Dr. BozoRepe, Bosnia - the First Muslim State in Europe, *Journal of the Pakistan Historical Society*, No.10, 1994, P.413.

⑤ Dr. BozoRepe, Bosnia - the First Muslim State in Europe, *Journal of the Pakistan Historical Society*, No.10, 1994, P.413.

⑥ 参见余建华、季惠群：《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与波黑战争刍议》，《欧亚观察》，第 215 页，1995 年第 6 期。

如此。历史表明，穆族原系斯拉夫民族，虽然伊斯兰教及文化是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他们的宗教意识并不强烈，尤其是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前南斯拉夫文化教育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波黑穆族更是如此。一位青年穆族士兵讲：“（以前）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穆斯林。我不知道如何礼拜，也从不去清真寺。我是一名欧洲人，我不希望阿拉伯世界帮助我们，而希望欧洲的援助”。^①穆族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对于波黑的未来政治构想是：以地区而不是纯民族基础，以及多元文化的相容性构建新波黑。他认可波黑的多民族特征，并不要求建立伊斯兰激进主义政体，或者一个伊斯兰国家。^②波黑许多穆族群众也希望波黑保持统一的、多民族的世俗政治特征。一位穆族群众说：“伊斯兰作为宗教代表的是我们的过去，并不代表未来。从民族身份上讲我认可自己是穆斯林，我与塞族或克族均不相同，但是我的（伊斯兰）社会和文化色彩是以多民族为特征的波黑大家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从波黑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中汲取文化营养，培养感情（和思想）。我与其他非穆族人民一样，共同属于波黑。”^③那么塞族攻击穆族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显而易见，是害怕波黑独立削弱塞族的民族地位，使它在新的国家中变成一个少数民族。塞族一贯坚持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反对波黑独立、要求波黑塞族自治、进而与前南其它塞族地区统一。塞族政治领导人的目的，就是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前南历史重大转折时期谋取更大的政治权力。所谓穆族的“东方色彩”以

① Friedman, Francine, *the Bosnian Muslims: Denial of a Nation*, Colorado, 1996, P.213.

② Friedman, Francine, *the Bosnian Muslims: Denial of a Nation*, Colorado, 1996, P.225.

③ Friedman, Francine, *the Bosnian Muslims: Denial of a Nation*, Colorado, 1996, P.222.

及“原教旨主义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掩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这在冷战后伊斯兰激进主义发展相对高涨的时期，无疑具有极大的煽动性。这样，在对立双方的相互煽动下，穆族的伊斯兰特征得以强化，并游离出其民族机体，而后又被夸大，成为导致民族、政治对立乃至种族仇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民族对立及冲突的发展，反过来也进一步增强了穆族的伊斯兰及其文化特征，以及他们与世界穆斯林的认同感。正如前述那位穆族青年战士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不得不认为自己是穆斯林，……是（穆斯林）民族的一个成员。如今，我们面临的是，我不得不去理解我和穆斯林人民的属性，我们（为什么）是别人希望清除的对象。”^①

^① Friedman, Francine, *the Bosnian Muslims: Denial of a Nation*, Colorado, 1996, P.225.

第六章 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变革

第一节 冷战的终结与穆斯林世界

冷战是一种全球结构和世界体系，在这种由美国和苏联、西方和东方相互对峙、相互排斥的两极格局中，每一个国家都有着相对稳定的位置，他们或从属于西方、或从属于东方、或游离于两者之间左右逢源，换言之，每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比较容易确定和把握的——一般说来，许多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不是自选的，而是冷战结构所赋予的。因此，冷战终结的直接后果就是力量的失衡与角色的重新确定。对于穆斯林国家来说，这一过程远不如想象中那样充满希望。

一、中亚的重新发现：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大约从19世纪中叶起，中亚地区逐步成为沙皇俄国的领地，十月革命以后又成为苏联的一部分，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在世界的政治地图中是找不到中亚的。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摆脱苏联的羁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于是，国际社会突然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完全陌生的地区，而穆斯林世界则平添了5个兄弟：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对于中亚的穆斯林国家来说，脱离苏联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实在是太过突然，就像在历史上多次处于民族迁徙、文化冲击和大规模战争的漩涡中心一样，中亚又一次面临不知从何而来、又要到何处去的尴尬的历史困境。西方的政客和评论家一厢情愿地认为，摆脱了俄国人长时期专制统治的中亚各国，一定会义无反顾的投向西方式的自由与民主的怀抱，也只有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自由化才是中亚国家实现稳定与发展的惟一正确的道路。然而，对于长期处于苏联的统治之下，严格实行计划经济的中亚各国来说，政治民主、多元化和资本主义却是一堆没有任何意义的陌生概念。^① 在宗教、文化、种族等方面，中亚与中东有着更多的历史联系，事实上，中东的一些重要的大国，诸如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从一开始就力图利用这种历史的渊源帮助中亚国家找回失落已久的自我，引导中亚国家走向未来的坦途。虽然从伊斯兰教中寻找复兴的动力、通过强调与土耳其的种族和文化联系寻找民族之根在中亚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然而它的发展前景并不光明。首先，俄国人在中亚 100 多年的统治已经使传统和现实之间出现了难以超越的鸿沟。早在 19 世纪中叶，俄国人就在中亚地区有计划地推动工业化和世俗化进程，十月革命以后，这一进程大大加快了。从 20 年代开始，一场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运动全面展开。在农村，国家通过土地改革对土地、财产、宗教公产和水源实行了再分配，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村中地主和宗教上层的社会特权。20 年代末，农村又开始了集体化浪潮，传统的封建和部落结构被彻底打破，国家从生产、管理和销售等各个领域实现了对农村的控制；到 1937 年，95% 的地区完成了集体化过程。在文化领域，各项改革也在同时进

^① Mir Zohar Husain, *Global Islamic Politics*,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USA, 1995, P.251.

行，早在1926年就用拉丁字母取代了阿拉伯字母，到1939年，又用西里尔字母取代拉丁字母，其目的就是要从文化上切断中亚与阿拉伯（伊斯兰）和土耳其的联系。1924年，苏联把中亚地区划分为不同的共和国，这为更深刻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国家在教育、法律等领域对伊斯兰教的严格排斥，传统的伊斯兰教及其社会作用都遭受极大的打击，到20年代末，伊斯兰教法法庭和穆斯林学校已完全销声匿迹。^①对于中亚国家来说，即使没有俄国人100年的统治和苏联所进行的彻底的社会革命，要把伊斯兰或突厥当作它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之根也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奥斯曼的文明之光从来也不曾对中亚产生持久的影响，而伊斯兰对于中亚多少也只是--种外来的宗教，这不仅是它远离伊斯兰的中心，皈依伊斯兰已是十分晚近的事情（个别大城市除外），更重要的是，中亚的伊斯兰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与当地的社会习惯和原始信仰有密切联系的托钵僧比乌勒玛更有影响。^②另一方面，当代伊斯兰国家的发展现实也很难使中亚国家产生投向伊斯兰的冲动。作为一种反对派，伊斯兰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无论是伊朗还是沙特）它远不能解决中亚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从地缘政治来说，苏联虽然解体，但俄国在中亚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它决不会坐视伊斯兰或土耳其势力在中亚不受限制地发展。

对于当前的中亚穆斯林国家来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如故，在努力为新生的国家寻找可行的发展道路同时，他们会经常面临“我是谁”和“往哪里去”这样的问题。

① Ira M.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PP. 784~794.

② Igor Lipovsky, *the Awakening of Central Asian Islam*,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2, No. 3, July 1996. Britain.

二、海湾战争：寻找新的座标

在 40 余年的冷战期间，从北非、西亚经阿富汗到南亚这一以穆斯林为主要居民的长弧地带，是欧洲之外东西方争夺的重要地区，为了攫取重要的战略资源，为了控制生死攸关的海上与陆地通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因此，在每一次战争或政局的变动中，几乎都可以发现东西方竞争和冲突的影子。在这种激烈的对抗中，每个国家的角色是比较容易确定的，其活动空间也有一定的限制。

冷战结束以后，苏联的力量迅速从中东撤退，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则弹冠相庆，忙于筹划如何分割和平的红利。于是，在外部压力突然消失的情况下，地区内部的力量制衡也失去了支撑，前所未有的力量真空为地区内部各种势力的重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 地区大国角色的重新确定

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包括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埃及和以色列等国。这些地区大国或拥有重要的战略资源、或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或传统上就在地区事务中举足轻重，在整个冷战时期，它们既是地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角色，也是超级大国争取的主要目标，它们之间可能因地区内部事务的分歧而充满矛盾，但在冷战的格局中，这并不影响它们同处一个阵营，他们之间的一些矛盾不会因同处一个阵营而消失，他们之间的冲突也不会因分属不同的阵营而失去控制，这是冷战时期中东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之一。冷战时期中东形势的另一特色是，每一个地区大国都试图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寻找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因此相互间的争斗与冲突经常发生。冷战结束，超级大国对地区力量的制衡、对危机的控制与管理能力大大下降，每一个地区大国都力图在这种政治力量的变更中占据最有利

的地位。

埃及——埃及是中东的重要国家，也是近代以来中东地区大部分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它是苏联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战略盟友。只是到萨达特担任总统时期，埃及才转而投入西方和美国的怀抱。然而，埃及与以色列的单独媾和却激怒了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从1978年戴维营协议和1979年埃以华盛顿和约签署以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海湾战争的爆发为埃及恢复其中东地区重要地位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到目前，埃及已成为美国冷战后中东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在所有的地区事务中，诸如中东和平进程、中东安全结构、中东地区的经济合作等方面，埃及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伊拉克——冷战期间，伊拉克主要是苏联的战略盟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拉克在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地位迅速提高；美国为遏制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不仅改善了同伊拉克的关系，实际上还积极支持伊拉克对伊朗的战争；海湾的国王们更是捐弃前嫌，把伊拉克当作抵御伊朗的英雄，在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向伊拉克提供了巨额的经济援助。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冷战终结在中东地区形成的政治真空使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看到历史提供的机遇，那就是通过控制海湾的石油，建立伊拉克在中东事务，乃至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前，巴列维的伊朗一直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盟友：一方面，伊朗是西方在海湾地区的警察，另一方面，伊朗是阻止苏联南下的天然屏障。霍梅尼时期的伊朗虽以其激进的伊斯兰革命对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但实际上伊朗已被排除在所有重大的地区和国际事务之外。然而，苏联的瓦解使伊朗发现了巨大的机会，它力图利用伊朗与中亚在地理、历史、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联系，利用中亚

国家独立以后在政治上的迷茫和经济上的困难，逐步在中亚确立伊朗的影响，形成一个以伊朗为核心的非阿拉伯穆斯林联盟，这样，既可以摆脱西方对伊朗的孤立，拓展伊朗的国际活动空间，又可增加伊朗在地区事务和国际社会的影响，这也许是伊朗积极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关系、推动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合作、更深地卷入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国内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叙利亚——冷战时期，叙利亚是苏联的可靠盟友，由于它与伊朗的亲密关系，由于它与以色列的激烈对峙，由于它对一些激进的阿拉伯组织的支持，叙利亚长久以来就是美国在中东打击的重要目标，甚至到现在，叙利亚仍然被列在美国的黑名单之中。苏联从中东的撤退一度使叙利亚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然而，阿萨德总统敏锐地抓住海湾战争所带来的机会，牢固地确立了叙利亚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地位：通过积极参加反对伊拉克的多国联盟，叙利亚不仅获得了海湾保守的王权国家的信任，而且实现了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通过有限度地参加中东和平进程，确保了叙利亚在中东所有重大事务中不可缺少的地位。叙利亚还通过加强与黎巴嫩的特殊关系，有效地加强了它在阿以和谈和建立中东安全结构中作用和影响力。在中东所有的国家中，叙利亚是利用冷战结束、海湾战争实现角色转换、确保国家利益的典范。

2. 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

穆斯林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某些共同特点和问题进行描述。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政治上盛行权威主义，某个家族或个人以及某个政党对国家权力的长期控制和垄断构成了穆斯林国家政治现实的主要特点。在权威主义的统治下，西方意义的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要素，诸如政治多元化、多党竞争、司法独立、新闻监督等等是不存在的，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

一个家族或政党对政治权力的传统的拥有和领袖人物非凡的个人魅力以及领导才能。与政治上权威主义的盛行相呼应的是经济活动中国家的干预和控制，其主要特点是，国有经济成分过大且效率低下、过于庞大的政府开支和持续扩大的财政赤字。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除了上述问题外，还存在严重依赖石油收入和军费开支巨大等问题。冷战的结束对穆斯林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军事对抗的缓解和中东和平不断取得进展，不仅使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可能，也成为一种内在需求。正是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都大大加强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的力度，同时，区域内部的经济合作和跨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也得到比以往更有力的推动：中东和北非地区已连续举行四次经济合作会议，欧洲则积极推动环地中海经济合作。其次，在大多数国家看来，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失败是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经济上计划控制的双重失败，那些在战略上与苏联结成盟友、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上与东方集团十分相似的穆斯林国家无疑最先感到了苏联解体所产生的冲击，同时，西方国家有意夸张自己在制度上的优势，把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化当作某种普遍有效的法则向全世界推广，所有这些都从内外两个方面对穆斯林国家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了压力，使得穆斯林国家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

三、穆斯林世界的冷和平

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的激烈争夺与对抗、由于存在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冷战在穆斯林世界经常演变成热战。引发这些战争或冲突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在冷战结束、东西方竞争与对抗的因素消失之后，旧时的热战已逐步被一种可称之为冷和平的状态所取代。其主要特征是，冲突的各方或失去了外援难以支撑、或已厌倦了长时间的战乱、或者在国际社会的调解和压

力下被迫放弃了武力，和平与和解的进程已经开始，但由于各方分歧巨大、积怨甚深，很难达成全面谅解，于是不战不和、似战似和的局面长期维持。

1. 中东的冷和平

冷战结束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阿以双方于1991年10月从马德里开始进入了新一轮和平进程，经过两年艰苦谈判，巴以关系首先取得突破，于1993年9月在华盛顿签署了《巴以原则宣言》，就以色列从被占领土的分阶段撤退和巴勒斯坦逐步实行自治达成原则协议。从那以后，尽管双方围绕协议的具体实施不断发生争执、威胁和平进程的恐怖主义事件时有发生，但巴以之间的和平还是持续取得了进展：1994年，阿拉法特重返加沙，1995年“塔巴协议”签署，1996年1月，巴勒斯坦自治选举顺利实现。与此同时，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得到改善，1994年10月，以色列与约旦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海湾国家则放松了对以色列的制裁。阿以双方的和解为地区范围内的紧张局势的缓和与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气氛，中东与北非地区的四次经济会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召开。

然而，中东和平是脆弱的。首先，中东和平是在阿拉伯国家地位十分软弱和以对阿拉伯国家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得以实现的。冷战结束以后，那些与以色列进行激烈对抗的阿拉伯国家，诸如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在失去了苏联的强大外援之后，已无力维持与以色列的军事对峙，而海湾战争，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伊拉克在军事上的瓦解使阿拉伯国家失去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以色列来说则等于消除了最主要的军事威胁；海湾战争使阿拉伯国家陷入了更大范围的分裂，而阿拉伯国家的不和从来就是阿拉伯人在历次阿以冲突中遭受耻辱和失败的最主要原因；阿拉法特在海湾危机中与萨达姆站在一起不仅损害了巴解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也招致许多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

家的反对；海湾危机为美国更深地卷入和干预中东事务提供了借口，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即使那些最为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如叙利亚）也不得不仰美国之鼻息。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于巴勒斯坦来说，中东和平根本就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城下之盟”。因此，其条件之苛刻是可以想见的；阿拉伯人接受了以色列存在的现实，但巴勒斯坦的生存权利却留给了不可知的未来；大批的犹太移民涌入以色列，但流落异国数十年的巴勒斯坦人却无人问津；其他如耶路撒冷问题、戈兰高地问题、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等等，至今谁也无法说出答案究竟在哪里。

其次，中东和平基本上是美国政策的产物。长久以来，中东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就占据重要地位。以海湾战争为契机，美国不仅实现了在海湾地区保持直接军事存在的梦想，而且第一次成为中东地区的惟一主导力量。从此以后，美国再也不用担心会与苏联在中东迎头相撞，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也不再是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需要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中东，一个在美国主导下保持平衡的中东，只有一个稳定和平衡的中东才能确保美国战略意图的实现：稳定的石油供应，美国重要盟友的安全和政治稳定，遏制和削弱中东的激进势力，特别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因此，消除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的因素就成了美国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这就是美国在海湾战争结束以后卖力地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原因。强调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并不是要否定阿以双方实现和平的诚意，也不是有意忽视饱受战争之苦的普通民众对和平的渴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推动力，我们只是想说明，没有美国的调解和施加的强大压力，单靠阿以之间的和平努力，中东和平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进展。然而，正是由于美国对中东和平的主导，中东和平进程显示出两重性，一方面和平满足了人们追求安全与稳定的要求，另一方面而和平必须有助于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当两者之间不能达到完全一致时，和

平也就会陷入危机，同时这也能够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和平在阿以双方都引发了激烈的争吵与分歧。

第三，中东和平是一个长久的历史过程。众所周知，阿以冲突有着长久的历史，即使从1948年以色列立国算起，到现在也已持续了半个世纪；阿以之间的冲突还是一场全面的冲突，它涉及历史、民族、宗教、领土、现实利益等各个方面。显然，这样的一种冲突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的。国际条约可以实现领土的划分、利益的分割，甚至可以对所有有形的争端进行约束，然而，民族、宗教间的矛盾、长期冲突与流血所激发的误解与仇恨却不是一纸文书就可以化解的，要学会和睦相处则更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中东和平将是一个长久的历史过程，它的突破并不表示和平就要到来，它的危机也不意味着和平已陷入绝境。

正是由于中东和平进程的上述特征，中东陷入了某种可称为冷和平的境地：参加中东和平进程的所有方面都对和平充满失望，甚至怨气冲天，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方愿意放弃和平，退出和平进程；中东和平进程已多次陷入绝境，但每一次都峰回路转，起死回生。对于中东和平进程的所有参加者来说，和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在走向和平的过程中，每一方都试图利用和平，或通过和平最大限度地保持和攫取更多的利益。于是，我们看到，和平可以服务于党派之争，和平可以用作打击异己的政治武器，和平可以构成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平可以有效地提高国家在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和平可以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和平可以有效地约束不同方向的力量……。当实现和平困难重重，当和平的到来可能会使大家一无所有时，和平进程本身就成了各方最好的选择，由此看来，中东的冷和平就十分自然了。

2. 阿富汗的政治边缘化

在东西方冷战时期，阿富汗曾经是美苏争夺的热点。一方面，苏联为了实现南下印度洋的战略，不断在阿富汗培植亲苏势

力，使得阿富汗政局连年动乱，到1979年，苏联干脆直接侵入阿富汗，人主喀布尔；另一方面，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南下，在其盟国巴基斯坦的积极配合下，从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全力支持阿富汗的抗苏武装。于是，在接下来的10年中，阿富汗成了美苏争夺的焦点。到1988年，苏联已被冷战拖得精疲力竭，阿富汗成了苏联的“越南”，在经过了10年一无所获的战争之后，苏联于1989年2月最终撤出了阿富汗。

经历了长期战争之后，阿富汗面临十分巨大的社会危机，一方面，失去苏联支持的纳吉布拉政权已陷入四面楚歌，在战争中强大起来的各派游击队兵临城下，喀布尔随时都有失陷的危险；另一方面，战争已彻底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生活，数百万人流落他乡成为难民，国家财政连年赤字，通货膨胀率高达56.7%（1990）。^①对于饱受战争之苦的阿富汗民众和风雨飘摇的喀布尔政权来说，他们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援助，以实现国内各派力量的和解，着手进行艰难的战后重建。然而，阿富汗被国际社会遗弃了。苏联已经解体，它已不再能像往常一样提供上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昔日盟友的命运如何、阿富汗将向何处去都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美国人比苏联跑得更快，最后一批苏军撤退的时间是1989年2月15日，而美国大使馆在11日就已关闭。显然，在苏联的威胁消失以后，阿富汗的战略地位已不像从前那么重要。至于阿富汗政局如何演变、谁会成为喀布尔的新主人都不会影响美国的全球利益。

阿富汗问题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下降、大国势力从阿富汗的脱身以及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局势演变的漠不关心，从两个方面促成了阿富汗国内动乱的进一步激化。第一，失去约束和失去共同敌人的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和社会力量大打出手，为争夺权力展开

^① 《世界知识年鉴》（1993—1994），第4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了异常残酷的内战；第二，周边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肆无忌惮地卷入阿富汗的内部纷争，使阿富汗内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

到目前为止，阿富汗的政治现实是，喀布尔已数易其主，各种派别此消彼长，谁也不能完全控制全国的局面，在一些周边国家的调解下，阿富汗内战打打谈谈。作为最有影响的国际机构联合国也有心无力，除了派遣调解人员奔走于各派之间，召集一些不起任何作用的会议之外，就是分发一些少得可怜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质。它拒绝派出维和部队，像干预波斯尼亚或参与海湾战争那样对阿富汗内战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它也无能力消除内战各方及其背后支持者的分歧，阿富汗的和平仍将是梦想。

四、没有结束的冷战

冷战期间，中东的许多国家都与苏联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因此，冷战在中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美国及其盟国对苏联的盟友进行战略遏制和直接的军事打击。比如，1981年，为消除伊拉克可能的核威胁，以色列空军炸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1986年，美国两次大规划空袭利比亚，试图置卡扎菲于死地。苏联瓦解以后，全球性的冷战宣告结束，中东的局势也多少得到了缓解，最大的变化就是阿以这对老冤家开始了和平进程。然而，中东的冷战并没有完全终结，相反由于新矛盾的出现，中东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冷战局面。

在这场持续的冷战中，一方是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另一方则是被美国称为“无赖”国家的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和苏丹等国。众所周知，早在海湾战争前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就一再声称，美国将利用海湾战争，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不管美国理想中的世界新秩序对于别的地区，抑或对于全世界意味着什么，对于中东来说，新秩序就是美国主导一切：石油、军

售、安全、稳定等等，有关中东的所有问题都必须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于是，我们看到，美国与海湾的重要石油王国结成了同盟，对于世界经济利害攸关的能源完全处于美国的监护之下；我们还看到，美国除了与中东的一些重要国家结成双边同盟之外，还在中东及其周边地区保持了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仰赖美国的监控；我们更看到，美国是中东和平进程中最大的掮客，没有美国的干预，中东和平几乎是寸步难行。然而，美国的影响力并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万能的。对于美国来说，中东地区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异己力量，除了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反美情绪以外，对美国最直接的挑战来自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和苏丹等国家。按照美国人的说法，这些国家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事或支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开发和引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煽动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情绪。为了对付这些国家所带来的威胁，美国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冷战。首先，美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国际社会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制裁。比如，海湾战争以后，美国以伊拉克没能完全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由，多次要求联合国维持对伊拉克的国际禁运。其次，美国还将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随意把别国列入予以打击和制裁的黑名单，1996年美国公布达马托法，要求国际社会听从美国的指挥，共同对伊朗和利比亚进行制裁，并威胁美国将对敢于和伊朗、利比亚进行经贸往来的他国公司实行制裁。第三，为了有力地打击和削弱所谓的“无赖”国家，美国在保持相当的军事压力的同时，还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事务中把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国排除在外。然而，可悲的是，在所有的地区事务中，如果没有相关国家的参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把恐怖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当成美国在中东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威

胁，因此，美国根本不可能轻易放弃对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和苏丹等国的严峻立场。同时，到目前为止，这些所谓的“无赖”国家也没有改弦易辙或政治崩溃的迹象，看来冷战仍将会在中东地区持续一定的时间。

第二节 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变革

在穆斯林世界，不管政治体制有多大的差别，也不管政治当局信奉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生活中盛行的主要是权威主义，一个家族、一个政党、一个集团或某个个人对国家政权的长期垄断构成了穆斯林国家主要的政治特征。因此，我们所关注的政治变革是指这种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和开放的政治进行变革的过程或倾向，这种由现行政治当局推动的政治变革也许是主动的、也许是被动的，但都与革命、军事政变所带来的政府更迭和政治变动毫无关系。

一、穆斯林国家政治变革的动力与原因

对穆斯林国家政治变革，特别是对穆斯林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的讨论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在90年代初之前，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穆斯林世界的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诸如阿以冲突、石油问题等吸引了大部分学者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在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民主发展的预期似乎很低”，^①实际的情形可能比这更遭，在冷战的50余年中，除了经常不断的军事政变和政治动乱，

^① Samuel Huntington,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9, 2 (Summer 1984), P.216.

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以扩大政治参与、建立民主政府为方向的政治变革可说是寥寥无几。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动下，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似乎成为世纪之潮，实际的情形是，穆斯林世界也确实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1988年，长期执掌阿尔及利亚政权的“民族解放阵线”放弃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并于1989年颁布新的宪法和政治结社法，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并存的新的政治体制；同年，分裂对立数十年的南北也门实现了统一，并允诺在统一后的也门开放党禁，进行政治多元化的改革；与此同时，埃及、黎巴嫩、约旦等国也有限地开放了政治进程，允许一些政党和个人参加市政和议会选举。甚至连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这样的保守的王权国家也试图通过有限的政治参与，扩大统治的政治基础；沙特于1992年3月公布了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包括政府法、协商会议法和地方政府法等三个方面，^①从此，这个以《古兰经》为宪法的王权国家又多了一部治理国家的法典，而科威特则于1992年10月恢复了被解散多年的国民议会，缓解了对新闻和言论的控制。

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有限变革，穆斯林世界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各国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但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相似的，即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行国有企业的重组，推进私有化进程；对外贸体制、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进行必要的改革，改善贸易和投资环境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重要的穆斯林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直接干预下进行了更为激进的结构调整。

穆斯林国家从90年代初开始的政治变革有着极为复杂的内

① Madawi al-Rasheed, God, the King and the Nation: Political Rhetoric in Saudi Arabia in the 1990s, *Middle East Journal* 50, 3 (Summer 1996), P.363.

外原因，从内部原因看，既有经济的、又有政治的，从外部原因看，既有地区的、又有国际的。

1. 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罚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① 由此看来，所谓政治合法性实际上是指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对政治权威的认可程度。政治合法性是一个变化着的历史概念，基本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是权威的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即权威的建立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赞同。另一方面是对权威合法性的加强和维持，即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预期。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条件，权威的合法性才是稳定的。

对于大多数的穆斯林国家来说，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本上来自两种途径。那些王权国家，诸如沙特阿拉伯、约旦、摩洛哥以及革命前的伊朗等国，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传统的。与传统宗教和显赫家族的政治联盟、与先知家族的血缘关系、或者王室家族在国家历史上的杰出作用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这里，政治权力的过渡和继承是世袭的，只要新的统治者得到了家族内部的认可，政治合法性就确立起来。其他的穆斯林国家，其政治合法性的建立则与王权国家完全不同，有的政治权威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产物，有的则是靠革命或军事政变获得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因此，对于这些“革命”的政权来说，政治合法性的首要来源是因为他们推翻了人们深恶痛绝的旧权威，尤其是革命的领导集团和领袖人物，由于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的杰出的表

^①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等著，曹佩霖等译：《比较政治学》，第35-3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现，他们获得了社会成员的广泛支持和信任。

政治权力的取得和政治权威的确立只是实现合法统治的第一步，与历史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王权国家和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的国家都面临着维持和加强合法统治的巨大挑战。对于那些刚刚获得权力的革命者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他们必须证明，他们能够比旧的统治者更加公平地管理社会、更加公正地行使权力、更加有效地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加和变化着预期。第二，他们必须在意识形态和政权建设方面投入巨大的精力，完成新的政治权威的制度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少数新兴国家，第一代的政治领袖往往比新的政治形态更具影响力，因此，“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上来”，^①就成了这些国家政治发展和制度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对于那些王权国家来说，挑战则要单纯一些，毕竟，王权及其制度已存在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着比较完备的运行机制，同时，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和宗教信仰也抑制了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怀疑，然而，即使在最为专制的王权统治之下，不断满足臣民的现实需求也构成了维持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前提，王朝更迭、王权帝制被新的政治形态取代，在历史、在当代都已屡见不鲜。显然，政治合法性的维持与加强比政治合法性的确立本身更为艰难，正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

第一，政治权威的制度性弱点。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是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建立起来的，因此，民族主义，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强大意识形态，它所享有的政治权威是无可争议的，同时，一

^①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等著，曹佩霖等译：《比较政治学》，第4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些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领袖人物更是对普通的民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对于新兴的民族国家来说，适时地把一种政治运动转换成一种政治制度、把对政治领袖的忠诚转移到对一种政治制度的忠诚就成了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应该说，所有新兴民族国家都对此作出了不少的努力，比如把领导民族主义革命的政治组织变为政党，根据当代已有的政治形态进行制度化建设等等。然而，大部分国家的此类政治转变都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政治权力依然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政治领袖个人往往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许多国家，个人对政权的把持经常达数十年之久。这种权威主义政治有许多天生的弱点。首先，权威主义政治是以排斥一切反对力量为前提的，从理论上讲，某一个人或集团对权力控制的时间越长，它制造的反对派就越多。比如，反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政治力量既有宗教的（什叶派）、又有民族的（库尔德人）、还有历次权力斗争中的失意者。其次，在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之下，政治过渡经常充满危机，有时还会发生军事政变和内部动乱，即使是在有一定继承秩序的王权国家和像土耳其、埃及这样有一定制度保证的国家，新旧领导的更替也使国际社会担心不已。第三，长期的权力垄断是造成政治腐败和官僚主义盛行的温床。

第二，民众的希冀与失望。经历长时期殖民主义统治和经济社会落后之苦的穆斯林民众对于国家的新政治当局寄予厚望。对外，他们渴望摆脱西方对穆斯林社会长期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一洗民族、宗教和国家百多年来所蒙受的耻辱；对内，他们渴望改变经济和社会的落后，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公正。应该说，无论是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还是保守的王权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普通民众的这些需求，民族国家的建立、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阿拉伯国家石油武器的运用以及石油美元带动的经济繁荣等都有力地提高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然而，从更一般的意义

上来说，穆斯林国家政府的行为与民众的期望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国际政治和地区事务两个方面，穆斯林国家依然不能摆脱大国的控制和支配，尤其是在阿以冲突中，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偏袒，更使穆斯林不断遭受新的耻辱，许多国家的统治当局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外部力量的依赖，也严重伤害了普通民众的自尊心。在国内政治层面，各国人口的增长普遍高于经济的增长，因此经济发展并没有显著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有的国家，人们的工资收入甚至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①同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瓦解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同时，并没有促使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形成，相反，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住房、贫穷、失业、犯罪等社会问题困扰着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在大的都市此类情形更为严重。此外，腐败现象的蔓延、严重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化、政府管理的无能、社会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都激发了民众对现行当局的不满。

政治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和政府行为与民众预期的巨大差距构成了穆斯林国家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于现行当局来说，进行某种可行的政治变革就成了维持合法统治的较好的选择之一。

2.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后果及其政治压力

纵观整个穆斯林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基础、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也十分复杂，有历史的、也有人文的，有的则与地理和自然环境的限制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大部分的穆斯林国

^① Rex Brynen, Bahgat Korany & Paul Noble,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Volume 1,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USA, 1995, P.266.

家在取得独立以前，几乎不存在或根本没有现代工业，原始的、落后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仅有的与现代工业的联系就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原材料生产和加工业。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伴随着穆斯林国家在政治体制选择方面的差异，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把社会主义作为前进的目标，有的则选择了“西方化”，实际的情形是，我们很难在理论上对他们进行概括。然而，透过这些众多的差异和不同，我们似乎可以发现穆斯林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选择及其后果等方面的一些共同点。

基本说来，在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上，大多数穆斯林国家有两种共同的政策倾向，一是国有化，一是工业化。摆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穆斯林国家，在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大多不同程度地开始了国有化进程。埃及1952年“七月革命”胜利以后先是进行土地改革，继而在1956年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1971年的宪法则在制度上确立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①阿尔及利亚的国有化进程是在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完成的，1966年，外国人拥有的矿山、土地和保险公司被收归国有，1971年国家完成了对碳化氢生产部门的控制。^②海湾王权国家则大部分在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才开始石油工业的国有化进程，比如，沙特直到1980年才完全接管了阿美石油公司。^③在经济国有化的同时，各穆斯林国家先后开始推动工业化进程，通常的做法是，政府通过各种周期不等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有意识地加大对工业部门的投入，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穆斯林国家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此种政策选择虽有历史的必然性

①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7.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P. 38.

②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7.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P. 280.

③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7.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P. 868.

和合理性，然而，它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政府长期面临巨大的财政开支、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农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滞后，工业企业效益低下和开工不足等等。然而，比起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来说，这些经济领域本身的问题简直算不了什么，毕竟大部分的经济问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改革得到缓解，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可能因经济结构调整变得更为复杂、更加难以控制，并最终形成对现行当局的政治变革压力。

概括起来，穆斯林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化。由于农村的贫困化和就业机会的缺乏以及现代工业的迅速扩张，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和工业中心。根据世界银行1992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东和北非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由1965年的35%上升到1990年的51%，从1965~1980年，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6%，整个80年代，年均增长4.4%。^①尤其是像开罗和德黑兰这样一些大都市，人口的增长更是惊人，据估计，德黑兰的人口在1952年约只有100万，^②到现在已超过了1000万。^③城市人口的增长是经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过快的城市化也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就业困难、住房紧张等等，即使在最为理想的情况下，城市化也会对旧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出挑战——大量乡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一方面使得传统的自然经济逐步萎缩，另一方面也使得以地域、宗教、家族和部落为纽带的社会结构趋于解体，同时，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也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怀疑和冷落。第二，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工业化的直接后果之

①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② Donald N. Wilber, *Iran: Past and Pres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205.

③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7, P. 450.

一是在社会中形成了两个力量不断增强的新的社会阶层，一个是产业工人阶级，另一个则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人员、工程师、教师、律师和医生以及政府部门的技术官僚等。例如马来西亚，1970年中产阶级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为20%，1993年上升到33.5%，同一期间，产业工人的比率由11.6%上升到28.5%，而农业人口则由44.1%下降到25.4%。^①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阶级构成，他们不可能不对传统的政治结构形成压力，提出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第三，世俗化。不管穆斯林各国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战略，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穆斯林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大大加快了，其主要表现是，伊斯兰在政治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遭受巨大的挫折。在政治上，宗教上层人物已无力影响政策的制订和执行，无论在世俗化较强的埃及，还是在宗教势力强大的沙特，宗教基本上是政治的附属品；在社会层面，宗教道德和教条对人们的约束在不断削弱，大量的妇女走入社会、宗教教育受到严格的限制、世俗的法律正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世俗化也引起了伊斯兰的强烈反弹，激发了伊斯兰教的政治本能，从而对政治变革的进程和方向产生巨大的影响。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一社会变化不仅使原来一些处于社会和政治边缘的人群、宗教势力和社会意识得到广泛的动员和激励，而且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因此，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受到挑战和压力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穆斯林世界的权威主义政治当局来说，要么实行政治变革以求得生存，要么继续坚持对权力的垄断等待革命的到来。

^① Edited By Garry Rodan,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Industrialising Asia*, Routledge, London, 1996, P.129.

3. 国际环境与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变革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的激剧变动是穆斯林世界政治变革的重要外部动因。首先，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民主化对穆斯林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众所周知，苏联模式在第三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正是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同时，一些国家还与苏联结成战略上的盟友，直接卷入了冷战时期东西两大阵营的全面对决。因此，苏联和东欧的剧变首先对那些与苏联的模式相近并与东方集团关系密切的国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苏联的解体使他们失去了强大的外部支撑，他们不得不在所有重大的国际与地区事务处于防守地位，同时，苏联的垮台还意味着他们所看重的发展模式的失败，^①他们不得不对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作出必要的调整和改变。由此看来，在中东国家中，阿尔及利亚和也门首先发生较大的政治变动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第二，西方社会对政治变革的鼓动。在大部分的西方政客和西方舆论看来，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全面胜利，因此，推动人权，鼓吹民主化成了西方各国冷战后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成了新闻媒介和学术界谈论的热门话题。在美国著名的学者亨廷顿那里，更是用“第三次浪潮”来概括冷战结束前后发生的世界性政治变革，^②在一个通讯和信息高度发达的世界里，这种文化扩散对穆斯林各国的影响不可低估。然而，真正对穆斯林各国产生政治压力的是那些西方国家以及由它们控制的国际机构。众所周知，许多穆斯林国家长期

① Rex Brynen, Bahgat Korany & Paul Noble,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Volume 1,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265.

②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s: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以来一直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财政支持构成了克服危机的主要手段，如果说冷战时期，西方的经济援助主要是为了遏制苏联的影响，那么，冷战后西方的主要目标则是促进自由化和民主化，在最近几年，无论是“巴黎俱乐部”做出的债务减免与重新安排决议，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受援国达成一揽子协议，都是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和前提条件的。例如，在199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阿尔及利亚达成的为期3年的协议中，阿方允诺进一步推动私有化进程、实行贸易自由化、进行必要的财政和金融改革、削减政府开支和减少财政赤字。^①这些条件虽然是经济的，然而他们对受援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冲击是巨大的，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来，这些变革也有效地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为将来的政治自由化准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②

第三，非政府组织（NGO）的压力。在冷战后的国际事务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有日渐增强的趋势，尤其是一些人权组织的活动更是对阿拉伯国家政府当局产生不小的压力。这些组织主要包括：大赦国际、中东观察、国际法官委员会、阿拉伯人权协会、摩洛哥人权组织等等。^③通过举行会议、发表研究报告和支持当地人权组织的活动等不同方式，非政府组织对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决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989年，迫于国际压力，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邀请大赦国际派团访问，随后大赦国际发表了对摩洛哥人权状况多有责难的考察报告，哈桑二世虽然极为恼

①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7, P.283.

② Pete W. Moore,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16, No.3, Summer 1994.

③ Pete W. Moore,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16, No.3, Summer 1994.

火，但在公开的讲话中，却不得不多次对人权组织的活动表示恭维。^①

第四，地区范围内的压力。在穆斯林世界，一些地区事务的演变也推动了政治变革。首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随之而来的海湾危机，对中东国家的现行政治结构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围绕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同时穆斯林社会内部的分歧以及普通民众与统治当局的分歧也在扩大，这些巨大的裂痕与分歧反映了一种令人尴尬的政治现实：对于阿拉伯和全世界的穆斯林民众来说，支持伊拉克等于支持强权，反对自己的另一个兄弟；而支持科威特则等于和美国、以色列这样一些穆斯林长期的敌人站到了一起。海湾的王权国家面临的压力更为巨大，面对伊拉克的军事威胁，他们需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支持，甚至不惜许诺更多的政治参与。^②然而，公开邀请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驻海湾又招致了民众强烈的不满，从而使传统的政治权威陷入困境。最近，沙特阿拉伯连续发生的爆炸事件表明，美军的存在和民众的不满已成了王室面临的重大政治挑战。

对政治变革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地区因素是阿以冲突的缓解。长期的阿以对峙和经常发生的战争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也为权威主义政治的盛行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正是强大的外部压力使各国政府有充足的理由保持对权力的垄断，以调动所有的社会资源应付外部的挑战。从马德里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虽然一波三折、困难重重，公正、持久的和平远未成为现实，然而，中东和平不断取得进展毕竟大大缓和了地区紧张局势，阿以之间

① Pete W. Moore,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16, No.3, Summer 1994.

② 同注①。

发生大规模军事对抗的危险进一步减少。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构建和平比走向战争更为困难，和平使原有的社会危机得以显露，和平使公众舆论和社会力量发生分化，和平使统治者当局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社会资源。总之，和平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政治当局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能力。

阿尔及利亚和也门是中东地区最早发生激烈政治变革的国家，这些政治民主化实验远不能说是成功的，然而要说他们已经失败也为时过早。就像 50 年代民族主义革命在整个中东和国际社会引起反响一样，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政治变革也对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现行政治结构产生了不小的冲击。长期以来，沙特等保守的君主制国家就对中东地区发生的任何革命充满敌意，并不断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各种异己势力进行对抗。50~60 年代，沙特反对纳赛尔主义；70~80 年代，沙特则对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充满戒心；而 90 年代，沙特面对的主要挑战就是政治民主化的冲击。也门是沙特的近邻，也门的统一和政治改革使沙特王室非常不安。自从海湾危机以来，两国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1994 年底甚至演变成军事冲突，也门与沙特的关系的持续恶化固然与也门在海湾危机中支持伊拉克有关，也反映了沙特与也门的历史积冤和领土纷争，然而，在许多也门人的眼里，真实的原因是沙特王室对也门的民主化充满恐惧。^①

二、穆斯林国家政治变革的阻力与困难

如前所述，在冷战结束前后，一些穆斯林国家确实进行了某种政治变革，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变革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并没有像在东欧、非洲和拉美等地区那样席卷整个地区，

^① Pete W. Moore,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16, No.3, Summer 1994.

同时政治变革的深度也是有限的。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政治变革往往意味现政权的垮台，政治结构的彻底变更，而在穆斯林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政治变革都是在现政权的领导和控制之下进行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政权虽然在政治变革中失去统治地位，然而，军方的介入却打断了原有的政治发展进程。因此，穆斯林世界，特别是中东的政治变革远不是西方所鼓吹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匆匆对这种政治发展的模式作出价值判断显然过于鲁莽。在历史和现实中，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同样随处可见。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变革远没有人们预想的那样迅速和深刻，换言之，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变革面临那些阻力和困难？

1. 中产阶级、公民社会与政治变革

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中，中产阶级的壮大与成熟、公民社会的形成一直被看作政治民主化的前提。这种基于对欧洲政治发展的概括和总结而形成的政治学体系和研究方法其理论价值显而易见。然而，当我们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革，并想当然地认定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对政治变革的积极作用的时候，这种理论很可能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原因十分简单，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穆斯林国家毕竟不是欧洲国家。

确实，在穆斯林社会存在着西方学者所说的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而且中产阶级和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各种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存在也确实对政治变革和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92年5月，在黎巴嫩，组织起来的劳工推翻了乌马尔·卡拉米政府，随后，一大批社会组织对在叙利亚监护之下举行的议会选举提出了挑战。^①”沙特是一个严禁政党和结社的国家，1990

^① Augustus Richard Norton, *the Futur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47, No.2, Spring 1993, P.54.

年12月，包括商人、作家和新闻记者在内的43名社会知名人士联合上书法赫德国王，要求组成咨询会议，实施地方法规，调查司法体系，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新闻自由。^①当我们注意到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对穆斯林国家政治变革的有限推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穆斯林社会中产阶级和各种利益集团与生俱来的弱点。首先，大部分穆斯林国家的中产阶级不仅力量弱小，而且本身就与传统的政治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绝对占有和对社会财富与权利进行分配的高度垄断，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商人和技术官僚等实际上是传统政治的直接受益者和衍生物。例如，埃及最大的工程承包商奥斯曼曾经是建筑部长，他的发迹很大程度上是靠着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和对政府公共工程的垄断性承包。^②同时，教育、医疗、法律和新闻出版等知识阶层云集的部门大多处于政府的严密控制和管理之下，很难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产生了大量城市贫民和失业人口，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这些贫困的大众都是中产阶级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情形下，中产阶级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他们一旦获准以某种方式参与政治进程，很可能变成进一步政治变革的阻力。

第二，穆斯林国家公民社会的不成熟性。在理论上，典型的公民社会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它的确切定义是什么，西方学术界一直存在非常激烈的争论。^③然而，在有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

① Madawi al-Rasheed, *God, the King and the Nation: Political Rhetoric in Saudi Arabia in the 1990s*, *Middle East Journal* 50, 3 (Summer 1996), P.362.

② 穆罕默德·海卡尔著，发恩、黎启译：《萨达特遇刺记》，第214~218页，新华出版社，1987。

③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47, Spring 1993; Rex Brynen, Bahgat Korany & Paul Noble,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Volume 1,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即肯定公民社会对政治民主化的作用，并在研究穆斯林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革时，对这个范畴加以运用。归纳起来，公民社会对政治民主化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各类社会组织和政党对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表达和权益保护，有效地制约着政府的权力、缓解着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因此它们是社会的减震器，同时政府与各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平等的，社会组织享有充分的自治；第二，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的实现是竞争性的，这种竞争以充分尊重其他组织的利益和信念为基础，每一个组织都不能用强制的手段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观点；第三，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多元、宽容和节制应该成为组织内部结构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用这些基本条件观照穆斯林世界，就会发现穆斯林国家的公民社会远未成熟，也远不能对推动政治民主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个原因是，在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政府对政党和各种社会组织进行严格的控制和限制。在阿拉伯国家，政府对各种政治和社会团体的态度基本可分为三种，一种政府不承认结社自由，这类国家主要有除科威特之外的其他海湾五国；第二种是在社会中存在大量公民社团，然而他们都须接受政府或执政党的控制，这类国家包括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和伊拉克；第三种是政府确保一定程度的结社自由，允许建立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这类国家有埃及、突尼斯、也门和约旦等。^①然而，即使在第三类国家，反对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地位也是十分软弱的，政府或执政党总是利用各种方法限制它们的活动。在突尼斯，政府颁布法律禁止政党的领袖成为其他社会组织的最高成员。一般认为，这项法律主要是针对最大的反对党“社会民主运动”，因为其领导

^① Rex Brynen, Bahgat Korany & Paul Noble,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Volume 1,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141.

人恰巧又是“突尼斯人权联盟”的秘书长。在科威特，政府则宣布所有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建立的社会组织都是非法的，这意味着所有的人权组织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在其他的穆斯林国家，情况大都与此类似，由于政府对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控制（有的组织干脆就是秉承政府的旨意而成立的），因此，利益的表达和保护、对政府权力的影响和制约以及公民团体的高度自治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现实。

在穆斯林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还受到宗教、种族和部族等问题的困扰。由于宗教、种族和部族之间的矛盾及其非理性倾向，大量此类组织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各种公民组织间的关系，有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些以教派和种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组织不惜采用极端主义方法，甚至诉诸武力和暗杀等恐怖主义手段，在这样的情形下，离建立民主、宽容和节制的公民社会何止万里。另外，许多政党和社会团体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国外的捐款，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政治当局以口实，指责他们不过是外国利益的代理人。

2. 食利经济与政治变革

70年代，随着石油收入在产油国的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大幅增加，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通过关注公共财政的结构来研究一个国家及其经济的性质，他们从传统经济学中借用“食利国家”、“食利经济”等概念，并通过扩大其内涵，把所有不是来自国内生产性部门的收入都视作食利行为，如石油收入、有价证券收入、国外援助和贷款、劳务支付和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获得的收入（如运河、输油管道）等等。^① 我们不准备就这类概念的确切性展开争论。我们感兴趣的是上述各种收入形式在国家财政结构中的地

^① Edited by Hazem Beblawi and Diacomio Luciani, *the Rentier State*, Groom Helm, USA 1987.

位以及他们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尤其是他们对政治变革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开支主要依赖外部租金而不是来自国内生产部门和税收时，政府的政治变革热情和政府感受到的政治变革压力相对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无代表，不纳税”，反过来说，不纳税，没有代表也就无可厚非。在一个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外部租金的国家，政治当局一般都处于某种强有力的地位，它用不着与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讨价还价以获取财政收入，也用不着理会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要求；相反，由于政府的财政支出和支出的方向与形式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利益的分配，政府获得了超越一切、支配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样的情形下，外部租金变成了强化统治的工具，大量的资金被用于建设与统治者的安危息息相关的机构与部门（如军队、警察和情报部门），无数的金钱落入与统治集团命运相连的特殊社会阶层的腰包。

中东的“食利国家”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石油输出国，国际石油美元构成这类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类国家或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或因其在地地区政治格局中特殊作用，每年都从国际社会获得可观的收入，这类国家主要包括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尔及利亚等（参阅表6-1）。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以及特殊的战略地位和政治作用所带来的丰厚收入，使中东的许多穆斯林国家统治者处于一种欲取欲求的地位，政府的财政开支支配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财政补贴关系到每一个社会阶层，政府的福利政策更是影响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与此同时，政府还在事关统治者安危的强力部门投入巨资。总之，大量国外租金的存在使统治者运用“胡萝卜”和“大棒”的能力同时得到了加强。然而，一旦来自国外的收入减少，统治者的控制能力就会削弱。约旦和海湾的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海湾战争之后进行有限的政治变革，原因之一就是国家财政能力的相对减弱；约

且因支持伊拉克失去了国际社会，尤其是海湾产油国的财政援助，而沙特、科威特等国则是把大量的资金用于支付战争费用。

表 6-1 部分阿拉伯国家“非税收收入”在政府预算中的比例^①

国 别	百分比	国 别	百分比
阿尔及利亚(1993)	56.6	摩洛哥(1987)	10.13
埃及(1989)	33.77	沙特阿拉伯(1993)	79.4
约旦(1990)	28.26	叙利亚(1990)	25.77
科威特(1986)	97.56	突尼斯(1991)	17.32
利比亚(1990~1991)	57.04	也门(1991)	42.5

应该强调的是，外部租金的存在并不能确保社会的稳定，也不能永远阻止政治变革的要求，在许多的情形下，统治者的专制和变革热情的缺乏也不一定与外部租金有直接的关联。我们只是想强调，外部租金加强了政府的统治和应付危机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政治变革的进展。由于石油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构成产油国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中东的许多国家仍可凭借其特殊的地位轻而易举地获得国际社会的财政支持，许多穆斯林国家、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仍然不会对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表示多大热情，即使已经进入政治变革尝试的国家，也会在面对失去控制的情况下裹足不前。

3. 伊斯兰主义与政治变革

当代伊斯兰主义兴起的最大特征就是它把现存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从当代伊斯兰运动的早期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促进会到 80~90 年代的各种伊斯兰组织和政党，不管是

^① Rex Brynen, Bahgat Korany & Paul Noble,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Volume 1,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ublished b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USA, 1995, P.244, 292.

激进的还是温和的，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遍及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组织都把改变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大部分穆斯林国家的统治当局也把伊斯兰运动当作最为危险的政治异己力量，即使是那些强调国家伊斯兰特征、统治者与伊斯兰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的国家，伊斯兰复兴思想的传播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透过当代穆斯林国家的这种政治和社会现实，我们似乎看到一条跨越整个伊斯兰发展进程的巨大历史鸿沟：伊斯兰构成了穆斯林社会历史、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主体，几乎所有的民众都是伊斯兰教的虔诚信徒，然而，伊斯兰又经常处于政治的对立面，一次次扮演改朝换代的急先锋，即使是那些依靠伊斯兰夺取政权，并不断强化与伊斯兰的密切关系的王朝和政府，最终也成了伊斯兰的反对目标。历史上的阿拉伯历代王朝如此，当代的沙特亦复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难逃同样的命运。伊斯兰与政治的合与分映照着穆斯林社会的盛与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稳定与混乱），也映照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起与落。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伊斯兰与政治的合与分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我们只是想说明宗教与政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容忍的程度。换言之，即使政治与宗教毫不相干，假如政治当局能够满足（或者部分满足）和迎合大多数穆斯林和伊斯兰势力的要求，宗教与政治就会相安无事。战后的十多年间，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反对力量相对沉寂，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新兴的民族国家政府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普通民众长期以来要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愿望。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道路离伊斯兰理想十万八千里，伊斯兰也很难形成强大的政治反对力量。

于是，结论似乎变得明确起来，政治变革、政治民主化可能是实现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有效途径，只要政治体制能够容纳

和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见与要求，能够吸收和团结大多数的社会政治势力（包括伊斯兰反对派），那么，来自伊斯兰的挑战就会消于无形，社会的发展前景也会变得明朗起来。然而，问题也随之产生，一方面，伊斯兰势力可能根本不愿与现行政治当局同流合污，仍然奉行一种我行我素和毫不妥协的战略，不推翻现行政府决不罢手；即使那些进入政治进程的伊斯兰政党和组织也可能只是进行了策略上的调整，最终的目标依然是取现政权而代之。于是，对于统治当局来说，政治变革就有着巨大的风险，不仅不能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消除伊斯兰的挑战，而且在一场难以预料的政治变革中可能彻底丧失对权力的垄断和控制，在这方面，阿尔及利亚的经历使所有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记忆犹新。如果不是军方干预政治，取消了第二轮选举，伊斯兰拯救阵线肯定已是阿尔及利亚的新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即使所有的伊斯兰组织和政党愿意接受政治变革的选择，并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中合法地参与政治过程，伊斯兰所提供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也不完全令人信服。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成功已有近 20 年的历史。然而，到目前为止，伊朗的革命实践仍然而临严峻的考验，它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在穆斯林世界，所有的统治者都必须面临因政治变革而失去权力的风险，在大部分进行有限政治变革的穆斯林国家，政府的任何限制措施都不足以阻止伊斯兰反对派取得出其不意的胜利。如果穆斯林国家也像东欧那样实现完全的自由化，我们相信，伊斯兰政党或组织取得选举的胜利绝不会仅限于一、两个国家。

伊斯兰反对势力的广泛社会影响和强大的实力，有效地吓阻了穆斯林世界各国统治者的政治变革热情，大大减缓了政治变革的进程。

4. 地区局势与政治变革

在穆斯林世界，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有两种地区性的因素严

重阻碍政治变革的进程。第一是随时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威胁，第二是跨国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势力的影响。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乃至穆斯林世界一直是战争与武力冲突发生最为频繁的地区，其中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包括四次阿以战争、黎巴嫩内战、两伊战争、阿富汗抗苏战争和随后的内战、海湾战争等。冷战结束以后，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原有的一些矛盾似乎有所缓解，然而，发生大规模军事对抗的隐患并未完全消除，各国对水资源的争夺、阿以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普遍存在的领土与边界纠纷等问题随时可能会把中东的许多国家引入战争的深渊之中。

在中东地区，由于各国在宗教、民族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天然联系，跨国国家的政治与社会思潮一直在地区国际关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在 50~60 年代，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代表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意识形态，强大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在致力于国内革命的同时，还把实现阿拉伯各国的联合、推翻腐败的封建王朝统治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70 年代以来，泛阿拉伯主义逐渐让位于泛伊斯兰主义，尤其是激进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更是对中东和整个穆斯林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伊朗对伊斯兰革命的积极鼓动、对其他国家国内事务的露骨干预使许多穆斯林国家的统治日益感到伊斯兰反对派的巨大威胁。

地区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冲突威胁和跨国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势力的强大影响力，严重阻碍了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变革进程。第一，战争与冲突的隐患迫使各国政府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军事领域，防务开支长期以来居高不下成了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尤其是中东穆斯林国家的重要特征（参考表 6-2）。把有限的国家资源大量地、长期地投入军备竞赛必然大大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而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的联系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第二，应付战争与外来的威胁历来就是统治者巩固自己权力

和地位的最好借口。战争有利于权力的高度集中，战争使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限制和打击任何形式的反政府组织及其活动，战争把所有的经济资源置于国家的高度垄断和控制之下，战争还使国家的强制性机构（如军队、警察等）迅速膨胀，并在权力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第三，外部压力的存在使各国统治当局经常处于高度的神经过敏状态，任何外来的政治和社会意识都可能被视作对政治权威的挑战，从而对他们进行严厉的限制和防范。1993年2月，埃及法院拒绝给“觉醒党”颁发许可证，因为该党的章程允许接受外国资助。在约旦，1991年的“国民宪章”和1992年的政党法都把限制政党与非约旦人的联系作为最重要的条款。^①对外来势力干涉国内政治的担心严重影响了穆斯林国家统

表 6-2 部分中东国家军费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②

国 别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阿尔及利亚	1.8	1.9	1.9	1.8	1.7	1.7	1.7	1.7	1.7
埃及	6.5	6.3	6.7	6.9	5.8	6.1	6.2	4.8	4.5
伊拉克	12.3	18.4	24.3	29.1	26.0	24.2	24.3	23.0	-
约旦	13.7	13.5	13.8	13.1	13.6	14.8	15.0	15.0	11.0
科威特	4.4	6.0	6.8	6.8	7.9	8.6	7.0	7.3	6.5
利比亚	14.0	15.0	13.0	14.5	15.2	12.7	-	8.6	7.4
摩洛哥	6.6	6.5	4.9	4.7	5.4	5.1	5.0	4.2	4.3
沙特阿拉伯	14.5	21.1	20.3	20.9	22.0	22.4	22.7	19.8	-
叙利亚	14.7	15.6	15.4	16.7	15.6	14.4	11.3	9.2	-
突尼斯	2.7	5.9	6.6	4.7	5.2	5.9	5.5	5.3	4.9
也门(AR)	12.6	14.7	14.2	10.4	8.4	7.3	7.2	-	-
也门(PDR)	19.7	18.4	19.1	17.1	16.7	22.3	18.4	18.5	-

① Rex Brynen, Bahgat Korany & Paul Noble,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Volume 1,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290.

②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19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治当局进行政治变革的热情，因为任何一国的统治者都不愿成为外国支持的政治反对派的牺牲品。

5. 西方的利益与政治变革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制度性变革，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浪潮迅速向世界的其他地区蔓延。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把推动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积极鼓动世界各国的政治变革。在他们看来，冷战的终结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全面胜利，民主化和自由化已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各国政治发展的惟一正确的选择，支持整个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可以使西方的价值观得以推广，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确保西方的安全，维护西方的利益。^①然而，在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似乎要复杂得多，且不说西方的政治模式是否适合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即便政治变革朝着西方所鼓动的民主化方向发展，也不一定就能确保西方国家利益的实现，尤其是在穆斯林世界，如果让人民自由表达愿望，用西方所欣赏的民主方式选择政府，西方的利益可能会荡然无存。原因十分简单，第一，在一场自由竞争的选举中，穆斯林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所有与美国和西方结成盟友的政府都可能败北，失去对权力的长期垄断；第二，在民主化过程中获得权力的新统治者可能会是那些对西方恨之入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即使世俗主义占了上风，这些新的政治权贵也不一定就是西方的盟友；第三，政治民主化还有失去控制，使整个社会陷入动乱和内战的危险。^②这样的一种政治前景（实际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民主化实验已证明这是一种政治现实）有力地阻止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① Joan L. Esposito and John O. Voll, *Islam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6, P.19.

② Graham E. Fuller and Irn O. Lesser, *Persian Gulf Myths*,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3, May-June 1997, P.46.

在穆斯林世界推动和鼓吹政治民主化的热情。从过去的经验和长远的观点来看，维修现状也许孕育着更大的危险，然而，对于这些既得利益者来说，维持现状也许是目前最好的选择。由此我们看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依然同那些保守的国家结成政治和军事上的盟友，甚至对一些穆斯林国家明显的侵犯人权和政治变革中的倒退行为视而不见。1990年，为奖赏埃及在海湾危机中的表现，西方国家免除了总额达170亿美元的债务，与此同时，埃及大部分反对党正指责政府对伊斯兰反对派的镇压和选举舞弊，进而抵制了1990年的议会选举。在阿尔及利亚，军方取消了1992年1月的大选，然而在此后的两个月内，政府却从西方得到了15亿美元的贷款，并得以重新安排其债务支付。

从整个穆斯林世界来看，政治发展和政治变革呈现某种极为复杂的局面，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变革远不会是西方所期望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它必定带有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特征。同时，从目前的情形看，阻碍政治变革的力量远比促进政治变革的力量强大，在可预见的未来，现有的政治结构依然会主导穆斯林社会。

第七章 政治变革进程中的伊斯兰组织

大部分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变革，是以政府对政治变革进程的高度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反对党和反对派的存在为主要特征的。所以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变革，远不是西方国家所鼓动或所期望的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伊斯兰组织作为最为强大的政治异己力量，在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受到严厉的打击或严格的限制。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有限的政治变革确实给不少伊斯兰组织提供了比以往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使得他们有可能在不使用激进的手段与方法的情况下，合法进入政治过程，获得对权力的控制。

第一节 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

一、沙德利总统的政治变革与 1990 年的地方选举

1988 年 12 月，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开始了他的第三任总统任期，在前后短短的 9 个月（1988 年 10 月～1989 年 7 月）中，他开启了到目前为止阿拉伯世界最为激进的政治变革。根据 1989 年 2 月经全民公决通过的新宪法，阿尔及利亚取消了所有与社会主义有关的条文，以及那些曾经对阿尔及利亚政治认同和政治发展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原则。新宪法还保证人民的言论、交往和结社的自由，赋予人们政治结社和罢工

的权力。5月，另一项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付诸实施。担任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阵）中央委员的高级军官退出现役，军队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得到限制。7月5日，政府又颁布了“政治结社法”，允许多党并存，在很短的时间内，正式组建并登记注册的政党几达30个，其中包括伊斯兰拯救阵线。^①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改革无异于一场革命，自1962年独立以后，支配阿尔及利亚政治生活近30年的政治三角——民族解放阵线、军队和政府官僚（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老战士）——顷刻间土崩瓦解。沙德利的政治变革开启了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但同时他也打开了通向内战和政治混乱的地狱之门。

根据1989年7月通过的新选举法，反对党可以参加选举，并在议会中占有席位。地方选举原定于1989年12月进行，由于大多数政党抱怨时间紧迫，不能为选举作好准备，因此选举被推迟到了1990年6月。选举前的阿尔及利亚，政治与社会局势十分不稳。1989年9月，沙德利总统认为卡斯迪·梅尔巴赫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进程，解除了他的总理职务，新任总理哈姆鲁凯一上台，就下决心要切断党（民阵）和国家的联系，通过与其他政党、商会和人民群众的对话，完成国家的转变。在民阵内部，组织与思想的混乱也达到新的极点。在1989年11月底召开的特别会议上，许多人对突然到来的政治多元化忧心忡忡，一些人则在发言中发泄对布迈丁统治时期的不满，更有一些代表显示了强烈的伊斯兰情绪，民阵实际上分裂为四个派别：支持沙德利总统的改革派，反对改革的“新布迈丁主义者”，对政治变革感到恐惧的官僚和支持伊斯兰化的伊斯兰主义

^①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6.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5, London, England. P.260

者。^① 1990年3月，民阵在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宣称实现了党内的团结一致。然而，未过多久，曾经担任过总理的布拉希米就发表声明，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政府官员接受的贿赂多达260亿美元。至此，民阵的声誉可谓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利用新宪法所赋予的权利，用罢工和示威游行来发泄不满和表达意愿。据统计，在新宪法通过以后的一年中，工人的罢工次数增加了25%，每个月平均250次。1990年初，学生为了抗议警察的暴行而走上街头；妇女则分成了两派，有的为恢复伊斯兰传统的妇女地位而呐喊，有的则为反对这种倒行逆施而奔走。此时的阿尔及利亚，罢工、示威游行，乃至街头暴力成了不同社会集团利益表达的主要形式。

1990年6月12日，阿尔及利亚举行了市政与地方选举，65%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伊斯兰拯救阵线（简称伊阵）赢得55%的选票，在853个市政和32个省议会占据了多数议席，而垄断政治近30年的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仅获得32%的选票，只在487个市政和14个省议会中占有优势，在奥兰和康斯坦丁，伊阵赢得的选票则分别高达70.5%和72%。^②

阿尔及利亚的地方选举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和影响。从地区层面看，它是阿拉伯世界第一次多党民主选举，它的成败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影响巨大。在阿拉伯世界，由于各国在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广泛联系，因此，一国的政治变动往往在其他国家引起巨大的反响，并对现有的政治结构形成强烈的冲击。从国际层面看，伊斯兰拯救阵线是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取得

① Edited by John Ruedy.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North Africa*,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P.236.

② Francois Burgat, *The Islamic Movement in North Africa*, trans. William Dowell Austin;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exas, 1993, P.279.

胜利的伊斯兰政党，它所形成的挑战和影响更是难以估量。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欧国家把民主化当作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民主化却把强烈敌视西方的伊斯兰主义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如果穆斯林世界的民主化意味着伊斯兰化，意味着伊斯兰主义者可以通过选举控制国家权力（无疑，这样一种前景在许多国家都是存在的），西方国家的许多既得利益将面临严峻挑战，其外交政策也会陷入两难的境地。伊斯兰拯救阵线的胜利与伊朗伊斯兰革命不同，它不是通过群众性的革命，而是经由“投票箱”^①获得对权力的控制。因此，它对于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和伊斯兰组织都形成了强烈的震撼，那些长期以来与现存社会政治秩序格格不入、企求以实现伊斯兰教法统治为目的的伊斯兰组织，可能会从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发展中获得灵感，越来越指望通过体制内的斗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各国的统治当局所看到的却是政治民主化的巨大风险，他们不仅在政治变革中裹足不前，而且几乎毫无例外地把伊斯兰政党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

毫无疑问，阿尔及利亚地方选举所造成的最大影响还是在其国内。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地方选举中的胜利，表明阿尔及利亚的国内政治生态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仅厌恶了长达数十年的由民族解放阵线独揽权力的权威主义政治，渴望实现社会的多元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而且对阿尔及利亚的世俗化进程和法国殖民主义的“遗产”失去了兴致，试图通过伊斯兰主义实现社会的回归。然而，经历了200余年法国殖民统治和近30年的“社会主义”之后，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只会引发社会动乱，正如美国的一位著名伊斯兰学者所

^① John L. Esposito & John O. Voll., *Islam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61.

说,“改革之路即是毁灭之途”。^①

二、伊斯兰拯救阵线的崛起

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地方选举中的胜利仅是其力量的初步显示。1991年12月的议会选举才真正展示了伊斯兰拯救阵线的强大影响。与地方选举前政府的盲目自信不同,伊阵在地方选举中的杰出表现已引起民族解放阵线和军方的高度警觉。1991年4月初,政府宣布,议会选举将于6月27日举行,同时还建议对选举法进行修改:在第一轮投票中,那些没有任何候选人得到绝对多数的选区将举行第二次投票,严格限制利用清真寺助选和代理投票,同时选区的数目从290个增加到540个。^②政府利用选举法的修改来抑制伊阵,招致伊阵的激烈抗争,5月,伊阵领导人迈达尼发动了无限期的总罢工,并要求沙德利总统辞职,而政府则使用武力镇压和逮捕伊阵领导人及其支持者予以回击——伊阵的主要领袖迈达尼和贝勒哈吉双双被捕,并以“煽动、组织、发动和领导危害国家安全的武装密谋”等罪名,被军事法庭判处了12年的监禁。当政府以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对伊阵进行压制的时候,伊斯兰势力内部也发生了不利于伊阵的变化,一方面,伊阵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分歧不时显露(如是不是支持伊拉克),另一方面,那些对伊阵有所不满和不同意伊阵经济与社会主张的伊斯兰主义者逐渐汇集在了贾巴拉赫和纳赫纳赫周围,组成了两个新的伊斯兰政党,即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哈马斯,这不能不分散和削弱伊阵在未来选举中的政治动员能力。

^① Ibid., P.161.

^②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6.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5, London, England. P.262.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能阻止伊阵在全国大选中取得胜利。参加竞选的 49 个政党，提出了 5712 个候选人，另有独立候选人 1000 余，争夺议会的 430 个席位。选举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伊阵一举拿下了 188 个议席，而长期执政的民阵只获得 15 席，以落后于阿依特·艾哈迈德领导的社会主义力量阵线的 25 席，屈居第三。从理论上讲，伊阵只要在第二轮选举中从剩下的 199 席中赢得 20 席，就可在新的议会中占据多数，从而获得组阁的权力，换言之，如果不出意外，穆斯林世界将出现第一个民主选举的伊斯兰政府。

伊阵在阿尔及利亚政坛的崛起不是偶然的。1962 年独立以后，民阵在保持政治垄断的同时，在经济上大量搬用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工业化、国有化、计划体制等构成了阿尔及利亚主要的经济特征，尤为重要，阿尔及利亚的经济主要是由石油工业来支撑和带动的。整个 70 年代，甚至到 80 年代中期，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美好：尽管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时有发生，但是，由党（民阵）、军队和国家（政府官僚）所组成的三角架构依然能够保持政治的稳定和连续性；石油收入持续增长，既带动了经济的快速成长，也给人民带来了实惠，更为重要的是，丰厚的石油收入使政府一直能够保持庞大的开支，在维持快速工业化的同时，把大量金钱用于进口食品的补贴和社会福利事业。^① 于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发展战略的缺陷、不合理的政府开支、人口的过快增长、农业的萎缩以及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等问题都掩盖在石油所带来的繁荣之中。然而，80 年代中期石油价格的暴跌使所有的问题都浮上了台面，尤其是失业增加和住房与食品的匮乏更加深了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不满。1988 年 10 月，一场席

① Edited by John Ruedy,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North Africa*,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P.225.

卷全国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在阿尔及利亚爆发，这场危机既促成了沙德利的政治民主化变革，也为伊斯兰拯救阵线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阿尔及利亚从来就不是伊斯兰运动发展的中心，既没有载誉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宗教机构，也没有出现像霍梅尼或图拉比那样的伊斯兰思想家，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伊斯兰主义不会成为政治中的有生力量，伊斯兰教——作为阿尔及利亚大多数居民的信仰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从来就是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伊斯兰教在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是世所公认的，即使是领导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并在独立后长期执掌权柄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也不能无视伊斯兰的影响，除了在一些社会事务上（如在一些城市禁酒、增加学校中的宗教课程等）对伊斯兰进行妥协之外，“还试图把伊斯兰教嫁接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当中”。^① 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这些举措一方面反映了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持久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世俗的民族主义政府力图把伊斯兰教置于一种可以控制的地位，并进而巩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在民族解放阵线独揽政权的整个时期，伊斯兰教一直处于政治边缘，虽然从 60 年代末开始，各种形式的伊斯兰运动不时浮现，有时甚至与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然而，他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即使是 1988 年发生的全国性骚乱，也没有证据表明是伊斯兰主义者一手策划和组织的。我们强调这一点只是想说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愈来愈背离伊斯兰传统以及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广泛存在，并不意

^① Edited by Bruce Maddy · Weitzman & Efraim Inbar, *Religious Radicalism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Frank Cass & Co. Ltd. 1997, London. P. 179.

意味着伊斯兰运动一定会勃起，更不意味着伊斯兰主义会成为政治竞技场的重要力量，如果政府有足够的管理与控制能力，伊斯兰势力就很难进入政治过程。在阿尔及利亚，如果说伊斯兰教的广泛存在为伊阵的崛起提供了群众和思想基础，长期存在的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和道德沦丧以及文化的异化为伊阵的崛起积累了经济和社会基础，那么，沙德利所开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则给伊阵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基础——如果伊阵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党，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迅速的扩张。

在组织结构上，伊阵最大限度地把反对现政府的各种伊斯兰势力拉入自己的阵营。事实上，它是一个由力图用伊斯兰方法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把恢复伊斯兰乌玛当作力挽危局的唯一手段的传统伊斯兰普世主义者以及所谓的阿富汗斗士所组成的联盟，这些阿富汗斗士崇尚暴力和恐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曾经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伊斯兰圣战者一起接受过训练。^①伊阵对不同政治倾向的伊斯兰力量的广泛接纳，促成了伊阵实力在短时期内的迅速扩张，与此同时，遍布全国城乡的清真寺，^②以及由清真寺或伊斯兰组织建立的社会福利和救助机构，都成了伊阵宣传政策主张、谴责政府和进行政治动员的基层组织。尤其是每周的星期五聚礼更成了伊阵进行政治鼓动的良好机会，以至于政府不得不修改选举法，严禁利用清真寺和周五聚礼展开竞选活动。正是伊阵在组织结构上的包容性和遍及全国的基层联系网络为伊阵在选举中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① Edited by Haifaa A. Jawa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New World Order*,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London, P. 49.

② Martin Stone, *The Agony of Algeria*,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1997, London, PP. 158~163.

三、陷入内战的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议会选举的结果使所有的观察家感到震惊，虽然许多人以投票人数少（仅有 59% 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伊阵的得票率比地方选举时有所下降等理由极力贬低伊阵在选举中的胜利，^① 然而，不容否认的现实是，如果第二轮选举如期举行，伊阵将轻而易举地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如此，一个由伊斯兰政党控制的政府已是呼之欲出。

伊阵的胜利使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发展方向面临抉择，一方面，伊阵拒绝了与沙德利总统分享权力的可能，要求任命迈达尼为总理，并举行总统选举；另一方面，世俗力量惶恐不安，在举行示威反对建立伊朗式政权的同时，移居国外的浪潮悄然卷起。沙德利总统已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他既不能诱使伊阵与之分享政权，又不能说服军方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在军方的强大压力下，沙德利于 1992 年 1 月 11 日辞去了总统职务，本应临时接掌总统权力的议长早已因“过于接近原教旨主义者”^② 而去职，于是，由军方任命的以布迪亚夫为首的五人最高国务委员会被赋予了总统的权力。布迪亚夫是一位曾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战士，早在 1964 年就因与本·贝拉意见不合而流亡国外，他的归来只是为军方装饰门面，真正控制权力的是国防部长纳扎尔。与此同时，军方实施戒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不承认议会第一轮选举结果，并无限期取消了第二轮选举。紧接着，伊阵被取缔，其领导人和成员，甚至同情者遭到军方搜捕，据报道，大约有 10000

^① Robert Mortimer, *Islamists, Soldiers, and Democrats: The Second Algerian War*,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inter 1996, Vol. 50, No. 1, P. 25

^② Alfred Hermida, *Algeria: Democracy Derailed*, *Africa Report*, Vol. 37, No. 2, (March - April, 1992): 15.

多人被投进了位于撒哈拉沙漠中的集中营。^① 军方从幕后走到台前，用强力直接干预政治发展进程，表明阿尔及利亚的民主变革发生了重大的逆转。在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伊阵发表声明，号召老战士、知识分子、宗教领袖、高级军官和士兵以及所有热爱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起来反对军方的镇压，^② 与此同时，那些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议席的政党，如长期执政的民阵和代表伯伯尔人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阵线等也对军事政变进行了谴责，民阵甚至号召所有的政党，包括原教旨主义政党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反对军方的暴行。^③

如前所述，伊阵是一个由不同政治与宗教取向的派别组成的伊斯兰政治联盟，从成立之初到赢得第一轮议会选举，它从来也没有系统阐述过其政治纲领。一方面，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政党，它有着现成的政治理想（先知的政治实践和传统）和群众基础（广大的信教者），它只要对政府的种种丑行和无能、社会的问题和弊端进行不断的揭露和批判，就足以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或支持；另一方面，内部派系的林立、政治与宗教主张的差异也阻止了共同的政治纲领的产生。然而共同纲领的缺乏并不足以阻止不同派别的联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伊斯兰化、反对现政府成了不同伊斯兰派别走到一起的主要动因。在伊阵内部，占主导地位是迈达尼所代表的温和路线，在政治上，它摒弃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鼓吹伊斯兰方案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但它试图在伊斯兰和民主政治之间建立桥梁，认为只有在伊斯兰民主的框架内，公正、自由和平等才能得到最好的实践；在

① John L. Esposito & John O. Voll, *Islam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66.

② *The Economist*, January 18, 1992, P.42.

③ James Ciment, *Algeria: The Fundamentalist Challenge*, Facts On File, Inc.1997, New York, P.171.

经济上，伊阵并没有为改革设计一个蓝图，但它显然对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的改革持赞成的态度。贝勒哈吉则是伊阵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更倾向于迅速在阿尔及利亚推行伊斯兰教法，用激烈的方法与政府进行对抗，^① 并认为伊斯兰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所有的法律和习惯都已在《古兰经》、逊奈和哈底斯中得到确立，多元政治既与伊阵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也与人民的信仰相违背。^②

如果说伊阵参加多党选举，表明迈达尼的温和路线在党内占了上风，而伊阵在地方和第一轮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也使伊阵的团结得以维持的话，那么，军方的镇压就是催化剂：它促成了伊阵的彻底分裂，并使伊阵中的激进派最终走上了与军方控制的政府进行对抗的道路，从此，阿尔及利亚无可救药地走上了内部战争的不归路。在这场战争中，一方是政府的警察和安全部队，他们把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作为主要的目标；另一方则是从伊阵分裂出来的伊斯兰武装集团和名义上仍从属于伊阵的伊斯兰救世军，另外还有一些小股的极端帮派活动在城市和遥远的山区，他们用绑架、暗杀、爆炸等恐怖主义手段，把目标对准政府官员、新闻记者、外国游客和普通民众。他们甚至袭击学校、医院和交通工具等民用设施，并不时把恐怖活动扩散到其他国家。除此之外，不同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之间还经常为各种原因大打出手。从1992年到现在，政府军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以及不同的伊斯兰派别之间究竟发生了多少次冲突我们不得而知，死亡人数更是永远也不会有确切的统计。

① John L. Esposito & John O. Voll, *Islam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58 - 161.

② Martin Stone, *The Agony of Algeria*,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1997, London, P.165.

1994年9月，阿尔及利亚总统府公布有3万多人死亡。1996年底，大赦国际认为至少有5万人死亡，而反对派则估计，大约有8万人已在这场战争中死于非命。^① 到目前，我们仍然看不到这场内战何时才是尽头。

四、重建国内和平

1994年1月31日，阿尔及利亚最高国务委员会提名泽鲁阿勒将军担任国家元首，从此，重建国内和平的重任就落在了这位前国防部长的身上。概括起来，泽鲁阿勒总统恢复国内和平的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试图以此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化解人民的不满。泽鲁阿勒一上台就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加快了经济改革的速度：通过削减政府对食品的补贴和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把预算赤字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3%降低到5.4%；阿尔及利亚第那尔贬值40%以上，并适当提高利率；放弃对物价的控制，实施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与此同时，政府还有选择地对那些效益低下、管理不善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变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不能在短期内推动经济的增长，它基本上是一种着眼于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战略，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它所带来的当下后果则是失业和生活水平下降。然而，阿尔及利亚的经济改革，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西方国家的高度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康德苏甚至夸张地把阿尔及利亚的表现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② 并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阿尔及利亚提供新的贷款。

^① 新华社，巴黎，1997年1月8日法文电。

^② Francis Ghiles, *Is Algeria Staring Disaster in the Fac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17 Feb. 1995: PP. 16~17.

与此同时，由西方债权国组成的巴黎俱乐部也接受了阿尔及利亚的申请，同意对债务做出新的安排，其结果，阿尔及利亚大约一半的债务得以减免。另外，通过与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双边安排，阿尔及利亚也获得不少的资金，以改造它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扩大生产和出口能力。^①

第二，继续加强对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镇压，同时推动与反对派对话，以实现全国的政治和解。泽鲁阿勒上台伊始就执行了一种与前任有所不同的政策，那就是在维持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派别高压政策的同时，力图拓宽政治对话范围，把所有摒弃暴力的伊斯兰组织，包括被取缔的伊阵，纳入到政治和解的进程中来。实际上，早在泽鲁阿勒担任国防部长时就曾亲往监狱，会见被关押的伊阵领导人，因此，当他被任命为总统时，伊阵领导立即发表了向他示好的声明，呼吁极端组织把他们的攻击目标限制在安全部队的成员，而不是外国公民和阿尔及利亚平民。^② 1994年2月底，政府释放了伊政的两个领导人，并在整个夏天保持了与迈达尼和贝勒哈吉的接触和会谈。然而，由于双方在结束伊斯兰武装叛乱、释放伊阵成员和领导人以及恢复伊阵合法地位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与此同时，反对派也开始协调立场，于1995年1月中旬聚集罗马，开出了与政府谈判的六个条件，主要内容包括：“反对将暴力作为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工具；尊重多党制和通过普选实现政治替代的原则；保证个人和集体的基本自由，不分人种、性别、信仰和语言；释放伊阵领导人和所有政治犯；建议建立一个由政府 and 反对派组成的过渡

① Mahmud A. Faksh, *the Future of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Fundamentalism in Egypt, Algeria, and Saudi Arabia*, Praeger Publishers, 1997, U.S.A., P.77.

②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6.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5, London, England, P.268.

机构；进行自由选举。”^① 政府完全拒绝了罗马协议，然而，罗马会议本身却并不是毫无意义，它至少表明，包括伊阵在内的反对派接受了与现政府对话的现实，而不是一味地否认其政治合法性，同时，罗马协议的一些内容在肯定伊阵的作用与地位的同时，也对伊阵进行了限制，使它第一次公开地承认政治多元、权力分享和文化多样等民主的政治原则。^②

第三，在与反对派对话的基础上，推动民主化进程，逐步建立合法政府。在推进经济改革、强化对极端分子的打击以及加强同反对派对话的同时，泽鲁阿勒总统采取了另外一种更为主动、也更具冒险性的全国和解战略，那就是通过选举，让全体阿尔及利亚人对自己的未来作出抉择，用泽鲁阿勒总统自己的话说，就是“与人民进行直接的对话”。我们说这是一种主动战略，是说政府不想让与反对派的对话变成一种负担，把和所有反对派的协商一致当作实现和解的惟一前提。事实上，由于立场和利益的不同，不仅政府和反对党之间，即使反对派阵营内部，其不可协调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样的一种战略也存在极大的冒险性，泽鲁阿勒获胜的前提是：他必须证明他与所有反对党的对话是真诚的；他必须使相当一部分反对党同意他的选择；他必须让大多数民众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够实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最后，选举进程是可以控制的。如果所有的反对党拒绝参选，总统选举成了泽鲁阿勒的独角戏；如果民众对选举持怀疑或冷漠的态度，就没有足够的选民参加投票；如果极端分子的破坏使选举流产，或者选举又一次出现意外（就像1991年议会选举），那么，阿尔及利亚将陷入无底深渊。

① 《人民日报》，1995年1月15日。

② Mahmud A. Faksh, *the Future of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Fundamentalism in Egypt, Algeria, and Saudi Arabia*, Praeger Publishers, 1997, U.S.A. P. 79.

从1995年11月到1997年10月，阿尔及利亚一共举行了四次大规模的选举和投票活动。第一次是1995年11月16日的总统选举，包括泽鲁阿勒在内，一共有4人参加了竞争总统的角逐。虽然伊斯兰拯救阵线和其他7个反对党抵制了大选，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甚至威胁要把投票箱变成棺材，然而，选举还是取得了成功，大约74.92%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哈马斯领导人纳赫纳赫获得25.38%的选票，争取文化和民主联盟总书记萨迪得到9.29%的选票，革新党主席布克鲁的得票率仅为3.98%，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泽鲁阿勒得票率则高达61.01%。^①1996年11月28日，阿尔及利亚举行了第二次全国性投票，把新修订的宪法草案付诸全民公决，宪法除了扩大总统的权力，严禁以宗教、语言、种族、性别、社团主义和地方主义为基础成立政党，还对选举制度作出了重大修改，同时，阿尔及利亚第一次明确规定阿拉伯语是惟一的官方语言。投票结果，85.81%的阿尔及利亚公民接受了新的宪法，从而也就为1997年举行的议会和地方选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7年6月5日和10月23日，阿尔及利亚分别举行了议会和地方选举，新成立的支持泽鲁阿勒总统的全国民主联盟取得胜利，至此，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建设和民主化进程，以泽鲁阿勒的完全胜利而告终。第一，曾经在政治和社会中都有着广泛影响的伊阵被彻底排斥在政治发展进程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伊阵的存在已是无足轻重；第二，大部分的反对派接受了政治现状，愿意在现行体制内开展政治竞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伊斯兰社会运动（哈马斯），它不仅易名和平社会运动以适应宪法和政党法的要求，而且还成了政府的盟友；第三，也许是最为重要的，泽鲁阿勒完成了政权的制度化和合法性建设。自从军方接管政权后，无论是在一般民

^① 法新社，阿尔及利亚，1995年11月17日法文电。

众或反对派眼中，还是在国际社会，阿尔及利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合法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政府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多么合理，其权威性和合法性都会受到人们的怀疑。通过选举，政府的既往政策得到了肯定，同时，它也获得了进行新的政策选择的授权。

然而，阿尔及利亚的未来仍难以捉摸，一个原因是，体制内的伊斯兰主义势力不可低估，在总统选举中，纳赫纳赫的得票率名列第二，在议会选举中，哈马斯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分别获得69席和34席，是议会中的第二大政治势力，他们的发展方向和政治选择与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稳定息息相关。其次，被排斥在体制外的伊阵不甘寂寞，在国内和国外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同时，激进的伊斯兰好战组织仍不时制造事端，对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稳定和民众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第三，阿尔及利亚民众是为社会的稳定和自生的安全而投票，一旦政府的政策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民众的不满就会给反对政府的伊斯兰势力提供巨大的政治机会，实际上，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和冷漠早已有所流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只有65.5%，地方选举的投票率为66.19%，如果考虑到参加投票的人把相当的选票投给了反对党，那么，真正支持泽鲁阿勒的选民并没有多少。最后，也许是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所推动的经济改革是否能取得成功。从1995年开始，阿尔及利亚的经济逐步好转，大致维持了4%左右的经济增长，尤其是1997年，阿尔及利亚在农业减产、石油价格疲软的情况下仍实现了4.5%的增长，看来经济结构调整已取得明显的成效，越来越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① 只有获得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缓解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压力，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才会真正到来。

^① 《中东经济文摘》，伦敦，1997年9月12日。

第二节 埃及：排斥伊斯兰的政治

一、埃及政治变革的进程

从70年代开始，埃及政治制度逐步开始了谨慎变革的进程，其主要的特征是，在确保政治强人权威（先是萨达特，后是穆巴拉克）和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优势的前提下，使埃及从一个一党垄断政府和议会、实施严格新闻控制的国家逐步向容许政治反对派存在、实行有限新闻自由的多党制权威主义国家过渡。

1970年11月，萨达特成为埃及的新一任总统，从此，埃及开始了一个对其内外政策进行激剧调整的十年。在经济领域，萨达特逐步放弃了纳赛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而实施“开放”的政策，试图通过引进外国投资和鼓励私有企业实现埃及经济的发展。在对外关系领域，埃及的变化更为剧烈，首先，为了使埃及摆脱战争的负担，萨达特不惜得罪整个阿拉伯世界，单方面与以色列实现了和平，同时，萨达特逐步疏远苏联，与美国和西方结成了同盟。显然，与纳赛尔充当阿拉伯盟主的泛阿拉伯主义不同，萨达特追求的是埃及第一主义。与经济和外交领域的调整相呼应，埃及的政治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上台伊始，萨达特就以“纠偏”为名义，修正纳赛尔时期的过激政策，归还被没收的财产、关闭拘留所、约束警察行为、重新任命被纳赛尔解职的法官，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他下令焚烧了大量由秘密警察所保存的档案。^① 1971年，埃及颁布了第一部永久性宪法，宣称政府将依

① Raymond A. Hinnebusch Jr., *Egyptian Politics Under Sadat: the Postpopulist Development of an Authoritarian - Modernizing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0

据法律实行统治，确保国际公认的政治自由和人权，一家法律杂志甚至宣告，埃及不像新生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源于人民意志的宪法的国家。”^① 1976~1978年，萨达特对政治体制进行了更为重要的变革，他试图通过政党合法化，在确保反对派实力不会过分强大的前提下，逐渐改变一党统治。1976年3月，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形成了3个集团，同年11月，这3个初具政党雏形的政治集团就参加了议会选举。1977年，萨达特组建了以他为主席的民族民主联盟，次年，一个正式的反对党社会主义劳工党在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建立起来。^②

萨达特的政治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求生”战略，面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各种政治势力的压力，他激活了一些过去受到压制和排斥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并允许他们在一定的范围内展开活动，以图在这种互相矛盾的力量冲突中，确保对权力的控制。同时，萨达特缺乏纳赛尔所特有的个人魅力和广泛的感召力，一些制度性变革（如可控制的多党选举、修改宪法等）无疑将有助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立。由此，我们看到，当1971年宪法对政治自由和实行法制作出承诺的同时，总统也被赋予更大的权力，而人民议会的作用“更像是橡皮图章而不是决策机构”。^③ 所谓的多党并存也不过是承认了原执政党内的不同派别，政府随时可以限制或取消它们的活动。真正对萨达特构成挑战的新华夫脱党和穆斯林兄弟会却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1980年

① Raymond William Baker, *Sadat and After: Struggles for Egypt's Political Soul*, I.B Tauris & Co.Ltd., London, 1990, P.59.

② Najib Ghadbia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slamist Challenge in the Arab World*,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1997, P.89

③ Ibid, P.90.

夏，因经济困难、政策失误和同以色列媾和而引发的社会不满达到极限，当穆斯林与科普特人的冲突不断增加的时候，萨达特便对包括伊斯兰主义者、纳赛尔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科普特人在内的所有反对派实行了镇压和搜捕，大约有 1000 名反对派人士遭到关押。

在穆巴拉克统治下，埃及的政治变革继续维持了萨达特所开创的模式，所不同的是，穆巴拉克在允许更多的政党合法化的同时，日趋把伊斯兰主义势力当作主要的反对目标。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伊斯兰主义实力的增强和政府与伊斯兰主义对抗的不断升级，埃及的政治变革实际上陷入了停顿。

1984 年初，政府使新华夫脱党实现了合法化。同年，埃及举行了穆巴拉克统治下的第一次议会选举，由于选举法规定只有那些至少得到 8% 选票的政党才能在议会中占有议席，因此，除了新华夫脱党，其他的反对党都被议会拒之门外，值得注意的是，处于非法地位的穆斯林兄弟会与新华夫脱党结成了同盟，并在议会中获得 8 个席位。1987 年，最高宪法法院宣布 1984 年的选举违背宪法，因为它不允许独立人士参加选举，一次新的选举看来势在必行。护法机构的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似乎表明，埃及的民主正走向成熟，然而，事后才清楚，穆巴拉克此举不过是为他获得第二任期总统提名预做准备。^①尽管如此，1987 年的选举还是意义重大，一方面，进入议会的反对党和反对党所控制的议席都有所加强，另一方面，穆斯林兄弟会不仅使社会主义劳工党和自由党同意和它结成伊斯兰联盟参加竞选，而且一举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反对党（参见表 7-1）。

^① Ibid, P.91.

表 7-1 埃及 1987 年议会选举结果^①

党 派	席位数	得票率%
民族民主党	364	69.3
伊斯兰联盟*	60	17.0
新华夫脱党	35	10.9
民族进步联盟**	-	-
乌玛党**	-	-
独立人上***	7	-
总计	448	100

* 穆斯林兄弟会占有 37 席。

** 这些政党没有得到选举法所要求的最低 8% 的选票, 因此不得占有议席, 他们所获得的选票被转给了民族民主党。

*** 根据新选举法, 给予独立人上的席位共 48 席, 但他们中的 41 个人隶属于民族民主党。

进入 90 年代, 埃及的政治变革继续取得小的进展。1990 年, 在反对派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 臭名昭著的内政部长巴德尔被解除职务; 同一年, 三个力量弱小的政党得到法律的认可。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埃及的政治变革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一方面, 穆斯林兄弟会对一些社会组织的控制和在选举中的不俗表现使政府感到震惊, 另一方面, 穆巴拉克已从阿尔及利亚混乱中看到政治民主化的巨大风险。因此, 打击反对派势力, 限制政治变革的进程, 越来越成为埃及的现实政策选择, 早在 1990 年的选举中, 政府就拒绝了反对派提出的取消内政部对选举的监视和中止紧急状态法的请求, 1995 年大选前一个星期,

① *Egypt,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88*,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td., 1987), P.368; Charles Tripp and Roger Owen, eds., *Egypt Under Mubarak* (London: Routledge, 1987), P.41.

更是对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的政治反对派进行了集中清洗，根据一个独立的人权组织的报告，1995年的议会选举，实际上成了政府对反对派进行全面镇压的运动，是埃及最近的历史中最恶劣的一次选举。^①

二、穆斯林兄弟会与政治变革

60年代末，也就是纳赛尔统治的最后几年，穆斯林兄弟会遭到灭顶之灾，在纳赛尔的高压政策之下，兄弟会的成员有的流亡国外，有的被关押和处决，还有的干脆走上了与政府进行正面对抗的道路。萨达特成为埃及总统之后，为化解纳赛尔主义的挑战，他不仅释放了被关押的兄弟会成员，允许流亡国外的兄弟会领导人返回埃及，他实际上还鼓励伊斯兰势力在大学、专业机构和商会中扩大影响，尤为重要的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伊斯兰作用也得到强化。1971年的宪法就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法是“立法的主要渊源”。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也选择了一种温和的、在现行体制之下展开活动的战略。首先，它与政府保持了一种谨慎的合作关系。在反对纳赛尔左派的斗争中，穆斯林兄弟会和政府是一种同盟关系，然而，对萨达特的经济改革、与以色列媾和及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穆斯林兄弟会却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第二，在是否参与政治进程的问题上，穆斯林兄弟会也十分谨慎。萨达特曾经以穆斯林兄弟会的合法化和允许其成员进入协商会议为条件，诱使穆斯林兄弟会缓解对政府的批评。而穆斯林兄弟会则认为，由于负责党派注册的社会事务部享有随时解散社团、改组董事会，并在行政、技术和财政等方面进行监督的权力，因此，合法化没有任何意义，至于进入协商会议，穆斯林兄

^①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Egyptian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al - Wafd, Dec. 29, 1995, PP.1~3.*

弟会的领导人则认为，由于协商会议的成员是任命而非选举，因此可能因欠下任命者人情而丧失立场，从而拒绝了萨达特的建议。^① 第三，穆斯林兄弟会积极扩张推动在社会组织中的力量，但避免在政治上激怒当局。一方面，萨达特的开放政策使政府开支减少，政府逐渐从许多社会福利机构中退了出来，另一方面，利用清真寺和附属于清真寺的机构进行救助和慈善活动本来就是穆斯林兄弟会传统的活动方式之一。正是在萨达特统治时期，穆斯林兄弟会逐步建立了一个影响广泛的经济、教育、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网络，并控制了相当的学生组织和行业协会。第四，通过自己控制的新闻工具，尤其是《呼声》杂志，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呼吁它的成员“最大限度地利用萨达特政府所准许的和平手段，为建立伊斯兰社会而努力”，^② 并主动与伊斯兰极端势力保持距离。

在穆巴拉克时期，穆斯林兄弟会似乎进一步加快了对专业协会和社会救助机构的控制。到1993年，它已经在医生、药商、工程师、教师等行业工会、大学教授协会和学生会以及相当数量的慈善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仅在开罗和亚力山大两地，就有约9000家机构为那些需要救助的人们提供福利、就业和教育服务，^③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当今的埃及，实际上“有一个向民众提供保护和教育的伊斯兰基础设施。”^④ 与此同时，穆斯林兄

① Raymond William Baker, *Sadat and After: Struggles for Egypt's Political Soul*, I.B.Tauris & Co.Ltd., London, 1990, P.245.

② Ibid., P.246.

③ Azzam Tamimi, ed., *Power - Sharing Islam?* Liberty for Muslim World Publications, London, 1993, P.166.

④ Nayib Ghabbia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slamist Challenge in the Arab World*,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1997, P.102

弟会还进一步调整战略，试图完全变成合法政党，进入政治过程。如前所述，在1984年，它与新华夫脱党结盟参加了议会选举，并赢得了8个席位。1987年，它又与另外两个政党联合起来参加选举，赢得37个席位，一举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反对党。这种合法的政治实践，一方面体现了穆斯林兄弟会在现行体制内进行合法斗争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它对民主参政的信心，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位领导人就断言，“不论当局想做什么，只有名符其实的民主才是解决危机的惟一方法，通向美好未来的惟一道路。”^①

纵观穆斯林兄弟会与现代埃及政府的相互关系，这样的几点结论似乎是成立的，第一，在大部分时期，穆斯林兄弟会不是一个合法的组织，但只要它不对政府的权威构成直接的威胁，它的存在和发展一般都得到政府的容忍；第二，政府经常把穆斯林兄弟会当成平抑其他社会政治势力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一旦目的达到，或者政府感到了伊斯兰的威胁，穆斯林兄弟会就成了替罪的羔羊；第三，虽然穆斯林兄弟会是许多极端组织的母体，但其主流是温和的，循序渐进和在现行体制下进行合法斗争是他们主要的政策选择。

三、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

大约在60年代末，埃及出现了一些伊斯兰激进组织，他们从库特卜的著作中汲取灵感，从根本上否定现存一切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把推翻现政府当作一种宗教义务，用绑架、暗杀、爆炸等各种暴力手段对埃及政府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圣战”。

^① Azzam Tamimi, ed., *Power - Sharing Islam? Liberty for Muslim World Publications*, London, 1993, P.168.

伊斯兰极端组织把圣战的首要目标对准了政府和政府官员。在他们看来，伊斯兰社会的衰落和腐败的流行，究其根源是政治权力落入了那些不能恪守和推行伊斯兰教法的官僚手中。因此，从70年代开始，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安全部门的官员就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打击的首选目标。1974年，伊斯兰解放组织试图夺取军事技术学院，发动军事政变；1977年，一位前宗教事务部部长遭到绑架和杀害；1981年，萨达特总统遭刺；1990年，前议长被谋杀；1995年6月，穆巴拉克在埃塞俄比亚死里逃生。在袭击政府官员的同时，好战的伊斯兰组织还把那些代表或体现西方文化的酒吧、夜总会、电影院、音像商店和新闻出版机构当作攻击目标。1993年12月9日，一批枪手闯入开罗的一家电影院，造成了一死七伤的惨案。^①更有甚者，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敢于公然批评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的作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对他们展开绑架和暗杀，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80年代末，著名记者马克拉姆·穆罕默德·阿赫马德遭到枪击；1992年，专栏作家法拉格·富达被暗杀；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赫福兹在袭击中侥幸逃脱；而著名法官赛义德·阿什马维则不得不生活在24小时全天候保护之下。

从1992年开始，外国游客也成了恐怖活动的受害者。埃及是一个旅游资源异常丰富的国家，旅游收入从来就是埃及获得硬通货的主要来源。1984~1985年度，埃及的旅游收入只有约8亿美元，到1989~1990年度，旅游收入增加到25亿美元，1992年（1992年6月以前的12个月）旅游收入更达到创纪录的35

^① Edited by Bruce Maddy - Weitzman & Efraim Inbar, *Religious Radicalism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Frank Cass & Co. Ltd. 1997, London, P.49.

亿美元。^① 从1992年6月第一次发生袭击外国游客的事件以来，针对国外游客和旅游设施的恐怖活动就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打击埃及政府的主要形式之一。1993年2月，一颗自制炸弹在开罗市中心的咖啡馆爆炸，3个外国游客死亡，18人受伤。1997年9月18日，两名歹徒袭击了停放在开罗解放广场的旅游车，造成9名德国游客死亡。同年11月17日在旅游胜地卢克索发生的惨剧更是举世震惊，6名持枪歹徒枪杀64人（其中外国游客60人），伤25人。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们试图通过对外国游客的袭击，减少政府的旅游收入，吓跑国际投资，从而在经济上摧毁埃及现政府。

伊斯兰极端组织还把科普特人作为恐怖活动的主要目标。根据1986年的统计，科普特人仅占埃及总人口的5.8%，主要聚居在埃及南方。科普特人虽然是埃及的少数民族，并且与大多数居民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对现代埃及的认同是毫无疑问的。^② 不幸的是，从近代以来，穆斯林与科普特人的矛盾和冲突就时有发生，普通的埃及穆斯林对科普特人的猜忌已十分明显，在激进的伊斯兰分子眼中，科普特人则更成了异教徒和西方在穆斯林中间的代理人，^③ 于是，科普特人的教堂、商店经常遭到袭击，而那些反对穆斯林支配一切的个人更成了驱逐和谋杀的目标，总之，在南部科普特人聚居的村镇，伊斯兰极端分子发动了一场持久的反对科普特人的战争。

①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6.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5, London, England. P. 397.

② 关于科普特人与穆斯林的关系，请参阅杨颢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7页。

③ Mahmud A. Faksh, *the Future of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Fundamentalism in Egypt, Algeria, and Saudi Arabia*, Praeger Publishers, 1997, U.S.A., P. 49.

四、埃及政治发展的前景

伊斯兰运动已成为制约和影响埃及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的重大因素。一方面，激进的伊斯兰组织所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威胁着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主流伊斯兰势力则从根本上对现代埃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政治发展的方向提出了挑战。

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所制造的血淋淋的事件故然骇人听闻，震撼人心，但由于他们的政治与宗教主张过于偏激，所采取的斗争手段也过于残忍，因此很难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和大众的政治选择。对于埃及政府来说，他们是一种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当局尽可以动用一切力量进行回击。实际上，从1990年以来，埃及政府就加大了对极端伊斯兰的反击力度，在继续实施紧急状态法（1981年就开始实施）的同时，政府赋予警察和安全部队更广泛的逮捕与拘留权力。1992年，议会又通过了反恐怖法，根据该项法律，任何组织的成员一旦被认定犯有恐怖主义罪行，即可处以死刑。另外，为了加快案件的审理和从重惩罚罪犯，埃及当局广泛设立军事法庭。为了有效地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埃及政府还在国内外掀起了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宣传运动。在国内，政府与艾兹哈尔的乌勒玛密切合作，一方面让这些宗教权威驳斥极端主义的政治和宗教主张，另一方面为政府的政策寻找合理的依据；在国际上，埃及政府可谓是三管齐下。首先，埃及把伊朗和苏丹说成是国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两个中心，指责他们卷入了埃及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第二，要求海湾产油国控制个人赞助和慈善基金的流出，以切断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国外财源，同时，埃及还寻求中东地区国家的合作，共同对付伊斯兰极端主义；第三，1993年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之后，埃及鼓动

美国应该承担起反对恐怖主义的领导责任，1995年5月，埃及更利用“防止犯罪与犯人待遇国际会议”在开罗召开的机会，成功地推动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合作。

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温和势力对埃及政府所形成的威胁是更为致命的，穆斯林兄弟会对埃及当代社会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建立更加公正伊斯兰社会的主张，引起了普通穆斯林的广泛共鸣；以清真寺和各种救助机构为主体所形成的遍布全国的基层网络，通过他们的有效服务为穆斯林兄弟会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对各种专业团体的渗透和在大学校园的持久影响，使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最后，穆斯林兄弟会对现行政治运行规则的接受和在各种选举活动（包括议会选举和社会组织中的选举）的良好表现赢得了国内外的极高评价。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埃及政府的政策选择是十分有限的；像对待极端分子那样，对穆斯林兄弟会实行赤裸裸的镇压将会使政府信誉扫地；而放手让穆斯林兄弟会合法存在，则无疑自掘坟墓，一位长期研究埃及问题的学者在经过广泛调查之后写道，“我所询问过的压倒多数的埃及人和西方外交官都说，如果埃及举行真正自由的选举，穆斯林兄弟会极可能赢得大部分选票。”^①然而，埃及政府并没有坐以待毙。如前所述，埃及政府的一贯做法是，拒绝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合法政党，同时，又允许它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一旦感受到威胁，就想方设法予以遏制。正是1987年的议会选举引起政府的警觉，于是，许多更为严厉的针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策开始付诸实施。首先，穆巴拉克政府采取各种方法限制穆斯林兄弟会在社会团体中的影响。1988年，政府通过了一项规范投资公司活动的法律，以阻止人们把存款投入伊斯兰分子控制的公司，限制

① Robert Kaplan, *Eaten from Within*, *Atlantic Monthly*, Nov. 1994, P. 28.

穆斯林兄弟会的经济实力；1992年2月，安全部队突袭了一家电脑公司，指控该公司与穆斯林兄弟会密谋颠覆政府，外界的评论是，政府此举不过是要阻止穆斯林兄弟会在高科技领域的扩张；^①1992年，一项新的行会法付诸实施，法律规定，参加董事会选举的行会成员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否则，政府将任命一个委员会对行会进行管理。^②第二，穆巴拉克继续把穆斯林兄弟会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并不时以各种借口把穆斯林兄弟会等同于极端伊斯兰，公开搜捕和审判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人物。例如，1995年11月，一个军事法庭审讯了82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其中有54人被判处3年或3年以上的监禁。^③政府所采取的其他措施还有，将清真寺置于政府部门的监督之下，减少学校中的宗教课程，禁止宗教宣传品的传播，限制广播电视中的宗教节目等等。

种种迹象表明，伊斯兰势力的广泛存在严重吓阻了埃及政府进行政治变革的热情。一方面，埃及政府从来就不是政治民主化的积极支持者，它所进行的有限变革很大程度上只是个求生战略；在保持政府既得权利的前提下，通过有限的政治参与，化解社会不满，拓宽和加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埃及政府逐渐认识到，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不见得就是根治埃及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在一定的时期和情形下，它所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

① Najib Ghadbia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slamist Challenge in the Arab World*,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Harper Clooins Publishers, Inc., U.S.A., 1997, P.102.

② Carrie Rosefsky Wickham, *Beyond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Arab World*,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7, No.3, Sept.1994, P.508.

③ the Higher Military Court Passes Its Ruling in the Case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L - Wafd*, Nov 24, 1995, PP.1~8.

问题还要多，前苏联和阿尔及利亚的教训，使穆巴拉克本能地觉得，决不能犯同样的错误。^①从伊斯兰组织方面来看，恐怖主义固然为人们所不齿，就是以温和、合作而著称的穆斯林兄弟会，也没有几个人相信它是一股民主和进步的力量，情愿听任其以合法的方式主导国家政治。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埃及当作中东和穆斯林世界的可靠盟友，他们决不可能冒伊斯兰化的风险，鼓励埃及进行政治变革。埃及的政治现实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愈强大、愈表现出渴望合法化的倾向，埃及的政治变革就愈遥遥无期。

第三节 突尼斯：从复兴到革命的纳赫达运动

一、突尼斯伊斯兰复兴的发端

突尼斯获得独立以后的头30年（1956～1987）一直处于一个领袖（布尔吉巴）和一个政党^②（宪政民主联盟）的统治之下，在长期把持政权、排除一切反对势力的同时，布尔吉巴政府推行了一种以西方为模式的世俗化和现代化发展战略。1957年，突尼斯颁布了个人身份法，对传统的一夫多妻制进行了严厉的限制，同时，政府还取消了宗教法庭，用世俗法律代替宗教法律，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政府不仅禁止戴面纱的旧俗，还对斋月的禁食提出异议，认为它严重影响了“国家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作为法国的前殖民地，突尼斯还受到法国文化的强烈影响，尤其

^① Mahmud A. Faksh, *the Future of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Fundamentalism in Egypt, Algeria, and Saudi Arabia*. Praeger Publishers, 1997, U.S.A., P.56.

^② 突尼斯执政党为宪政民主联盟，原名宪政党，成立于1934年3月，1964年易名为社会主义宪政党，1988年2月又改为现在的名字。

是在高等教育、政府部门和精英阶层，法语更是占据了统治地位。由此，许多人得出结论，“历史地看，作为最开放的地中海式阿拉伯国家，突尼斯不可能成为伊斯兰主义高涨的地区”。^①

然而，恰恰是这种世俗化进程，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化与民族认同危机，构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最深刻的原因之一。突尼斯伊斯兰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拉希德·格努西说道：“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感觉就像陌生人，我们接受的教育是，我们是穆斯林、是阿拉伯人，但同时我们又看到，这个国家完全是用法国文化浇铸的。对于我们来说，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大门关了起来，因为大学已然全部西化了，这样，那些想继续学习阿拉伯语的人就不得不前往中东”。^② 1967年，随着阿拉伯国家在对以色列战争中的失败，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受到人们的怀疑，回归阿拉伯——伊斯兰的传统既是一般民众的呼声，也成了统治者收拾民心、重建政治权威的重要途径。于是，突尼斯当代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组织“保护古兰经协会”宣告成立，并于1971年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得到布尔吉巴政府支持的“保护古兰经协会”是一个非政治的宗教——文化组织，它以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为榜样，把宣传和推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传统的复兴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政府则利用“保护古兰经协会”，对来自左派的批评进行有效的遏制。

二、突尼斯伊斯兰组织的政治化

70年代末，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呈现出逐步政治化的倾向。一方面，以拉希德·格努西和法塔赫·穆鲁为代表的一批伊

^① Fred Halliday, *Tunisia's Uncertain Future?* *Middle East Report*, March - April 1990, P.25.

^② John L.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 Myth or Re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55.

伊斯兰领袖人物，在鼓吹宗教和文化复兴的同时，日趋把突尼斯社会、经济和文化落后、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归因于布尔吉巴政府、西方化的社会精英以及他们对西方的依赖和刻意模仿。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教不仅是突尼斯而且也是穆斯林世界和整个第三世界的惟一希望。^① 另一方面，70年代末突尼斯的社会危机表面化，伊斯兰主义者也开始对他们的社会角色和政治功能进行反思。1978年，在突尼斯工人总工会的领导下，突尼斯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政府随即动用武力镇压，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1980年，一批武装分子在突尼斯西部发动叛乱，宣称要从布尔吉巴的独裁统治下解放突尼斯人民。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冲突，格努西等意识到，宽泛的意识形态宣示、布道式的宗教与文化呐喊已显得苍白无力，必须进入政治竞技场，把伊斯兰教与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使伊斯兰教成为解放整个社会的源泉。^② 1979年，以格努西和穆鲁为首的一部分人从保护古兰协会中分裂出来，组成了伊斯兰协会，他们以清真寺和自己的出版物为阵地，把青年学生和工人当作主要的宣传对象，围绕着社会现实问题——工人权利、就业、工资、贫困、西方化、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等——展开了政治攻势。1981年，布尔吉巴试图对传统的一党政治进行变革，于是，伊斯兰协会易名为伊斯兰倾向运动（简称伊倾），开始了它的政党化努力。其主要的政治主张包括：确认突尼斯的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限制西化进程，推动政治的民主和多元化，实现社会公正。虽然政府拒绝了伊倾的政党化要求，但并不能阻止其力量和影响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伊倾就在学生、工人以及包括教

① John L.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 Myth or Re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56.

② *Ibid.*, P.157.

授、教师、工程师、律师和医生在内的中产阶层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对于伊倾的挑战，布尔吉巴政府是无法容忍的。此时，整个穆斯林世界都陷入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恐惧之中，于是，布尔吉巴毫不犹豫地对伊倾进行了镇压。1981年7月，包括格努西和穆鲁在内的约60余名伊倾成员遭到政府的逮捕，一些人流亡国外。尽管政府极力把伊倾描绘成落后、偏激、充满狂热并得到伊朗支持的暴力组织，格努西还是努力保持与伊朗革命的距离：他谴责使用暴力，强调渐进的社会变革，选择体制内的政治参与以实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长期目标；他还仔细讨论了体制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伊斯兰变革而不是简单的实施伊斯兰教法等问题。^① 1984年1月，由于政府取消了对面粉和主要食品的补贴，面包的价格上涨了115%，再加上高失业率等问题积蓄的社会不满，一场席卷全国的骚乱发生了。1月3日，政府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并动用军警对示威者进行弹压，在死亡89人、伤938人、逮捕1000余人之后，局势得到了控制。为了缓解人民的不满和国内的紧张局势，在解除内政部长职务的同时，政府释放了格努西等政治犯，然而，政府对伊倾的压制并没有停止。1987年，格努西又一次遭到逮捕，政府指控他鼓吹暴力，并与外国势力共谋颠覆政府。^② 同年，法国抓获了6名携带武器的突尼斯人，尽管法国政府已经查明，这些人与伊倾没有任何关系，但布尔吉巴还是把矛头指向伊倾，把大约3000名伊倾成员关入了监狱。随后，格努西被判处终生监禁，哈马迪·德杰巴利等3名伊倾成员被缺席判处死刑，甚至流亡在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

① Durk Vanderwalle, *From New State to the New Era: Toward a Second Republic in Tunisia*, *Middle East Journal*, Autumn 1988, P.612.

②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6.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5, London, England. P.916.

世界联盟总部工作的穆鲁也被处以 10 年徒刑。^①

三、伊斯兰倾向运动的激进化

布尔吉巴政府对伊倾的多次镇压，使伊倾的领导阶层对合法斗争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当政府要处决格努西、取缔伊倾的谣言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时候，用激进的方式回击政府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恰在此时，突尼斯的政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动，总理本·阿里废黜了布尔吉巴，成了突尼斯的新一任总统（1987 年 11 月）。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本·阿里许诺要实行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推动多党竞争的政治变革，同时他也效法萨达特等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试图通过对阿拉伯——伊斯兰传统的回归，拓宽统治基础、寻求政治合法性、缓解伊斯兰反对派的挑战。于是，广播电视中传出了祷告的声像，斋月的禁忌得到了遵守，总统的讲演中也充满了伊斯兰的语言，1988 年，格努西获得了自由，流亡沙特的穆鲁也返回了祖国。

对于本·阿里的政治变革许诺，伊倾的回应充满了合作的精神。1988 年 8 月初，格努西宣布，伊倾接受政党法，尊重宪法以及个人身份法赋予妇女的权利；9 月，伊倾派出代表，参加了政府当局发起的旨在实现全国和解、为政府行为设定目标与准则的“国民公约”；11 月，格努西甚至乐观地认为，不公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②为了使伊倾符合政党法所规定的登记要求，1989 年 2 月，伊倾进行了新一轮改组，取消了名称中的“伊斯兰”，易名为复兴党（纳赫达）。然而，复兴党的合法化希

① Edited by John Ruedy,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North Africa*,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P.155.

②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6.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5, London, England. P.918.

望又一次成为泡影，政府以复兴党的强烈宗教倾向为借口，拒绝了它的注册申请。遭受挫折的复兴党并未放弃合法斗争的政治选择，4月，复兴党的成员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了议会的选举，虽然没有赢得席位，但它却得到14.6%选票，在突尼斯城，它得到的选票甚至高达30%，^①从选举中的得票情况看，复兴党已取代社会民主运动，成为突尼斯最大的政治反对派。

复兴党在大选中的良好表现，使本·阿里看到了伊斯兰主义在突尼斯社会中的强大影响，随后，阿尔及利亚政治民主化实践更使本·阿里感到震惊，他已下定决心要把伊斯兰的威胁扼杀在萌芽状态。与此同时，复兴党也对政治民主化完全绝望，越来越把与政府的武装对抗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了海湾危机，也造成了复兴党的分裂，此时已流亡欧洲的格努西和复兴党内的激进势力采取了支持伊拉克、反对西方干涉的立场，试图利用海湾危机扩大其影响，而与沙特关系密切的穆鲁则小心翼翼，避免对沙特等国的亲西方立场进行批评。随着海湾局势进一步恶化，复兴党内的激进势力开始进行暴力活动。1990年11月，一伙极端分子因涉嫌从事爆炸活动遭到搜捕，1991年1月，执政党在突尼斯市中心的一办公楼遭到袭击，造成一死一伤的惨剧。同年3月，以穆鲁为代表的一批温和派发表声明，对暴力行为进行了谴责，并宣布“冻结”他们在复兴党内的成员资格，同时还宣称，他们将继续与政府寻求对话。穆鲁与复兴党分道扬镳，表明复兴党已彻底放弃了合法斗争，转而使用激进的手段实现伊斯兰理想。

当我们研究政治变革中伊斯兰政党或组织时，我们面临两个最基本的难题。第一，由于穆斯林世界各国政治体制、政治传

^① Edited by John Ruedy,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North Africa*,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P. 157.

统、统治者执政能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各国进行政治变革的方向、策略和程度也十分不同。第二，各国的伊斯兰政党或组织情况更为复杂，他们在政治变革中的态度、能力、组织形式更是很难用一种统一的分析架构去进行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纯从理论上分析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否相融合，即使不是毫无意义，也可谓无关痛痒，因为它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变革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你能证明伊斯兰与现代民主是相融的，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事例来说明伊斯兰与现代世俗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格格不入；如果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那么，如何解释约旦、马来西亚成功地把伊斯兰纳入政治进程呢？更不用说，土耳其的繁荣党从容接受了法院的裁决，而且作好一切准备，试图用合法的方式卷土重来。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宽容地允许伊斯兰政党通过选举执掌政权。因此我们还无法证明伊斯兰政权愿意还是不愿意遵守民主政治的所有游戏规则，也不能证明民主化是化解伊斯兰威胁的有效方法，但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把伊斯兰势力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或者用严刑峻法对伊斯兰组织进行镇压，肯定会把更多的人变成伊斯兰极端分子。

第八章 伊斯兰政治的发展前景

在当今世界，可称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只有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少数国家，沙特把国家建立在王室与乌勒玛联盟的基础之上，而伊朗则把伊斯兰教对于国家和政治的作用明确无误地写在宪法之中。苏丹是另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形态，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事将领自愿地把政权置于图拉比的“全国伊斯兰阵线”的监督之下。由于沙特和伊朗两个国家在中东和穆斯林世界的重要地位，由于他们的政治发展和变革可能会对地区局势和伊斯兰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关注这两种形式的伊斯兰政治究竟会走向何方。

第一节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治发展

一、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治结构

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也是历史上阿拉伯帝国统治的核心地区，然而到 18 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却陷入了政治与宗教的无序状态。从名义上，盛及一时的奥斯曼帝国领有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权，但即使在它的顶盛时期，其势力也只能达到汉志、也门和波斯湾的沿岸地区，半岛的腹部地区实际上处于家族仇杀和部落争斗的政治混乱状态，在最好的情形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也只能借助部落酋长和家族首领来发挥有限的政治影

响。在宗教上，当伊斯兰教走出半岛，在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等地兴旺发达的时候，阿拉伯半岛又逐步回到了多神崇拜的旧有状态，人们崇拜先知和圣迹，甚至对树木、岩石等也充满敬畏，更不重视作为穆斯林的基本义务。虽然伊斯兰教依然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但实际上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崇拜物和独特的宗教仪式。宗教上的衰落和混乱与伊斯兰政治和宗教中心的转移、阿拉伯帝国的分裂和瓦解有着极深的内在联系，同时多神崇拜也反映了半岛上部落政治的现实。

18世纪中期，两种客观上发展方向不同、表现形式各异的社会运动开始在阿拉伯半岛酝酿和发生。一种是台米木部落司南族人瓦哈卜所倡导的以纯洁伊斯兰信仰、消除多神崇拜为主要目的的瓦哈比运动，另一种则是阿奈扎部落沙特家族所推动的以扩大统治领地、统一各部落为方向的政治运动。从社会层面来说，瓦哈比运动的意义似乎更为重大，宗教上对一神信仰的重新确认和对偶像崇拜的批驳，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传统的宗教和部落统治者，像穆罕默德创建的伊斯兰教一样，瓦哈比主义有着克服部落分离的天然政治本能。而沙特家族所从事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过是以血族复仇和财物掠夺为主要内容的部落战争的翻版。况且，沙特家族所在的部落并不是半岛中最为强大的力量，在一个弱肉强食、实力决定一切的部落社会中，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对外扩张的政治感召力，沙特家族的衰败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在一个伊斯兰教广为流行，每一个部落都可以宣称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就是伊斯兰的社会中，宣扬宗教改革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以铲除异端邪说为己任者很可能它本身被当成异端邪说，显然，瓦哈卜的宗教革命如果不以部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为依托，严酷的政治和宗教迫害最终将会使瓦哈比主义烟消云散。

大约在1744年，瓦哈卜的传教活动终于激怒了欧叶伊奈城

的统治集团，瓦哈卜及其追随者被驱逐出境，无家可归的瓦哈比派清教徒只好投奔与欧叶伊奈城素有仇怨的阿奈扎部落酋长穆罕默德·本·沙特，从此，掌握世俗权力的沙特家族与拥有宗教权威的瓦哈卜家族实现了历史的联合：沙特家族皈依瓦哈比派，为瓦哈比主义的传播提供物质支持和保护，瓦哈卜家族则为世俗权威提供“合法性”，证明沙特家族对半岛的征服和统治完全体现了真主的意志。沙特与瓦哈卜的政治——宗教联盟彻底改变了阿拉伯半岛的历史进程，虽然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沙特家族统一半岛的努力一再受挫，但宗教与政治联盟这一政治遗产却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并最终为伊本·沙特在本世纪20年代统一半岛，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奠定政治基础。

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奠基者伊本·沙特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作为一个在沙漠里长大、深谙部落生活的领袖人物，他对家族权力和部落势力的重要性及他们对统一进程的阻挠与破坏作用都非常了解。他深知，在建立沙特家族的政治权威、实现半岛统一的过程中，部落主义的桀骜不驯和反复无常是他必须面对的最大障碍。在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社会中，政治联姻无疑是结成联盟的有效手段，因此，沙特家族不仅与宗教世家瓦哈卜家族通婚，而且也半岛上的重要部落和家族建立通家之谊，尤其是伊本·沙特本人，其一生中曾娶妻数百，子嗣更难以计数，这种政治联姻对稳定沙特家族的政治权威、扩大统治基础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把一个部族主义盛行、大部分居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社会改造成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血缘纽带所能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相反，应该逐步消除部落的分立倾向和家族的权威，建立对民族和统一的政治权威的认同感。大约在1912年，伊本·沙特开始建立准军事组织伊赫万——其成员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应征入伍，到1930年，大约有15万贝督因人定居在这种被称为“胡贾尔”（Hujar）的军

事——农业村子里，^①应该说，伊赫万不仅为伊本·沙特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它还为持续多年的统一战争提供了训练有素的士兵，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沙特社会转变和国家意识确立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大量贝督因人由游牧转为定居，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根本变化，从此，居无定所、充满危险的游牧生活开始让位于可得到稳定收入的农业生产。伊赫万成员也经常应征入伍，但战争的主要目的已不是掠夺财富，而是为了更为崇高的政治目的——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大量人口转向定居，克服了由地域分散、流动性强而造成的管理困难和部落主义与生俱来的反复无常以及难以预料的叛变行为，同时伊本·沙特与瓦哈卜的后裔伊本·阿卜杜·拉蒂夫进行合作，把瓦哈比主义所倡导的伊斯兰宗教主张与现实的政治目的紧密结合起来，以伊斯兰教法代替部落习惯、以宗教信仰代替血缘纽带、以对真主和神授王权的忠诚代替对部落的忠诚，从而逐步实现“克服游牧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确立国家观念”，以及“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目的。”^②

从现代沙特阿拉伯的形成历史中，王国的基本政治结构可谓清晰可辨，以王权、教权和族权为支撑的统治三角构成了沙特阿拉伯的政治传统和现实。在这三者之中，王权居主导地位，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权力核心，国王不仅是国家的元首和行政首脑，而且作为伊斯兰圣地的守护者，他事实上也对宗教事务有着相当的影响。同时，王室成员还在大臣会议中占据最为重要的大臣会议副主席、国民警卫队司令和内政、外交、国防等大臣职位。教权是沙特王权统治的重要基础，以瓦哈卜的后裔为主所形成的宗教上层人士，不仅为王权统治提供政治合法性、为政府的决策寻

^① 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Regime and Elite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Groom Helm Ltd, London, 1988, P.4.

^② 王铁铮主编：《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第48页，陕西三秦出版社，1997。

找合适的宗教依据，而且通过参加高级乌勒玛会议、高级卡迪会议和谘询会议以及控制国家的司法和教育等机构，直接进入了政治决策过程。同时，宗教当局还在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解释和执行伊斯兰教法等方面享有广泛的权利。作为王国政治结构的第三个方面，族权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行政区划变更等）以及人口流动的增加，部落的地域界线已变得含糊不清，另一方面，部落和家族领袖也因在各级政府部门任职而在事实上成为国家的雇员。因此，在当代沙特，从社会学的意义来说，传统的部落酋长或埃米尔已不复存在。然而，复杂的婚姻关系早已使重要的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族权依然是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①

二、沙特阿拉伯的发展困境：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

当伊本·沙特巧妙地借助宗教和部族的力量逐步完成半岛统一，并试图建立以王权为核心的现代民族国家时，他也面临着保守的宗教与部族势力的反对，1928～1930年的伊赫万叛乱可以看作是沙特王国历史上所发生的第一次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还是恢复分散的传统部落社会？

20年代中期，在半岛的统一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伊本·沙特开始了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推动社会进步为方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在政治上，伊本·沙特在确立王室权威的同时，着手组建了统管外交、内政和财政的大臣会议。为消除地方分立局面，打破部落界线，他又将汉志地区分成14个由中央

^① 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Regime and Elite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Groom Helm Ltd, London, 1988, P.11.

直接任命行政长官的埃米尔区。在司法领域，伊本·沙特逐步树立伊斯兰教法和政府设立的各种法庭的权威，以取代习惯法和部落领袖在司法方面的特权和随意性。在社会领域，伊本·沙特把推动教育事业、引进先进的交通和通讯技术作为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手段。^①应该说，伊本·沙特的改革是以调和与宗教势力的矛盾为前提的，比如他确立了伊斯兰教法的权威，设立“劝善惩恶协会”以肯定宗教阶层在政治中的作用等，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他的改革多少还是触动了传统社会阶层的利益：宗教税的取消断绝了乌勒玛的独立财源，从此，他们实际上变成了依靠政府津贴的国家公务员；现代教育和司法体系的逐步建立打破了宗教在这些领域的垄断；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和中央权力的加强更是大大削弱了部落和家族首领的影响。于是，一些在统一战争中实力不断扩充的伊赫万军事领导人拥兵自重，纠集内志地区最为保守的宗教人士，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发动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军事叛乱，试图恢复旧制，维护部落特权。1930年1月，伊赫万叛乱得以平定，围绕国家政治体制和发展方向的冲突以国王的胜利而告终，从此，以沙特王室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得到确立，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瓦哈比派以及主要的部落和家族也因他们与王室的历史联盟、在统一半岛中的重大作用而进入了王国的政治中心。

从分散的部落社会到建立统一的王权国家，沙特阿拉伯完成了向现代社会迈进的第十次飞跃，从30年代到现在，虽然教权和族权处于不断衰落和削弱的过程当中，君主政治也经常而临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如50~60年代的民族主义和70~80年代的伊斯兰复兴），然而，沙特阿拉伯的基本政治结构是稳定的，换言之，构成统治阶级的三种政治势力——王室、乌勒玛和家族首

^① 参见王铁铮主编：《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第56~58页。

领——之间还是保持了大致的和谐：王室的权威和在国家政治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乌勒玛则顺从地为王国的政治与政策构筑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础，并警惕地看守着沙特的瓦哈比遗产，而部族和家族首领也不再留恋往昔的游牧生活，他们已习惯于心安理得地享受王国所赋予的特权和石油所带来的繁荣。但是，在这种政治和谐的背后却孕育着某种更为深刻的社会危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沙特王国的传统政治结构及其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30年代中期沙特阿拉伯就发现了石油，但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石油的大规模开采和出口才成为可能，从此石油收入逐渐取代传统的农牧业和朝觐，成为沙特王国的主要财政来源。70年代，随着沙特政府通过联营、参股和赎买等不同方式逐步从西方石油公司手中收回石油资源的主权，沙特的石油收入更是以几何级数持续增长，1970年，沙特的石油收入仅为12.14亿美元，1974年就增长到225.73亿美元，1979年伊朗发生伊朗革命，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使国际市场油价飞涨，作为主要的石油输出国，沙特的石油收入连年增长，1979年为484.35亿美元，1980年则增长74%，达到844.66亿，1981年更达到创纪录的1020亿美元。^①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在提高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也激发了沙特王室的雄心，从1970年开始，沙特阿拉伯连续执行开支规模庞大的“五年计划”，试图利用巨额石油美元，在短期内把一个传统的、落后的沙漠王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富强国家。

客观地讲，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在短短

^①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6,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London, PP.838~839.

的几十年中，沙特不仅建成了以石油化工为主体的现代工业体系，而且还十分注重国民经济的多样化，试图改变过分依赖石油收入的状况，它甚至别出心裁地发展沙漠农业，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中东地区的小麦出口国。与此同时，沙特还建立了遍及全国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的现代化努力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和提升人民生活的同时，也使沙特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激剧的变化。第一，传统的部落社会进一步解体。早在本世纪初的统一战争中，沙特就建立伊赫万军垦组织，使一部分游牧民定居下来，60年代中，沙特又实施“费萨尔示范垦殖区方案”，诱导人们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发展农业。从游牧到定居，旧有的部落结构遭受了第一次冲击。从70年代开始，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大量人口离开部落，前往都市和工业中心寻找发展机会，到80年代中期，游牧人口锐减到只占总人口的5%，定居和半定居者所占比例为25%，而城市人口则超过了50%。^① 根据最近的一项估计，已有四分之三的沙特人居住在城市。如果说定居务农的贝督因人还能勉强维持其部落结构的话，城市化则最终会使部落永远消亡。第二，新的社会阶层逐步生成。传统的沙特社会，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和单调，阶级构成相对比较简单，一方面是从事农牧业的普通民众，另一方面是家族和宗教背景决定的社会上层，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社会地位就已不可改变。沙特的现代化进程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家族统治（事实上，统治家族利用政治垄断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石油财富和经济机会，他们已变成最大的财阀），但至少为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促进了政府职能的扩张，一大批接受现代教育的管理和

^① 参见王铁铮主编：《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第91页。

技术官僚进入政府机构,^①成为现代化计划的制订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创造了新的社会职业,如教师、律师、医生、工程师和企业家等。显然,政府的新职能和社会的新职业都不是传统的家族领袖和接受宗教教育的乌勒玛所能胜任的,于是现代化教育在沙特的兴起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第三,外籍劳工大量存在。根据1992年9~10月的初步统计,沙特的总人口为16929294,其中外籍人口约为4624495人,^②另外,还有数量不详的非法移民。这些外籍劳工主要来自埃及、也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等中东阿拉伯国家,也有一些来自欧美和亚洲,除行政管理、银行和某些国有企业外,他们成了沙特大部分生产部门的主要劳动力,长期以来,沙特就对外籍劳工进行严格的管理,甚至把外籍人员同沙特公民隔离开来,显然,沙特政府想把外籍劳工对沙特社会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减少到最小限度。

野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革,从根本上说来就有使沙特陷入内部冲突的必然性,虽然沙特王室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努力寻求宗教乌勒玛的支持,而宗教界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也几乎是有求必应,但问题的实质是,当代沙特王国的统治者所面临的已不是建国之初统治集团的内部冲突,而是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对传统政治结构强大的张力。

① 从50年代以来,政府部门从4个增加到20个,同时还有40多个公共权力机构。政府部门的雇员50年代不过几百人,60年代初大约37000人,70年代初85000人,到80年代则增加到了245000人,占沙特总人口的3.5~4%,占劳动人口的10%。参考: Edited by Adeed Dawisha & I. William Zartman, *Beyond Coercion: the Durability of the Arab State*, Croom Helm Publishers Ltd, 1988, P.17.

②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6,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London, P.835.

城市化、工业化、遍布城乡的交通通讯网络已使部落的血缘和亲情纽带支离破碎，世俗化、商业化以及西方文化的侵扰也使传统的道德体系面临考验，现代教育的兴起不仅使宗教教育显得无足轻重，更为可怕的是，妇女已不甘心待在家里，她们越来越渴望摆脱传统的依附地位，一场妇女解放运动依然十分遥远，但人们发现，沙特妇女的面纱已变得愈发透明了。^①同时，沙特社会还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王室成员的奢侈腐化与部落民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在许多人的眼里，沙特王室以及与之结成同盟的宗教上层已经严重背离了伊斯兰教的理想和正道。伴随着70年代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复兴，一种被称为“新伊赫万”的伊斯兰激进思潮开始在沙特的一些大学中流行，其最终结果是在1979年发生了麦加大清真寺事件。这种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对沙特政治——宗教统治的反抗只是反映了传统与现代性冲突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对传统政治结构所显示的不满，作为王国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他们愈来愈指望进入政治决策过程，打破王权——教权——族权对国家政治的垄断。

三、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反对派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以王权——教权——族权为统治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它既没有立法机构，也不允许政党和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存在，然而，从沙特阿拉伯立国始，政治反对派就不时困扰统治当局。1928～1930年，发生了“伊赫万”武装叛乱；50～60年代，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特别是纳赛尔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包括王室内部自由派在内的各种反对组织；1979年，受伊

^① Edited by Peter J. Chelkowski & Robert J. Pranger,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1.

朗伊斯兰革命的激励，先后发生了麦加大清真寺事件和东方省什叶派穆斯林的骚乱。在沙特阿拉伯的数十年历史中，虽然各种类型的反对派运动不时造成震撼，但并没有对王室的统治构成真正的威胁，政治与宗教的坚固同盟、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为沙特王室的统治建立了牢固的基础，而历任国王刻意在伊斯兰传统和现代变革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也有效化解了来自各个方面的不满。

进入 90 年代，沙特王国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国际上来说，苏联东欧剧变所带动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浪潮，以及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实行的有限政治变革，对沙特等传统政治体制形成了压力。从国内的情况看，80 年代中期开始的低迷石油价格以及沙特先后为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支付大笔费用，使沙特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人均国民收入也从 80 年代初的 17000 美元骤减至 1995 年的 7000 余美元。伴随着经济的衰退，沙特所能提供的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服务逐步减少，考虑到沙特持续增长的高失业率（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 25%）和人口的高出生率（年均 3.6%），政府开支的减少就意味着社会环境的迅速恶化。^①同时，在 1990~1991 年的海湾战争期间，沙特允许 50 余万多国部队驻扎在伊斯兰的神圣土地，沙特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严重依赖和美军的长期留驻更使沙特政治的伊斯兰特性受到怀疑。

1990 年 12 月，由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而引发的海湾危机正处于关键时刻，沙特国王法赫德收到了一份由 43 名所谓自由派分子联署的请愿书，请愿书支持建立法赫德国王早已许诺的咨询会议，要求建立基于宪法的政府制度，以保证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

^① Edited by Bruce Maddy-Weitzman & Efraim Inbar, *Religious Radicalism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Frank Cass & Co. Ltd., London, 1997, pp. 79~80.

的完全平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组织社团的权利。^① 请愿书使用的语气十分温和，对王室没有任何的不敬，更没有对统治家族进行攻击，它所要求的不过是伊斯拉赫（*islah*，改革），然而，在沙特王国的政治发展史上，其重要的象征意义不容低估。人们早已注意到，随着现代教育的兴起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已经在传统的部落社会生成，虽然他们还远未形成具有良好组织和集体意志的独立政治势力，他们内部还存在家族（来自不同的部族）、教育（受教育的程度、西方教育和国内教育）、职业和收入等因素造成的对立倾向，但他们敢于用请愿书的方式公然宣泄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要求，这说明新的社会阶层正处于某种力量和政治诉求的整合过程当中，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实惠，也不再安于现状，在政治的边缘徘徊，他们试图冲破传统的政治结构，在王国的决策核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当然，在一个政治与宗教结成同盟、王室对所有的政治资源高度垄断和伊斯兰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中，实现政治结构的重组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不用说所谓的沙特中产阶级还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② 事实上，当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世俗主义经受失败的挫折，并受到人们的怀疑和唾弃以及伊斯兰主义围攻的时候，沙特的“自由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毫不奇怪，沙特自由派的改革呼声很快就笼罩在伊斯兰反对派的阴影之中。

1991年5月，52名宗教界人士向法赫德国王提交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在沙特进行12项“必要的”改革。其主要内容

① Mahmud A. Faksh, *the Future of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Fundamentalism in Egypt, Algeria, and Saudi Arabia*, Praeger Publishers, U.S.A., 1997, P.96.

② 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Regime and Elite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Groom Helm Ltd, London, 1988, PP.169~170.

包括：建立拥有决定国内外政策实际权力的独立的协商会议；取消所有与伊斯兰教法相抵触的政治、行政和经济法规；在所有的社会成员中实现公正与平等；清除国家机构中的腐败现象，毫无例外地对所有的官员进行监督；建立公正的财富分配制度，取消任何形式的对财富的垄断和非法占有；建立强大的军队，并实现武器来源的多样化；改革新闻媒介，在伊斯兰教法的范围内达到新闻自由和建设性的批评；在对外政策中保护乌玛的利益，反映国家的伊斯兰特性；改善宗教机构和宗教宣传，“取消所有可能妨碍他们充分执行自己任务的限制”；统一司法机构，赋予他们真正独立的权利；在伊斯兰教法的范围内，保证个人和团体的权利。1992年9月，由107名宗教人士签署的“劝解备忘录”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主张：取消所有对伊斯兰教职人员、学者、教师在写作、出版和宣教等方面的政府限制；允许乌勒玛监视和参与所有政府机构乃至大使馆的工作，以确保对伊斯兰的固守；建立最高伊斯兰教法法院，使所有的法规不与伊斯兰教相违背；修改大学课程，严禁教授西方法律；限制警察特权；一视同仁地选择政府官员，实行行政改革；对所有的外国出版物和电视节目进行审查，防止异教和世俗思想的传播；建立拥有50万士兵的强大军事武装，在圣战和献身精神的鼓舞下保卫国家，同犹太人进行战斗。^①

宗教反对派在沙特出现并不是第一次，如前所述，1979年就曾发生麦加大清真寺事件和什叶派骚乱。然而，90年代的宗教反对派有着与以往宗教反对派完全不同的特征。他们没有明显的部落背景，也不是来自社会的最低层或受到歧视的国外移民，相反，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的还拥有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博

^① R. Hrair Dekmejian,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ism in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48, No.4, Autumn 1994.

士学位，几乎所有参与签名者都有着受人尊敬的宗教与社会地位。从斗争的手法来看，他们并不崇尚和鼓动暴力，他们提倡社会与政治改革，更为奇特的是，他们用保护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闻自由、廉洁和负责任的政府、社会公正等现代民主政治的口号来包装其伊斯兰社会和政治主张。宗教界以公开信和备忘录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直接的动因似乎是为了回击自由派的请愿书，并向法赫德国王施加压力，影响他对即将成立的协商会议成员的选择，但实际上，公开信所宣泄的是整个宗教界对王室内外政策和权力垄断的不满，一些资料表明，参与1991年5月公开信签名的多达400人，而沙特最具影响的乌勒玛谢赫·阿卜杜·本·巴兹也是公开信的签名者之一。^①这一资料的真实性我们还无法证实，但即使如此，宗教界对王室的不满也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一位西方学者的统计，参与公开信签名的人中，来自内志地区的有33人，占63.5%；参与备忘录签名的内志人更多达77名，占总人数的72%，^②要知道，内志地区是瓦哈比主义的摇篮，也是沙特王国传统的权力基础，看来，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的联盟正出现越来越深的裂痕。

沙特的宗教反对派中显然有一支更为激进的力量，1993年5月，以沙特国王大学物理学教授穆罕默德·马萨里博士为核心的7名伊斯兰反对派人士成立了“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他们试图通过该组织监视政府对伊斯兰教法的执行，揭露社会的不公，在伊斯兰教法的范畴内保护公民的权利。这是沙特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自治的人权组织，对于严禁结社的沙特政府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两

① Mahmud A. Faksh, *the Future of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Fundamentalism in Egypt, Algeria, and Saudi Arabia*, Praeger Publishers, U.S.A., 1997, P.96.

② R. Hrair Dekmejian,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ism in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48, No.4, Autumn 1994.

个星期之后,这个组织就被政府取缔,其创始人也遭到当局的搜捕。不久,流亡英国的马萨里在伦敦重新建立“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利用出版物和电子媒介继续宣传其政治主张。这股激进的伊斯兰反对势力对沙特的现行内外政策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如王室对权力和财富的垄断、严重的分配不公和政治腐败、对西方的依赖以及迎合西方利益的石油政策。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沙特王室统治的基础:家族和宗教联盟。他们并不反对部落在沙特社会中的作用,但反对沙特王室利用它来维护专制统治。在他们看来,沙特是一个多部落社会,有些家族甚至比沙特家族更为古老,因此,把这个国家叫做沙特阿拉伯,其公民叫做沙特人是没有道理的。沙特王室还滥用“部落原则”,使权力和财富都落在了沙特家族的手中。在这些激进的宗教反对派眼里,沙特统治者是“法老”、是非伊斯兰的偶像崇拜者,而以巴兹为首的最高宗教当局和高级乌勒玛不过是一些为王室政策进行辩护和寻找根据的工具与“法特瓦”制造者,这些乌勒玛在发布法特瓦时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对不如此行事的后果的恐惧”。^①沙特的宗教反对派属于逊尼派,但他们所宣传的政治主张却与霍梅尼多有相似,如果按照“劝解备忘录”重建沙特政治,人们很可能将在中东发现一个新的伊朗式的政权。

宗教反对派已成为沙特王室的最大麻烦,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政治主张对王国的政治结构有着釜底抽薪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把人权、平等和自由等现代民主政治的诉求纳入了改革视野,不管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结局如何,它显然代表和反映了沙特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呼声,一旦沙特的中产阶级走向伊斯兰化,沙特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① Edited by Bruce Maddy-Weitzman & Efraim Inbar, *Religious Radicalism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Frank Cass & Co. Ltd., London, 1997, P. 84.

四、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发展前景

面对来自不同方面政治反对派的挑战，沙特政府出于本能的反应就是强化与宗教界的同盟，利用乌勒玛的合作与宗教权威，为政府的政策建立合法性。首先，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向宗教当局示好：严格对新闻的检查、禁止进口卫星天线、强化公共道德标准，并就一些政策同乌勒玛广泛协商，沙特还抵制了1994年9月在开罗举行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和1995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它看来，这些会议是反伊斯兰的，有违伊斯兰教法。1994年10月，为加强对宗教生活的控制，防止反对派披着伊斯兰外衣宣传反政府主张，沙特特别在最高乌勒玛会议之下增设了两个宗教监督机构，一个是以国防部长苏丹王子为首的“高级伊斯兰事务会议”，另一个是由宗教基金与宣教事务部长图尔基博上领导的“宣教与指导委员会”。^①为了使保守的乌勒玛对沙特与西方国家的紧密关系保持沉默，沙特政府有意不与美国签署防务条约和联合举行军事演习。^②

在争取宗教当局支持的同时，沙特政府毫不犹豫地对宗教反对派进行了镇压。1991年12月底，针对宗教反对派对王室和受教育妇女的恶毒攻击，沙特情报头子图尔基·费萨尔王子发出了严厉的警告，^③不久法赫德国王也威胁将对那些敢于向国家政策

① Mahmud A. Faksh, *the Future of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Fundamentalism in Egypt, Algeria, and Saudi Arabia*, Praeger Publishers, U.S.A., 1997, PP.100-101.

② Elaine Sciolino & Eric Schmitt, Saudi Arabia, Its Purse Thinner, Learns How to Say 'No' to U.S., *New York Times*, Nov.4, 1994; A1.

③ Youssef M. Ibrahim, the Saudis Are Fearful, Too, as Islam's Militant Tide Rises, *New York Time*, Dec.31, 1991; A1.

挑战的好斗分子采取严峻措施。^①1993年5月,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成立后两星期就遭到政府取缔,它的5名成员在政府机关中的职务被解除,另两名成员的律师执照被吊销,办公室也被封闭。^②1994年9月,两位著名的反对派人士遭到逮捕,一位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伊斯兰研究系的系主任萨法尔·哈瓦利博士,另一位是被人称为“沙特霍梅尼”的谢赫·萨尔曼·阿乌达,与此同时,政府还对发生在西北部卡希姆地区布赖达城的示威游行实施弹压,根据设在伦敦的沙特反对派组织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所提供的资料,大约有1300人遭到逮捕。^③

沙特王室向宗教当局示好以及向反对派施以高压政策,迅速得到以巴兹为首的乌勒玛集团的回应和支持。1991年12月,巴兹与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警告遥相呼应,强烈地谴责5月公开信是对国王的诋毁和恶意中伤,完全“违背真主的意志”,他奉劝反对派“悔过自新,迷途知返”。^④1992年劝解备忘录事件之后,巴兹所领导的高级乌勒玛会议发表了一份谴责声明,指责签名者煽动叛乱,为沙特的敌人谋取利益。对于反对派建立的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宗教当局迅速将之界定为非法组织,在他们看来,“沙里亚是现世的法度,宗教法庭能够实现公正”。^⑤1994年9月,反对派人士哈瓦利和阿乌达及其追随者遭到政府搜捕之后,巴兹在一项法特瓦中宣称,除非

① Youssef M. Ibrahim, Saudi King Takes on Islamic Militants, *New York Time*, Jan. 30, 1992; A3.

② Caryl Murphy, Saudis Move Against Rights Unit, *Washington Post*, May 16, 1993; A27.

③ Edited by Bruce Maddy-Weitzman & Efraim Inbar, *Religious Radicalism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Frank Cass & Co. Ltd., London, 1997, P.87.

④ Youssef M. Ibrahim, the Saudis Are Fearful, Too, as Islam's Militant Tide Rises, *New York Time*, Dec. 31, 1991; A10.

⑤ Mahmud A. Faksh, *the Future of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Fundamentalism in Egypt, Algeria, and Saudi Arabia*, Praeger Publishers, U.S.A., 1997, P.100.

哈瓦利和阿乌达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否则,将严禁他们发表演讲、参加会议和录制音像盒带。^①与此同时,巴兹所领导的各种宗教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其主旨一方面是为政府的政策提供宗教合理性,另一方面强调顺从(ta'a)统治者的重要性——即使他们偏离了严格的伊斯兰教义。

由此看来,政治与宗教的联盟依然是沙特王室保持政治垄断的重要手段,但我们有理由对它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如前所述,90年代的宗教反对派是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并在各种政府和社会机构中担当要职的宗教上层人士,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宗教知识,而且还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因此,当以巴兹为首的御用乌勒玛引经据典对它们进行谴责时经常感到力不从心,1991年,巴兹对反对派的指责迅速遭到回击,哈瓦利用神学观点令人信服地证明,巴兹以法特瓦允许美军进驻沙特有违先知传统(hadith);他还提醒,这位年老的谢赫在其早年作出的裁决中曾谴责与非穆斯林结成同盟。^②宗教反对派的强有力的回击不仅使巴兹本人处境尴尬,而且直接促成了乌勒玛的分裂。1992年,高级乌勒玛委员会的7名乌勒玛拒绝背书谴责反对派的声明,不久他们就被法赫德国王解除了职务。我们对政治与宗教联盟的有效性表示怀疑,还因为宗教反对派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极具感召力: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宗教上层都可在这个政治纲领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尤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一些政治要求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宣泄,甚至西方的人权组织也在沙特的宗教反对派中觅得了知音——如果不是国际人权机构的关切,马萨里等人就不可能离开沙特并在伦敦重建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

① *Al-Hayat* (London), Oct. 2, 22, 1995.

② R. Hrair Dekmejian,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ism in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48, No. 4, Autumn 1994.

也许,正是看到了政治与宗教联盟的局限性和其日益扩大的裂痕,法赫德国王在用传统的政治手段克服眼下危机的同时,还开始了某种谨慎的政治变革。1992年3月2日,法赫德国王在一篇对全国的讲话中公布了三项法令,即“政府基本法”、“协商会议法”、和“地方法”。“政府基本法”共有九款,主要对沙特的政治体制、继承原则、沙特家族的政治地位和政治作用以及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论述;“协商会议法”主要对这个协商机构的设立、成员的产生、权限和运作等作出了规定;“地方法”对地方长官的权力与义务进行规范,进一步确认了内政部在地方政治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还对省议会组成进行了规定。从这三项法令的内容来看,谈不上是一种政治的民主化,他们只是对沙特的现实政治体制和运行方式进行了重新确认,尤其是对沙特家族的政治合法性、宗教与政治的联盟等事关存亡的大问题,从历史、教理和现实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如果说有些新意,那就是有关成立协商会议和省议会的规定,尽管这些议事机构的成员主要由国王任命,尽管他们的权力极为有限,但议事机构的建立毕竟为更多的人参与国家政治和地方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①1993年8月,期待已久的协商会议终于成立,除了激进的宗教反对派,法赫德国王所任命的60名成员比较均衡地照顾到了由职业、地区和教育等因素形成的利益分布,当然,与王室和宗教当局联系密切的成员占据了多数。

纵观沙特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沙特王室依然把政治稳定建立在与宗教和家族的联盟之上,虽然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传统政治结构的局限性,试图通过有限的调整在宗教反对派、世俗反对派和既得利益者之间建立平衡,但这实在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① Madawi al-Rasheed, *God, the King and the Nation: Political Rhetoric in Saudi Arabia in the 1990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50, No.3, Summer 1996.

考虑到石油收入的减少正使沙特政府的控制能力受到限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时有所闻，因此设想在年老多病的法赫德国王之后发生大规模社会动乱和权力斗争并不是没有道理，然而，对沙特政治发展的方向得出明确的结论依然十分困难，最大的可能是沙特将继续承受传统与现代性冲突所带来的困扰，而作为统治家族的沙特王室，在确保权力垄断的同时，仍旧把政治稳定交给传统的政治结构，并不断寻找扩大政治参与、实现社会稳定的新的方法。

第二节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发展

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1979年的伊朗革命是对巴列维王朝（1925~1979）专制统治的反动，因此，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民主和清廉的政府应该成为革命的自然结果。事实上，1979年宪法和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很大程度上是伊朗大多数人的选择，虽然国际社会对伊朗的革命和新政权的内外政策充满敌意，但客观上，伊朗的新政府比巴列维王朝拥有更广泛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几乎所有研究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文献都承认革命的发生有着不可避免的特性，换言之，巴列维王朝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白色革命及其后果、对西方国家的依赖等因素使群众性的革命获得了某种天然的合理性。由此看来，革命后的政权，即使比巴列维王朝还要糟糕，它也比旧政权更易获得民众的支持，更不用说伊朗革命的领袖人物远不仅是旧制度的造反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道德高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崇高的政治和宗教理想，在普通的民众中得到广泛的支持。这种由革命及其领袖所带来的天然政治合法性和民众的支持虽然极其重要，但却是不牢靠的，因此当革命取得

胜利之后，制度化建设自然而然地摆上了议事日程。

1979年3月，革命后的伊朗举行了第一次公民投票，决定废除巴列维的王朝统治，建立伊斯兰共和国，随后，选举产生了主要由教职人员组成的“专家会议”，负责新宪法草案的修订，同年底，经过全民公决，伊朗历史上的第二部宪法正式产生。根据宪法，伊朗建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分立的政治体制。总统任期4年，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他负责宪法、法律的执行，协调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关系，他有权提出总理人选；伊朗的立法机构是由270名成员组成的伊斯兰议会，议员由秘密直选产生，任期四年。议会所拥有的权力包括：在不与国教（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基本教义和原则相违背的前提下制订法律，任免政府成员，“对国家的所有事务进行调查和咨询”等；司法权属独立的“最高司法会议”，共有5名成员，任期5年，^①由选举产生。伊斯兰共和国与宪法的形成过程，以及选举在国家各级权力机构产生中的广泛使用，表明一些民主原则在当代伊朗政治生活中起着相当的作用，虽然用现代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来判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远不是民主政治体制，但我们必须承认，它在人民中享有的支持、民众参与政治的程度都远胜于巴列维王朝，甚至远胜于它的阿拉伯邻国。^②

然而，不幸的是，伊朗仅有的一点民主因素被笼罩在教权统治的阴影之中，伊斯兰教、宗教领袖和神职人员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强大影响，使伊朗在摆脱王权专制的同时又陷入了教权的专制。1979年宪法共175条，伊斯兰宗教因素充斥整个宪法；伊斯兰教是国教；国家的任务和目标必须与伊斯兰特性相统一；国

① Asaf Hussain, *Islamic Iran: 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Frances 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 London, 1985, P.130.

② John L. Esposito & John O. Voll, *Islam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65.

家的立法不能与伊斯兰教法相抵触；国家所有的领导职务必须掌握在法理学家手中；所有个人、民族和种族的民主权利必须接受伊斯兰教的约束；所有机构的设立只能是为了确保国家的伊斯兰特性。^①也许，最能体现伊朗教权政治特征的一是宗教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力，二是教职人员对政治与社会的监护功能。

1979年的伊朗宪法接受了霍梅尼的基本政治学说：在公正的统治者伊玛目隐遁期间，伊斯兰社会应该受到沙里阿法的约束，并接受神法的解释者法理学家的指导（第5条），他的权力包括：任命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任命国家最高司法权威；确认当选总统；一旦得到最高法院或伊斯兰议会的认可，他还可以国家利益为名废黜总统；作为武装部队的最高长官，他还拥有下述权力：任免总参谋长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负责组建最高国防会议，在最高国防会议的举荐下任命陆海空各兵种总司令、宣布战争与和平、实行武装力量总动员。^②显然，宗教领袖所拥有的权力和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已远不是政治的监护人。由于1979年宪法把霍梅尼当作终生领袖，更由于霍梅尼无人可及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在伊斯兰共和国的头10年历史中，宗教领袖不仅经常直接干预行政、立法和司法工作，而且实际上获得了凌驾宪法之上的权力。^③

1979年宪法还为教职人员设置了一些权力极大的机构。第

① Asghar Schirazi, *The Constitution of Iran: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trans. John O' Kane, I.B.Tauris & Co Ltd., 1997, London, P.8.

② Asghar Schirazi, *The Constitution of Iran: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trans. John O' Kane, I.B.Tauris & Co Ltd., 1997, London, P.13; P.60~72.

③ Asghar Schirazi, *The Constitution of Iran: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trans. John O' Kane, I.B.Tauris & Co Ltd., 1997, London, P.13; P.60~72.

一个当数宪法监护委员会，该委员会共有 12 名成员，其中 6 人是由霍梅尼任命的教职人员，其权力包括判定议会法案是否与伊斯兰教法相一致、解释宪法、监督总统和议会选举及全民投票。另一个主要由教职人员组成的机构是有权废除宗教领袖的专家会议，同时最高法院也控制在教职人员手中。除了这些宪法允许设立的专门机构，霍梅尼还根据自己的意愿赋予教职人员以政治特权。1988 年 2 月 6 日，霍梅尼建立确定利益委员会，以裁决议会与宪法监护委员会的争端，这个成员由霍梅尼选择的特别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议会之外的另一个立法机构。其他的体制外的机构还有文化革命委员会、支持战争委员会和重建委员会等。最能体现霍梅尼和教职人员无所不在的权力的是所谓的“伊玛目代表”，他们遍布政府的各种机构，直接听命于伊玛目霍梅尼，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只拥有监督权，但实际上他们可以决定一切。^①

二、伊朗内外政策的伊斯兰化

政治的伊斯兰化以及教职人员政治优势的确立，使得为推翻巴列维专制统治和建立公正社会而结成的革命同盟走向了分裂，这不仅是因为好斗的毛拉和霍梅尼鼓动的宗教狂热本就缺少宽容，更因为教权政治与王权政治一样，并不是以权力共享、政治多元和容忍反对派存在为基础，而是崇尚压制和权力集中。在霍梅尼担任最高精神领袖期间，大规模的清洗和政治迫害不断发生。1979 年 11 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政府总理巴扎尔甘被解除了职务，1981 年 6 月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被剥夺了权力，随即因生命受到威胁不得不仓皇逃往巴黎，1982 年 4 月，伊朗揭露一个反政府阴谋，前外交部长萨迪克·霍特卜扎德被处以死刑。1983 年 4 月，伊朗政府把矛头对准了伊朗共产党，指责该

^① Ibid., P. 73.

党是苏联的间谍，在这一事件中，包括总书记齐亚努里在内的约1000名成员遭到逮捕。根据某国际组织的估计，从1979年到1985年，至少有7000伊朗人被处以死刑。^①正如一位西方作家所评论的，在伊朗，教权恐怖代替了王权恐怖、萨瓦玛(SAVAMA，伊斯兰伊朗的秘密情报组织)代替了萨瓦克(SAVAK，巴列维的秘密情报组织)，原来关押国王反对者的伊文监狱现在则装满了伊斯兰共和国的囚犯。^②

伴随着政治上的伊斯兰化和教权专制，整个社会的伊斯兰化也全面展开。在毛拉们的推动下，各种各样的宗教组织迅速在工厂和学校中建立起来，传统的什叶派宗教机构也转变为纯化意识形态的工具，尤其是星期五的聚礼以及遍布全国的清真寺更成了进行宗教和政治动员的有效场所。于是，夜总会、酒吧遭到取缔，跳舞、听音乐与赌博、吸毒都被归入必须严惩的腐败行为。与此同时，成千上万名教师被清洗、教材被修改，男女分校制开始实施，学校中的激进伊斯兰组织对教师和学生的活动进行监视，不断举报他们的“非伊斯兰”行为。1983年开始，伊斯兰教法在伊朗广泛实施，断手、鞭刑等传统的刑法又一次成为惩罚犯罪的主要手段，在化妆、穿衣等方面的严格戒律不仅针对伊朗公民，就连外交官和外国游客也不能幸免。

与政治和社会的剧烈变动相呼应，伊朗的经济政策也进行了重大变革，其一，将巴列维家族及相关成员的财产充公，其二，把重要的经济部门国有化，由政府进行管理。1979年3月1日，霍梅尼发布命令，以“被压迫的伊朗人民”的名义，将巴列维家

①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6,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London, P.426.

② John L. Esposito & John O. Voll, *Islam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0.

族及其亲友用非法手段攫取的财产充公，由“受压迫者基金会”进行管理。根据该基金会负责人 1983 年通报，他们“拥有大约 200 个大型工厂，15 万包括宫殿、住宅和仓库等在内的大型建筑，70% 以上的影剧院，50 座大小不等的矿山，120 多家建筑公司、牲畜和家禽养殖场，以及数量可观的珠宝——其中的一些举世无双，我们还有一些农——商综合体和数万英亩的农田，这个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联合体之一，在伊朗它则是最大的。”^①1979 年 6 月，伊朗先后把 28 家银行和 11 家保险公司收归国有，7 月又对私营的金属工业实施国有化，1980 年夏，把 4 家和外国合资的石油企业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到 1982 年，所有雇用 1000 人以上的企业已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②伊朗经济领域进行的变革虽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伊斯兰化，但毫无疑问，所有的这些措施与霍梅尼所推动的伊斯兰革命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实现经济独立，消除贫穷，满足人们在衣食住行和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最基本的需求（宪法第 43 条），显然，伊朗的革命者和新国家的奠基者深信，政府只有掌握最主要的经济部门，才能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

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伊朗的对外政策也受到了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主要的特征一是把美国及其盟友，特别是以色列当作主要的敌人，二是把推动伊斯兰革命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在这种总的外交原则的指导下，以 1979 年 11 月占领美国驻伊大使馆为契机，美伊关系全面恶化；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之后，伊朗通过建立真主党，直接卷入了黎巴嫩内部事务和阿以冲突；鼓动穆斯林世界，特别是海湾地区的伊斯兰反政府运

① *Kayhan Havai*, 10 July, 1983, 22.

② Edited by Hamid Zangeneh, *Islam, Iran & World Stability*,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4, P.173.

动，除了传媒的宣传和煽动，伊朗还直接参与或组织了一些反对组织的颠覆活动；伊朗积极与那些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如利比亚和叙利亚）以及意识形态相近（如苏丹）的国家建立同盟或合作关系；为了扩大伊斯兰革命的影响，打击其主要的敌人美国，伊朗甚至被怀疑卷入了恐怖主义活动，除了1979年11月扣押52名美国人达444天这一事件之外，伊朗受到的指控还有：1983年4月18日用汽车炸弹袭击贝鲁特美国大使馆，同年10月23日袭击驻黎巴嫩的美国海军等。^①

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曾经指出：“伊斯兰教拥有一整套制度和关于不同社会事务的纲领：政府和管理的形式、人们相互交往的规范、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与外国的关系以及其他所有的政治和经济事务……，清真寺从来就是领导和指挥中心，也是审查和分析社会问题的中心。”^②由此看来，1979年革命之后，伊朗内外政策的伊斯兰化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三、霍梅尼的遗产与拉夫桑贾尼的变革

1989年6月3日，伊朗革命的一代宗师和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与世长辞。毫无疑问，霍梅尼的政治、宗教学说和革命理论在伊斯兰教和世界发展史上都留下极浓重的一笔，然而，他所推动的伊斯兰革命也使伊朗陷入了现代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首先，在外交上伊朗成了国际社会的弃儿。1979年革命之后，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处于持续恶化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两伊战争的后期，美伊事实上已处于交战状态。1989年2

① Shirreen T. Hunter, *Iran and the World: Continuity in a Revolutionary Decad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74.

② R. J.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trans. Hamid Algar, Berkeley, Calif., Mizan Press, 1981, PP.249~250.

月，“拉什迪事件”发生，当霍梅尼发出国际追杀令之后，欧盟成员国冻结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而伊朗也毫不妥协地召回了驻欧盟各国的外交代表。伊朗的阿拉伯邻国也把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当作主要的威胁，他们不仅建立合作机构以图联合自保，他们还向伊拉克提供巨额财政支持，希望野心勃勃的萨达姆遏制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其次，两伊战争中伊朗损失惨重。从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到1988年8月两伊实现停火，两伊战争持续8年之久，根据伊朗政府在战后的估计，伊朗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811000百万里亚尔，50个城镇和4000多个村庄被摧毁或遭严重破坏，平民死亡14000人，因战乱而流落他乡者多达125万人。^①第三，伊朗的经济与民生陷入困境。盲目的国有化、经营管理不善以及原材料和零配件的缺乏所造成的企业开工不足（特别是严重依赖西方设备和技术的石油工业）使革命后的伊朗经济一直处于连年衰退的过程当中。1986年开始的油价爆跌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急剧减少，然而为了支持战争，伊朗每年又必须花费50~90亿美元用于购买军火。到1988~1989年，无论是国家经济还是民众生活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从1979年到1988年，革命和战争主导着伊朗，革命的狂热和战争的紧迫感掩盖了社会和经济危机，也抑制了政治上的争论，然而，当战争结束，面对失业、通货膨胀和生活日用品匮乏等现实困难以及恢复经济的巨大挑战时，人们不禁对革命产生了怀疑，甚至在统治集团内部，政治上的纷争也趋于表面化。以霍梅尼法定继承人蒙泽塔里、总统哈梅内伊和议长拉夫桑贾尼为代表的开明派鼓励对过去的政策进行反思，主张逐步放松政府对经

^①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6,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London, P.431.

济的控制，发展私人经济，通过有限度地利用外国资金、吸引流亡者回国等方法，加快经济的恢复与重建。而以总理穆萨维等为首的保守派主张继续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强调自力更生的作用。最高领袖霍梅尼似乎对这种政策争论持一种超然和宽容的态度，在他看来，“辩论可以继续进行，因为这是那些对国家的效忠不容置疑的人之间的辩论”，^①实际上，霍梅尼还启动了某种政治变革的过程，1988年12月，伊朗内政部宣布，1981年通过的政党法将付诸实施，一些小的反对派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权利。同时修改1979年宪法的工作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1989年1月，为缓解国内矛盾，霍梅尼宣布赦免4500名犯人，2月1日，为庆祝革命胜利10周年，霍梅尼又宣布全国大赦，423名在押犯人获得自由，2月11日伊朗又释放230名政治犯，总统哈梅内伊在群众集会上乐观地宣称，下一个10年将是伊朗的“发展年”。然而，这种有限的政治争论和政策调整很快露出了失去控制的征兆。2月11日，伊朗纪念伊斯兰革命的活动宣布结束，蒙泽塔里在圣城库姆接见群众时不仅对庆祝活动本身严加指责，而且对过去10年的政策失误和极端行为进行了尖锐批评。^②霍梅尼的法定继承人蒙泽塔里与霍梅尼意见不合早已不是秘密，但如此公开的冲突还是第一次。3月下旬，当蒙泽塔里写给霍梅尼的一封信在美国之音和BBC先后曝光之后，霍梅尼被真正激怒了，3月24日，他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指责“天真幼稚、头脑简单的人受到伊斯兰共和国的敌人的影响而变成了自由党人和伪君子们的发言人”，^③3月27日，在霍梅尼的逼迫下，蒙泽塔

① 《伊朗的未来在革命10年之后仍然处于十字路口》，路透社，迪拜，1989年2月1日英文电。

② 新华社，德黑兰，1989年2月12日电。

③ 若塞·加尔松：《霍梅尼如何搞掉蒙泽塔里》，法国《解放报》，1989年3月30日。

里公开发表声明，辞去了继承人一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也随之而来，渴望变革的力量受到了重创。实际上，当2月份拉什迪被霍梅尼判处死刑、伊朗与西方的关系全面恶化时，这场从1988年开始的政治争论就有了结果，就像霍梅尼所宣称的：“只要我活着，我就决不会让这个国家落到自由派的手中”。^①

霍梅尼去世前的最后一搏似乎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争吵化于无形，特别是拉什迪事件更成了改革派的梦魇：要想通过改善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加快经济重建的进程，首先必须面对拉什迪事件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对于霍梅尼遗产的继承者来说，无论是坚守霍梅尼路线还是为伊朗的未来另辟蹊径，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霍梅尼的去世毕竟为可能的变革创造了条件。

与大多数分析家的预料相反，伊朗的权力过渡并没有产生太多的麻烦，总统哈梅内伊很快被确定为伊朗新的精神领袖，议长拉夫桑贾尼则在7月的选举中顺利成为伊朗总统。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都属于比较开明的高级宗教和政治领袖，尤其是拉夫桑贾尼长期以来就是颇具政治智慧和务实精神的实权人物，他深陷“伊朗门”丑闻却又安然无恙；他以议长之位行代理总司令之职，最终实现了两伊战争的停火；在蒙泽塔里去职、政治清洗不断发生的情况下，他成功地推动霍梅尼同意对宪法作出修改，使他将要担任的总统职务得到更大的授权。他早就明白无误地宣称：“没有生产能力我们能有独立吗？如果我们总是不得不从别人那里得到小麦、肉、工业零件、机器以及技术工人，我们将一无所有——没有政治独立，也没有经济独立。”^②显然，拉夫桑贾尼注

① 美联社，德黑兰，1989年2月27日英文电。

② Edited by Hamid Zangeneh, *Islam, Iran & World Stability*,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4, P.176.

重实际的态度与霍梅尼强调宗教革命的倾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概括起来，拉夫桑贾尼的政策调整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为了改变盲目的国有化和管不善所产生的经济低效益，加快经济的恢复和重建，新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1991年4月的一项政府法令决定对国有企业和组织实行逐步的私有化，具体的操作办法是，通过相关政府机构的组织协调，把国有企业33%的股份优先转给企业职工，其余的67%将进入股票市场，根据德黑兰股票交易所的一份内部材料，到1991年底，进入股票市场的国有企业已达到261家，股票的票面价值高达3.58亿美元。^①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为了把逃离的伊朗资本家吸引回国，伊朗政府还无偿归还了许多在革命中没收充公的财产，尤为重要是，伊朗生死攸关的石化工业也向私人资本打开了大门，根据1991年底伊朗政府的公告，它已就9个石化工程的建设与私人部门达成协议。^②为了推动经济的重建，伊朗政府还引人注目地改变了对外国资本的态度，伊朗政府允诺，外国投资者不仅可拥有百分之百的股权，而且可自由将利润带出伊朗，为实现1989~1993年的五年计划，伊朗准备寻求270.4亿美元的外国投资，来自西欧、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投资者同伊朗在石油化工、铝矿和钢铁等领域达成了不少协议，一些外国资本甚至还参与了波斯湾克什姆和基什等岛屿的联合开发。^③

为了改善伊朗的国际形象，也为了使经济重建获得外国资本的支持，拉夫桑贾尼还对外交政策作出了必要的调整。1990年

① Edited by Hamid Zangeneh, *Islam, Iran & World Stability*,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4, P.192.

② Edited by Hamid Zangeneh, *Islam, Iran & World Stability*,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4, P.178.

③ Hamid Hosseini, Iran Privatizing Public Sector, *Mideast Markets*, January 20, 1992, P.7.

4~5月，伊朗发挥其在黎巴嫩的影响，一些被真主党和其他亲伊朗组织绑架的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人质相继获得释放，伊朗这一举动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积极评价，美国归还了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财产，而英国则声明尊重伊斯兰教、理解《撒旦诗篇》对穆斯林所造成的伤害，1990年10月，欧盟正式取消了与伊朗进行高层次外交接触的限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伊朗采取了一种可称为积极中立的立场，一方面，它反对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驻海湾，支持并积极参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另一方面，它也谴责了伊拉克的侵略行为，遵守联合国有关对伊拉克实施禁运的决议，支持西方国家为库尔德人建立安全区的动议。伊朗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的建设性立场，使它与埃及、突尼斯、约旦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联解体之后，伊朗在中亚获得了新的外交空间，利用种族、宗教和地缘上的有利条件，伊朗在中亚的影响迅速扩大，它不仅直接介入中亚的地区冲突，而且试图通过“经济合作组织”和里海合作区计划加强与中亚各国的经济联系。拉夫桑贾尼对外交政策的调整极大地改善了伊朗的国际形象和安全环境，虽然美国依然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伊朗依然受到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但与霍梅尼统治时期相比，伊朗已不是国际社会的弃儿。

四、1997年的大选与伊斯兰共和国的发展前景

1997年5月的伊朗大选中，温和的神职人员、80年代曾担任文化部长的哈塔米出人意料地战胜了时任议长的努里，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7任总统。大选之前，人们普遍看好努里，因为他不但在议会中有着广泛影响，更主要的是他还得到了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高级教职人员的强烈支持，而哈塔米不过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80年代还因过于“自由化”被解除了文化部长的职务。哈塔米的当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

欢迎，不仅长期与伊朗不和的沙特阿拉伯主动示好，就连美国也向伊朗新总统伸出了橄榄枝，而欧洲国家则干脆让自己的大使返回德黑兰，把柏林地方法院审判所引发的不快扔到了九霄云外。

国际社会对哈塔米的当选表示欢迎是因为他的许多政治主张更为开明。他相当巧妙地对过去的一些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主张“必须严肃地把宪法当作社会行为和法律秩序的规范”；他主张建立负责任的政府，在他看来，“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服务于民，其次是克服自由和自由思维的障碍，第三，防止道德和社会腐败”；他还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意义，“每个社会的活力依赖公众对计划制订与执行的参与程度，为了保证这种参与，个人必须感到安全，并对制度抱有必要的信心。人类至高无上的特质就是思维，因此必须为人类自由地思考和安全地表达开辟道路。思想从来就不受约束，即使在最压抑的环境下，思想也不能被套上枷锁”。^①哈塔米这些充满激情的政治理念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人们普遍指望伊朗的国内政治和外交行为能够发生显著的变化。哈塔米就任总统不过数月，对他的内外政策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我们所能看到是哈塔米不得不在所有的问题上谨慎从事，对内除了放松对一些报刊的审查、为一些新的出版物发放许可之外，主要是延续了拉夫桑贾尼的谨慎的改革政策；对外政策的变化似乎要多一些：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欧盟各国大使先后返回了德黑兰，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改善的征兆，尤其是1997年12月的德黑兰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更是扭转了伊朗的孤立状态。然

① Ziba Farzin - ma, The Seventh Iran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Its Probable Impacts o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s Foreign Policy, *The Ir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IX, No. 2, Summer 1997.

而，伊朗外交环境的改善主要是国际和地区国际关系演变的结果，它并不意味着伊朗的外交原则和对外政策行为的变化。指望伊朗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发生迅速变化是不现实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总统并不是国家的最高权威，也不是惟一的决策者，更不用说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无所不在的宗教对政治的监视都抑制了改革的热情。

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已近 20 年，无论是伊朗的国内政治还是伊朗所处的地区与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观察这种变化也许多少能为我们理解伊朗的未来提供一些线索。

从伊朗的国内政治发展来看，第一个变化就是伊朗的制度化建设已基本完成。1978～1989 年是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时期，与历史上大多数革命一样，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也显示出某种可称为“矫枉过正”的特征：意识形态主导一切、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偏激、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等。同时，革命领袖享有绝对的权威，他的政策选择往往是不可变更的。再加上伊朗革命的宗教特性和长达 8 年的战争所形成的压力，伊朗内外政策的非理性化和不可预料就毫不奇怪了。1988 年两伊战争停火是对伊斯兰政治体制的考验，这不仅是因为“一切为了战争”和“一切源于战争”这个可以解释所有问题的借口已不复存在，还因为伊斯兰政府必须令人信服地证明它能够从容应付现实的挑战：失业、通货膨胀以及经济重建。包括霍梅尼在内的伊朗最高统治集团显然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和政治制度的缺陷，因此，一方面容忍了一定范围内的政治争论，放松了对反对派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开始酝酿对宪法进行修改，其直接的效果就是 1989 年对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取消总理职务，赋予总统更多的权力，这一变化看似不经意，但实际上是消除了一个权力中心，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为直接、更有效率，拉夫桑贾尼之所以能够实现有限的变革，是与宪法修改分不开的。1997 年的伊朗总统选举尤其显得意味深长，一方面

宪法中关于总统任期的规定得到了切实遵守。另一方面，不管宗教领袖有多大的影响力，也不管他特别偏爱哪位总统候选人，他至少必须保持表面上的政治中立，并在选举后确认选举中的获胜者。纵观 1989 年以来的政治发展，一些现象值得注意：伊朗的政治权力过渡是平稳的，也是符合伊朗宪法的，换言之，伊朗的权力交接不像那些王权国家和专制国家充满不确定性；选举成了伊朗政治参与的主要载体，伊朗公民所享有的选举权利是中东的许多国家无法相比的；在一定的层次和范围内（如允许公开发表的报刊和议会内部），伊朗允许广泛的政策争论，伊斯兰议会也能够有效制约政府的行为。

伊朗国内政治的第二个变化可以概括为“形势比人强”。1988~1989 年的严峻经济形势促成了伊朗有限的经济结构调整；人口高出生率所带来的就业、住房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伊朗下决心对人口进行控制；而经济的全球化和冷战结束后各国普遍重视经济发展的倾向肯定是伊朗实行开放政策的重要诱因之一。由此看来，伊斯兰教并不是只有刻板教条一副面孔，在一定的情况下，它也会接受变革的现实。因此，伊朗内外政策逐步理性化应该是可以预期的。伊朗国内政治的第三个变化是最高宗教领袖权力的逐步回落和宗教保守势力的发展受到抑制。哈梅内伊继承了霍梅尼的职务，但并不意味着继承了霍梅尼曾经拥有的全部权力。由于在经历、学识和个人才能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哈梅内伊不可能像霍梅尼那样凌驾于宪法和国家三大权力机构之上，随意任免总统和政府部长，决定国家的政策，也不可能像霍梅尼那样超越所有的政治与宗教派别，调解他们的利益和冲突。哈梅内伊曾试图修改宪法第 110 条，以获得更大的授权，但这一努力在众多宗教人士的反对下归于流产，拉夫桑贾尼更是直言不讳地宣称，如果宗教领袖获得决策的完全授权，“政府

和议会将一事无成”。^①

在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宗教保守势力无疑受到了抑制，这不仅是因为他把前总理穆萨维、前内政部长穆赫塔希米和前新闻部长雷萨里这样一些激进的伊斯兰革命者挤出了决策核心，更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伊朗的经济变革和对外关系的调整。哈塔米赢得总统选举表明务实的政治选择得到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和妇女选民的广泛认同，而努里的失败多少也反映了宗教保守势力的衰落。

当伊朗的国内政策逐步趋于务实的同时，地区与国际环境也在向有利于伊朗的方向发展。众所周知，海湾战争之后，美国日益把伊朗当成了主要的敌人，它指责伊朗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反对中东和平、支持并参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于是，美国不仅把伊朗排除在所有的中东事务之外，而且还带头推动对伊朗的国际制裁，试图在国际范围内孤立伊朗。然而，最近几年（特别是1997年），地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似乎越来越有利于伊朗：中东和平进程自内塔尼亚胡上台以来就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众多阿拉伯国家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为了向美国施压，先后程度不同地改善了与伊朗的关系；美国对中东事务的独揽与霸道、达马托法的强制实行招致了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俄罗斯在经历了与美国的短暂蜜月之后也试图找回失去的大国尊严，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发展与伊朗的关系当作在中东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围绕中亚的争夺的加剧，伊朗的战略地位显得更为重要，甚至连美国的决策阶层也出现了调整中东政策、改善与伊朗关系的呼声。

^① Asghar Schirazi, *The Constitution of Iran: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trans. John O' Karc, I.B.Tauris & Co Ltd., 1997. London, P.77.

展望伊朗的未来发展，我们还看不到内外政策急剧调整的迹象，哈塔米虽然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但这是以能够满足人们的经济和社会乃至政治预期为前提的，更不用说宗教阶层依然是伊朗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因此，从一般的发展前景看，拉夫桑贾尼所开启的谨慎变革会持续下去，一旦这种改革不能满足人们的最低需求（如就业、住房等），或者这种改革激怒了保守的宗教势力，不排除伊朗发生政治混乱的可能。

第九章 结束语——伊斯兰： 威胁还是挑战？

伊斯兰是威胁还是挑战？从 80 年代末以来国际学术界就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因为它不是一个遣词造句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如何认识持续了数十年的“伊斯兰现象”问题，考虑到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先生已经预言一场“文明的冲突”即将来临，如何对伊斯兰作出判断已成为关系各国政府行为的重大问题：如果是威胁，无论如何应该将之消灭殆尽；如果是挑战，那就应该寻找与之打交道的方法。

一、伊斯兰威胁论的泛起

80 年代与 90 年代之交，当冷战的阴影和美苏对抗的恐惧逐渐离人们而去的时候，与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有关的一些重大事件却占据了人们视野：苏丹的伊斯兰化和南北旷日持久的内战、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在选举中的惊人胜利和随后的政治混乱、波斯尼亚的种族屠杀、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中亚的伊斯兰化倾向、埃及等国家的恐怖主义泛滥和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案等等，“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与西方的战争将被一场穆斯林与西方的战争所取代”，^① 于是一种伊斯兰威胁论迅速流行起来。

^① Willian Pfaff, *Help Algeria's Fundamentalists*, *The New Yorker*, January 28, 1991.

伊斯兰威胁论的泛起显然不是偶然的。首先，苏联解体后，沿着原东方阵营的边缘，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民族冲突和政治运动普遍高涨：在巴尔干半岛，有波黑内战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动乱；在外高加索有纳—卡冲突；在中亚则是伊斯兰复兴党的迅速扩散；俄罗斯内部有车臣危机；在阿富汗，塔利班民兵组织实际上已控制了包括首都喀布尔在内的大部分地区。第二，沿着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界地区，伊斯兰运动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从阿尔及利亚到埃及、从北非到地中海东岸，各种伊斯兰组织与政府的冲突不断升级，甚至有着长久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历史的土耳其也出现了伊斯兰政党控制政府的局面，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地中海的欧洲国家）来说，它长久以来就面对着仇视西方的穆斯林民众，如今，它很可能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西方的穆斯林政府。第三，伊斯兰因素还渗入西方社会，对西方国家的内部整合产生负面影响。据估计，生活在西欧的穆斯林超过了1000万，^①美国的穆斯林也有600万，^②这些因经济（劳工）或政治（流亡）原因来到西方的穆斯林移民，很难或根本不愿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由于这些移民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乡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在经受生活与工作艰辛的同时，他们更感到都市化的西方社会在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与自己的格格不入，一位西方观察家发现，“居住在德国的150万土耳其人中，大部分人比他们在土耳其的同胞更传统、更严格地遵守伊斯兰教的习惯”。^③这种远离主流社会、内向封闭的穆斯林社团不仅与许多社

① Edited by A. Jerichow & J. Simonsen, *Islam in a Changing World: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Curzon Press, Britain, 1997, P. 137.

② Graham E. Fuller & Ian O. Lesser, *The Geopolitics of Islam and the West*, Westview Press, U.S.A., 1995, P. 51.

③ Graham E. Fuller & Ian O. Lesser, *The Geopolitics of Islam and the West*, Westview Press, U.S.A., 1995, P. 52.

会犯罪（如走私、贩毒、暴力活动等）有所牵连，而且诱发了西方社会久已存在的毒瘤——极右势力和种族主义，更为重要的是，穆斯林世界的宗教与政治分歧已蔓延到这些穆斯林社团，他们在西方社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冲突。第四，伊斯兰教与西方的民主和人权观。冷战结束后，西方越来越把民主化和人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向全世界推销，在西方人眼中，不仅伊斯兰教法中类似断手、鞭刑这样一些条文严重违反人权，穆斯林世界普遍存在的政治专制也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在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那里，这种因文化传统、政治现实和发展进程所引起的差异更演绎成了“文明的冲突”，而且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第五，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长时期以来，绑架、暗杀、恶性爆炸等恐怖活动的泛滥一直是中东地区的一道主要风景线，恐怖主义者除了袭击政府要员和官方设施外，还把普通民众、外国游客、开明知识分子和学校、医院等民用设施当作打击目标，更有甚者，恐怖活动还蔓延到了欧洲和北美，制造了像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这样一些震撼西方社会的事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生化武器的扩散使国际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威胁更加巨大，也更难以防范。1995年3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投放沙林毒气所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恐慌，西方社会深感不安的是，如果这些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的武器落入对西方充满敌视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手中，后果可谓不堪设想，如果考虑到一些伊斯兰组织和穆斯林国家激烈的反西方倾向，特别是考虑到一些激进的穆斯林国家不仅涉嫌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而且渴望得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西方国家的担心也是顺理成章的。

除了这些地缘、移民、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西方社会伊斯兰威胁论的流行还受到了一种可称为“冷战后遗症”的驱动。冷战结束后，笼罩西方40余年的苏联威胁的阴影终于消失，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极大的热情和自信期待着“世界新秩序”的到来，尤其是当美国成功地动员国际社会的力量击退萨达姆在海湾的冒险之后，这个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的自信也达到了顶峰。布什总统宣称，“我们期待各国有超越冷战的新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要以咨询、合作和集体行动为基础，尤其要透过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集体行动。这个伙伴关系是依原则和法制而团结，并借由分摊成本与承诺所支持。这个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增进民主，增进繁荣，增进和平和裁减军备”。继布什之后担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以更加坚定的口吻宣称，“在新的危险与机会交替的时代里，我们最大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强化全世界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① 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越来越把“民主”、“自由”和“人权”当作对外政策和世界新秩序的支点，当民主化的浪潮似乎席卷全球的时候，民主本身却遇到了挑战。首先，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为民主化付出的高昂的社会代价引起了不少国家的高度警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则把西方所推销的民主和人权视为对国家独立与主权的威胁，干脆予以拒绝。其次，民主化对西方国家来说也有巨大的风险：一些与西方结成战略盟友的国家，一旦实现民主化，很可能产生强烈反对西方的政府。第三，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经历了民主化的地区，却出现了大量“不自由的民主国家”，美国《外交》杂志总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无奈地叹道，“那些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那些往往通过全民公决获得连任或重新得到确认的政权，一般无视宪法对其权力的限制，剥夺本国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②

① 亨利·基辛格，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

② 法里德·扎卡里亚：《不自由的民主制国家的兴起》，美国《外交》杂志，1997年11-12月。

在推销民主、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所遭受的挫折只是“冷战后遗症”的部分表征，真正的麻烦还是在西方阵营内部。首先，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失去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威胁或战略威胁，使得各国越来越以其眼前的国家利益，执行其外交政策”，^① 围绕着波黑内战、中东和平、对两伊的制裁、北约东扩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美国与欧洲发生了分歧，最近的一次重大分歧是围绕着伊拉克武器核查而展开的，除了英国紧紧追随美国的政策，西方大部分国家对美国再一次在海湾地区使用武力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第二，种族与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美国的主要特征，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移民的增加以及各种族集团对各自文化特性的强调，“潜在的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抬头——它一方面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认识，承认美国社会的多样式现实；但另一方面，通过蓄意贬低共同语言、共同的历史传统和政治价值观念的民族统一和社会平等的作用，它可能使多民族的美国巴尔干化。”^② 应该强调的是，布热津斯基的上述判断是与其它 19 个美国必须正视的问题并列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布氏并未把“潜在的”“美国巴尔干化”当作美国唯一的、决定性的威胁。然而，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文化的作用被提升到了决定一切的高度，在他看来，“在争取生存和霸权地位的斗争中，胜利属于文化上最统一、最坚定和最能适应追求全球权力的文明国家”，^③ 因此，“使美国非西方化”就成了对美国利益和西方利

① 亨利·基辛格，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第 744 页，海南出版社，1997。

②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潘嘉玢、刘瑞祥译：《大失控与大混乱》，第 11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③ 查德·鲁本斯基、雅勒·克罗克：《向亨廷顿质疑》，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4 年秋季号。

益的严重威胁。

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学术界来说，“一代学者的事业是建立在探讨冷战问题——如军备控制、核战理论和遏制一心推行扩张政策的苏联——的基础上的”，^① 因此，面对冷战后西方推销民主过程中的挫折和西方集团内部的离散，那些冷战的斗士几乎是出于本能就找到了使西方重新振作起来的方法：为西方寻找一个新的敌人，动员所有的力量和资源对之进行遏制，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伊斯兰、伊朗、伊拉克、北朝鲜、中国等先后成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威胁。亨廷顿先生显然是这些人中最为高明的，他反对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文化在全世界进行推销，也不赞成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他主张，当务之急是保持西方的活力和凝聚力，“团结一致，西方将仍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令人生畏的角色；四分五裂，它将成为非西方国家利用其内部分歧的尝试的牺牲品”。为了保持西方的凝聚力，亨廷顿开出的药方一是“在西方内部保持西方文化”，二是“明确规定西方的界限”。要达到前一目标，必须控制非西方移民，并使那些承认西方文化的移民融入西方文化；要达到后一目标，显然得费点周折，经过改造，拉美可以成为西方文化继美、欧之后的第三根支柱，另外，那些历史、宗教和文化属于西方的国家都可以加入北约，^② 显然，穆斯林世界和亚洲都被排除在“西方的界限”之外了。如果按照亨廷顿的方案，一场新的冷战为期不远，所不同的是，已经过去的冷战是以意识形态为分野，而新的冷战是以文化为界限；过去的威胁是苏联，现在的威胁则是伊斯兰教——儒教的联盟。

① 格雷格·马斯泰尔：《收起冷战思维》，美国《商业日报》，1996年9月20日。

② 塞缪尔·亨廷顿：《西方文化是特有的，但不是普遍适用的》，美国《外交》杂志，1996年11~12月。

二、伊斯兰威胁论质疑

从总体上来说，当代伊斯兰的复兴是伊斯兰教—穆斯林世界传统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对穆斯林社会同时经历的两种历史进程所作出的反应。第一种历史进程是西方的扩张及其对穆斯林社会所形成的压力，第二种历史进程是伊斯兰教的衰落和穆斯林社会的解体。应该说，在这种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的交互作用下，穆斯林社会内部自救图强的努力与尝试从来也不曾停止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的崛起很大程度上阻延了伊斯兰各民族衰落的趋势，也满足了普通穆斯林民众复兴民族、宗教和社会的希冀，然而，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和各穆斯林国家政府在解决最基本的社会问题方面的无能，普通民众的不满与失望迅速达到一个新临界点，穆斯林国家所面临的现实是，对外，他们难以摆脱大国的全面控制，对内，不适当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引发了普遍的不满。由此看来，当代伊斯兰复兴不仅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和改革主义特征，而且它的崛起也有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

然而，对当代伊斯兰复兴民族主义和改革主义特征的注意，对其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复兴思想就是能够解决穆斯林世界所面临问题的灵丹妙药，尽管当代伊斯兰思想家和理论家无一例外强调伊斯兰教及其经典《古兰经》对穆斯林社会所有事务的指导作用，并尽其所能对现实社会问题作出伊斯兰的回答，然而，伊斯兰复兴思想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首先，被大多数伊斯兰思想家视为至尊的伊斯兰教法并不能指导、约束和规范当今社会的所有事务，即使是最为激进的伊斯兰政权如伊朗者，也不能排除一些世俗法律的广泛使用。其次，作为一种革命理论，伊斯兰思想极具煽动性，尤其是它对社会不平等、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等社会弊端的揭露与批判更是极具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揭露与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能

为社会构建崇高且具现实依据的政治理想，在这一方面，大部分的伊斯兰思想家把穆罕默德所创建的乌玛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的统治奉为理想的政治模式予以宣传，并试图付诸实践，但“复制”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霍梅尼所创建的伊斯兰共和国，即使抛开其什叶派特质，它也很难在穆斯林世界得到广泛认同。第三，当代穆斯林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在经济与科学加速发展、全球竞争与合作日趋广泛的情况下，如何为国家的发展寻找适当的模式，虽然伊斯兰的思想家们普遍对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持否定态度，强调“伊斯兰就是解决方案”，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第四，当代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伊斯兰教的经典中未加叙述是十分正常的，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其中包括作者本人），伊斯兰教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要看伊斯兰思想家怎样对《古兰经》和其他经典作出新的解释，然而，不幸的是，出现这样的宗教——政治思想权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① 现有的一些思想家也更多地是强调当代社会对伊斯兰的背离，而对事关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妇女的作用、人口控制等）则持极为保守的态度。

伊斯兰思想的诸多局限性显然是伊斯兰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更不用说对西方、对世界构成威胁了。另外，无论是从伊斯兰运动的现状还是从穆斯林国家的对外关系来看，我们也很难相信伊斯兰威胁论这一政治神话。

由于穆斯林各民族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在文化与传统上对伊斯兰教的认同，伊斯兰思想和伊斯兰运动的跨地区、跨国家的影响显而易见，然而，伊斯兰运动绝不是铁板一块，不仅穆斯林世界

^① As' ad Abukhalil, *The Incoherenc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rab Islamic Thought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48, No.4, Autumn 1994.

不存在组织相联的伊斯兰运动，甚至一国内部的伊斯兰运动也呈现多元、多面孔的倾向，除了教派分歧引发的纷争之外，影响当代伊斯兰运动的因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利益。各国的伊斯兰组织基本上是以政府的反对派而出现的，他们大多也强调穆斯林共同体——乌玛利益的一致性，然而，在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中，这种政治和宗教的一致往往不复存在，不同民族的两个国家（如伊朗与伊拉克）如此，同一民族的两个国家（如科威特和伊拉克）亦复如此。第二，多中心倾向。从近代以来，除了像阿富汗尼、毛杜迪、班纳、库特卜、霍梅尼等一批在穆斯林世界享有广泛声誉的思想家以外，各穆斯林国家还有许多拥有众多追随者的宗教领袖和乌勒玛，不同的师承、不同的思想渊源往往形成不同的组织和派别。第三，政治分歧。政治上的纷争是伊斯兰运动产生不同派别的重要原因，有的伊斯兰组织致力于社区服务，有的则进行暴力和恐怖活动；有的伊斯兰组织转变结构与职能，努力在现行体制下进行合法的斗争，有的则不愿与政府同流合污，宁愿以隐秘的方式向重要的政府机构渗透。伊斯兰运动中的复杂派系不仅造成内部争吵和不断的分裂，而且严重影响伊斯兰组织在普通民众中的声誉。

伊斯兰教对于国家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影响不能随意夸大。我们不否定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很强的伊斯兰色彩，实际上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对此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然而，对穆斯林国家来说，决定外交政策及行为的主要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伊斯兰意识形态，应该看到，在当代的国际政治中，民族、国家依然是行为的主体，而文化和文明这些抽象的概念并不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由此，我们才会看到，政教合一国家中，既有伊朗这样美国的死敌，也有沙特这样的美国的坚定盟友；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他们不会因为埃及有着浓厚的伊斯兰文化色彩减少对它的援助和支持，也不会因阿萨德对伊斯兰组织的

严厉限制而把叙利亚从“黑名单”上一笔勾销。另外，伊斯兰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并不全是负面的。除了输出革命、支持恐怖活动和拉什迪事件这样一些西方国家大肆渲染的“伊斯兰威胁”之外，伊斯兰教及伊斯兰国际组织还是国际政治中一支极具建设性的力量，当年，若不是阿富汗伊斯兰组织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圣战者对苏联的侵略进行殊死抵抗，美国可能根本无法阻止苏联的南下；冷战结束后，以伊斯兰会议组织为代表的众多伊斯兰国际组织在一系列重大的地区事务（如阿以和平、波黑内战、海湾危机等）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影响。至于西方国家宣传的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所造成的威胁可以说与伊斯兰教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首先，涉嫌卷入恐怖活动的不只是伊斯兰组织，根据美国国务院1997年10月8日公布的恐怖组织名单，恐怖组织遍及各大洲，其“文化”背景也可谓丰富多彩。其次，受到指控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如哈马斯（巴勒斯坦）、真主党（黎巴嫩）和伊斯兰武装组织（阿尔及利亚）等主要是民族冲突或政治斗争的产物，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们动员、组织和宣传群众的工具，宗教可以激发人们的献身精神，但宗教本身决不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涉嫌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受到美国指责的穆斯林国家，如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很难证明他们是出于伊斯兰宗教的目的才如此行事，明摆的事实是，巴基斯坦不愿放弃自己的核计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长期对手印度实际上已是一个核大国；中东的一些穆斯林国家致力于发展“穷人的核武器”（意指生化武器，前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语——作者注）则是因为以色列不仅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而且早已跨进了核门槛。当然，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外，每个追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穆斯林国家肯定还有其他的目标，但是，将之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却是过于牵强了。

三、伊斯兰挑战

所谓“伊斯兰威胁”不过是西方在冷战后制造的众多神话之一，然而，遍布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复兴和伊斯兰运动的不断高涨，还是给国际社会提出了众多的挑战。

第一方面可以概括为理论和思想的挑战。自从哲学和其他各门学科摆脱神学的束缚之后，主要以西方为背景兴起的各种占主导地位的近现代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和发展理论都把科学与理性、世俗化与政教分离等作为最基本的原则。当代伊斯兰复兴不仅在理论上强调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和综合性，反对各种世俗的意识形态，而且在实践上把伊斯兰化当作主要的政治和社会目标。于是，一些理论和思想上的疑问由此而生：除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有没有一个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模式（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世俗化、政教分离对于现代化是不是必不可少？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有没有相容性？等等。第二方面可以概括为制度性的挑战。首先，穆斯林各国的伊斯兰组织和反对派把反对现政权、改变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作为主要的目标；其次，穆斯林国家和各种以穆斯林国家为主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对主要由西方控制的国际秩序表示不满。总之，在国内、地区和国际政治等三个层面，带有伊斯兰特征的力量都表现出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第三个方面可以概括为决策的挑战。全世界的穆斯林大约有 10 亿，他们分布在非洲、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 50 多个国家，同时，欧洲和北美的穆斯林也处于迅速的增长之中。在穆斯林民众中，他们因信仰真主而成为兄弟，但教派、民族、国家和政治等方面造成的分歧又使他们陷入分裂与争吵；在穆斯林国家当中，由各种矛盾所引发的争论更为激烈，在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而大打出手。对于各国的决策者来说，应付这样一种局面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更不用说，当伊斯兰组织和穆斯林国家所追

求的目标与自己相互交叉、相互重叠时，挑战更为严峻，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如何对待伊斯兰通过“投票箱”而不是通过“子弹”获取政权这样一种前景：既然民主、选举是政治进步的重要标记，那么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能否坦然接受一个民选的伊斯兰政府呢？从过去的经验看，西方国家还没有作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他们默许了阿尔及利亚军方对政治变革的干预，他们支持一些国家对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他们对土耳其把埃爾巴坎和繁荣党赶出政治舞台连一则评论也不愿发表。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运动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断定伊斯兰因素会从国际政治舞台消失，因此，把伊斯兰当成一种威胁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显得过于轻率，当全球化越来越成为新世纪的发展特征、当战争与对抗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摒弃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对话与理解、通过伊斯兰自身的反省与变革，穆斯林世界一定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国际政治论坛 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

作者 =

页数 = 3 0 9

S S 号 = 1 0 1 5 7 8 9 1

出版日期 =

目录

- 第一章当代伊斯兰运动概论
 - 第一节 当代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历程
 - 第二节 当代伊斯兰运动的基本类型
 - 第三节 当代伊斯兰运动——研究视角
- 第二章伊斯兰——历史的透视
 - 第一节 伊斯兰教及其主要特征
 - 第二节 伊斯兰教的生命力
 - 第三节 伊斯兰教的复古传统
- 第三章伊斯兰社会——来自外部的压力
 - 第一节 外部压力的来源
 - 第二节 外部压力的表现
 - 第三节 外部压力的特点和影响
- 第四章伊斯兰社会——来自内部的危机
 - 第一节 近代以来传统伊斯兰社会的解体
 - 第二节 二战后伊斯兰社会的困惑与挑战
- 第五章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伊斯兰运动
 - 第一节 国际格局的变动及其影响
 - 第二节 伊斯兰与国际关系
- 第六章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变革
 - 第一节 冷战的终结与穆斯林世界
 - 第二节 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变革
- 第七章政治变革进程中的伊斯兰组织
 - 第一节 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
 - 第二节 埃及：排斥伊斯兰的政治
 - 第三节 突尼斯：从复兴到革命的纳赫达运动
- 第八章伊斯兰政治的发展前景
 - 第一节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治发展
 - 第二节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发展
- 第九章结束语——伊斯兰：威胁还是挑战？